

..... 62-2746 文子一(1) Δ 200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回忆 62-2747 程潜斌(44) 200

一九二三年谭赵战争与湘军入粤 62-2746 方鼎英(52) Δ 500

谭赵战争亲历记 63-2747 戴岳(64) 600

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62-2746 刘兴遗稿(74) Δ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62-2745 唐生智(98) Δ 1000

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64-281 汤季楠(109)

广州政治讲习班始末 (121) Δ

记留俄学生 62-1400 何汉文(133) 200

留学苏联的片断 李拔夫(166)

“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卜介侯 任伊平(177)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二)

..... 童紫剑 欧阳泗 陈崧涛 郑汉吾(182)

何键统治湖南初期的一次党潮 文任武(198) Δ 1000

63-2749

补充与订正

关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片断回忆 63-258 彭子国 汤季楠 唐菊庵 张际泰(210) 200

对南岳游干班、西南干训班史料的订正 熊壮猷(223)

国民党湖南省党反共活动的订正和补充 胡蔚彰(226)

蔣軍進犯延安及慘敗經過

文 于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發動了對延安的進犯。擔任進犯的蔣軍是胡宗南部。筆者在胡部任職頗久，進犯延安前後任整編第二十九軍（前身為三十七集團軍）^①參謀長，參與了這次作戰。現就回憶所及，將胡軍進犯延安及慘敗的經過，作一概括的敘述。其非本人所親歷者，則略而不詳，有待旁人提供材料。事隔多年，記憶難免錯誤，又缺乏地圖、資料可查實証，尚希知者予以指正。

遠在抗日戰爭初期（一九三七年冬），國民黨軍隊自上海撤退時，蔣介石為了保存反共力量，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便令胡宗南（當時任第十七軍團長兼第一軍軍長和第一師師長）率第一軍撤到河南。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向武漢進迫，胡部在豫南與日軍剛一接觸，蔣又令其避而不戰，盡棄豫南城池，撤入陝甘地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包圍封鎖，企圖扼殺中共於這一狹小貧瘠地區；同時大肆擴充部隊，擴大地盤，積極準備反共力量。從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四七年春進攻延安前夕，胡部由不足五萬人的正規軍擴充到四十七、八萬人的龐大軍事集團。加上轄區的各補訓處、師管區和

①一九四六年二月，國民黨政府召開了復員整軍會議，決定整編國民革命軍隊，將原來的集團軍改稱整編軍，原來的軍改稱整編師，原來的師改稱整編旅。本文中敘及的旅番號，都是整編師、整編旅，相當於原來的軍或師。

地方保安部队，达五十六、七万人；屯驻东起豫西、晋南，西迄新疆伊犁这一辽阔地带，而以主力置于关中、陇东地区，长期虎视延安，企图伺机进犯。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即妄图以军事进攻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只以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形成强大压力，并因进行军事准备需要时间，遂虚与中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表面上达成“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利用这种和平烟幕，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一经完成进攻准备，即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动大军对东北、华北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结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一九四七年春，又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妄想先在这两个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或将它赶过黄河，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迅速解决西北方面的军事问题，以利尔后集中转用兵力于华北、东北，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并达到在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目的。

进攻延安的任务，自然落到胡宗南的身上。胡以两个整编军辖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总共约十三万多人（实际担任进攻作战的，在占领延安前为两个整编军部指挥的四个整编师——十一个整编旅，余任守备及维护补给交通线的安全；占领延安后最初为九个整编旅，约七万多人；继后由于不断遭受到损失减为七、八个整编旅）的兵力投入这次战争。在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进占延安；可是并没有达到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或把它赶出陕甘宁边区的目的，相反却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常家高山、岔口村、清涧等几个战役，被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五个整编旅，还有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整编旅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宜川瓦子街一役，

刘戡的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部和两个整編师部、五个整編旅部、八、团被歼灭；从进犯延安到宜川战役仅一年的時間中，总共被歼灭一个整編軍部、三个整編师部、十个整編旅，另有一个整編师部和一个整編旅受到重大损失，使号称蒋介石的“王牌”军队的胡宗南部遭受严重的打击，不得不退出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从而开始走上了复灭的道路。

蔣軍进犯延安，本是一次垂死的掙扎，其失敗是注定了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和当时已經出現的不利于蔣的軍事形势，是失敗的根本原因。胡宗南的指揮拙劣及其他的一些弱点，也是造成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胡宗南对人民解放軍和自己的部队都缺乏正确的估計，既輕敌，又惧敌。他自恃兵力雄厚，蓄养多年，在奉到进攻延安的命令之后，为了邀功取宠，滿冀一战而获全胜；但又鉴于与解放軍作战的历史教訓，对对方怀着严重的戒惧心理。因此，在战略指导上，一开始就不想寻求西北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决战，只是采取驅逐作战的态势，企图把对方赶过黄河；同时由于害怕暴露自己部队的弱点，被解放軍各个击破，始終采取以大兵团密集平推的战术。这就正好为解放軍执行避开主力决战、相机歼敌的战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胡为人刚愎自用，不肯傾听下級將領的意見，并且欢喜越过下一級指揮机构直接指揮部队；他的私心很重，賞罰不公，有功則据为己有，有过則諉諸別人，因而加深了部队内部的矛盾。这些，对于加速胡軍的复灭，无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我就将进攻延安前后几次較大的战役中尚能回忆起来的事实，分段記述。

三原作战會議，进攻“腰形地带”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奉到蔣介石的命令，

要他开始进攻延安。他决定首先夺取封锁线①上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②，作为进攻延安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它象一把尖刀直插入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并有如下的几个作用：（一）便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隴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隴海铁路西段及陕甘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二）使陕甘宁边区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蒋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使蒋军增加约三百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感到十分头痛，久已蓄意侵占，只因时机未至，不敢贸然动手。现在既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夺取这一地带当然是时候了。同时，为了便于从隴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这一地带不可。

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指定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胡宗南事先命我拟订作战方案；随即于二月九日清晨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将领，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

①蒋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系东沿黄河，南自洛川东西之线至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西经隴东抵宁夏，北抵榆林。

②按封锁线上的地形，从宜君至正宁本系在东西一条平行线上。而封锁线实际上在这一段间，是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形成在封锁线上向南的一个“囊形”，蒋军就将这一地带叫做“囊形地带”。

謀長薛敏泉、參謀處長汪承釗，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參謀長文于一，三十六師師長鍾松、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十二旅旅長陳子干、二十四旅旅長張新、四十八旅旅長何奇、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以及其他高級幕僚共二十余人（整編第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享、整編第一六五旅旅長李日基未趕到）。

胡宗南主持會議，首先講話，大意說：我們要根除共產黨在中國的“禍害”，必須首先消滅它的武裝力量；要達到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滅它在陝甘寧邊區的主力軍，摧毀它的首腦機構。我相信可以在兩個月內解決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問題，六個月內消滅整個共軍，解決全國對共軍作戰的軍事問題。現在決定先奪取“囊形地帶”。這一戰關係爾後我軍向延安進軍能否順利進展，希望大家努力達成任務。

接着由我代表軍部報告作戰計劃。計劃要點如下：

為了達到消滅“囊形地帶”內的共軍的目的，擬採取四面合圍的戰術。以整編第一六五和整編第四十八兩個旅分別從宜君西北及正寧東南，以果敢迅速的行動，插入“囊形地帶”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領要點，封閉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從囊內北撤的共軍；以主力控置於馬欄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東西兩側，準備截擊共軍。軍主力同時從東、南、西三面迅速推進，包圍囊內的共軍而殲滅之。軍預備隊控置於宜君附近，以便進出袋口以北地區，聯系封鎖袋口的部隊，截擊共軍南下救援部隊，以期一舉而獲全勝。

薛敏泉在我報告完畢之後，對軍部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此次作戰的目的主要在於迅速奪取“囊形地帶”，不同意封閉袋口，主張僅從東、南、西三面進攻。我仍極力主張執行原方案。我所得的理由是：認為作戰在軍事上的目的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一個是奪取戰略要地（點），控制空間。只有實現了前

一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得了地方，也只是一种虚假的、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况且我们既经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已不可能隐瞒下一步必将对延安采取行动。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发动，为了调集兵力（当时整编第一军的主力还在晋南）完成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和补给设施等，势非有一个短暂的间隙来进行准备不可。既然如此，则应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北窜（其实这也只是我们的主观幻想，对于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和在当时情况下的人民解放军作战来说，要想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我和薛敏泉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钟松起来发言，也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方案。胡宗南眼看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出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于是，既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开会之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说过，这个方案经军部研究过，似乎以这样较为妥当），也不让其他将领发言，正颜厉色地向大家说：

“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部署的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说完即宣布散会。到会将领皆相视无语，旋即各返防地准备行动去了。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占领延安，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和地位。

二月十四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胡军从东、南、西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分别指挥各该师（欠整编第二十八旅，整编第一

四四旅)及整編第十七師之第十二旅,第四十八旅,東自宜君、銅川、耀縣,南自三原,西自淳化,枸邑、正寧,向“囊形地帶”推進;整編第四十七旅為軍預備隊,控置於三原附近。當部隊剛一進入解放區,原在該地區的一部西北人民解放軍(據了解系新四旅)即從容地主動向北撤走了。除第十二旅在峽台嶺一度與解放軍掩護撤退的部隊發生戰鬥外,幾乎沒有打什麼仗。胡軍進犯部隊除了占領這塊地方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

洛川作戰會議, 侵占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前後,胡宗南部董釗的整編第一軍和劉戡的整編第二十九軍所屬各部已分向宜川、洛川地區集結,準備待命向延安進攻。三月十一日晚上,胡宗南在洛川的西安綏署前方指揮所召開參加對延安作戰部隊旅長以上將領的作戰會議。到會的有(按部隊建制排列):西安綏署副主任裴昌會、副參謀長薛敏泉、參謀處長汪承釗;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參謀長朱俠,第一師師長羅列,第一旅旅長吳俊,第七十八旅旅長沈策,第一六七旅旅長李崐崗,第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第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第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亨,第九十師代師長陳武,第五十三旅旅長鄧宏義,第六十一旅旅長鄧鍾梅;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參謀長文子一,第十七師師長何文鼎,第十二旅旅長陳子干,第三十六師師長鍾松,第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第一六五旅旅長李日基,第七十六師師長廖昂,第二十四旅旅長張新,第一三五旅旅長祝夏年(該旅系西安綏署的直轄旅,當時尚未編入師,新撥歸二十九軍指揮的。會後祝夏年病假離職,由副旅長麥宗禹代旅長)等。此外還有隸屬第十七師的四十八旅旅長康莊、第八十四旅旅長張祺,隸屬第三十六師的第二十八旅旅長徐保,隸屬第七十六師的第一四四旅旅長賈貴英,或因部

隊尚在調集途中（四十八旅和八十四旅），或因另有任務（二十八旅被調空運增援榆林，一四四旅留在關中為控置部隊），沒有到會。

胡宗南主持這次會議。他裝出一副極為得意、不可一世的神態，首先講話，大意說：我們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現在領袖（指蔣介石）授命我們進攻延安，徹底摧毀共產黨的根據地，解決西北地區剿共的軍事問題。我們已經集中了十幾萬大軍，比敵人多幾倍；還有鄧寶珊的部隊在榆林，馬鴻逵的部隊在隴東，配合我軍進行封鎖堵截，形勢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大家要不負領袖的重托，發揮革命軍人的精神，奮勇作戰，建立奇功，延安必可指日而下，勝利穩穩在握。

繼由綏署參謀處長汪承釗報告作戰計劃。計劃的主要內容是：以十五個整編旅（約十三萬多人）的兵力，區分為左右兩翼兵團，總預備隊及第二綫部隊。為了避免重蹈被共軍各個擊破的覆轍，分為兩路大軍，採取密集平推、齊頭並進的戰術，向延安攻擊前進。

戰鬥序列：

右翼兵團：

指揮官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

整編第一軍

工兵某團一個營

左翼兵團：

指揮官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

整編第二十九軍（欠整編第十七師——缺第十二旅、整編

第三十六師之第二十八旅、整編第七十六師）

整編第一三五旅

炮兵第一旅某團野炮一個營

裝甲兵第二團戰車一個連

（工兵某團（欠一營）

(野炮营、战车连、工兵团由茶房前进后，因道路不便运动，归入总预备队。占领延安后(四月十三日)又增调整编第五十五旅姚国俊部归二十九军指挥。)

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十六师(欠第一四四旅)

第二线部队：整编第十七师(欠第十二旅)

作战行动及任务，规定：

右翼兵团在牛武镇东边之××经××至××(地名忘记)之线(线上属左翼兵团)以东地区；左翼兵团在董兵团以西地区；右翼确实联系董兵团，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及其以西地区；两军同时向延安攻击前进。每日开始行动时间和应到达之线，均有统一规定，并严令不得有违。规定三月十三日黄昏前后，右翼兵团应到达临真镇、金盆湾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左翼兵团应到达牛武镇、交道镇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实行战地封锁，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附近，当攻击进展后，随左兵团之后，沿咸榆公路东侧山梁跟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第二线部队在攻击部队行动开始前，应保护铜川至洛川间的交通线；尔后随战斗的进展向前推进，尽速修复洛川至延安间的咸榆公路，并保护铜川至延安的交通补给线的安全。

攻击开始时间及攻占延安的期限：规定三月十四日(原定三月十三日。因整编第一军的军、师、旅长须从洛川转回宜川附近调动部队进入攻击准备地区，时间来不及，胡宗南在散会时当场宣布推后一天)拂晓开始攻击前进；限三月十九日以前必须占领延安。

汪承剑报告完毕，胡宗南要大家对作战计划发表意见。董剑首先表示右翼兵团完全同意签署计划。刘戡因患气管炎甚剧，说话困难，由我代表发言。我主要讲了两点意见：(一)签署作战计划以两

大兵团采取密集齐头并进，只求尽速顺利进占延安，不急于迫敌决战，似无不可，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能否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终须通过双方主力最后决战，消灭了对方的主力，才算取得真正的胜利。(二)两翼兵团都系大部队，应可独立作战，至少能够支持一定的时间。左翼兵团有不少重武器。綏署计划规定，本兵团各部队均系沿咸榆公路两侧狭窄正面的高山梁上行动，势必拥挤不堪，既碍大軍行进，一旦与敌接触，更不利于作战部队的进出和展开。可否酌予变更，除以必要的兵力沿山梁逐步占领要点搜索前进外，以主力部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前进，主力保持于右翼。胡宗南在我发言后，問刘戡的意见如何。刘戡低声回答：“刚才文参谋长是我請他代表发言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什么补充。”刘戡说完，大家面面相覷，默默无言。经过短时间的沉寂之后，胡宗南作出决定說：“左翼兵团的行动，可照該兵团所提的意见办；其他部队均按原计划执行。”說完便宣布散会。

刘戡和我在归途中談到會議上的情况，认为胡宗南同意我們提出的变更左翼兵团行进路綫的意见，显然出于勉强。可能是因为上次进攻“囊形地带”由于沒有采纳我們的意见，結果扑一个空；加以刘戡认为綏署正副参谋长盛文、薛敏泉二人均无带兵作战經驗，他們所拟的作战计划往往只是一些紙上作业，曾当面向胡提过意见，所以今天在会上才勉强接受我們的意见。预料会后薛敏泉仍将坚持原案，胡宗南也可能会有反复。

次日清晨，刘戡正在他住所的院子里打太极拳，一眼望見裴昌会偕汪承釗向这边走来，赶快走进室内对我說：“你看，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我們这位裴学长（裴同刘和我系陸軍大学同期同学，刘向以‘学长’呼裴）和汪承釗到这里来了，他們定系为宗南作說客来的。如果裴表示想要維持他們原来的方案，我們應該表示服从綏署的决

定，不要再談別的。”裴等與我們見面后，果然表示此來係為了疏通意見，希望我們同意綏署原來的計劃。劉戡很痛快地說：“我們雖然對計劃提了一點修改意見，綏署考慮全局，如何決定，我們自當絕對遵照執行。”裴昌會听了劉戡的話，連聲說：“很好！很好！那么，就是這樣辦吧。”說完，便笑瞇瞇地回綏署指揮所去了。不一會，胡宗南又親自打電話來約劉戡和我到指揮所去。見面后，胡只是嘻嘻哈哈南京城隍北京土地地談了一通，根本沒有提及作戰計劃的問題。大概意在聯絡感情，沖淡彼此內心的不歡情緒。

十二日下午，西安綏署下达了內容與昨天作戰會議上提出的計劃相同的作戰命令，規定于十四日拂曉開始全綫攻擊前進。

當時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解放軍僅二萬余人，而蔣軍約近二十萬（包括進攻邊區的胡宗南部和擔任防堵的榆林方面的鄧寶珊部及隴東方面的馬鴻逵等部）之眾，兵力對比，相差懸殊。在此情況下，西北人民解放軍僅以教導旅及警衛集團的三、五千兵力，在延安以南阻擊胡軍的進攻部隊，擁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安全轉移；隨即採取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死守一城一地，主動撤出延安，誘敵深入，以逸待勞，給對方製造過失，尋找機會，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正確方針。當西北人民解放軍撤出延安時，故意以少數部隊向延安西北方面撤退，以迷惑胡軍；主力則集結于延安東北之青化砭地區隱蔽起來，準備待胡軍進出這個地區時，出其不意地打它一個截擊戰。

三月十九日近午刻，胡軍先頭部隊已接近延安。當時解放軍已全部撤出延安。胡軍不明情況，鑒于過去吃虧的教訓，深恐又中解放軍誘敵之計，不敢立即進入市區，在延水南岸山上徘徊多時。整編第一師始以少數部隊逐段擁護搜索前進，并向四面八方亂打槍，使用威力搜索探明究竟后，才敢進入市內。

胡軍未經大戰便占領了延安，使胡宗南产生了解放軍“惧怕决战”的錯覺。他在到达延安时，对刘戡和我說：共軍不战而弃延安，証明它自度兵力处于劣势，不敢与我軍主力决战。現在只要我軍以主力尾敌穷追，广面扫蕩，它必将渡黃河东窜。我軍必須迫使它在陝北地区与我决战。他原先只图很快地将中共中央和陝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軍赶过黃河，此刻又改变了主意，急于寻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决战了。

当胡軍进占延安时，对解放軍主力的去向不明。据空軍偵察和各方面的报告，当我軍进占延安直前，共軍有大队人馬向延安西北安塞方面撤退。因而誤以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軍的主力。胡宗南既决定寻求解放軍的主力决战，在占領延安后，除以整編第二十七师师部率整編第四十七旅在西安綏署直接指揮下担任延安守备，并令整編第三十一旅进驻拐峁（延安东北三十多里），担任延安外围警戒和搜索敌情外，即令董釗率整編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共五个旅于三月二十四日奔赴安塞，結果是扑一个空；于是又令董部于翌日（二十五日）轉回延安，进行补給，待命行动。

胡軍在中共主动撤退的情况下侵占延安，根本沒有經過什么大战，仅在延安以南双方有些小的接触，亦无重大伤亡。胡宗南为了邀功取宠，在向蔣介石报捷的电报中，却大扯其謊，說什么“經七昼夜（原来上报开始进攻的日期是三月十三日）激战，已于三月十九日拂晓攻占延安，击毙和俘虏共軍各二万余。”蔣介石将这一完全出于捏造的“大胜利”向全国和全世界大吹特吹地加以宣传后，蔣管区的許多中外記者和反动派的一些知名人士，紛紛要求来延安參觀。蔣介石电令胡宗南对这些要来參觀的人准备欢迎。为了处理迫切的軍事問題和应接来訪人士的問題，胡宗南很快就去到延安。他到延安后，除了积极策划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外，对于如何矇騙外面

來訪的人，使自己的謊言不被拆穿，確也煞費心機。由於解放軍撤出延安時，實行了空室清野，不僅物資撤得一干二淨，連老百姓也找不到幾個，眼看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準備一套虛假的“戰績”和接待用的東西，是有困難的。於是胡宗南一面繼續使用撒謊伎倆，向蔣介石詭稱：延安飛機場和洛川至延安間的公路已被嚴重破壞，正在日夜趕修，須俟修復後始能接待；一面從關中區征派民工，趕運延安，整飾市容，擴修機場，並由西安運來大批高貴食物及日用品，連招待所、酒吧間、理髮廳和浴室等的一切設備（如沙發、桌椅、搪磁澡盆、中西餐具等）以及這些場所的服務人員，也都是由西安接運來的；同時，他挖空心思想出一個辦法：以自己的整編第二十七師的人員和武器，改裝成為這次戰役中擄獲的戰利品，以之愚弄前來參觀的人。後來在參觀中雖然露了不少破綻，出了一些洋相，好在有些人明知是假的，也心照不宣，总算勉強應付過去了。

這次胡宗南在延安，還處理了整編第一旅同整編第六十一旅和整編第七十八旅爭執首先进入延安的“戰功”問題。原來胡宗南為了掩飾整編第一旅上年九月在山西浮山被歼的敗績^①，並圖振作該旅的士氣，在下達進攻延安的命令時，曾向擔任正面攻擊的軍長示意：仗由大家打，但應讓整編第一旅首先进入延安。而事實上最先进抵延安近郊的是整編第六十一旅，同時進入市區的還有整編第七十八旅。胡宗南向上面報告則仍說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隊是整編第一旅。因此便引起了有關幾個部隊的爭執，六十一旅和七十八旅的官兵對此深表不滿。胡宗南既不愿也不便再改變上報的原案，又不能不顧全事實和部隊的團結，於是採取對內不談那個部隊最先进入延安的問題，了結了這個糾紛。

^①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蔣軍整編第一旅在山西省浮山被人民解放軍全部歼滅，旅長黃正誠被俘。

青化砭战役，整编第三十一旅被歼

前面提到，董钊率五个整编旅于三月二十四日奔赴安塞，企图捕捉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结果扑一个空。由此证实了解放军从延安撤出时，向安塞方面移动的只是一小部佯动部队，其主力并未撤到这一地区。同时，复据空军报告，当天（二十四日）有共军零星部队在延安东北，沿咸榆公路向清涧方面撤退。据此，西安绥署认为解放军主力可能已远撤到延安东北地区。实际上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的确是向这个方向移动的，不过并没有走得很远，而是埋伏在距延安约六十里的青化砭附近。

胡宗南这时一心只想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或把它赶过黄河，以期在短期內结束陕北战事，俾蒋介石能够转移兵力于东北、华北战场。为了便利尔后主力部队进出于清涧、绥德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同时顺道扫荡延安外围，以固延安守备，并在延安至清涧的交通线上建立据点，分兵驻守，整修交通，屯积粮弹，以利作战部队的进出和补给，绥署又令整编第三十一旅由捞牢推进至蟠龙（在延安东北，距延安九十里），搜索敌情。

由捞牢至蟠龙，计程五十余里，主要交通线是咸榆公路。公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山脉，公路就修在山沟里，旁边有一条小河沟（平常无水）与之平行。整编第三十一旅于三月二十五日晨由捞牢出发，沿着这条漫长的山沟向蟠龙前进。由于解放区的人民觉悟高，坚壁清野作得彻底，胡军对敌情毫无所知，完全处于盲目状态。该旅北行二十多里，便已进入早经埋伏在青化砭地区的解放军的伏击圈内。当先头部队发觉去路被堵住时，左右两边山上的解放军的大军已夹击而下，队尾后路亦被截断，全旅被困在一个口袋里割成数截，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四面弹如雨注，山沟里死

伤的人馬累累。結果全旅被歼，旅长李紀云被俘（該旅一九四六年七月間在山西聞喜曾一度被解放軍全歼，这是第二次被歼）。当战斗开始时，胡軍主力部队正在延安近郊进行粮秣补充，西安綏署得报，曾令刘戡率部馳援。待刘部赶到战場，战斗已經結束，徒使全軍目睹一片战敗的悲惨景象而已。

正当蒋介石、胡宗南大吹特吹攻占延安的“大胜利”的时候，整編第三十一旅的被歼，使胡宗南連声都不敢吭。中共将这个消息广播出来，胡更是恼羞万分，寻求与解放軍主力决战之心益切。

西北人民解放軍在青化砭战役結束后，主力即轉移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休整，仅派出小部队牵引胡軍，使之东奔西窜，疲勞挨餓，造成过失，暴露弱点，然后伺机歼灭。为了迎合胡軍急求决战的心理，解放軍以少数部队和民兵分为两路，一路經甘谷驛、延川，一路沿咸榆公路，在这两条主要道路上及其兩側的广正面佯装为大部队向清澗方面撤退的模样，引誘胡軍来追。胡軍果又墮入彀中，以为这是解放軍主力向綏德、米脂方面撤退，于二十七日分两路追击：董釗軍由拐峁附近經甘谷驛、延川，刘戡軍由蟠龙附近沿咸榆公路，同时向清澗搜索前进。董、刘两軍沿途发现所追赶的系小部队和民兵，知道又上当了。刘軍于三十一日到达清澗。董軍因在途中休息了一天，次日（四月一日）才到。

董、刘两軍部到清澗后，于四月一日同时接到西安綏署电告：据所得情报，共軍主力似尚隐蔽在瓦窑堡西南一带，一部在蟠龙西北附近地区。同时，綏署知道董、刘两部攜帶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当地无法补充。为了縮小战場，便于堵截解放軍主力，并推向前方建立补給站，屯儲粮彈，以便利主力軍扫蕩作战的目的，乃以廖昂率整編第七十六师师部及整編第二十四旅駐守清澗，以麦宗禹的整編第一三五旅駐守瓦窑堡（均归綏署直接指揮），令董、刘两軍主力即

日回头西进。

四月二日，董、刘两部按照綏署命令，由清澗分两路西进：董部經永平进至蟠龙、青化砭間地区集結，刘部掩护一三五旅进駐瓦窑堡后，进至永平附近地区集結。命令还規定：两軍部队到达集結地后，应尽速接受补給，待命行动。刘部从永平以北南下途中，曾在永平西北不远的地方遭到解放軍的伏击，激战两昼夜，整編第三十六师伤亡甚重。从此，胡軍更加不敢分兵行动了。

羊馬河战役，整編第一三五旅被歼

刘戡軍在永平西北地区遭到伏击，証实了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隐蔽在瓦窑堡西南地区的情报不虛。西安綏署认为这是迫使对方主力决战的一个好机会，如果它不进行决战，就只有东渡黄河一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綏署决定：以董、刘两部九个旅的兵力，在蟠龙以西形成自西北向东南广正面的梯形部署，董部在左，刘部在右，于四月十四日拂晓前向旧安定方面搜索前进，寻找解放軍主力决战，同时，以整編第一三五旅于十四日拂晓前从瓦窑堡向旧安定搜索前进，限当日上午×时以前进抵旧安定以西，确实掌握部队，占領要点，相机逐渐向南跃进，威胁敌后，堵截北軍。

十三日午后，刘戡軍部接到西安綏署上述指示，当經研究，认为一三五旅的前进路綫和进出目标距离主力部队甚远，从瓦窑堡至旧安定又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孤軍在解放区靠近敌大軍跟前行动，万一主力一时被牵制隔絕，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險。因向綏署建議：一三五旅可多派出远方便探向旧安定西、南两方面进行偵察，随时具报，部队宜仍暫在駐地整装待命，相机堵截。建議去后，沒有得到复电。

董、刘两部遵令于十四日拂晓开始行动。部队前进不到二十里，

即与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在广正面上发生接触。该纵队逐渐向西北方向引退，进至郭家砭以南，战斗渐趋激烈。这时，解放军以一个纵队牵引着胡军九个旅向西北方向追逐，却以主力埋伏于羊马河附近地区。十四日上午，一三五旅由瓦窑堡西进到安家咀附近，与埋伏的解放军发生接触，愈战愈紧。该旅见势不妙，改向西南夺路前进，企图加速靠撤主力；同时急电西安绥署和刘戡军部求援。可是解放军早已布成天罗地网，很快就将其紧紧包围于羊马河附近，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围歼。近午刻时，刘戡军部进至羊马河西南约三十里的地方，从话报机中听到一三五旅用密语求援。但以左翼董军正被牵制在距离较远的郭家砭附近，一时无法回援；右翼整编第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亦正在相持战斗中，不能立即转移。于是一面电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并电请西安绥署派飞机协助作战；同时令右翼靠近羊马河之整编第一六五旅火速驰援。一六五旅奉令后，因选择主攻进路不当，并走错了路，沿途又遇到坚强的阻击，以致前进迟缓，未能为有效的救援。待刘戡抽调整编第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从三十里外赶到战场，时已接近黄昏，战斗已在日没前结束。除了看到遍地扔的公文物件和死亡的人马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连负伤的人员也都给运走了。一三五旅全部被解决，旅长麦宗禹作了俘虏。

刘戡军救援一三五旅不成，转经瓦窑堡至永平接受粮弹补充，于四月十七日清晨从瓦窑堡及其东南地区宿营地出发，按整编第五十五旅、整编第十二旅、军部、整编第三十六师（缺整编第二十八旅）的行军序列，向永平进发。当先头部队通过横亘当面的两条山脉、进到第二条山脉与第三条山脉之间的河沟里，军部刚刚到达第二条山脉的脊梁上时，从望远镜的观察中，发觉前面第三条山脉的脊梁上有伏兵拦截去路。正待传令处境极为不利的先头部队，应不

顧一切，一鼓作氣，迅速占據當面高地，掩護後續部隊進占要點，以利全軍作戰之際，頓時伏兵四起，彈如雨注，劉軍被緊緊包圍，東沖西殺，激戰了兩晝夜。在十八日拂曉前，有解放軍約一個旅，乘黑夜沿山溝空隙，摸到緊靠劉戡軍部西側的一個山頭上，經過很短時間的互扔手榴彈和白刃肉搏戰，駐守該處的第十二旅三十△團團長和營連干部遭受重大死傷後，該山頭即告失陷。這時，軍部和十二旅旅部就在距離該山頭僅一百多米的鞍部地方。劉戡、陳子干和我從掩體內驟然惊醒過來，只見從山頭上敗退下來的士兵紛紛繞過軍部向東飛跑亂竄，拴在鞍部下面的機炮部隊的大群驢馬，亦被打得脫韁而逃、大聲嘶鳴。我們以身陷如此危境，只得在慌忙中親自率領控置在軍部附近的預備隊第十二旅三十五團吳子清部的一部分兵力，沖上山頭，恢復陣地，始倖免于危。

蟠龍補給基地失守，整編第一六七旅被歼

胡軍侵占延安不到一個月，已有兩個整編旅被歼。因而急求一勝，以掩敗績，兼挽士氣。為了便于進出前方的大軍就近進行補給，在整編第一三五旅被歼直後，特在蟠龍建立前方補給基地，大量運儲糧秣和全軍急待換季的夏服，派整編第一六七旅李崐崗部駐守。

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歼滅整編第一三五旅之後，為了奪取胡軍糧食被服補充自己，便着眼于拿下蟠龍這一前方補給基地。只以胡軍主力尚在蟠龍附近一帶活動，不敢貿然下手。乃迎合胡軍急欲尋求主力決戰的意圖，採取調虎離山之計，以大約一個旅的兵力，故意大正面地出沒于永平南北一帶，并不時向胡軍主力集結地區——蟠龍至永平間——附近進行襲擊，誘使胡軍追捕，遠離蟠龍。

當時西安綏署據所得情報，永平東北常發現有共軍部隊向北行動。因而判斷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必已轉向綏德方面，當面發現的

定系其主力的后尾掩护部队，意在阻滞我軍，以利其主力轉移。基于这一錯誤判断和急求决战的意图，綏署决定：董、刘两軍于四月二十六日由蟠龙至永平間地区出发，采取分进合击、广正面扫蕩驅逐的态势；董釗軍由蟠龙經瓦窑堡、王家湾、裴家湾，主力保持于左侧；刘戡軍由永平沿东北边山沟及两侧山梁逕直北上，經折家坪、石咀、田庄，主力保持于右侧；同时向綏德“扫蕩”前进。

胡軍在向綏德前进途中，每天虽与解放軍的小部队間或有些接触，但双方都是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根本沒有遇到較大的部队在一地相持战斗的情况。刘戡軍部看到这个情况，曾在部队出发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电告西安綏署：根据上述情况，軍部判断，共軍似在引誘我軍劳师远行，冀使我軍发生过失，暴露弱点，然后伺机袭击；敌主力可能不在綏德方面。电报去后，未获复电，仅在二十八日晚上接到一个简单的电报，指示我們两軍应特別注意外侧背的安全。

胡軍于五月一日进抵綏德城郊，不仅沒有看到解放軍的主力，連原来当面与我們接触的那些小部队也不知去向了。次日进占綏德县城。蔣管区的电台立即又大吹“攻占”綏德的“胜利”，并大撒其謊，說什么“已将共軍赶过了黄河”。

正当蔣、胡自欺欺人地大吹牛皮宣揚“胜利”的时候，就在这同一天——五月二日，駐守蟠龙的整編第一六七旅，已經开始受到西北人民解放軍大部队的围攻。这时远在綏德的胡軍主力，一时回师不及。胡宗南急得沒有办法，只好抽調担任维护銅川、延安間后方补給交通綫的整編第四十八和第八十四两个旅的各一部，附坦克数輛，迅速北上解围；同时电令董、刘两軍立即回师馳援。胡宗南当时滿以为調来四十八旅和八十四旅的部队，即使不能立解蟠龙之围，至少可以分散解放軍的兵力，減輕对蟠龙守軍的压力，爭取时

間，等候大軍救援。事情当然不会如胡宗南的愿。董、刘两軍虽于四日早晨就以强行軍从綏德南下，但綏德至蟠龙，有近三百里路程，一路都是山脈連綿、沟溪縱橫，大軍行进，至少須三天方能到达，显然是远水难救近火。北上解围的部队，行至青化砭北十里处，即被解放軍的教导旅堵住，寸步不能再进。蟠龙方面，虽有构成縱深的环形障地，工事构筑亦算相当坚固，毕竟頂不住斗志旺盛、战术高明的解放軍几昼夜的猛烈围攻。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战，在四日夜半，一六七旅自旅长李崐崗以下全部官兵都被歼俘了；儲存該处的夏季軍服几万套、面粉一万多袋、騾馬数百匹，亦全部为西北人民解放軍所获。刘戡軍部五日晚上在途中接到西安綏署的电报，知道蟠龙已經失守，当然用不着再去救援了。董、刘两軍于七日回到永平、蟠龙地区，即在該处进行补給，并作短暫的休整。

刘戡回到永平后，对西安綏署作战指导屡犯錯誤，以致損兵折将，甚为不满。他认为胡宗南的參謀长盛文、副參謀长薛敏泉、參謀处长汪承釗三个人，均系低級參謀人員出身，陆大毕业后，便一步登天，既无带兵作战的經驗，又不懂得解放軍的特性和慣用的战术，只是死搬着陆大学来的一套大的軍事原則，不顾对象和条件，主觀地作出一些錯誤的作战方案，根本不是担負策划大軍作战重任的材料。可是胡宗南却偏偏賞識信任这种人。从开始对延安作战以来，盛文留在西安，薛敏泉实际成了綏署策划作战的主要人物。在过去一个半月的時間中，胡軍已有三个旅（接近参加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被歼，这不能不归咎于綏署作战指导的拙劣。这个問題如不及时解决，今后战局殊难乐观。他以蔣氏王朝的忠臣孝子的心情，幻想以提高綏署的作战指导艺术，来挽回当前的敗局，写了一封亲笔信給胡宗南，信中以含蓄的口气，建議綏署加强情报工作和策划指导作战的參謀力量。信送去的第三天，胡宗南电召刘戡和我同去

延安面談。刘戡原想趁此机会向胡当面詳細陈述自己的意見。詎料見面之后，胡宗南仅提出拟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区分为扫蕩和守备两个兵团这一方案及部队区分和編組的具体問題，征詢我們的意見，根本不提信件的問題。刘戡在由延安返回永平的途中，怀着很大的埋怨情緒对我說：“蔣先生（指蔣介石）把国家的主要軍事力量交給他的三个浙江老乡（指陈誠、胡宗南和湯恩伯）統率。宗南領着几十万大軍，轄有西北广大地盘，責任不为不重。對我們提出的这样重要的問題，竟故作姿态，諱而不談，好象一切他都有成竹在胸，用不着你們多管閑事。这样下去，不管蔣先生給了他多大权力，不管他有多少部队，結果是必定要失敗到底的。你我如不及早設法脫身，恐怕大家都会落得一个悲慘的下場。”当然，他說这些話，只是一时的感叹。他当时既不是从战争的非正义性质認識到必然失敗的前途，只是对胡宗南的指揮、用人和作风有所不滿，而且也沒有离开这个部队的真正的决心；所以后来終於还是在陕北戰場上为蔣介石送了性命。

东追西扑，与解放軍“捉迷藏”

蟠龙战役結束之后，西安綏署認為不在陕北进行一次主力决战，西北人民解放軍是不会輕易放弃陕甘宁边区的。为了对付解放軍声东击西、牵大吃小、飄忽无定的战法，使自己的部队能在广面搜索扫蕩的运动当中統一作战行动、不失时机地捕捉敌主力进行决战，决定重新調整部队，将董、刘两部区分为野战和守备两个軍；以刘戡为野战軍（又称扫蕩兵团）指揮官，統率整編第三十六师（轄整編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整編第九十师（轄整編第五十三、六十一两个旅）、整編第十二旅、整編第五十五旅及原直屬綏署的野战补充第一团，共六个旅又一个团，担任对陕甘宁边区扫蕩作战的

任务；以董钊为守备軍（又称守备兵团）指揮官，統一指揮边区各地的守备部队。

五月中旬，西安綏署得报：五月十四日解放軍曾在眞武洞（安塞北）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庆祝蟠龙、羊馬河、青化砭三次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話，宣布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陝北指揮作战。据此，綏署估計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这时可能隐蔽在安塞附近地区。五月底，刘戡奉令率整編第三十六师（缺整編第二十八旅）、整編第十二旅、整編第五十五旅、野战补充第一团进出安塞地区，却不見解放軍的踪影。六月間，突进靖边地区，沿途仅有几次遇到小股地方武装，发生小的接触，又扑了一个空。七月上旬，部队回到延安附近，进行补給休整。

实际上，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于蟠龙战役后撤到安塞地区，仅作短時間的休整，即轉向隴东。六月間进出合水、环县，对馬鴻逵部进行突然袭击后，复乘势北上，經過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又回头向东。

七月中旬，西安綏署得报：靖边、馬栏一带均发现有共軍部队出没。綏署即令刘戡率所部于七月下半月在延安以西从馬栏至安塞、靖边的广大地区进行搜索扫蕩，寻找解放軍的主力决战。刘戡先以整編第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进入馬栏地区“扫蕩”一通；于八月初率全部兵力在延安以西，自西南向东北形成百数十里广正面的扫蕩部署。当軍部进至安塞以西地区时，西北人民解放軍已由隴东回头东向，于八月上旬围攻榆林（解放軍这一行动，是为了調动胡軍馳援榆林，为它制造过失，乘隙伏击）。綏署急电刘戡命钟松率整編第三十六师（缺第二十八旅）从华池（在安塞西南永宁寨以西，該师当时正进出該地区）經橫山沿长城南边东进，逕向榆林解围，暫归綏署直接指揮；其余部队仍續向三边进行“扫蕩”。

刘戡遵令率整編第九十师、整編第十二旅、整編第五十五旅及野战补充第一团共四个旅又一个团繼續向三边前进，沿途沒有遇到解放軍的部队。进抵靖边地区，据老百姓說，三边地区的“紅軍”連同地方部队和所有机关、干部、眷屬等，已于大約半个月前后全部撤向东边去了。刘戡軍部以解放軍既已連地方部队等均已东撤，围攻榆林又一时难下，钟松部赶到解围后，可能被迫图渡黄河；为了不失时机跟踪追捕，迫使于无定河与黄河間地区决战，当即从靖边轉头向东，沿大理河谷兩側向綏德急进。沿途又据老百姓报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亲率紅軍不多，于前两天（有的地方說是昨天）經这条路向东边去了，听說准备过黄河。我們对于这些情报，虽不完全相信，但认为亦有可能，未能察觉这又是解放軍的誘敌之計——故意透露这些消息，欺騙胡軍，使它造成过失，寻机歼敌的情报策略。

西北人民解放軍既歼灭了榆林外围蔣軍，并調动了胡宗南的大軍仓皇北上增援，这就有利于当时正待从晉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的人民解放軍陈赓、謝富治两將軍的部队的行动。为了給胡軍制造过失，寻机截击，便又迎合其心理，于八月十一日晚上主动从榆林撤围东向，沿途封鎖消息，故意显示出要过黄河的样子，誘使胡軍追捕，实际上却集中全部兵力隐蔽于米脂以北、长城以南、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待机截击歼灭胡軍。

钟松率所部于八月十二日进抵榆林附近，看到解放軍已經解围东撤，竟大吹由于該部行动神速巧妙，出敌意外，已不战而围解，向西安綏署报捷表功。綏署据此，也不察西北人民解放軍这一行动，正在誘使我軍追捕，于中途伏击，却认为它已在仓皇逃窜，势将图渡黄河，正是集中兵力，乘机将其主力压迫于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綏德以北、葭县以南这一狭小地区內，一举而包围歼灭或將它

赶过黄河的最好机会。乃一面令钟松部从榆林經魚河堡以后繞由无定河南岸（为防被截击，故不直走北岸）向鎮川堡（在米脂西北）进出；同时令刘戡率主力仍沿大理河谷迅速向綏德急进，企图堵截西北人民解放軍于鎮川堡、葭县之綫以南地区，实现上述战略目的。

沙家店、常家高山战役，整編第一二三旅被歼

刘戡率主力于八月十五日已刻进占綏德。由清澗北上的整編第一师亦随后赶到与之会合。軍部刚刚駐定，便接到西安綏署电示：

（一）共軍主力現似逃窜在无定河东岸綏（德）、米（脂）間地区，以我軍尾追甚急，东渡不及，势将搶先北窜。（二）我軍必須以果敢迅速行动，追敌于上述地区而歼灭之。（三）已令钟松部即进出鎮川堡以东烏龙鋪、葭县之綫，占领要点，阻敌北窜。（四）貴官应即率整編第九十师、整編第十二旅、整編第五十五旅及野战补充第一团，在无定河东岸亘黃河西岸間地区迅速北进，与钟部合力夹击，追敌于两河之間决战；主力保持于左翼。（五）整編第一师暫控置于綏德附近，准备随时机动。

刘戡軍部接到这一指示，当經研究，认为解放軍慣于使用声东击西、誘敌入彀、围点打援、牵大吃小的战术，深恐钟松部在未与軍主力靠攏以前，以連日长途远征的孤軍过早进出鎮川堡以东分散摆开，有被西北人民解放軍各个击破的危险，当即逕电钟松，作了如下的指示：为防予敌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隙，貴师应即集結于鎮川堡附近，占领要点，筑工固守；并速向米脂、葭县方面偵察敌情具报；俟軍主力靠攏后待机行动。除电主任胡核备外，特电遵照；并希速将貴师配备情况电告。同时发了一个电报給胡宗南，把給钟松的指示內容报請核备。

钟松参加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虽不算很久，却是胡部当时的軍师

长中资历較深、并为胡所賞識的一个。他在这一集团中，除了对胡宗南极为恭順、对刘戡也还有几分尊敬之外，是颇为自命不凡的。可是从开始进攻延安以来，他在作战行动中，常常表現謹慎过度，特别是在羊馬河战役中，当时軍部认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采取迅速果敢的作战行动，几經催促，而他仍是迟滞观望，致失战机，曾受过刘戡的指責。在这次“不战而解榆林之围”以后，由于他对解放軍主动撤围的判断錯誤，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这正是他立功取宠的大好机会，竟然趾高气揚起来。当他率部由榆林进至鎮川堡时，虽已接到刘戡的上述指示电报，他以胡宗南既已有命令要他立即率部进出鎮川堡以东烏龙舖、葭县之綫占领要点、阻敌北窜，便完全照胡的指示行动；对刘戡的指示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复电，也不将该师的行动报告軍部，甚至他的电台也一连几天不与軍部电台联系。他的想法，可能认为該师从奉令馳援榆林时起，已归綏署直接指揮，因此对軍部的命令可以置之不理。西安綏署对刘戡給钟松的指示报請核备的电报，也始終沒有复电。

刘戡軍部于十五日发給钟松上述指示电报后，满以为钟松必会遵照指示，将部队集結于鎮川堡，以待軍主力的到达。当即以整編第一师控置綏德附近，准备随时机动；并令进至吳堡搜索的部队归建；軍主力則于午刻前后分两路北进：一路以整編第九十师陈武部由綏德向东，經义合鎮沿黄河以西向葭县及其以西地区搜索前进；一路由軍部率整編第十二旅、整編第五十五旅及野战补充第一团，出綏德东北，經吉征店向烏龙舖搜索前进。

此时，西安綏署认为西北人民解放軍这次如不能搶先渡过黄河，則势必被包围歼灭在鎮川堡和葭县以南、无定河与黄河之間这一狭小地区，要想突围是不大可能的了。因此，便迫不及待地馬上宣布：国軍已收复陕甘宁边区全部县城，恢复了这三个省的行政区

域的完整。

刘軍主力由綏德北进，所經无定河以东地区，尽是一些横貫东西的山脈；又逢接連几天，每到中午前后总是傾盆大雨，雨到之处，頃刻間山洪滾滾，部队必須停下，等雨止和山洪过后，才能行动。經過四天多的時間，整編第九十师的一路于十九日申刻前后始抵葭县；軍部的一路进抵烏龙舖以东約二十余里之××（地名忘記）附近山沟时，已是二十日子刻了。因部队已异常飢疲，即在該处停止休息并造膳进餐。

天刚明时，据軍部偵察电台报告，不久以前，发现烏龙舖至鎮川堡之間地区有敌大小电台数个，并有总台（指揮台）出現。刘戡和我正在研究中，又据軍部話报台报告，說刚才听到三十六师向綏署报告战况紧急、請求援救的密語話报。軍部正从无綫电台和話报台向西安綏署和钟松师部进行联系，恰在此时，綏署电台正在紧急呼唤軍部电台接收胡宗南发来一个給刘戡的十万火急的电，告以钟松师部和一六五旅現在沙家店附近、一二三旅在常家高山附近被围，情况非常危急，要刘戡率所部火速馳往解围。刘戡接电后，即令整編第九十师一路由葭县附近向常家高山、沙家店急进；軍部一路，除野战补充第一团正在葭县附近执行对黄河西岸的搜索任务未及赶回外，即按整編第五十五旅、軍部及直屬部队、整編第十二旅的順序同时向常家高山、沙家店前进。

当天未刻，先头部队整編第五十五旅的队尾刚刚通过烏龙舖（在常家高山东边約十里），軍部及直屬部队方从河沟走上山腰小道向烏龙舖前进。刘戡和我为了搶先观察情况，带了少数随从和警卫，走在軍部前面。当我们行抵烏龙舖东端高地时，已清晰地听到常家高山方面持續不断的炮声，当即停住观察。从望远镜中，首先发现距我們所站的地方約千多米的北側河沟（无水）对岸的山頂上，有穿

灰色服装（当时解放军的服装为灰色，胡军的服装为草绿色）的武装士兵三人；继又发现该山东西两侧的鞍部均有不断涌到的大部队正在集结。我们断定那是解放军的堵截部队。正待派员传知各部队，并令后续部队迅速前进，抢先登上乌龙铺东边一带高地，这时，又发现就在我们所站地方的北面、距离不到二百米的那条河沟里，有大队解放军，正用快跑步沿河沟南岸的死角、由西向东、朝着军后续部队奔来；窥其意图，似在争先占领乌龙铺东边一带高地。刘戡和我估计当时军后续部队尚未发觉敌情。在这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为了尽速使全军得知敌情，调动后续部队急进，并阻滞解放军的行动，于是采取紧急措施：即命在身旁的司号长吹奏发现敌情的号音，并令跟随而来的几个参谋、副官及警卫一排，迅速占领附近的一个小土围子，立即向北面河沟里的解放军猛烈射击。这支解放军突然遭到来自侧背的袭击，即以靠近土围的部队，对土围进行猛烈围攻，其余部队纷纷抢登高地。刘军各部在行进中听到军部吹奏发现敌情的号音和急促的枪声，也就急忙抢先登山。顿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高地争夺战。

当解放军围攻土围、战斗方酣的时候，军部特务营几经冲杀、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才进到土围东南，占领了一个山头，解除土围之围，掩护军直属部队陆续到达土围附近地区。就在土围战斗开始的同时，整编第五十五旅在通过乌龙铺、距离常家高山仅几里路的地方，亦被解放军堵住进路；跟在军直属部队后面的整编第十二旅也被阻截，不能前进。军部所有电台和话报机与钟松师部始终未能取得联系。

日没前，常家高山方面的炮声已趋沉寂。黄昏时，据军部的便衣侦察员报告：乌龙铺有老百姓说，毛主席前天路过乌龙铺，往东北方向去了。据此，军部判断：围攻钟松部的当系西北人民解放军

的主力；进到軍部当面的可能是它东来堵援的一部。事实是：西北人民解放軍从榆林撤围，急速南下，既不打算东渡黄河，却集中于米、葭間地区，俟钟师孤軍到来，来它一个伏击。刘戡和我，意識到这一战役是决定陝北战場前途的一个关键，而形势对我们显然十分不利，内心甚为焦虑。

这时，軍部所在地仅有軍直屬部队，兵力单薄；五十五旅和十二旅又已被解放軍堵截在途中，尚未取得联系。入夜后，为防解放軍对軍部和前后部队进行袭击，我們只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令軍部特务营以班为单位組成几个夜袭小组，分向烏龙鋪东、北两方面解放軍的远后方进行猛烈射击、燃烧火堆，并放信号弹，以牵制解放軍的行动；同时分別派員与五十五旅及十二旅切取联系。当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得知軍部所在位置后，即以一部頂住解放軍的攻击，自率主力于夜間二十二时許到达軍部附近。在陈旅到达前約一个小时，解放軍曾一度进行猛烈攻击，战况随即趋于沉寂。我們判断这可能是撤退前的一种掩护行动。旋得夜袭小组报告，証实解放軍主力已向烏龙鋪以北及西北方向撤退，留下的掩护部队亦正在后撤中。接着又据派往常家高山、沙家店方面偵察的軍部便衣队員回报：从来自常家高山附近的几个老百姓口中了解到一二三旅已于当天日沒前后在常家高山地区被解决；沙家店方面在天黑以后槍炮声也已消失，情况尚未探明，另派有人正在向那方面繼續偵察中。軍部据此，以时已深夜，十二旅的部队又未全部到齐，除即令軍部特务营进行有限目标的追击搜索；令軍部便衣队从速增派干員向沙家店方面偵察回报；同时将全般情况电告已进抵常家高山东北不远的高地一带之整編第九十师，令其注意防堵，尽速搜索敌情，并偵察沙家店方面的情况具报；令其余各部，暫在原地严密戒备，待命行动。

二十一日清晨，軍部率各部队繼續向沙家店搜索前进。途中得

到派往沙家店方面偵察的便衣隊員回報：他們于本日拂曉進到沙家店附近；該處已無戰鬥；綜合從老百姓口中得到的情況判斷，三十六師師部和一六五旅可能當一二三旅在常家高山被解決後，已于昨日（二十日）黃昏以後突圍南下；圍攻三十六師的共軍亦已不知去向；沙家店附近現未發現敵情。軍部當晚進至沙家店以西至鎮川堡間地區宿營後，從一二三旅逃回的軍官口中得知：三十六師由鎮川堡東進時，系以一二三旅為先行。該旅進到烏龍鋪附近，忽接鍾松電示，說師部和一六五旅已在沙家店附近與敵大部隊接觸，要該旅火速回頭，向師主力靠攏。該旅系于折回沙家店的途中、在常家高山附近遭到伏擊被解決的。二十二日軍部進入米脂休息。第二天，從綏署的來電中得知鍾松師部和一六五旅于遭受嚴重打擊後已逃抵綏德，正在集結收容部隊中。

胡軍進入陝甘寧邊區後，由於解放區堅壁清野做得徹底，面臨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部隊的補給困難。全軍補給僅有延安一處。在解放區追送糧彈則到處都有被攔截的危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方在蟠龍設立補給基地，並擬逐漸推向前方設立分站。蟠龍基地被摧毀後，推向前方設站的計劃就被完全打破。因此，部隊遠離延安行動，只能靠自己攜帶口糧。每次所帶的至多只能維持十天以內。吃完以後，如不空投，就非轉回延安進行補給不可。劉戡軍這次已離開延安二十多天，雖在大理河谷和綏德附近得到一些空投的大餅補充，畢竟數量有限，不能解決問題；當部隊由沙家店南下時，全軍糧已告罄，官兵挨餓行軍作戰，莫不怨氣重重。

劉戡對西安綏署的作戰指導和胡宗南的某些作風早已有所不滿，在這次沙家店和常家高山慘敗後，更是埋怨不已。當從米脂南下綏德的途中，他單獨同我談過這些問題。他說：鍾常青（鍾松別號）素來用兵謹慎，歡喜動腦筋，也懂得共軍的特性和慣用的戰術。

他这次到达鎮川堡后，不應該看不到綏署指示的危險性，竟不遵軍部的指示，仍按綏署的命令行动，致有今日的失敗。这固然由于钟常青存在邀功取宠的心理，他本人應該負一部分責任；但主要还是由于宗南在这个集团里一貫只顧树立个人权威、养成一种极不利于战場指揮的风气所造成的。須知战場情况瞬息万变，决非远处后方的高級指揮机关所能及时掌握、作出完全符合实际的指导，必須賦予战場指揮官以根据战場情况的变化作出适应战机的独断专行的权力。宗南則根本不是这样，他要求下級指揮机构絕對服从他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否行得通，都不允許有絲毫改变。一般負責实际指揮作战的人，因为害怕违反他的命令，受到处分，也就奉命惟謹，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专断行动；結果当然只有失敗、再失敗。这是一个根本关键問題。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我們大家都免不了一个作枉死鬼的下場。钟常青这次是直接受綏署指揮的，他不遵我們的指示也难怪他，但不給軍部复电是很不應該的。事到今天，他可能也有难言之隱。刘戡原先对钟松这次的錯誤行动是深为不滿的，这时已变为相当諒解的心情。当他到达綏德后，钟松来見他时，也就根本不提过去的事了。不久，钟松率师部和直屬部队去清澗进行补充，并在关中重新編組一二三旅去了。

刘、董两部岔口村遭伏击，整編第二十四旅清澗被歼

刘戡軍进到米脂后，即奉西安綏署电令南下綏德。

此时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已从米脂以北地区沿咸榆公路以西兼程南下，搶在胡軍前面，进至延安东北距延安約一百里之岔口村附近隱蔽，以待胡軍到来，进行截击。同时以一个队也从米脂以北繞过胡軍右翼，穿过无定河，沿咸榆公路兩側对胡軍进行側击，以阻滯胡軍行动，并消耗其兵力。

八月二十四日戌刻，刘戡軍部下达了全軍于翌日南下綏德的命令。几小时后，据偵察台报告：刚才发现米脂附近东、北两个方向均有共軍电台，但未发现其总台。軍部立即将这一情况以电话告知各师、旅，令其严加戒备，并就近进行偵察。为了部队南下的安全，决定首先排除这一側背的威胁，遂下令各部队：以一部置于米脂城外东南高地軍部所在位置附近为控置部队，并对南进行警戒偵察；另一部于城西占领要点，对西进行警戒偵察；其余各师旅各就駐地区分任务，于二十五日拂晓分向城东、北两方面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驅逐当面之敌，进至攻击到达綏后，严密戒备，待命行动。双方一度接触后，西北人民解放軍的阻击部队即向远方撤退，刘軍的側背威胁方得解除。

米脂战斗结束后，刘戡軍部判断，在米脂方面与我軍接触的，大概是西北人民解放軍的牵制部队，而非其主力。全軍即开始向綏德南下，沿途没有战斗。部队于二十五日到达綏德。

胡軍自沙家店、常家高山战役整編第一二三旅被歼，整編第三十六师师部和整編第一六五旅遭受严重损失后，已经失去了兵力上的优势，不仅寻求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决战或将它赶过黄河的企图已成幻梦，而且势必影响整个战局。当刘戡軍从米脂南下綏德时，人民解放軍陈赓、謝富治两將軍的部队已于八月二十三日由晉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威胁洛阳、潼关，有直逼西安之势。胡宗南以关中空虚，老巢危急，約在九月十日前后电令刘戡，除以一六五旅留駐綏德外，全部由綏德南下延安。

刘戡軍部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清澗，与董釗軍部（榆林、沙家店战役直前后，該軍部駐在清澗）会合。当天晚上，据偵察台报告：发现延川以西地区有共軍电台。刘戡与董釗研究后，决定翌日南下时，为了防止截击和便于进出展开，在通过延川北端后，即縮短行軍长

径，采取梯形并列部署，分三路同时并进：一路以整编第九十师在右边、沿咸榆公路（延川至蟠龙一段）及其北侧向蟠龙搜索前进；一路以董钊军部和整编第一师在当中、沿咸榆公路南边山梁及其南侧河沟向青化砭搜索前进；一路以刘戡军部和整编第十二旅、第五十五旅在左边、沿董军南边河沟及山梁向拐岭以北地区搜索前进。

刘、董两路军当日进抵延川西南地区宿营。翌日清晨，部队刚一出发，即不断遭到解放军的侧击和堵截，两路军已处在解放军的大伏击包围圈中。与此同时，九十师在永平以东亦受到侧击。当时，全军除董钊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在清涧携带有大约两天的口粮外，其余部队食粮均已告罄，急需得到补充，才能作战。眼看距离延安仅约百里，为了迅速脱离战场，赶往延安求得补给，决定让九十师一路努力排除当面之敌，继续向蟠龙前进；董、刘两路军仍沿咸榆公路以南横贯东西的两条山梁，采取各部队互相掩护跃进的战法，打出包围圈。经过大半天的激烈战斗，边打边走，两个军部于未刻同时进至岔口村地区。当时胡军虽然处在河沟南北两边山上的解放军的夹击中，但以在陕北作战以来，解放军向来没有炮兵，大家都不在意。当刘戡、董钊、罗列和我几个人正聚集在岔口村前河沟里（无水）研讨作战问题时，突然从河沟北边山梁的鞍部向河沟连续射来二十多发炮弹（估计解放军所使用的炮是不久以前掳获一二三旅山炮营的），打得正在河沟里运动的胡军慌乱不堪。刘戡、董钊等虽然也很惊慌，但在自己的官兵面前，不得不力持镇静，指挥部队采取行动后，才得脱离险境。

刘、董两路军在岔口村附近这一纵横仅三、五里的狭小地区内，被围困得水泄不通。此时，军中已无颗粒存粮，时序又已是九月深秋。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虽在山坡田土里找到一点收尾的秋瓜小菜，根本无济于事。有的部队实在挨饿不下去

了，已开始宰杀軍中的騾馬充飢。刘戡、董钊等眼看不赶紧打出包围圈，很难再坚持下去；如再耽誤時間，恐怕連突围的可能性也沒有了；乃决心以一部分兵力頂住三方面的攻击，集中其余全部兵力突破一面，从內綫进到外綫。由于判断当时解放軍的主力可能在包围圈的西、南靠近通向延安的两个方面，决定向北突围。就在部队被围的第二天晚上，一面令已进至蟠龙以东的第九十师急速回头，向岔口村西北猛攻解放軍的側背；同时令被包围在东、南、西三面陣地上的各部队，除留少量兵力頂住各該当面的攻击外，彻底集中兵力，于次日拂晓向北出击，打出包围圈后再向左旋迴，从內綫进出外綫，联系第九十师，向青化砭、延安間地区前进。

事情完全出于我們意料之外。西北人民解放軍在經過两昼夜的战斗、予胡軍以严重杀伤后，竟于第二天晚上主动撤围。当第九十师进至岔口村西北边，刘、董两部同时出击时，已經不見解放軍的影子了。

刘、董两部旋即回到青化砭、延安間地区进行补給。

胡軍从开始进攻延安以来，仅仅半年多的時間，已經有四个整編旅被歼灭；部队东奔西窜，拖得疲憊不堪；各級軍官（包括高級將領）情緒日益低落，信心几乎全失，將領們对西安綏署的指揮錯誤，更是議論紛紛。胡宗南为了恢复部队的战斗力量，并对各級軍官特别是高級將領进行一番思想挽救工作，当即命令在陕北的各部队除守各部队外全部集結延安附近东、南两面地区，作短時間的休整。

西北人民解放軍在岔口村伏击胡軍以后，复乘机于十月上旬围攻距离延安东北約二百里、由整編第七十六师师部率整編第二十四旅駐守的清澗。胡宗南得报后，急得发慌，只得又命刘戡率整編第九十师、整編第十二旅、第四十七旅、第五十五旅等部火速前往救

援。刘部刚一出发，从蟠龙起就遇到解放军的拦截部队和民兵的节节阻击，边打边走，经过两天多的时间赶到清涧，战斗已在半天前结束，解放军也早已远离战场。这一战役中，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和整编第二十四旅自师长廖昂、旅长张新以下全部官兵均被歼俘。

至此，胡军不仅已从主动陷于被动，完全失去了采取攻势的可能，而且已连招架都来不及。为恐远隔主力、留在绥德担任守备的整编第一六五旅又被围歼，刘戡即率所部由清涧北上，迎接该旅归建。

胡军在陕北作战一败再败的事实，对蒋介石和外面一直都是隐瞒着的。每经中共广播宣布，也总是极力掩饰，说什么这是中共故意捏造夸大宣传，借以扰乱人心，从来不肯据实承认。直到绥德、清涧失守，所有进犯边区的部队都龟缩到延安附近，眼看关中危急，延安势必不守，知道不可能再隐瞒下去，才躲躲闪闪地就陕北战局向上面作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报告。胡宗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竟呈报蒋介石说刘戡救援清涧不力，请将其撤职留任。但又害怕这种诿过于人的作法，不仅无以服众，甚且可能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因而采取对内密而不宣的办法。刘戡本人更是蒙在鼓里，始终不知道这回事。

在岔口村战役后、全军回到延安时，胡宗南已电令我即回西安另候任用。适因当时部队奉命驰援清涧，接替我的参谋长职务的刘振世尚未到任，未能立即离开刘戡军部。救援清涧后，我才回到西安。

我到西安之后，胡宗南约见，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向我询问前方部队的情况和对陕北作战的意见，主要是检讨失败的教训；我除了如实地反映了一些情况以外，谈了自己对若干问题的

看法。我在当时由于立场的局限，对于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战争的性质这个根本道理、和蒋军进攻解放区的战争的反革命性质、从而必然招致失败的结果，还认识不到。我当时谈到的我所认为陕北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都是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即使加强主观努力，也是无法解决的。我所谈的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我军进入陕北作战，一开始就没有力求与敌主力决战，消灭其有生力量；常常采取驱逐作战的态势，急求夺取城镇、扩大空间的占领，分兵固守既不可能，徒然分散主力，疲于驰援。同时，由于没有进行主力决战，予敌以严重打击，也就不可能将它赶过黄河。这是形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二）绥署对前方部队所下命令，往往过于硬性，很少灵活余地，不仅易失战机，也不能发挥各级指挥官的主动性和部队的战斗力，甚至贻误大事。如对羊马河战役中的一三五旅和对钟松师进抵镇川堡后的行动的指示，就是明显的例子。

（三）评定集体或个人在作战中的功过，主要应以它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和对整个战局发生的影响为标准，不宜过分看重部队本身有无损失。如某一部队由于行动果敢，对这一战役或整个战局起了好的作用，本身纵然受了损失，甚至部分被歼灭，也不能降低它的功绩，必须给以应有的奖励；反之，在战斗中不能采取果敢行动，达成任务，对该次战役和整个战局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虽然保持了部队的完整，也不能认为是好的，应该给以适当的批评和处分，甚至进行必要的人事撤换。否则就不能养成各级指挥官善于从大局着眼、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良好作战风气。我的上述意见，当然都是针对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的缺点、错误而提出的委婉的批评。实际上我还有许多保留；而在胡宗南看来，这对他已经是冲撞得够厉害了。他虽然没有立即对我训斥，但已显露出一快的神色。此外，我还谈到在陕北解放区作战，有几个大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那就

是，（1）補給困難。解放區的堅壁清野做得徹底，部隊所需糧秣，既無法就地得到補充，又不可能追遶，每作戰行動一次，必須返回延安補給，這就大大限制了大軍作戰的機動能力；（2）情報不靈。由於我們得不到老百姓的幫助，總是摸不到敵情，老打背光瞎子仗，致常坐失戰機，並易為共軍所乘。（3）地形不利。陝北到處都是高山、深溝和隘路，部隊行動必須爬山越嶺，加以敵情不明，容易使共軍乘我軍疲憊糧缺的時候，選擇有利於它作戰的地區，進行伏擊攔截。最後，我還提到延安的守備問題，我只說了“似宜從整個戰局着眼，重新加以考慮”一句話。胡宗南似乎感到非常驚詫，立即向我追問：“怎麼！你對這點有什麼意見？”我也馬上警惕起來，趕忙回答：“我只是說，應該從全局來考慮這個問題。我還沒有什麼成熟的意見。”胡又緊逼着說：“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談，不一定要成熟。”我說：“我不了解全面情況和綏署對今後作戰的全盤計劃，提不出具體意見。”胡又問：“麟書（劉戡別號）對這點有什麼意見？”我說：“劉軍長和我一樣，也只是認為應該從全局出發考慮這個問題，沒有多談過。”胡又問：“你這兩天同我談的這些問題，都和麟書研究過嗎？他的意見如何？”我說：“我平日和劉軍長都談過，我們兩人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胡再問：“其他將領的看法怎樣？”我說：“沒有交談過，不清楚。”這次談話，就此結束。

隔了兩天，胡再約我談話。他說：“好在我對你很了解，不然的話，你有些言論是不能不使人對你的思想發生懷疑，甚至難以諒解的。你對綏署的作戰指導有意見，當然可以提，但最好同我或正、副參謀長談。象你以前在三原和洛川的作戰會議上所提的意見，雖也有些見地，但是未能從大處着眼，全面考慮，徒然有損綏署作戰指導的威信。從那時起，各級將領常對綏署的作戰指導發生不應有的懷疑，從而造成一些過失，這都應歸咎於你。過去我還以為你成

熟了，哪知揭开鍋蓋一看，仍是生的。我虽爱护你，怎奈生的不能吃，有什么办法呢！希望你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絕裾而去（指我在他任师长期間当他的參謀处长，曾留书不辭而去）是令人寒心的。千万不可再鬧意見。須知兄弟毕竟还是兄弟，关系是断不了的。請求休養的問題，不必再提；应即到新职（当时胡要我任整編第一三五旅旅长，我已表示不肯就），把部队带好，打几个漂亮战再說！”胡的这一席既严峻、又“亲切”的話，虽然不能为我所完全接受，而且有相当大的抵触，但也只有装作恭謹地听着。

瓦子街慘敗，延安撤退

一九四七年十月間，胡軍在陝北戰場一再失利后，被迫龟縮延安附近。这时，人民解放軍陈、謝两將軍的部队又在豫西向东西两面发展，潼关受到威胁，西安为之震动。胡宗南只得将西安綏署延安指揮所的全部人馬撤回西安；董釗軍部及整編第一、第二十七两个师同时南撤关中；以刘戡統率第十七、三十六、九十三个整編师留在延安附近——以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該师之第十二、四十八两个旅接替第二十七师的延安守备任务，以其余两个师集結在延安近郊为机动部队。

到十一月間，陈、謝两將軍的部队在豫西橫冲直闖，接連解放了許多县城；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两將軍的野战大軍正在豫、皖、苏大举进攻。蔣介石为了牵制上述两部解放軍、減輕其对东面的压力，并幻想打通郑州、潼关間的隴海綫，封鎖豫西黃河南岸，一再电令胡宗南抽調大軍进入豫西作战。当时胡軍在陝北，即使不調走兵力，久据延安已不可能，保守关中也已大成問題，本来无兵可調。但因胡宗南一向对蔣介石縮小、有时甚至完全隱瞞了陝北作战的敗績（清澗战役后蔣虽已略为多知道了一些陝北戰場的不利情况，但

对其严重性仍然了解不够)，这时也就不敢遽向蒋说明实情。迫于蒋的命令，同时也为了解除陈、谢两将军的部队对关中的威胁，只好硬着头皮，决定抽调部队进入豫西。于是在十一月间又先令整编第三十六、第九十两个师南撤；继于十二月下旬再令刘戡军部南移洛川。这时胡军的兵力部署如下：陕北方面——以整编第十七师何文鼎部（欠第八十四旅）仍旧守备延安，整编第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张汉初部守备宜川，整编第二十七师王应尊部除一部维护洛川至延安的交通线外，主力随刘戡军部驻洛川附近，整编第九十师严明部集中黄陵地区整训；豫西方面——除整编第十五师武庭麟部、整编第三十八师张耀明部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邱行湘部原在豫西外，新由陕西调去的有：整编第一师罗列部，整编第三十师鲁崇义部，整编第三十六师钟松部；所有在豫西的部队，统归西安绥署设在灵宝的指挥所统一指挥。

次年（一九四八年）春天，正当胡军调到豫西的主力部队进出洛阳、郑州间陇海路以南地区进行扫荡作战的时候（这时我因新职没有确定，住在西安家里），大约是二月十五日一清早，刘戡打电话给我说：我刚从洛川回到家里，马上就到你家里来。我回答说：请你在家里等我，我马上来看你。我刚开车出门，他已乘车来到我家门前。落座后，我首先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以便我开车到火车站去接他；他说：有重要问题必须亲回西安同你研究，并和宗南面谈，因恐宗南不让我离开防地，故事先既未电告宗南，也就没有告诉你。我问他有什么重要问题；他说：共军大部队现正分向延长西南和延安西南两个地区集结，估计很快会有行动。我军主力现已调去豫西，留在陕北的兵力有限。因此，我特赶来和你研究，就这个情况判断，共军可能有什么企图和行动，以便向宗南提出具体对策，早作准备。我问：分向两处集结的共军，究竟哪一方面是主力？我

軍可能抽調多少兵力參加野戰作戰，他說：共軍的主力在哪一方面，現在還不清楚。我軍現在陝北地區勉強可以抽調參加野戰作戰的兵力，至多只有七八個團。這些部隊由於歷次作戰的傷亡和逃亡，又都是缺額很多，現在實有人數一般只有編制定額的二分之一強，最多的也不足定額的三分之二，而且有的還是剛剛編成的新兵部隊，這是你很清楚的。我說：我軍目前在陝北的兵力狀況，共軍當然是明了的。從它集結兵力的情況來看，大概不是打算進攻延安；可能是以下兩個企圖中的一個：一個可能的企圖是圍點打援，即首先圍攻我駐守宜川的二十四旅，迫使我駐防洛川、黃陵地區的部隊前往增援，於中途截擊我們的援軍，目的仍在於消滅我們的有生力量。另一個可能的企圖是，乘現時關中、隴東我方守備空虛，向這一地區內屯有械彈糧服的城市來它幾個襲擊，目的在於奪取補給，威脅我軍後方，造成恐怖心理，瓦解我軍鬥志，並迫使我將在豫西的部隊撤回陝境，以利其在豫、蘇、魯的作戰行動，從而促使關中和整個戰局向着更有利于它的方向發展。劉戡聽了我的這個分析後，說：你的判斷和我的看法一樣。共軍的企圖一定是這兩個中間的一個。據我看，它一向重視消滅我軍的有生力量，因此，企圖圍點打援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這樣，當宜川被圍攻得急時，二十四旅全系新兵編成不久，戰鬥力弱，張漢初一定會向綏署求援，宗南勢必要我率領現駐洛川、黃陵一帶的部隊前去解圍；而我能够抽調的兵力至多只有七八個團，並且有的還是新兵編成的，這一去定將成為羊入虎口，有去無回。為此，我特趕來西安，面請宗南速籌妥善對策。依我之見，應速將現在豫西的主力部隊調回。你以為如何？我說：很對！而且應該馬上決定開始調運。劉和我談到這裡，他就到胡宗南那裡去了。他由胡處出來，又逕來到我家，很高興地對我說：宗南同意我們的判斷和意見，已決定即電委員長（蔣介石）將我

們進入豫西的部隊調回；他並說過，在主力部隊未調回前，即或宜川方面有情況，也決不僅以現在洛川、黃陵的部隊去增援。

劉戡這次回到西安，雖然他的眷屬住在这里，又正值元宵節前，由於前方軍事緊急，胡宗南要他立即返防，他在家里沒有留住一天，便於當天晚上十二時許偕嚴明、王應尊兩個師長（他們是在劉戡之前來到西安的）一同回前方去了。

劉戡回洛川後不到十天，西北人民解放軍已開始圍攻宜川，守備宜川的二十四旅旅長張漢初急電西安綏署求援。這時，進入豫西的胡軍主力尚在洛陽以東地區作戰沒有調回。胡宗南竟不顧自己前次的諾言，電令劉戡於二月二十五日率領整編第二十七師王應尊部（三十一和四十七兩旅共三個團缺一個營）、整編第九十師嚴明部（五十三和六十一兩旅共五個團又一個營）共一個軍部、兩個師部、四個旅部、八個團的兵力，沿洛宜公路馳赴宜川解圍。

二十五日傍晚，先頭部隊王應尊部進抵永鄉地區，發現觀亭附近有解放軍的大部隊，判斷可能是在沿洛宜公路設伏打援的部隊。當晚，劉戡將這一情況電報西安綏署，並建議：為了避開沿公路設伏的解放軍的截擊，請求集中力量先打觀亭，解除翼側威脅，然後改由觀亭沿山梁直趨宜川縣城。因等候綏署指示，該軍二十六日在原地停止沒有前進。晚間才接到綏署復電，大意是：宜川情況緊急，時間上不允許先打觀亭，要劉戡仍率所部沿洛宜公路向宜川急進。全軍乃於二十七日繼續沿公路棧前進。是日行軍途中僅兩側山中偶有槍聲，無大接觸。當晚進抵瓦子街以西地區宿營後，偵知瓦子街以東有解放軍警戒部隊出沒，並有大部隊在瓦子街東邊約十里處積極構築工事。二十八日，劉軍剛剛通過瓦子街，即與解放軍的警戒部隊接觸；在邊打邊走的情況下，於當日午刻，便進入了解放軍部署在瓦子街以東、丁家灣以西地區的伏擊圈內。經過兩晝夜的激戰，

全軍伤亡大半；至三月一日，战况益趋剧烈。在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和四十七旅旅长李达相继陣亡以后，第九十师师长严明也自杀了。战至黄昏前，伤亡更加惨重，中下级军官已所剩无几，解放军已迫近軍部所在地。刘戡見战局已无法挽救，即令軍部人員将所有文件和密本焚毀。当解放军攻入軍部核心陣地时，他遂跳出土围，以一个木柄手榴弹置于头部自炸毙命（在这之前，他曾向刘振世等表示“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并已将他的日記和儿女的照片焚毀；刘振世等为了防他自杀，已将他佩带的手槍收藏了）。

西北人民解放军在瓦子街以东地区全歼刘戡軍二万余人之后，随即猛攻宜川，守軍第二十四旅^①自旅长张汉初以下亦均被歼俘。

当刘戡軍被围攻时，胡宗南眼看情况危急万分，豫西主力一时又不能赶回救援，在惊慌失措中，于二十九日下午召我去到西安东仓門下馬陵他的住所，对我說：“宜川方面的战况较昨日更加剧烈。为了分散共軍对麟书部队的压力，我已抽調駐临潼和潼关一带的一三五旅主力向郃阳方面急进，先头部队今晚可达郃阳；并已在几天前抽調了关中、隴东的师管区和补訓处的补充团及陕西的保安团等共五个团的兵力，亦在向郃阳急进中，估計明后天都可赶到。决定請你去統一指揮。一三五旅旅长祝夏年另調他职，我已令他立即交你接替，你可即以其旅部原来的机构指揮作战。綏署已派运输汽車至新丰鎮（临潼东边）备用，你应立即率指揮机构的必要人員和通訊、警卫部队及綏署增配的通訊部队（无綫电一台、有綫电一連）連夜赶到郃阳，准备指揮这些部队策应麟书部队作战。”我对这种“临危授命”，自然沒有話說，只問了一句：“作战行动計劃应该怎样？”他

^①上面胡軍被歼的十个整編旅中有两个二十四旅及两个三十一旅的番号，这两个旅系由三三制清涧、青化砭被歼后，重新編成，第二次又被歼灭。

說：“等你到了郃阳与綏署联系后再电达。”

我于当晚到新丰鎮率領一三五旅旅部部分幕僚人員及通訊、警卫部队，乘汽車于翌日清早到达郃阳。这时仅到了一三五旅先头部队符树逢团的一部，該旅主力和其他部队都还没有到达。当我正在与符树逢見面談話时，胡宗南来電話說，大軍即可到达，你应与之速取联系，并催請郃阳县政府准备充足的运输力量；令到即开始行动。他說完这几句話，既不問我别的，也不等我答話，便挂筒了。我当时接到電話，覺得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作法（战场上重要作战行动的上报下达，通常都是用密語或电报，不用长途明語電話的），立刻意識到，这是他故意暴露我軍行动和虛張声势，以使解放軍分兵来对付我部，从而減輕对刘戡部的压力。我只好一面催請县政府为我们准备运输力量，一面等待部队的到来。当天除一三五旅主力到达外，其他部队沒有取得联系。三月二日清晨接到綏署如下电示：

（一）符树逢团应即向黃龙山某地（地名忘記）进出，收容部队散兵；一三五旅其余部队应乘原車輛即返原防。（二）所有向郃阳前进部队的行动，綏署已逕行电示。（三）貴官应即回西安。我接到这个电报，知道宜川方面的战斗已經結束，便于当日黃昏时回到西安。

大約是在宜川战役結束的第二天晚上，中共电台就开始对胡軍連續广播，大意是說，我們对你們在宜川战役中負伤的官兵已給予医疗；陣亡的官兵已給予掩埋；刘戡、严明的尸体已予装殮，定于某日（日期忘記）运送至某地（黃龙山之某地，小地名忘記），希望你们按期派人前来接运。

胡宗南听到中共的广播后，感到十分为难。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于瓦解我方的軍心。不去接运嗎，恐怕无以对全体将士和死者的家屬；去接运嗎，面子上又实在过于难堪。几經拖延，結果还是决定去接。首先将灵柩接到渭南，暂时停厝。

为了籠絡將士繼續为他賣命，还得裝点样子給大家看。于是在五月的某一天，西安綏署特备两列专车，将刘戡、严明的灵柩从渭南，同时将四月二十七日西北人民解放軍进攻宝鸡时被击毙的整編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的灵柩从虢鎮（宝鸡东边），由隴海路东西两头同时开抵西安車站。这天，胡宗南带上一副黑眼鏡（他平日是不带这种眼鏡的），神态显得很沮丧，偕同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軍高級官員及死者家屬，在車站迎接。旋即随运柩車輛送至西安城南翠华山麓安葬；并呈准蔣介石追贈刘戡为陸軍上將（原系中將），严明、徐保为陸軍中將（原系少將）。

胡軍于宜川瓦子街战役惨敗后，延安势难再守，整編第十七师原本急于从延安撤退。由于蔣介石当时正在准备召开“行宪国大”（即“选举总统”），不愿在这个时候将陕北战場失敗的真相彻底暴露出来，有損他的“威信”，因此，一直捱到四月十九日他在“国大”騙得“总统”以后，四月二十一日才狼狽地从延安南撤关中。

国民党空軍进犯延安的回忆

程 蔭 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广大人民的死活，掀起全面内战，企图以拥有美式装备的几百万陆、海、空軍的兵力，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区进犯，实现其所謂“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狂妄計劃。这时，国民党空軍得到美帝国主义作战飞机的补充和訓練，配备有八个大队和一个中队的兵力，計 B—24 型重轟炸机一个大队，B—25 型輕轟炸机一个大队，P—40 型、P—47 型、P—51 型战斗机四个大队，C—46 型、C—47 型空运机两个大队，P—38 型偵察机一个中队。除供訓練及通信用的小型各式飞机外，第一次补充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共約五百架，編队分駐于沈阳、北平、南京、上海、西安、徐州、武汉、广州、台湾等地区。大队組織也全部是美式編制。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空軍又在美帝国主义策划下，将原有的各路司令部按美式編制，扩大改組为五个軍区司令部、一个供应司令部，一个訓練司令部；并按照对解放区作战的軍事部署，将五个空軍区司令部分駐北平、沈阳、西安、汉口、重庆，空軍供应司令部駐上海，空軍訓練司令部駐台湾。

西安是蒋介石自負为可以控制中共心脏地区延安的“王牌”軍——胡宗南部的基地，原即配有空軍 P—47 型战斗机一大队，B—25 型轟炸机一中队。在这次改制时，为了增强对解放区作战的准备，

乃将原驻兰州的空軍第五路司令部移駐西安，扩充、改組为空軍第三軍区司令部，任刘国运为司令（后为徐焕昇）。我原任空軍宁夏机勤队队长，因刘的关系，也于一九四六年七月被調往西安，任空軍第八总站站长。西安总站管辖范围是西安、鄠县、临汾、运城、郑州、新乡、洛阳、宝鸡、南郑等航空站和无綫电台、测候台、油彈庫所等单位。这些基地的矛头，都是指向延安。西安总站所辖范围和它的組織，在全国空軍地勤机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重点基地的規模。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空軍又将全国空軍总站、基地指揮部、部分飞机修理工厂（或所、組）合并，在各軍区司令部下成立一个供应分处（供应总处設上海），将航空站撤消，按业务繁簡成立大、中、分供应队，以完全符合美式編制。这时，西安总站与成都第八飞机修理厂合并为西安空軍第三供应处，以原第八修理厂厂长揭成栋为处长，我任副处长。在蒋介石集团进犯延安期間，我是西安空軍基地供应方面的主要負責人。现将国民党軍进犯延安前后有关空軍地勤活动的經過，略記如后。

扩修西安飞机场

一九四三年，美帝国主义借盟軍在华作战关系，利用我国空軍基地，对日寇进行轟炸战斗，以昆明、新津、重庆等基地为其空軍活动的大本营；北战場以西安为前綫机场。西安机场原来只有一千二百公尺，設備簡陋。至美空軍使用时，扩修为一千八百公尺，增修跑道一条和滑行、停机、疏散各道，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約一百架左右的飞机，B-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同时，又在鄠县修建一个規模較大的机场，以为西安基地的輔助机场。

一九四六年四月，蒋介石下令将西安机场延修五百公尺，共为二千三百公尺，并翻修旧跑道、停机道。先后拨扩修工程費六亿元，

由空軍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机場工程所，并責成西安區司令督促，于八月开工，至十月中扩修完竣。

日寇投降后，全国的机場，在淪陷区的均經日寇大体修好，在蔣管区的絕大多数也已由美軍修建，可供当时国民党空軍各种类型的飞机起落。为什么这时还要花費巨大財力、物力和人力来扩建西安机場呢？不言而喻，这是蔣介石集团为了加强其空軍在西北地区的儲备力量，使西安机場能够容納更多的飞机，为进犯陝北解放区預作准备。

轟炸起义飞机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刘善本由昆明駕駛国民党空軍第八大队的B—24型重轟炸机一架起义，飞降延安。这件事引起蔣介石集团极大的震恐，国民党空軍全軍为之騷动，美国駐蔣政府軍事顧問团也深为惊詫，国民党空軍总司令周至柔、副总司令王叔銘更是慌了手脚。为了挽回士气、稳定軍心，国民党空軍总司令部除予第八大队队长王世鐸以調职处分外，还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对空軍人員的内部控制和反共教育。同时对刘善本的起义进行种种污蔑和歪曲宣传，如說：“刘善本原系打入空軍内部的共产党员，最近因其逆迹已被发觉，故乘飞机逃往延安”；又說：“刘善本因受大队长王世鐸的排挤，被迫而出此逃跑下策，王对这件事应負领导无方的責任”，以掩盖国民党空軍人員反对內战、士气低落的事实。为了不使这架飞机落入解放軍手中，并遏止这一事件在国民党空軍内部的影响，周至柔在蔣介石指示下，派王叔銘亲到西安，令九中队队长郭作璋自駕B—24型轟炸机一架，偷襲延安机場，炸毀刘善本的起义飞机。这次派机去延安轟炸以前，进行了极严密的准备工作。当飞机前去轟炸时，还派有P—47型战斗机六架掩护，以制止地面对空

火力，并指示：如不能完成轟炸任务时，则由战斗机进行扫射，将起义飞机烧毁。

八月二日正午，国民党空军飞机七架空袭延安，除轟炸机场炸毁 B—24 起义机外，还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王家坪附近投弹多枚。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这一破坏停战协定的挑衅罪行提出了严重抗议。军调部美方代表接到抗议后，还装模作样地诡称对蒋介石的挑衅进犯事先全不知情。蒋介石也对此次轟炸进行抵赖，将责任推到周至柔身上。周又推给王叔铭。彼此互相推诿，谁也不敢承担下令轟炸之责。最后，由刘国运出面，在西安召开一个检查会议，“研究”此次挑衅事件的责任问题。在会议上，郭作璋经不起“研究”，知道上面要把责任推在他身上，愤愤不平地站起来说：“别研究是谁下令的问题了。总之，延安机场上的 B—24 是我郭作璋亲驾飞机去炸的，要追究责任，枪毙我好了！”郭作璋既然表示愿意承担这次挑衅的责任，王叔铭、周至柔便都可以报账了，蒋介石也以事先不知情为词，向军调部敷衍塞责了事。

空运部队增防榆林

陕北的榆林是延安北面的门户，为一重要军事据点。当时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军是邓宝珊部。邓非蒋的嫡系，一般认为他的动摇性很大，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但榆林所处形势于邓颇为有利，蒋不敢贸然将他撤换，只好一面对他进行笼络，一面密令宁夏马鸿逵严密加以监视，防其异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当蒋军正在加紧进犯延安的军事准备时，为了增防榆林、控制延安，并防范邓宝珊异动起见，蒋介石在征得邓的同意后，由胡宗南部抽调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空运榆林。为了保守机密，不使延安方面知道，空运时特选择鄯县机场起运。二

月下旬起运的前一天，空軍第三軍区司令刘国运、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副处长李肇华和我偕同西安总站其他人員飞往鄂县安排空运准备工作。王叔銘也于同日由南京率領C—46、C—47型運輸机二十架飞到鄂县。他對我們宣布此次運輸計劃時說：“委員長（指蔣介石）命令，限三天內運輸完畢，飛行必須避開延安上空，免使共產黨知道我方軍事部署情況。總站應迅速作好裝運過磅準備，部隊到達後，即行裝運，不得遲延。”

經我與空運大隊長衣復恩、副處長李肇華等反復研究，估計一旅人和輕武器裝備至少要一百二十架次才能運完，每機每天兩架次，如天氣良好，可望三天能完成任務；如天氣不利，或飛機發生意外，就難以預計了。我們提心吊膽地接受這個緊急任務，照樣傳達並責成機場各級人員迅速作好空運準備，希望在我們這部分工作中，不要發生任何差錯才好（國民黨空軍有一個慣例，即重空勤不重地勤，重飛行不重機械，重正牌不重雜牌，如稍有差錯，地勤人員多半是倒霉的）。

部隊是半夜趕到機場的。當時天氣很冷，士兵飢寒交迫，機場也沒有休息和避寒設備，他們全坐在又潮又冷的停機綫上。經一排排地過磅後，就被趕着裝上飛機。部隊長為了防止士兵乘機逃跑，趕緊將機艙門关上。有些胆大的士兵，因被悶得難受，竟大聲叫喊着：“這樣還要不要我們去打仗？我們也是娘生的呀！”對之，我們也只有充耳不聞。據後來飛行員回來說：“到達榆林機場時，大部分士兵凍僵了，都是由飛機上抬下來的，真慘！”

這樣連續運了兩天多，只用了八十多架次，共運去三千多人，就沒有兵來了。我們感到有些奇怪：徐旅原是胡宗南部兵員比較充足的一個旅，至少有五千人以上，還有的兵到那里去了呢？據擔任聯絡的軍官說：“兵在路上逃跑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未補充足額。”

我們当然知道，未补充是名，吃缺是实。国民党軍的部队长吃空缺，原是习以为常不足为怪的。

进 犯 延 安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蔣介石突然从南京飞到西安。下机后，逕至空軍十一大队部，稍事休息，即召集国民党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副主任裴昌会、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綏署參謀长盛文、空軍副总司令王叔銘、空軍第三軍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會議。會議开至下午二时许始毕。蔣介石即飞返南京。

当晚，刘国运在空軍司令部召集空軍駐西安部队副队长以上、司令部副处长及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員开会，宣布蔣介石亲自来西安所作进犯延安的軍事部署要点。接着刘国运对空軍出击作了詳細部署，他說：“进攻延安是摧毁敌人的政治中心，消灭敌軍的有生力量，务必将陝北敌人完全消灭在陝北地区內。这是委員長給我們的指示。我們要同心同德，忠于党国，方不負委員長對我們的教育。关于陆、空軍的布置，陆軍以刘戡、董釗两部为进攻主力；空軍以协同陆軍出战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单方面出击。十一大队P-47战斗机在西安的有四十架，以担任偵察、掩护陆軍攻击及陆空联络为主。九中队B-25轟炸机九架，以轟炸为主。由南京派来C-46运输机十至二十架，担任空运。必要时再从南京、徐州調P-40及P-51战斗机到郑州基地参加作战。空軍八大队B-24轟炸机調来后，可駐鄠县机場。（在进犯延安战役中未参战）。太原方面的空軍也同时参加作战。从現在起部队停止休假，至战事結束为止。十一大队从明日起，逐日輪番派飞机至陝北各地进行偵察，发现敌情，立即报告。九中队整机待命出击。使用的炸弹，因延安沒有大的建筑工事，无需重量炸弹，只需以杀伤为主的輕量炸弹。儲存在汉中、宝鸡各站的油料

和适用炸弹大部运来西安备用，能陆运者隔夜陆运，不能陆运者空运。运输力量，主要是集中西安空军所有车辆应用，不够时由西安绥署调补给区汽车协助。以鄠县、临潼、运城、洛阳等各站为辅助机场，应飭迅速加强准备。所有补给设备等事宜，统限三月十日以前集中完毕，如有延误，军法从事。”他并严令与会人员绝对保密，布置工作时，不准丝毫泄漏军事行动的机密。

从第二天起，C-46运输机十余架便开始从南京陆续运来油料。随即日夜不停地由飞机、汽车、火车运来各种作战物资。入夜，总站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汽车出入通宵达旦。

接连几日，从清晨到黄昏，战斗机不停地分批飞往陕北各地侦察。侦察都是派具有作战经验、熟悉陕北地理的分队长、参谋级以上的军官担任。据侦察报告，当时，解放军在铜川、韩城一带大军云集；延安方面，却未见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迹象，延安城内安静如常，附近地区亦无特殊情况。直到最后两天，才发现有小部队行动。指挥部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延安方面，并未获有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延安广播电台也没有透露我有进犯的征象。胡军官员对此颇为高兴。有一天盛文对我说：“平日延安方面消息最灵通；这次因为我们部署迅速，行动机密，致敌人无从探悉，我们准可一举而下延安。”他说这话时摇头摆尾，露出一副得意神气。

空军在西安、郑州、太原等地集结各型飞机近百架，开国民党空军在一个战场上使用飞机之多的新纪录。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下达进犯延安的总攻击命令。三月十四日晨，西安机场第一批B-25型轰炸机四架，满载炸弹，在P-47战斗机掩护下，向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以配合地面部队进攻延安。接二连三一批一批地起飞，终日未稍间断。

连日的轰炸，经侦察照相证实，并没有炸到什么重要目标，仅

地面有无数弹坑而已。陆军开始进攻后，除第三天在洛川以北与解放军一度发生战斗外，并无大的激烈战斗。可是前方报告，却說战事如何“激烈”，吹得天花乱墜，使得西安指挥部的高级官员，紧张了几天几夜；宣传机关也忙于发布“胜利”战报，以愚弄不明真相的人；后勤部則忙着征調軍用物資，向前綫輸送；空军基地人員忙着加油、挂弹。整个西安市被所謂延安地区的“激烈战斗”鬧得馬仰人翻。

十八日，战事进行到第五天，偵察机回来报告：我軍先头部队已进抵延安近郊，并发现延安以北有解放军一部向陕晋方向轉移，已通知部队追击。十九日拂晓据飞机偵察报告，昨天发现的解放军已不知去向，也无我軍追击；我軍大部隊已围住延安城，城内街道上未見行人。下午又据飞机偵察报告和前方电报，先头部队已进入延安。

胡宗南部在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的情况下进据延安后，大肆宣传，把“延安大捷”吹嘘得比二次世界大战中盟軍攻克柏林还要“伟大”。“捷訊”传到南京，奖金、慰劳品、勋章、升官状等也迅速飞来西安。胡宗南还在西安、延安专設招待所，招徠中外記者和各界人士到延安去参观，并大开庆祝会，摆庆功宴，煞有介事地鬧了許久。

胡宗南利用这次的“胜利”极力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他下面的一批喽囉也爭着冒充“功臣”，不可一世。在一次庆祝会上，胡宗南的总务处长蔣某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說：“从此胡先生不会老死关中了，我們都有出路了。”

但是，这帮“英雄”們的好梦不长。胡宗南部在侵占延安后一年的時間中，一个一个的整編旅、整編师、乃至整編軍相繼被歼灭，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不得不撤出延安，龟縮关中；最后，仍逃不了其必然复灭的命运。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与湘軍入粵

方 鼎 英

(一)

湖南地当南北之冲，形成西南的門戶。辛亥革命后，虽有北洋軍閥兵連禍結的混战，干戈扰攘，此起彼伏，但革命的因素总在南方，依靠北洋軍閥者，莫不声名狼藉，以失敗而告終。一九二三年的譚（延闓）趙（恒惕）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湖南許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說得振振有詞，实际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也可以名之为“鴉片之战”。湘西是烏金之地，不仅云貴等省的鴉片烟土多由湘西轉运汉口，而湘西各县自种的鴉片亦复不少。反动統治階級睹此禁膏，莫不垂涎欲滴。北洋軍閥統治时期，由湘西問題引起的湖南战争，大都是为販运与种植烟土而战的鴉片战争。而湘西之土匪如毛，其原因也在于此。一九二三年七月发生的趙（恒惕）蔡（鉅猷）之战，蔡鉅猷指斥趙恒惕“甘心附北，背叛西南”，自己投靠广东，予譚延闓以由粵入湘討趙的借口。究其实质，又何尝不是变相的鴉片战争呢？蔡部旅长刘叙彝，本是学生出身，因考学校不起才入湖南混成协当兵的，故虽出自行伍，姿态却很斯文。他率部久駐黔阳、洪江一带，利用軍隊販运烟土，大发橫財，积資巨万。仅就其在汉口一地的房产而言，就占有好几条里弄。刘自营別墅，請求名人署名“墨庄”。署名者解釋为希望主人能兼爱天下，取墨子兼爱。

摩頂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之义。这样一篇大道理讲给他听，当然高兴。实则寓有諷刺之意，因为墨字由黑土拼成，盖指“鴉片烟庄”也。刘不自知，窃为得意。刘性贪且吝，如汉口宝庆碼頭，是新化煤店船民挑夫麇集的旧式街道，茅棚最多，常因火烛失慎成灾。街道既窄，又无水管救灾。刘亦有高楼大厦巍立其傍，街邻倡修正街，安装水道，向刘筹集捐款，而竟一毛不拔。刘部久据湘西不动，赵急欲染指而討伐蔡鉅猷。

譚延闓三次督湘，一手扶植了赵恒惕，使其羽毛得到丰满。但譚搬起这块石头，而竟打了自己的脚，终于一九二〇年被赵恒惕逼走沪滨，不得不一边倒向前曾被他们罵为“大炮”的孙中山的怀抱。而赵则恰恰相反，死心塌地投靠北洋軍閥吳佩孚，依然开口閉口罵“孙大炮”，并且罵得格外起劲，遂釀成一九二三年秋譚延闓奉命由粵入湘的討賊之局。赵却犹以省宪自治做挡箭牌，既自己立法又自己毁法，倒行逆施，弄得众叛亲离。稍有正义感者，莫不奋起驅赵，欢迎討賊。

(二)

一九二三年秋，譚延闓奉孙中山先生命，为湖南討賊軍总司令，石陶鈞随行，任参謀长。譚电湘軍官，責赵勾引吳佩孚，自残同类。电文有云：“效順則以无力自居，助逆則残民以逞”。当时，湘軍兵力分布情况如下：

第一师师长宋鶴庚（师部駐长沙），第一旅旅长賀耀組（旅部駐益阳，部队駐常德、益阳），团长郑鴻海（宁远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謝煜燾（邵阳人，保定軍校二期毕业）。第二旅旅长唐生智（旅部駐常德，部队亦駐常德一带），团长刘兴、李品仙。师屬騎兵团团长何鍵（駐桃源），炮兵团长黃輝祖（长沙人，湖南兵目学堂毕业，

部队駐常德)，“独立歩兵团团长汪磊（新化人，广西讲武堂毕业，部队駐郴州）。

第二师师长鲁滌平（师部駐长沙），第三旅旅长刘鋈（邵阳人，湖南速成学堂毕业，旅部在长沙，部队駐南县、湘潭），团长叶琪（广西人），袁植（平江人），皆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第四旅旅长唐荣阳（石門人，警官学校毕业，該旅系由林支宇的警察部队改編，是林的政治資本。旅部駐澧县，部队駐津市、澧县），团长唐生明（石門人，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唐振鐸。师屬騎兵团长唐希朴（駐湘潭），炮兵团长戴岳（駐宁乡）。

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宁乡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旅部駐长沙，部队駐长沙、醴陵、湘阴一带），团长刘重威、邹鹏振、朱耀华。

衡阳鎮守使兼混成旅旅长謝国光（湘乡人，军队司书出身，部队駐衡阳、桂阳、永州），团长譚道源、成光耀。

宝庆鎮守使兼混成旅旅长吳剑学（湘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部队駐宝庆、武岡），团长吳家銓、张湘砥。

沅陵鎮守使蔡鉅猷，节制第九、十两旅。第九旅旅长刘叙彝（新化人，部队駐黔阳、洪江），团长何隆干、譚潤生。第十旅旅长田鎮藩（益阳人，湖南武备学堂毕业，部队駐辰州、黔阳），团长彭寿恒、楊毓棠。

此外，尚有陈渠珍部駐湘西凤凰一带；鄂軍歩兵团团长夏斗寅，部队駐浏阳；王得庆宪兵一营，駐永州。全部湘軍官兵人数，共約四万人。

譚延闓致电湘軍軍官，是当年六月中旬的事。至六月底，蔡鉅猷部刘叙彝旅，与赵部賀耀組旅在益阳边界交鋒，賀軍敗退。八月八日，譚在衡阳就中山先生所委的湖南省长兼总司令，再发通电討赵。

电文有云：“湘省限于绑票，虽經屡次贖票，产即全破，而生命仍难救。”又云：“請于撕票之日，証我哀痛之心。”直斥赵为盜賊，語詰而虐，此皆醉六（石陶鈞号）手笔也。是时，譚駐衡阳鎮守使署，以衡阳鎮守使兼混成旅长謝国光部合宝庆鎮守使兼混成旅长吳剑学部、湖南陸軍第五混成旅陈嘉祐部，計三个混成旅，与赵恒惕的死党、第一混成旅叶开鑫部相持已月余，而战事迄无进展。

当叶开鑫部与譚軍相持之时，第一师师长宋鶴庚、第二师师长魯滌平，都各在湘乡、湘潭互相觀望，不表示态度。我这时担任第一师參謀长，师部駐长沙曾公祠，而宋則逗留湘乡私宅。我对宋之觀望态度极不同意，几經考虑，决定以“拥赵、拥譚、自干、滾蛋”八字逼宋，专遣师部軍法官胡耀湘飞赴湘乡，囑其率直轉告：事到此时，已如箭在弦上。不管怎样，总得采用上述八个字中的任何两个字表示自己的态度才对。否則，事不宜迟，你不动手，我可要干了。宋見我如此相逼，才認真考虑問題，覺得拥赵对不住譚，拥譚对不住赵，自干則譚、赵都对不住，不如一走了之。于是，便要我去湘乡面商。

我离长往晤时，早已下定决心，如宋仍犹豫不决，我只好毅然辞职，不回省城，徑赴衡阳助譚干去。当然，这只是我当时内心的打算。赵恒惕、唐义彬（赵的參謀长）、賀耀組等人对我仍是不疑有他的。記得赵蔡决裂时，賀且私自对我說过：“刘奎煥（刘叙彝别号）是你的貴同乡，他的部队你可取而代之。希望你不要老是置身度外吧。”我說：“謝謝你的好意，不过这是不能解决湖南問題的。”賀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呢？我想因宋鶴庚时常責賀为人过于“古子，古子”（日語譯音，意指无果斷，太囉嗦），有意撤賀职而要我去頂着干。我极不以为然，曾对宋說：“古子古子固然是他的个性所在，但其本意是想做好的搞，这又何伤呢？为了团結同志，顾全大体，不可輕

动。我們要原諒他，帮助他。”这些話我不止一次地談过，大約賀已有所聞。同时，賀又喜深思好謀，搞政治活动。有一次，赵恒惕派他赴广东联系陈炯明，搞联省自治，临行时竟当面要我代理他的旅长，以此来征求我的意見。我馬上很直爽誠懇地安慰他，說：“你有事尽管去吧！你的部队，你不在期間，我是师部參謀长，是义不容辞地要好好招呼的。請你明白，我之回湖南，是希望大家團結一致，把湖南的事情搞好，然后向外发展，共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我决不是回来向鍋里爭飯吃的，你放心去吧！”后聞賀到广东，順便看了程潜，这也是同乡之間的普通应酬，不足为怪的。但却大犯了宋、赵之忌（因程前在郴州当湘南总司令时，是被赵、宋等人赶走的），怀疑賀与程有来往，将不利于他們。宋、賀之間，从此成見更深了。这段叙述，虽是題外的話，但由此可見，当时湘軍將領中互相猜忌到了何等程度。

我这次的湘乡之行是公开的，參謀长向师长請示，誰也不会怀疑我有什么异图。我見了宋，尚未开口，他便笑着对我說：“你的八字大題，我已考虑成熟了，决定采取两个大字：‘滾蛋’。事关机密，故特請大駕光临面談。我的答案还是‘滾蛋’好些吧！”我也笑着說：“既是这样，我們就此分道揚鑣吧！望你远走沪滨，暂时休息，路过长沙、汉口，都不要停留。日后稍有局面，我准定来迎接。”这样，就于其家将他所能招呼的部队如炮兵团黃輝祖部、工兵营李祖晃部及第七团已离职的团长李湘泉等，分派专人持密函前往关照，要他們听我指揮，立率所部并协助召集本师其他能够同情的各部参加討賊。諸事部署已妥，他就决定立即去上海，而以譚延闓所发湖南討賊軍第一軍軍长的印信（譚入湘討赵，任宋为討賊軍第一軍軍长，印信早已送到，宋意存观望，迄未公开）交我，并送我光洋八百元，囑我代理其职务，参加討赵。这里补叙一笔，我是宋的幕僚

长，为何竟以八字逼宋而无所顾忌呢？前清末叶，我与宋在东京振武学校同班同学，宋好嫖，害花柳病耽誤学业，心頗鄙其为人。后来我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肄业，宋因降級而入第九期。一九二一年春，我因他坚邀回国，出任第一师参谋长，宋遂遇事言听計从，視我为畏友。

八月二十四日，宋鶴庚由湘乡經长沙直赴汉口，东行赴沪。我亦自其家西走衡阳，面晤譚延闓。寒暄后，詢悉战事毫无进展，彼此成了僵局，亦无其他办法来打开此不生不死的局面。頓時引起我的責任感，心里灵机一动，知道当时省城空虚，除站崗警察外，无一武装部队，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又想起当我离长赴衡时，在长衡道上看見叶开鑫屬下三个步兵团之一的朱耀华团，正自长沙向衡阳方面开拔，增援叶开鑫在前綫的战事，估計今夜可以到达炭塘子一带。我素知朱是张輝瓚的妻姪，因得到张的支持，才去保定軍官学校第三期受訓的。张輝瓚这时随譚入湘討赵，亦在衡阳相見。我問张：“你对朱耀华这个团能不能掌握，使他听从你的指揮調度？”张說：“这孩子对我的話倒是听的。不过这事要他违反其直接上司叶开鑫，他是不是会有顾虑，待我去問問他看。”比即派遣林蒞南（号昌武，也是张的外姪，与朱是表亲，并在保定軍官学校同班同学）兼程前去，約朱将队伍开到炭塘子附近宿营，他本人則同林蒞南于本夜輕装赶到离炭塘子約六十里地的龟头市相会。当天傍晚，我同张輝瓚赶赴龟头市，与朱秘密会見。我們要朱将队伍于明天拂晓反扑省城，活捉赵恒惕，解送衡阳。朱坚不肯行。我們一再晓以大义，他仍然只允将赵吓走，不肯活捉。劝說无效，只好就这样办。

次晨，即九月一日上午八时許，朱团回到长沙南門城外，朝天鳴槍示威后，即整队入城維持秩序。赵恒惕果然带亲信数人，仓忙向城外逃跑。朱团倒戈入城，确出赵之意料。先是，赵听說张輝瓚

随譚回湘。张、朱关系密切，曾通知叶开鑫严防朱团反水。叶以身家性命担保，赵遂不虞有他。

朱团从容入城后，我与张辉瓒随督省署，一面与譚延闓电话联系，报告入城经过，一面用討賊軍第一軍軍长宋鶴庚名义，布告安民。同时，追探赵的行踪所在及其动静状态，并委派专员监察省垣各机关。赵之軍政要員如唐义彬、邹序彬等人的眷属，均未出走，亦派人撫慰，以免紛乱。并向各方面召集同情部队，以防赵恒惕卷土重来。到第三天，探悉赵已逃到醴陵車站，正在調度軍隊，企图反攻长沙。比囑朱耀华派一輕裝部队，指示捷徑，前往追捕，将赵解送衡阳处理，便可万事大吉了。但朱仍然坚不肯为。

这时，我深感自己没有亲信部队，什么事也无法进行，内心非常痛苦。曾派員向益阳、安化資河流域去探召資河巡緝处胡海琴部（是我为巡緝資河扰害船民的匪盜而建議一手筹編的一个武装部队），調集所屬一营多人前来服务，以及宋的旧部、业已被賀耀組撤換离职的李湘泉（原在第七团团长任内选留下来的亲信部队，从該团中抽出来約一营多官兵），与黃輝祖的炮兵团、李祖晃（广西人，保定軍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的工兵营（向駐省城，能受宋的控制），作为軍部的特务营等直屬部队，漸解軍部僵化之局。而张辉瓒时为譚之筹餉委員，自己并无部队。待朱部是他的嫡系，可以有恃无恐，便成天召集长沙士紳，筹集款項。計在省城十三天，仅筹得現款八万余元作軍費。后探知赵恒惕已向吳佩孚請得救兵来到岳阳，并将宋屬第一师的賀耀組、唐生智两旅都調集岳阳待命行动，战机一触即发。这时，蔡鉅猷部的刘叙彝旅，已开到宁乡县城，經与我电话联系。我正要他立即开来长沙，以便对付赵的援兵（預計合刘、朱三团之众，加上其他部队，可以守住长沙城，徐图扭轉局面），不料他得到賀、唐两旅已向岳阳开动的消息，忽又一声不响地連夜单

独行动，折回常德去扩充他的防地，以图巩固湘西鸦片出口的总卡子小汉口(常德)去了。我与譚延闓在电话中叹息此人之唯利是趋，不顾大局，太无志气，深为可惜。于是，我在长沙城始终只有非我嫡系，不听指挥的朱耀华团。张辉瓒亦不肯顾全大局，助我去说服朱团苦撑，致成了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一旦赵的援兵来到，唯有弃城南走之一途。果然，到了九月十三日，赵已调集岳阳的援兵，开始向长沙压迫前进。当时，我仍力持镇静，密令部队深夜过河，连家人都不露半点消息，仅于过河后遣人密囑到教堂暂避几天，徐向汉口避难。故市面未受惊动，安静如常。在出走时，家中东西毫未携带，后被蒋黻欧的部队洗劫一空。最使我痛心的是，我多年在国内外积蓄的书籍十余箱，也被糟蹋得一无所有了。我督率朱团过河后，自岳麓区起，沿湘江向上游，与赵的援兵一面对战，一面南撤，经株洲、三门、昭陵、淦田、朱亭溯流而上，相持了三十三天。

在此期间，驻郴州的第十团汪磊部，被我说服收编。汪磊号石山，新化人，广西讲武堂毕业。赵恒惕曾在该堂任过教官，故与赵有师生之谊。该团原隶属鲁滌平师邹序彬旅，是唐义彬、邹序彬等一手培植起来，而甘为赵恒惕所驱使者。此时因被衡阳谢(国光)、吴(剑学)部所阻断，不得过来。赵、唐派孙某(忘其名，亦新化人，为汪小时同学。有连口须，譚名“孙胡子”)送款十万元给汪做军费，在湘江边的淦田前綫，被我胡海琴部所拘获，解送军部。因为汪磊过去与我在实业学堂同班同学，又系新化小同乡，遂令孙某随我行动，前往说服汪团弃暗投明。孙某去后，汪团果为我所说服，编为我部一个支队，由汪任支队司令，随同入粤。后为在粤湘军第一师(我兼师长)第一旅旅长，相从有年。

（三）

一九二三年十月中旬，吳佩孚調遣入湘的北軍馬濟、譚道南、葛应龙等部，节节向粤汉、株萍路进逼，已进驻长沙、常德等地，并在岳阳组织两湖警备总司令部，由吳自任总司令。赵得大量北军后援，又有軍火接济，即向我軍大举反扑。当此战事重起的时候，陈炯明軍洪兆麟部围困广州城，同时又勾結方本仁自江西贛州进抵北江的始兴，駐軍楊希閔部滇軍第一师师长赵梁成率部抵抗不住，节节败退，方部直迫曲江，韶关岌岌可危。孙中山先生急电譚延闓率师回粵馳援。这时，魯滌平亦已在湘潭杀了团长袁植（袁团系魯亲手訓練而成的基本队伍），才得率領他的这个亲信部队王牌团和戴岳的炮兵团（其余第二师所屬刘鑑諸旅，都被赵扩充成师，拖不动了），一道向广东南撤。魯本人則和謝国光、吳剑学、陈嘉祐等随譚逕赴广州（譚在率师回粵途中賦詩，有“胜固欣然败亦喜，西风吹泪到昭陵”句）。他們帶了卫队馬弁一大群人馬，浩浩蕩蕩專車入城，洪兆麟等围城的部队，見了湘軍南开，便喊出“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洪为湖南宁乡人，所部官兵皆湘籍），自动撤去，遂解广州之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底，譚軍全部退出湖南，持續四月的譚赵之战，因以結束。譚赵战后，湘軍变化情况如下：入粵者，总司令譚延闓，下轄第一軍軍长宋鶴庚（代軍长方鼎英），第二軍軍长魯滌平，第三軍軍长謝国光，第四軍軍长吳剑学，第五軍軍长陈嘉祐，第六軍軍长蔡鉅猷仍留湘西未随入粵，与赵恒惕对立，形成割据，是譚部湘軍留駐湖南的部队；留湘者，总司令赵恒惕，下轄第一师师长賀耀組，第二师师长刘鑑，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鄂軍混成旅旅长夏斗寅。

譚延闓率領魯、謝、吳、陳等人分批先後逕奔廣州，我則代宋鶴庚帶領由長沙撤出的部隊，合謝國光、吳劍學、陳嘉祐等部，官兵約一萬七千餘人，由韶關北轉，與方本仁部在始興城外苦戰了十一天。這時，湘軍官兵初入粵境，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又缺乏糧餉醫藥，加以粵人聚族而居，設有炮樓碉堡，一見我軍開來，連牲畜物資一概搬入碉堡，形成了堅壁清野的狀況。不僅買不着東西吃，連問一個信都不可能。我軍倉猝南來，處境非常困難。軍中有时絕糧，連一餐紅薯也吃不上。始興河邊，地形起伏。某天，我赴前綫觀察戰況，竟一天未得到一口糧食。深夜自前綫步歸軍部時，跟着馬燈高一脚低一脚的走，時序已是初冬，全身大汗淋漓，眼神發黑，幾乎不能支持。恰好摸着褲口袋裏帶有西洋參一支，取出來吃了一點，覺得精神立振，津液滿腔，汗流頓止。這樣衣濕蒸發，熱氣弥漫的趕回軍部，吃到一餐紅薯，如飫盛筵。在始興地區艱苦備嘗，窮熬苦撐了十餘天，終因我軍堅持不懈、層出不窮地迂迴奇襲或猛扑側擊，硬將敵人趕出始興城，逼向南雄，狼奔豕突地越嶺北撤。

敵軍馬不停蹄地直向大庾嶺敗退，我部尾追不放，不覺已前進很远。當我率軍部直屬部隊朝始南大道跟踪搜索前進時，忽從始興城外始興河岸這邊我陣綫右翼後方山地中，發出軍號聲。初聽之下，以為是我部尚有搜索敵人未曾歸隊的官兵，因朝傳音方面層層梯田山土的斜坡彎路上搜索前進。不料突然遭到來自山後坡上的猛射，一時彈如雨下，劈拍之聲，在渾身周圍狂鳴不絕。只見敵彈着地击起的飛塵，有如群馬狂奔，一大片一大片地向我們猛扑而來。這樣，事出突然，形勢異常危急。我才命令隊伍，分批據地回击，掩護後撤至轉彎處，嚴陣以待。但聽到一個北方口音大聲咒罵說：“他媽的，老早就叫你們要沉得住氣，不許乱放槍，等他前來捉活的多好呢，誰叫你們乱放一陣，把他吓跑了。他媽的，還可惡！”不久，這

股敵人也趁機乘隙而逃。據安（慶）有脫降書文證在該處。其石碑還在，足証該處勞山僻壤也是四十年前的南北戰場）。

經過這次突如其來的短兵相接，我才警覺到得意時切不可大意。於是，沿始南大道步步搜索前進，再不敢隨便大意。一直到南雄城，察知我部主力已直追到大庾嶺，遂停止前進，嚴陣以待。可是倉猝之間却忽視了這兩條道路的戰術意義，未注意到南雄通大庾嶺大道之外，還有直通信豐的大道，以及在這兩條大道中間可逕達贛州、信豐兩城的通路。隨後發覺，我便從新布置這兩條道路上的偵察，果然發現敵有大股竄入離南雄不遠的中間一帶的村莊里造飯。如果我對此路未有戒備，他們或許會于飯後乘夜間反扑南雄城，使我首尾不能相顧，大有功虧一簣的可能。敵方料想不到我部居然會來一個突襲包圍，致使他們倉皇遁去，已造好的飯都來不及吃了。

第二天，敵方主力部隊之一的第九旅旅長高鳳桂派員前來接洽投誠，這場戰事就算告一段落。高部投誠後，比電譚延闓轉陳中山先生，得到復電嘉獎，派我就地代表宣慰勞軍。並贈我美式手提機槍八挺專械獎勵。高旅經過點驗，改編為贛軍第一師，任命高鳳桂為師長，歸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節制指揮。譚並來電，要我陪同高鳳桂赴穗謁孫聆訓。我陪同高到廣州後，先由譚延闓面謁孫，約好在廣州河南士敏土廠大元帥府相見。屆時又由譚和我陪高于約定之日上午八時前往謁見。我們會見了中山先生。譚要我將高投誠經過作簡要的匯報，中山先生頻頻點頭嘉許，並對高說：“你過來很好，以後好好訓練部隊，準備隨時參加北伐，完成國民革命。”也略問了高的部隊情況，最後連說：“好吧，以後再見。”我們趕緊起身，匆匆握手告別。當時，我感到中山先生待高不甚親切，便對譚說：“先生今天和高初次見面，並無半句慰問的話，僅僅是普普通通對話一番，就伸手言別，對新降將領未免太簡單了吧！”譚說：“先生的作風就是

更靠自觉自愿。……与北洋军阀的官僚作风，迥然不同，我后又是一套，那全是两样的。我们要设法把这些道理切实告诉高师长，使他知道初到广州，就蒙中山先生以革命同志相待，应该感到荣幸。”我听了谭延闿这番话，深感他对中山先生的认识，比我要深得多了。

后来，与高凤桂谈及始兴之役要活捉我的情形，方悉他们也是派了特遣队来扰袭我后方，想借此建奇功，而竟被我先发觉，险遭复没。因此，感到对我正攻奇袭皆已无望，而方本仁又歧视他们，随时有被陷害的危险。再三考虑，才来投诚。

以上所述，是湘军入粤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以前的一段史实，拉杂写出来，借供参考。

譚趙戰爭亲历記

戴 岳

一九一六年的夏天，窃国大盜袁世凱薨命后，我由天津回湖南（在天津参加秘密倒袁活动），任湘軍第二师陈复初部野炮連連长，次年驅傅（良佐）胜利，陈复初垮台，任第一师赵恒惕部炮兵第三营（第一、二营未成立）营长。一九二一年援鄂之役，調升第二师魯滌平部騎兵团团长（繼迁炮兵团团长），在湖南軍隊中有一段較长的經歷。

一九二三年爆发的譚趙战争，使湘軍內部起了很大的分化。我是这次战争的参与者之一，現就回忆所及，写出一点片断的資料，以与方鼎英先生的《一九二三年譚趙战争与湘軍入粵》一文，互相参証。

（一）

赵恒惕自一九二〇年驅逐张敬尧收复长沙岳阳后，利用各方面的倒譚势力，逼走了譚延闓，繼任湘軍总司令，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軍政大权。他又悍然伸出血手，杀害了傾向程潛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及第一师炮兵混成团团长瞿維斌等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統治基础。并且打出“省宪”的招牌，高唱“联省自治”，实质上是投靠直系軍閥，反对西南进步势力。从湘軍內部情况看，譚延闓虽已远走上海作寓公，并未忘情于湖南，譚派势力仍然不小，都希望老

上司卷土重来。特别是自从援鄂战争失败以后，赵恒惕处于吴佩孚的恩养威劫之下，更为一部分拥谭军人所不满。而谭延闿在上海亦不甘寂寞，通过周震鳞的关系，开始和孙中山发生接触，并于一九二三年二月随孙中山由沪赴粤，在大元帅府担任建设部长。谭对孙极为恭顺，孙对谭亦相当倚重。此时，谭虽身在广州，很想有机会夺回湖南地盘；湖南的谭派军人，也迫切希望他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能够早日回湘，恢复统治地位。因此，暂时获得安稳的湖南政局，又已“密鑼紧鼓”，预伏了重新爆发派系斗争的危机。

曾任湘军混成旅长，第七区司令的陈嘉祐，是湘军将领中竭力拥谭的一个。当谭延闿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随孙中山搭轮船离沪赴粤之际，陈即潜赴湘西筹划军事，作拥谭倒赵的准备。陈嘉祐是在上海和谭延闿密商之后，于二月十八日动身回湘倒赵的，到湘西后收合余众，四月中即在辰州公开宣布讨赵。他在湘西和沅陵镇守使蔡鉅猷取得密切联系，蔡当时也是拥谭反赵最力的。蔡部久据湘西一带，防地辽阔，有特税收入，军费充裕。赵恒惕在政治上痛恨蔡之拥谭，不利于己，在经济上则对蔡之把持特税，垂涎欲滴。因此，就于七月二日在省召开军事会议，以蔡鉅猷未奉命令擅自收编陈嘉祐“叛部”为理由，建议裁撤沅陵镇守使，将蔡调任湖南讲武堂总办，所轄刘叙彝、田镇藩两旅，改归第一、第二两师节制。蔡鉅猷等受谭延闿之命，公开宣布湘西独立，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湘西第一军军长，分兵三路，由刘叙彝、田镇藩、周朝武率领，向常德、安化、新化等方面进攻。

七月二十四日，赵恒惕拉拢湘军团长以上军官十七人在长沙举行会议，他自己没有公开露面。会后，这些团长联名发出通电，指责蔡鉅猷，拥护赵恒惕维护省宪。这是赵恒惕拉拢中层（团长）、排挤上层（师长、镇守使），直接控制部队的一套作法。我当时在宁乡

防地，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會後不久就有人把會議內容告訴了我。我是極不滿意趙恒惕這種作法的。這個電報發出後，趙即發動駐在常德的唐生智，以所轄何鍵的騎兵團擔任常德、桃源守備任務，將所部第三、第八兩團推進到鄭家驛、辰龍關，賀耀組所部第一旅則進至東坪、底莊一帶，與蔡部開始作戰。其時，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等則聯名發出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湘西問題。他們這種作法，實際上就是逼迫趙恒惕趕快下台。因為蔡鉅猷等已從湘西分路進兵，並與唐生智、賀耀組等部接觸，趙恒惕已成騎虎難下之勢，湘西問題根本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了。

趙恒惕與蔡鉅猷之戰，不管雙方有什麼借口，實質上是一場爭奪鴉片煙稅的戰爭；同時，也為譚趙戰爭揭開了序幕。

(二)

趙恒惕與蔡鉅猷之間發生了戰事，譚延闓認為倒趙的時機已經成熟，於八月初由粵回湘討趙，在衡陽就任孫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隨即任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為湘中討賊軍第一、二、三、四軍軍長。謝、吳兩人公開接受譚的號令，興師討趙；宋、魯兩人則表面上仍然保持“中立”，魯將第二師師部由長沙移駐姜畚，宋根本不過問軍事，往來於長沙、湘鄉間，成為一個十足的軍人政客。此外，公開擁護反趙的，還有蔡鉅猷和陳嘉祐，蔡部實力雄厚，陳則僅僅收編了雷洪、朱剛偉、蔣隆葵等部，兵力非常薄弱。

八月中旬，譚趙兩軍主力（趙軍為葉開鑫部）在株洲、醴陵一帶接觸，醞釀已久的譚趙戰爭正式爆发了。

譚趙之戰爆發後，魯滌平雖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奔走“和平”，實際上却是傾向譚方的。他為什麼有這種傾向呢？據我看來，不外

以下几个原因：一、援鄂战争结束后，部队损失颇多，进行整编，鲁部第四旅旅长邹序彬与鲁发生争执，结果邹旅以伤亡太多，不能继续保持旅的建制，邹愤而辞职。所部曾君聘的第九团缩为两营（后改为第二师骑兵团），汪磊的第十团则不听鲁的指挥，擅自开往郴州，依附谢国光。邹序彬去后，鲁滌平保荐原第四混成旅旅长张辉瓒为第四旅旅长（张部残存的王钺团，于援鄂失败后，闻赵决意将其解决，星夜由湘潭附近开赴桂东、汝城，联合陈嘉祐部进入粤北仁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事。后又由湘粤桂边境退入湘西，依附蔡锷，为蔡所收编）。张在其长沙清香留公馆大贴红条宣布就职，鲁要我前往道贺。我到了张宅表示祝贺，门前冷落车马稀，除看到林昌武与朱某等二三人外，并未见有其他的贺客。张宣布就职后，鲁颇为得意，而赵恒惕所亲信的旅团长则表示反对。这在张辉瓒固然感到很扫兴，而鲁滌平则更为愤慨，竟因此托病住进医院（我到医院探视时，鲁并无病容，但愤慨之情见于词色）。后来经人调处，赵为敷衍鲁的面子，乃以原驻澧县的唐荣阳旅（由警察部队编成的）编入第二师建制，调张辉瓒任湖南省警务处处长。鲁遭此打击，开始对赵有贰心。二、谭未入湘讨赵之前，湖南废师去镇（不设师长和镇守使职务，各旅旅长直接归湘军总司令指挥）之谣颇盛。当时位居师长、镇守使的宋鹤庚、鲁滌平、谢国光、吴剑学、蔡锷等人，觐心自身地位难保，有意拥谭。赵恒惕下令撤销蔡锷的沅陵镇守使，宋鲁谢吴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杀鸡吓猴”的手段，拥谭之心更为迫切。三、南县知事李希尚，是鲁滌平的妹夫，被唐生智下令处决，赵恒惕没有表示意见，鲁因此迁怒于赵，也促成了他的拥谭决心。

谭赵战争初期，鲁滌平内心拥谭，而伪装中立，不敢公开露面反赵，也有他的原因的。第一，当时湘军只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

宋鶴庚的態度搖擺，沒有積極反趙的表現，魯為自身前途計，不能不有所顧忌。第二，魯所指揮的兩個旅，第四旅唐榮陽部駐澧縣、津市，雖歸魯節制，而鞭長莫及，無法調動；第三旅旅長劉鏞，與葉開鑫、賀耀組、唐生智等的感情很好，甘心擁趙，無意擁譚，他雖和騎兵團團長唐希朴多次密談，指責譚延闓由粵回湘，無故掀起內戰，擾亂地方，表示決心擁趙到底。第三，魯部中下層軍官大部分是跟隨劉鏞擁趙反譚的，如第五團團長葉琪是唐希朴向劉鏞介紹來的，唐、劉關係很深，葉當然聽命於劉鏞；第六團團長袁植，因劉鏞的關係，早已通款於趙；大部分營長也決意隨劉擁趙，僅有第六團第二營營長黃鍾珩是寧鄉人，所屬連排長士兵多為寧鄉籍，是魯的基本隊伍，可以直接控制。在此情況下，魯如公開揭發反趙旗幟，外援無望，內憂堪虞，進取退守，都有困難。這是他不能不認真考慮的。

譚趙兩軍在湘江東岸相持多日，戰事迄無進展。八月二十七日，魯滌平在湘鄉發出通電，正式宣布“中立”，電文中有“畏（譚延闓號畏三）、炎（趙恒惕號炎午）兩公均吾姑，兩姑之間難為婦”兩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當時的尷尬心情。

八月三十一日，由長沙開往衡山進擊譚軍的葉開鑫部朱耀華團，因方鼎英、張輝瓚的策動，反戈倒趙，襲攻長沙。方鼎英於九月一日進入長沙後，電邀魯滌平前來省城主持一切（宋鶴庚已遠走上海），魯就心趙恒惕卷土重來，仍然偽裝“中立”，沒有接受方的邀請，而向雙方提出和平談判的建議。在魯的倡議下，譚趙雙方同意以湘潭姜畬為和議地點。姜畬會議從九月二十二日開到十月十三日，斷斷續續地開了二十多天，由於雙方提出的條件都很苛刻，互不相讓，始終沒有談攏來。在此期間，魯表面上偽裝和事佬，超然於事變之外，實際上是在爭取時間，進行一項重要的政治投機。他一面勸導

双方罢兵停战，一面加紧调动部队，企图集中到湘潭，便于自己指挥，使自己更加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和谈破裂，可以公开投向谭方。鲁再三电催唐荣阳旅开来湘潭，唐不愿离开家乡，仅派了刘凤一个营开到湘潭，以敷衍鲁的面子。炮兵团原驻宁乡、安化，鲁命令我率部移驻湘乡，后来一部分到了姜畲，我是在十月十三日到达姜畲的。

(三)

姜畲和平会议，曠日持久，双方距离很远，已经成了僵局。这时，刘鏞到了湘潭，召集第六团少校以上军官谈话，他说：“人各有志，师长决心拥谭，我以身体关系，不惯驰驱。因此，不能不和师长分家了。实诚（黄钟珩别号）随师长很久，希望跟随师长继续效力，好好招拂师长。”刘鏞说话之后不久，就秘密回长沙去了。

鲁瀚平在姜畲听到刘鏞在湘潭召集第六团少校以上军官讲话的消息，误会到刘鏞已将黄钟珩扣留，这营人靠不住了。加之他早已对袁植不满，时常公开地骂：“袁舜波（袁植别号）忘恩负义！”这时更迁怒于袁，认为他在和刘鏞勾结，制造纠纷。鲁正在绕室彷徨时，有人向他建议，即时下令召集在湘潭的营团旅长到姜畲开会，刘鏞、袁植如果不公开叛变，黄营长自然会来参加，问题就解决了。鲁深以为然，立即下令召开军事会议。听说鲁召开这次会议的用意，还不仅仅在救出黄钟珩，并想趁机会加害刘鏞（他不知刘鏞已经离开湘潭了）。届时，第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武彝，骑兵团团长唐希朴、团附萧文铎以及营长周磐、黄钟珩、李仲任、周维黄、洪振楚等均遵令到姜畲开会。他们到师部的时间已经不早了，彼时并未正式开会，鲁仅仅说了几句话，略谓：刘旅长原表示愿意与我一同拥谭，忽而又决意拥赵，使我为难。现在愿意随我拥谭的，当然欢迎，不愿

意的也不勉强，有多少去多少。如果大家都不愿意跟我跑，纵然只剩下几个馬弁，我也是要拥譚到底的。大家吃了飯，可早些回防。这可能是由于看到刘鏞沒有来，所以草草收場。

会后，大家在师部吃了晚飯，立即动身回防。不料变生意外，袁植行至姜畚公路附近离师部不远的地方，突被他的第二营第七連連长张汉忠派兵行刺，當場殞命。袁死，魯滌平交代黃营长妥为收殮，并安慰其在湘潭的家屬。黃馳至袁被害处抱尸慟哭，連声說：“我对不起我的团长”。黃自袁死后，心緒不宁，入粵即患心脏病，始南克复，入广州医院，不久病逝。

我于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由湘乡到达姜畚，向魯汇报所部各营开动情况。我們談及了和平會議問題，魯說：“对方（指赵方）无誠意，和談无結果，誠三湘人民之不幸。”接着又談及了两军形势，我說：“譚方战綫太长，兵力分散，赵方正在縮短防綫，集中兵力，以图一举歼灭譚方主力，战事前途，极为可慮。”魯說：“譚方兵力多于赵，但指揮无法統一，处此情况下，我也爱莫能助。”随后，我到和平會議場所訪友去了。听到发生事变的消息，赶往师部打听情况，进门后看到魯滌平頓足长叹，連声說：“我的人格破产了！我的人格破产了！”他說袁植被害不是他指使的，但事到如今，人家决不会諒解。

袁植被刺后，据师部代理參謀长王捷俊（与袁最有交誼）告訴我，魯平日待袁很好，第六团是魯的基本部队，袁离他而随刘鏞行动，魯非常不滿，形于詞色。第二营第七連担任师部警卫任务，张汉忠人极粗暴，听到魯不滿于袁，也以为袁确是忘恩負义，或系憤而出此。他又說，蘇波这个人真蠢，既然决意离魯而随刘，何不避居长沙，不住湘潭；縱在湘潭团部，开会不必亲来，可以派团附作代表，則這場禍就可以免了。当时又听到有人說，杀袁系师部副官

长洪汉傑預为布置的。究竟真实情况如何，我无从悬揣。在魯滌平說来，反正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难怪他連声自責“人格破产了。”

袁植既死，刘鋹又走了，和平更无希望（实际上赵方完全不重視和平會議，和平會議也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魯滌平曾想以第二师駐湘潭的全部兵力强渡湘江，截击赵軍后方，但遭到部下的反对，未能实现。于是，乃率所部騎兵团、炮兵团及第六团之第二营到馬家堰，在馬家堰开了一次軍事會議，謝国光、吳剑学等都来参加了。謝国光部原在朱亭以北与赵軍对峙，这时見援軍已到，他在会上兴高彩烈地說：“好！你們来了，希望打一个胜仗，唱一出好戏給大家看！”我回答說：“对！我們今后有进无退，不以湘江西岸为后路！”

在这次軍事會議上，當場决定集中兵力，与赵軍决一雌雄。十月中旬，譚赵两軍部署完毕，在湘江东岸地区昭陵、黃土岭、醴陵之綫打了四五天。赵軍主力为唐生智所指揮的第三团、第八团及騎兵团，叶开鑫所指揮的刘重威、邹鵬振、蔣鋤欧三个团（唐在昭陵滩方面，叶在醴陵方面），譚方主力为謝国光部三个团，另方鼎英、张輝瓚所指揮的朱耀华、罗寿頤、黃郁祖、李湘泉、周祖晃等共約七个营，后方有魯滌平所率领的部队約两团之众，也渡江参加了战斗。此时赵方留守长沙的，为賀耀組一旅，与占据岳麓山一带的蔡鉅猷所部隔江相持，战事并不順利，双方互有伤亡。后因沈鴻英突率所部七八千人袭取郴州，魯的部队由我率领馳往郴州截击（我率部行抵郴州近郊，沈鴻英已弃郴州向桂阳方向窜去），前綫作战兵力頓感单薄。而广东方面亦軍事紧急，陈炯明、邓本殷由东江、南路两方面进逼广州，方本仁、邓如琢又由大庾侵占南雄、始兴，广韶震动，孙中山电令譚延闓率軍援粵，附譚部队除蔡鉅猷所部退入湘西，結果被赵全部解决外，其余各部均离湘赴粵增援。譚赵战争遂

以結束。

这里补叙一笔：譚初奉令时，本想要蔡鉅猷部一同入粵，曾在電話中与毛炳文商談很久（毛在蔡部以旅长代理前敌总指揮，其时到了湘潭中路鋪）。毛以他系临时代行指揮，未得蔡的同意，不敢擅自行动。蔡部各旅退湘西后，曾在激浦底庄实行一次反攻，把賀耀組的部队打垮了。嗣因叶开鑫部由宝庆袭取了洪江，后路已断，不能不离开湘西。所屬部队中，楊毓棻、何能千两团被賀耀組收編了，譚潤生、彭进书两团投降了叶开鑫。最后，陶峙岳团与龔宪一个营亦为賀耀組所收編，蔡所掌握的部队全部瓦解了。一九二四年春，蔡所收編的邓黑七（后改名为邓赫績），始潜由湘桂边境开到广东，編入建国湘軍第二軍。

譚赵战争结束后，魯滌平师随譚入粵部队，計有騎兵团两个营，炮兵团两个营（缺邓飞之第四連），第六团第二营及机关槍連，第四旅刘凤全营，另师部工兵連，官兵共計約三千五百余人。魯到馬家壩后，始正式就譚延闓所委的討賊軍湘中第二軍軍长职，将所部編为第一、第二两个混成旅，以唐希朴和我分任旅长。由于唐希朴不能来，实际上只是一个混成旅，完全由我負責。

这次入粵的部队，是分两路前进的：一路由郴州經坪石；一路越蔚岭关經九峰。蔚岭地势险峻，山巒重叠。我率部越过蔚岭关到达青草岭时（相距約五里，有鋪屋十余家），已是深夜十一时，細雨綿綿，气候頗寒，大部分官兵就在野外露宿了一夜。其时，官兵衣单被薄，給养亦日感困难，沿途但見滇軍到处設卡收稅，湘軍是不敢过問的。周鰲山虽在乐昌向县公署筹措到一点錢米，亦屬杯水車薪，无济于事。

湘軍入粵后，在始兴与方本仁、邓如琢部激战了約十日之久（滇軍赵成梁师旅长韦杼率领一个团参加作战），因給养不济，有以紅粟

混菜煮稀飯充飢者，艰苦程度可以想見。始南克復，我率部駐守梅岭，魯滌平升任我为第二師師長。当时我因对入粵前途并不乐观，对魯个人又有所不滿，就将公文退回，表示不就新职。后来魯派副官长洪汉傑一再敦劝，我才勉强接受了。一九二五年冬，在粵湘軍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延闓、魯滌平分任正副軍长，我为該軍第六師師长。辛亥革命后，譚延闓三次督湘，每次离开都是只身出走，情况相当狼狽。一九二三年第四次卷土重来，却带走了几千軍隊，成为他投向国民党旗帜下的一笔重要的政治資本，从此左右逢源，見重一时，最后甘为蒋介石的走卒以終。关于湘軍入粵后参加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以及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参加北伐的經過，我另有专文記叙，此处不贅述。

魯滌平率領一部分队伍随譚入粵后，赵恒惕以刘鏞升任第二師師长，以第五团及第六团一、三两营扩編为两个旅，升叶琪、唐希柝为旅长。原第四旅旅长唐荣阳升任澧州鎮守使，指揮原轄两个团，仍駐原防。并将湘軍由原来的两个師扩充为四个師：第一師師长賀耀組，第二師師长刘鏞，第三師師长叶开鑫（后兼湘西善后督办），第四師師长唐生智（后兼湘南善后督办）。旅长升了師长，原来的团长何鍵、李品仙、刘兴、叶琪、鄧鵬振、刘重威等，也都依次遞升为旅长，各自忙于招兵买馬，扩充部队实力。此外，在湖南寄食的夏斗寅部，由原来的鄂軍歩兵团扩編为鄂軍混成旅，由夏任旅长；蔣鋤欧沒有升官，他的部队番号为独立第二十二团。

以上所述，都是整整四十年前的往事。錯漏难免，識者正之。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回忆国民革命軍第八軍

刘 兴道稿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軍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出师北伐。最初参加北伐的部队只有八个軍。第八軍軍长是唐生智。这个軍在北伐的战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后来，第八軍扩編为第四集团軍，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十二、第十七等五个軍；一九二九年成立的第五路軍，也是在这个部队的基础上扩編的。为了叙述方便，我以第八軍为题，就我所知的来叙述它的演变，并涉及我所经历的或所知道的各次战役。

第八軍的前身

一九一六年，湖南人民把湯鄒銘赶走后，推举刘人熙当督軍。刘人熙为了督署的警卫，設立警卫团，派他的儿子刘仲迈当团长，唐生智当第三营营长，第一营营长是邹礼，第二营营长是李謨枫（一、二营根本未成立）。我当第三营十連連长，唐哲明是九連連长，李家馨是十一連連长。

刘人熙大約当了一个多月的督軍。譚延闓受北京政府之命回到湖南，接任督軍后，軍队从新改編。我們的队伍改編后的番号是：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三营第十連。师长赵恒惕、旅长林修梅、团长宋鶴庚、营长唐生智，我仍是第十連的連长。

一九二〇年，林修梅离开了队伍去广东医病兼搞政治活动，于

是宋鶴庚升旅长，唐生智升团长，我也晋升营长。

第二年即一九二一年，赵恒惕升兼师长，以宋鶴庚升师长，唐生智升旅长，我升团长，番号不变。第二旅开驻常德。一九二三年，蔡鉅猷任沅陵镇守使。蔡和赵恒惕的关系不好，与广东譚延闓有联系，接受广东方面给与他军长的任命和赵对抗。赵恒惕命令第二旅去打他，我们把队伍开向沅陵，打垮了蔡鉅猷。

澧州镇守使唐荣阳乘我们和蔡鉅猷作战的时候，他向我们的后方常德袭击，我们派回一个营，虽然把他们击退了，但损失很重。因为我们的军需品和私人的行李都在常德，很多被唐荣阳的军队抢去了。

一九二三年，譚(延闓)赵战争结束后，赵恒惕把湖南的军队作了一次整编，共编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组，第二师师长刘鏞，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并以叶开鑫兼湘西善后督办，唐生智兼湘南善后督办。第二旅自常德开回长沙后，即改为第四师第二旅，我任旅长，旅部移驻衡阳，部队分驻湘南各县。

第四师驻在衡阳的期间，唐生智专心致力于训练队伍，并举办军官讲习所。唐本人兼所长，三个旅长(何健、李品仙和我)兼副所长，师参谋长周福兼教育长。训练期间一年。除选调一部分连排长来所受训外，另吸收一部分青年学生，予以训练，作为充实基层干部之用。后因参加北伐，形势发展，只办一期，即行结束。

这时，鲁滌平、宋鶴庚率领湘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打过南雄后，据说鲁、宋两人发生意见(当时鲁滌平任湘军总指挥，宋鶴庚任副总指挥，发生什么意见我不了解)，宋鶴庚带领约一旅人，拖到汝城。唐生智派何健一旅将其包围缴械，所缴获的枪械，即以补充何旅。同时川军熊克武、汤子模在广东也因发生意见，汤子模率领一部川军，从江西边界回到四川，汤部奉令一旅开到道县。当时我

旅正駐零陵、道县一带，奉到唐生智的命令，也将李桑全旅繳械，所繳获的槍械，即以充实我旅。何鍵和我围繳这两部分軍隊的槍械都很順利，只是晚上将其包围后，打了几槍，就繳械了。至于湯子模自己所率領的一部（約一旅人）經全州拖到湘西时，也被第三师刘重威旅繳械。

第四师繳获宋鶴庚、湯子模两部槍械后，除充实原有的部队外，还新扩充了一个警备旅，以周瀾任旅长。由此兵力逐渐加强，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驅逐赵恒惕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組后，广东国民政府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浪潮迅速高涨，衡阳与广东接近，尤得风气之先。当时，唐生智除送胞弟唐生明去黃埔軍校学习外，还选送一批优秀青年前去学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間，广东政府与唐生智之間，已有信使往返，建立了初步联系。

湖南省长赵恒惕与北洋軍閥吳佩孚勾結，反抗革命。吳佩孚的軍隊盘踞在岳阳羊楼司一带，势力还相当强大。一九二六年春，唐生智为了清除北伐的障碍，发动了一个驅赵运动。当时，赵恒惕阴谋假白喇嘛来长做法会的名义，召集各师长来长参加法会，企图乘机把唐生智杀掉；但唐因已与赵发生意見，早有戒心，沒有来长参加，赵的阴谋未能得逞。随后，吳、赵又阴谋假装撤出长沙，企图引誘唐的部队深入后，包围歼灭。在此情况紧张的当儿，盛传第二师也反对赵恒惕，赵至此已感到沒有办法，只有离开长沙逃往上海。至是，唐生智带着李品仙的第八旅来到长沙，接受省长职务。

把刘重威等

唐生智到达长沙后，召集师旅长来长开会，到会的有师长刘鏞，旅长刘重威、唐希朴，参谋长张雄兴，秘书长肖汝霖等。实际并没有开会。当他们到达后，就分别被看守了，第二天被解送到衡阳，把刘重威交给第二旅看守。当时，我很难为情，因为刘重威和我是同学，感情也很好。我安慰他，和他住在一起，饮食起居，都特别照顾。不久，唐生智下命令，把刘重威、张雄兴、肖汝霖三人枪毙，由师司令部提去交机关枪连连长许德贵执行。至于刘鏞、唐希朴两人，被看守约四个月后才释放。

唐生智和刘重威、张雄兴都是同学，本来感情也很好，为什么要杀掉他们呢？确实原因我不了解。就我所知：刘重威为人很跋扈，平日极端反对唐生智，唐因是恨他，张雄兴因唐生智在部队提倡佛化，教官兵信奉佛教，他却在自己的部队里提倡基督教，与唐唱对台戏，因此唐对他也很不满。这可能是刘、张二人被杀的原因之一。至于肖汝霖为什么被杀，至今我还不明白。刘鏞、唐希朴两人与唐没有恶感，所以得免于死。

参加北伐的前奏

唐生智接任湖南省长后，贺耀组、叶开鑫都反对，尤以蒋钊欧（第三师的旅长）反对最力。在唐接事一个多月以后，他们就联合向唐进攻了。

唐生智在长沙的队伍只有一个旅，力量不够，在贺、叶和第二师联合进攻下，遂即退出长沙，命令第二旅由衡阳向永丰截击敌军林拔萃旅（原刘重威旅，刘死后由林接替）；第八旅沿湘江两岸向湘潭、长沙前进；第九旅由湘乡向宁乡前进。第二旅于打退林拔萃

旅后，进至湘潭、姜畲之线，又与叶开鑫主力遭遇。这时，贺耀组的第八军由常德进入益阳，迂回我军的左侧背，我军遂深夜撤至湘乡、虞塘、山枣之线。旋奉唐生智命令，第二旅和第九旅撤退到洪罗庙、国庆一带，第八旅撤至樟木市，固守待援。时因天雨，双方相持达四十余天之久，才又再行出击，这也就是第一次北伐作战的开始。

第八军的成立和进攻武汉

正当唐生智与贺耀组、叶开鑫和第二师作战的同时，广东方面先后派来白崇禧、陈铭枢和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与唐联系参加北伐的问题；唐生智也派了冯天柱去广州联系。广东政府给予唐以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名义。唐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即在衡阳宣誓就职。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的行列。

唐生智既任第八军军长，原来的旅，随之改为师，何键任第一师师长，李品仙任第二师师长，我承袭第四师；原警备旅改为教导师，仍以周斓为代理师长，没有第三师的名称。

此时，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源源开到湖南，首先是第七军和第四军的一个师（师长陈铭枢），随后第四军全部都开到。至是，原在洪罗庙，国庆以至樟木市一线固守的我军遂即全线出击：我第一师（原第九旅）由洪罗庙出击，把贺耀组部打垮，冲入湘乡敌人阵地，一直追到宁乡；我第二师（原第八旅）在樟木市正面攻击蒋钊欧旅和第三师第二师各一部分，战斗相当激烈；我第四师（原第二旅）在集兵滩与第三师的林拔萃旅和陈醒先（绰号陈瘦狗子）团接触，我以一部分兵力将林旅陈团吸住，另抽调唐哲明的一团，绕过南岳后山，抄到樟木市敌人的侧面，把敌人打垮，原被我吸住的林旅陈团，被我方猛烈攻击，也不支败退；我师遂向谷水前进；我第二师

沿湘江直下，經湘潭進至岳麓山，繳了賀耀組部和第三師的一部分槍械，隨即進入長沙。賀耀組的第一師撤至益陽，第二師和葉開鑫的第三師撤至汨羅以北。我第四師、第一師向汨羅之綫壓迫前進，一直追至岳陽。我教導師同時奪取益陽，向常德推進。

同時，第四軍直趨羊樓司向吳佩孚軍進攻。我第八軍渡過新牆河後，集中於岳陽地區。第四軍打垮吳佩孚的軍隊後，直指武昌。當時，國民革命軍因有共產黨參加領導，士氣旺盛，到處受到群眾歡迎，真是先聲奪人，不攻而下。

武漢方面的敵人有吳佩孚和湖北督軍陳嘉謨（劉佐龍踞漢陽，劉玉春固守武昌）。我方以第四軍圍攻武昌城，第八軍的何鍵師抵達漢陽時，劉佐龍即懸白旗向我方投降（當時，何鍵在報上宣傳戰事如何激烈，都是謊言）。坐鎮漢口的吳佩孚倉皇北竄（後來在其公館發現拋棄字畫古玩什物甚多，其慌亂可見）。我第四師由京口渡江，占領漢口，另出一部追擊至橫店，在橫店車站，截獲吳佩孚乘坐的原慈禧太后的花車。我師又由橫店進駐廣水，直逼武勝關。這時靳雲鶚駐守雞公山，我師冲進靳雲鶚的司令部，敵人才發覺，未經戰鬥就占領了雞公山。

當北伐大軍占領武漢、南昌、九江後，蔣介石在南昌召集會議，唐生智參加了這次會議。據唐事後透露，會議內容著重在整編軍隊問題，並說蔣私心很重。唐從此就對蔣不滿。

擴編為第四集團軍和進攻河南

一九二六年冬，唐生智根據南昌會議的決定，撤銷前敵總指揮的名義，成立第四集團軍，唐任總司令。原第八軍擴編為三個軍，任命李品仙為第八軍軍長，何鍵為第三十五軍軍長，原第四師與駐在常德周燦的教導師合編為第三十六軍，以我為軍長，周燦

长。第三十六軍轄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廖磊，第二师师长唐哲明，第三师师长周維寅。（一九二七年冬退到湖南后，又新添了两个軍，叶琪为第十二軍軍长，周燾为第十七軍軍长。）

在广水整編后，經過短时期的訓練，至一九二七年夏，又奉命繼續北伐。一九二七年五月間，国民革命軍由武汉繼續向河南进军。唐生智的第四集团軍全部投入作战部署：第三十六軍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由广水出发，沿平汉铁路綫前进；何鍵的第三十五軍作总預备队，在三十六軍的后面廢續推进；李品仙的第八軍卫戍武汉。在铁路綫的右翼，系賀龙將軍的独立第十五师和张发奎的第四軍，在铁路綫左翼的部队，系直奉系軍隊反正过来的庞炳勛、魏益三、樊鍾秀、梁受凱四个軍和其他部队（以上各軍的实际兵力均不够一个軍应有的力量）。当时敌方系奉系三、四方面軍团，軍团长为张学良和韓麟春。敌軍以遂平、西平和上蔡三个县城为据点，凭城固守。我三十六軍以第三师的一部看守遂平，主力即第一师的三个团繞过遂平直趋西平，以罗霖的第二团担任正面，胡达的第一团为右翼，张节的第三团为左翼；第二师为預备队。当我軍第二团前卫哨进至离西平城約一公里地时，即被城上敌軍哨兵发现，遂发生接触。当时因系白天，北方地势平坦，敌人又在城上，居高临下，兼之敌軍武器較我軍优良，发射炮弹亦相当准确，因此我軍死伤甚重，无法前进。入夜后，双方攻击，更为猛烈，槍炮声紧密不断。我軍担任預备队的第二师，亦已加入战斗。俄国顧問菲力普看到这种情况，感觉危險，再三要我撤退，我没有同意。我住在铁路边的一座土地庙里，靠近火綫。为了鎮定軍心，我索性睡下。菲力普还不时派人来看我的动静。直到半夜过后，槍炮声逐渐稀少，我判定敌人已在撤退中。到拂晓时，敌人果然全部退却了。菲力普对我举起两个大拇指，表示欽佩。由于西平已下，遂平的敌人也随即撤走了。同时，

右翼张发奎的部队，也攻下了上蔡，于是我军跟踪追击前进。

此时，河南的紅槍会扰乱着我们的后方，在李新店、明港一段铁路上，拆毁铁轨，破坏交通。我抽调第二师的四、五两团回头予以肃清。当军队开到后，紅槍会的群众大部分都散了，但也有极少数的人聚集抵抗，被我军捉到一些。据俘虏说，他们的首领有“神法”，吃了他的符水，子弹就打不进去。因为他们有这种迷信，在我军与他们接触时，有些人竟不退走，还向前进，结果被打死了。

我四、五两团于肃清紅槍会后，随即赶上前方，担任对漯河敌军的攻击。敌军自西平败退后，又集结于临颍、和尚桥之间，漯河市其前卫。我除以四、五两团监视漯河敌军外，即将主力绕过漯河，向临颍守城敌军压迫。我原来的命令是要在次晨拂晓开始出击，但我第一师的前卫部队第一团于黄昏时进抵临颍城郊，被敌军发现，向我军猛烈射击。我第一团亦欲乘势进攻，对敌还击。终因该团不是按照计划行动，后援部队未能及时赶上，以致在攻城时不惟未能得手，而且损失巨大，仅此一团就死伤达六百余人之多。

经过一星期的战斗，始攻克临颍。漯河之敌，因临颍既下，旋亦退走。和尚桥敌军，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同时败退。我军遂直趋郑州。

当我军与敌相持于临颍时，得到我方飞机在敌后侦察报告，知道敌军后方纷纷撤退，情况紊乱，我军遂乘胜猛追，敌军沿途丢弃军用品甚多。例如，在和尚桥车站发现张学良私人用的宣纸信箋（信箋上印有张学良用牋五个字），抛弃满地，其慌乱情况可以概见。

张学良退到郑州，写了一封信给我，在他退出郑州时，留下一个副官在郑州把这信交给我第一师的先头部队。信写得很长，内容我记不很清楚了，大概是：起首说了些对我钦佩的话；接着说他留

下了很多軍用品在郑州仓库，为了送给我，所以没运走；最末尾似乎还说过他也要参加革命的话。对于他留下些什么軍用品，我没有清查，也没有接收，大概后来都归馮玉祥接收了。

当我軍在临穎与和尚桥作战期間，右翼賀龙將軍的独立第十五师和张发奎的一部分軍队、左翼魏益三部，樊鍾秀的部队，都已到达前綫。会师后，又分別前进，向敌追击。当我軍到达郑州，张发奎部队到达开封时，第二集团軍馮玉祥的部队，从陝西出潼关，沿隴海路綫东进，已先我們到达郑州。

我軍到达郑州后，唐生智和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几位高級負責人如汪卫精、譚延闓，都来到郑州和馮玉祥会晤。唐生智并召集了我軍，师，团长以上举行會議，由唐說明当时国内形势，会后即将部队全部撤回武汉。第一次北伐，就此告一落段。

东 征 討 蔣

一九二七年秋，我軍自郑州回到武汉，整訓将近三个月后，唐生智又有“东征”“討蔣”之議。当时，我劝唐暫緩“东征”首先应安定自己的后方，巩固自己的經濟基础。因为湖南在“馬日事变”以后，地方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宜昌、沙市方面魯滌平的部队，与我何宣师不时发生战斗；同时，武汉政府因发行国库券的問題，金融亦不稳定；我們把自己内部巩固之后，再去討蔣，当会更有力量，并可免后顾之忧。唐則认为蔣介石和桂系的軍队与孙传芳的龙潭之战方結束不久，蔣、桂軍死伤惨重，这时討蔣，正是一个大好时机，不能交臂失之，沒有接受我的意見。终于在九月間就发动了“东征”。战斗部署是这样的：第三十六軍为江右軍，由我任指揮；第三十五軍为江左軍，由何鍵任指揮；第八軍留駐后方，卫戍武汉。部署既定，江右軍即沿长江右岸东下，江左軍即沿长江左岸东下。

当江左軍进到安庆，江右軍进到蕪湖，蔣已下野，我軍遂即停止前进。武汉方面即任何鍵为安徽省主席，我为委員。当时，南京方面系譚延闓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程潛率第六軍在皖南宣城一带，但中央实权，掌握在桂系的手里。

我軍进驻蕪湖时，陈調元的部队已先駐在这里。陈系总指揮名义，部队約有三个师。陈是我的老师，我在陸軍第三中学讀書时，陈教軍事地理，善于言詞，夸夸其談，有“牛皮大王”之称。我軍到达蕪湖后，他与我时相过从，感情很好。我們談到这次出兵的問題，他也表示反对，說：“孟瀟（唐生智的別号）何必把拳头伸出来把人家看，好好在武汉把自己的队伍培訓壮大起来不好嗎？”言下頗有关切之意。他还私下同我說过，“如果南京方面要打你們的时候，我把消息給你。”

我軍到了蕪湖，虽沒有再繼續前进，但对南京，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也就因此促成了譚、程和李、白暫时的結合。大約在我們到达蕪湖两个多月以后，陈調元果然告訴我說：“南京方面决定要来打你們了。”并說：“正面我是不会打你們的，你們只要对宣城方面注意。”就在这时，陈調元带着队伍先我离开了蕪湖。

东征軍敗退武汉和唐生智下野

唐生智本来早就指示过我們：如果南京對我們发动进攻，我們就撤退。唐原先臥为蔣、桂軍隊，經過龙潭战役之后，損失甚大，一时补充不及，臥为胜算在握；初未料到譚延闓等人与桂系联合，共同对唐。唐得到譚等与桂系联合“西征”的消息以后，感到自己只有三个軍，武汉、安庆、蕪湖各摆一个軍，成了一条长蛇陣，力量分散，不利作战；然而既已把拳头伸出去了，又不愿自动收回来，只有等到对方真要向我們进攻时，再作撤退之計。我自得到南京方

當要向我軍進攻的消息后，立即按照原計劃，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當宣城灣沚方面的第六軍向我第三師攻擊時，我軍稍予抵抗，即行后撤。

我軍司令部退到蕪春時，葉開鑫的隊伍緊跟在我們的后面。我的司令部駐在城內，他們已追到距城二三里的地方。我認為這于我們的撤退極為不利，于是決心反攻，派第一師擔任攻擊，一經接觸，葉開鑫的部隊便垮了，我軍直冲到他的司令部，一直把他們趕到黃梅，我軍才收回來，繼續向武漢撤退。

這時，何鍵從廣濟來電話說，劉建緒（三十五軍的師長）和他斷了聯系，不知到哪里去了，要我替他打聽。按照原來的部署，劉建緒部本應在我軍的左翼；但一打聽，卻無踪影，我才發現我的左翼竟成了空白點。我把這情況，答复了何鍵。

我在蕪春時，連接唐生智來電，催我立刻趕到漢口去。我坐楚有軍艦駛往漢口，途中還接到唐最後一個電報說，如果在今晚不能趕到，恐怕在短期內不能見面。當楚有艦駛抵漢口時，已經夜了，我立刻趕到唐的公館，何鍵、李品仙已坐在那里。唐生智對我說：

“各方隊伍都要向我們進攻，我們不能對付，我只好暫時離開部隊到日本去，但這只是短時間的，不久我還要回來的。至于今后的問題，由你們三個人（指何鍵、李品仙和我）負責商量進行，暫時撤回湖南去，把湖南搞好。”正在談話的時候，張國威走了進來，報告他對軍隊布置的情況，沒有說多少話，唐生智就叫他退出了，我們又繼續討論。這時，李品仙因為張國威的進來，觸發了他對張國威平時不大聽指揮的不滿情緒，他痛哭流涕地要求和唐同走，說他指揮不動自己的部隊。唐早就知道張國威的不聽指揮；尤其使唐憤怒的是張國威接到程潛委他為第八軍軍長名義，隱瞞不向唐報告，以為張國威有意反他；加之何鍵緊接着李品仙的話后，從旁插嘴

說：“我們的部隊向來很好，部隊不聽指揮那還行嗎？”（何鍵與張國威向來不和）這無異是火上澆油。唐聽了之後，馬上叫副官陳復初去把張請來。陳復初把張國威從旅館里找來了，唐立即下命令將張槍斃。於是就在唐公館隔壁的一棟房子里，用繩子把張國威勒斃了。

大約到十一點鐘的時候，唐就乘日本輪船走了，同去的有張翼鵬、晏助甫等人。

接受桂系的改編

我們在漢口停留了一些時候，商量今後怎麼辦的問題，也就是政治方面如何與桂系聯繫，軍事方面如何撤退和防守的問題。我建議政治方面由何鍵、李品仙兩人負責；軍事方面由我負責。因為何鍵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活動能力很強；李品仙是廣西人，由他出面與桂系聯繫，是比較適宜的。這時，何鍵表面上雖仍與我們敷衍，但暗地里另有陰謀，正在單獨行動。在撤退中，他就散布謠言，說三十六軍要解決三十五軍。我到漢口後，才聽到這些謠言，曾向他解釋過，並暗示我已略悉他的一些陰謀活動。至是，使我回想到，何鍵在廣濟打電話給我，詢問劉建緒軍的行踪，以及後來經過一個小市鎮時（忘記地名），我問市民，此地過了軍隊沒有？市民說，前天晚上，三十五軍的隊伍從這裡過去了。我才知道劉建緒已先我部兩天退走。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我便了解何鍵是為了保全實力，所以決心獨立行動，所有散布三十六軍要解決三十五軍的謠言以及電話詢問劉建緒師的行踪等等都是煙幕彈。後來，他的隊伍由漢口一直開到湘西的常德、沅陵，與我們脫離，並且一路搶先撤退，避免與敵人接觸。當我們準備在金井作戰時，請他派軍協助，也被他拒絕，始則說他不出部隊來，最後雖然答應派何宜一個師，却始終

沒有派來。這些都進一步証實了何鍵採取單獨行動的陰謀。

我與何鍵雖然同事很久，但對他的政治活動並不了解，只是他那種強烈的向上爬的政治慾望，我是看得清楚的。還在北伐軍隊占領武漢時，他就想當湖北省政府主席，卻不知怎的，唐生智不惟沒有給他當主席，連省府委員也沒有給他，我和李品仙卻都當了委員，這不免使何鍵感到難堪。後來給他當安徽省主席，是否為了安慰他，這就只有唐生智知道了。當我們撤退到長沙時，曹伯聞兩次要我提議何鍵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次他對我說，“湖南省政府要改組，只有芸樵（何鍵別號）才搞得好的，只要你提出，就沒有問題。”第二次是在聯合辦公處的碰頭會上，曹拉着我到欄杆邊（樓上）說：

“湖南省府改組，推芸樵來搞的問題，還是請你提一提，只要你說一句話，就可以通過。”我都拒絕了。我說：“我們回到湖南是作客，不好干涉省政，況且正在作戰的時候，結果尚不知道，在這時候改組省府，似乎不适宜。”以後曹就沒有再說了。

在從安慶撤退的途中，何鍵就已派人分途向李宗仁、白崇禧和譚延闓、程潛等接頭。他除了希望保全實力外，還想趁此機會，再向上爬。何鍵的這些野心，我是了解的，儘管那時我不詳知他的那些陰謀活動。後來，他的部隊不惟完全保留下來了，而且還擴大了，他本人當了湖南清鄉會辦，旋又當了第四路軍總指揮和湖南省政府主席。

在漢口時，我們與桂系的聯系工作毫無頭緒，遂即決定撤回湖南。我把軍隊開到羊樓司布防。當時，湖南系周燭代理主席，李品仙、何鍵和我都集中在長沙，我們四個人組織一個聯合辦公處，每周開會兩次。會議的內容，大都是彼此交換情況而已。

我軍撤退到湖南以後，敵人還是節節進逼，我們只好把戰綫縮短，撤至平、瀏、金井之綫與敵作戰。和我軍首先接觸的是李抱冰

的部队，接触时间不久，我軍就撤退了，我独立第一旅旅长周荣光牺牲了（該旅系第四集团軍总司令部直轄部队，撤退时归我指揮）。

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們放弃了长沙，經潭宝公路向激浦撤退。敌人到达长沙后，即行停止前进，随即发表了鲁滌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何鍵为清乡会办。

我軍过邵阳时，軍需告急，我想湘西乃弹丸之地，驟然集結到几万軍队，粮餉問題如何解决，目前就已发生困难，今后的問題，将更为严重。我为了暂时救急，派人向家里筹集現款两万元，挑来邵阳；但杯水車薪，无济于事。

当时陈汉章約有千余人众，駐在洪江，称霸湘西，第十七軍（該軍系我們撤退到长沙时，将罗霖、魏銀凡、王錫濤三个师合編而成，軍长为周燦）政訓处主任陈浴新与之有旧誼。陈以电话与陈汉章联系，陈汉章對我們退駐湘西表示欢迎。后来，他亲自来到激浦，与李品仙、周燦会晤，并帶現款二十万元，送作犒劳我軍之用。这是我离开部队以后的事情。

在激浦約两个多月，桂系一面和我們談判，一面又向我軍的师、团长个别勾引，企图从下面来拆我們的台。可是我軍的师团长团結得很好，无有一人为所动摇。桂系的阴谋，既不得逞，于是在談判时，李、白认为我是唐生智的死党，唐的基本队伍掌握在我的手里，因而要我离开部队，并送我两万元，作为出洋路費。我考虑，如果我不离开，李、白决不放心，問題就会弄僵；問題真的弄僵了，就只有再打。我們是否能再打呢？何鍵的队伍早已分开駐在常德、沅陵一带，并且已与敌方暗中勾搭，决不会和我們共同作战，在激浦的只有我的一个軍是完整的；李品仙、周燦的部队，也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处（如第八軍吳尚一师在安化，李云杰一师在湘乡，原张国成一师在湘西；第十七軍罗霖一师在零陵，魏銀凡一师在邵阳，王

第一師在湘鄉)，一時很難集中，因此再打已不可能。拖嗎？困難更多。我再三考慮，為了保全部隊，只得同意離開。正在這時，蔣介石派劉文島秘密來到激浦，要我們不要接受桂系的改編，暫在湘西和四川邊界拖着，經濟方面，由他接濟，等他起來後，再行調動。可是，他來遲了一步，我們已同桂系談判好了。

我既同意離開部隊，我的職務交誰接替呢？我的參謀長晏道剛托人向我說，要我交給他。我考慮：他來我軍不久，關係不深，恐怕不易掌握部隊；第一師師長廖磊，在部隊里的歷史久，作戰沉着勇敢，又系廣西人，由廖接替軍長，較為適宜。因此，決定以廖磊調升軍長，所遺師長一缺，以該師團長顏仁毅調升。安排妥當後，召集師、團長會議，告以我要離開的原因和勸勵他們今後應該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最後還說了我不久仍舊要回來的話。桂系送給我作路費的兩萬元，我只拿了四百元，其餘的都留作軍用。

我離開部隊，大概是三月間，正当桃花盛開的時候。劉文島和我同行。我經由邵陽，回到祁陽家裡，住了幾天，再經漢口去到上海。一直到次年（即一九二九年）三月，李、白垮台，我去開平，果真又回到了自己的隊伍。

白崇禧的率軍北上與奔軍脫逃

一九二八年初夏，白崇禧以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領原唐生智部的第八軍、第三十六軍兩軍和叶琪的第十二軍（原屬第三十五軍何鍵的一個師，經白改編為一個軍，叶系廣西人），由漢口乘車北上，号称第二次北伐。第三十六軍車抵正定時，奉到改編命令，遂即停止前進。三十六軍被改為五十三師，軍以下的師改為旅，其餘人事編制均無變更。我前在激浦離開部隊時，已以第一師師長廖磊調升三十六軍軍長，軍改為師後，仍以廖磊任師長，原師

长顏仁毅、凌兆堯、張節仍分任旅長。至第八軍，則被改為五十一師，師長仍以原軍長李品仙擔任，桂系並給予李品仙以第十二路軍總指揮名義，指揮第五十一、五十三兩個師。五十一師的旅長，分別由魏鎮凡、蔣春湖、羅啓疆擔任。軍隊到達北平後，因當時直系軍閥張宗昌尚盤踞在冀東唐山、開平、滦河之綫，人槍約六萬餘眾。我軍由通縣、三河、玉田、豐潤向張宗昌部壓迫，張軍撤至滦河以東、山海關以西地區。我軍第五十一師遂進駐唐山，五十三師進駐開平、古冶一帶。當時，白崇禧帶來的部隊尚有陳輔之一旅和安俊才的一個騎兵旅，魏益三的一軍也歸他指揮。

白崇禧此次北來，桂系的野心是很大的。李宗仁繼唐生智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設司令部於漢口；廣西老巢交由黃旭初看守（黃任廣西主席）。自廣西經武漢至北平，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一條長蛇陣勢。李宗仁率領胡宗鐸、陶鈞兩個軍，坐鎮武漢，虎視長江下游，大有吞噬南京之勢。這是桂系的全盛時期。

白崇禧來到北平後，利用行營主任吳忠信為人忠厚，企圖操縱華北軍政。白初欲拉攏閻錫山，但閻以平、津均系他的地盤（當時河北省主席商震，即是閻的嫡系），認為白的北來，侵奪了他的地盤，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桂、閻之間的矛盾既無法克服，關係也始終拉不攏來。至是白崇禧感到勢單力孤，久居客位（因無地盤），實非長計，乃異想天開，自請率軍開發西北，一面在報紙上大事宣傳，一面拉攏在北平的回教徒為他捧場。他認為到西北去，大有發展前途，因為他自己是回教徒，西北的回教徒當然都會擁護他，他可以在西北養精蓄銳，待機而動，利用西北這個新根據地通過鄂西，沿漢水順流而下，仍可与武漢連成一氣，挾西北囊括西南，保持浩大的聲勢。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盤。但西北是馮玉祥的地盤，馮豈能容白進去；同時，蔣介石也不願意白去西北，擴大勢

新收編的唐生智的部隊沒有把握，從而怕在北平站不住腳，遂潛往開平，住在廖磊的寓所（廖系廣西人，白待之甚厚，引為心腹，廖亦對他忠誠）。據廖部譯電員楊仲愚告知李俊，白在開平十餘日，經常通霄達旦不睡，在房裡踱來踱去，各方來的電報很多，他閱過後，隨即在電文上作出批復，立交拍發，因此，譯電人員也不得睡眠。廖磊為了照顧白的健康，每晚由廖的老婆親自蒸制人參或高麗參一碗，送給白吃。白在開平，原計劃要五十一、五十三兩師，經由徐州，直趨浦口，而以武漢胡宗鐸，陶鈞的兩部順長江東下直取南京；但五十一、五十三兩師官兵，大部分都是湖南人，又都是唐生智的舊部，他們原來就認為被桂系收編是一種恥辱，都盼望唐生智能回來。這時，紛傳桂系將要垮台，唐生智真的將要回到隊伍，個個都暗自歡喜，跃跃欲试。五十三師旅長凌兆堯掌握了這一思想情況，早與駐在唐山的閻錫山的一個旅長（忘記其姓名，與凌系舊交）取得聯繫，如有動作，請他援助。至是，凌認為時機成熟，除命部隊暗自採取戒備外，即在洼里集合全旅官兵，於紀念周上公開宣布反對桂系，並張貼“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總司令東山再起”等標語，甚至把這些標語貼在開赴天津、北平的火車箱上。這樣一來，白崇禧非常恐慌，害怕走不出去，即日秘密化裝，由廖磊親自護送至塘沽，搭乘輪船赴日本，轉回廣西老巢。時在一九二九年三月。

解決張宗昌的部隊

白崇禧的北來，若說做了什麼事情，唯一的就解決了張宗昌的

張學良對白崇禧的這番話，感到十分不滿。他認為白崇禧的這番話，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也是對他的軍隊的侮辱。

張學良的軍隊，在山海关沿長城一綫，防其向關外竄擾。張學良為了根本解決張宗昌這個禍國殃民的蠹賊，與白崇禧聯系，決定分由桂、張雙方東西兩面夾擊，同時發動。於是，五十三師移向滦河西岸靠牆，布置在鐵路線的左邊。迨到發動攻擊之次晨，我軍隱約聽到東方傳來的槍聲，正待配合進行攻擊時，忽然接到白崇禧自北平來電話，令我軍不要進攻，即時后撤，并布置一部于古冶、開平、胥各庄三個車站兩旁埋伏。五十一師一部，則埋伏于唐山車站兩旁。原來白崇禧又在玩弄聰明，貪取便宜，企圖毫不費力地坐待俘獲張軍。張宗昌的部隊本無斗志，經過張學良部的猛烈攻擊后，全部潰散，大部分被張學良部繳械，一部分向熱河逃竄，被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收編；另一部分約一萬餘人槍，被白崇禧派人謊稱收編，用十二列列車裝運，由滦河車站開出，沿古冶、開平、胥各庄、唐山四個車站各停靠三列列車。拂曉，原先埋伏在各個車站兩旁的我軍部隊，同時發動，向天開槍，迫使他們繳械。張部在車上無法展開，只好繳械；但也有少數不服的還槍射擊。五十三師二十七旅團長彭光燾在古冶車站指揮，想制止車上開槍，當他走到站台上，揚手示意時，即被亂槍擊斃。這是在繳械過程中，我方唯一犧牲的一人。繳獲的槍械中，發現有很多的步槍的機柄，迫擊炮的零件，被張的士兵丟掉了。繳械后的士兵，均開至天津遣散。所謂第二次北伐，至此便告結束。在這一戰役中，張學良對白崇禧之臨陣取巧，深表不滿，從此兩人交惡。原先張學良所許送給白崇禧指揮的軍隊過冬用的皮背心二十萬件，因此也就不送了。

唐生智的再起和第五路軍的成立

当蒋介石企图解决桂系时，对于处置在北平的白崇禧作了如下的布置：先派何成濬前去北平，接替吳忠信的行营主任职务；又派刘文島与从日本归来、寓居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請唐去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揮的軍隊；但又顾虑唐离开部队已久，怕有变化，要唐先进入部队然后再給予名义。这时，五十三师參謀长周武彝借着以軍隊代表出席国民党三全代会去到南京的机会，向蔣翰誠。但周的主要目的是找唐生智，告以軍隊的最近情况的。周在新乡車上遇着邵力子先生，即託他先向蔣报告，周即逕赴上海与唐生智会晤。唐正在希望了解部队里面的情况，見着周武彝后，遂决定即日动身。搭乘由日本开来上海、轉赴塘沽的輪船去天津。事有湊巧，白崇禧也正是由塘沽搭乘这条回头的輪船，一个上船，一个下船，只是沒有正面碰头。周武彝到南京会見蒋介石时，表示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全体官兵对蔣竭誠拥护，并轉达他們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去指揮的愿望。

当白崇禧尚逗留在开平的时候，蒋介石非常着急，要刘文島催促唐生智速去。盖蔣希望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桂系，生怕白仍潜匿在部队中，发生变化，所以催唐速去，抓住部队，免为白所利用。在唐順利地进入部队，得到何成濬电告后，蔣才放心，随即发表唐为第五路軍总指揮。

唐生智从塘沽下船后，在天津住了几天。五十一、五十三两师的旅、团长，有的亲自来津欢迎，有的自己不能来，則派了代表来，如苏民、李俊都是当时派来迎唐的代表。唐生智同欢迎的人們前往唐山，住魏鎮凡旅部。廖磊求見唐一面，唐拒不見他。廖对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說：“我是始終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沒有再动一个

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别号），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廖就在这时脱离了五十三师。

我本来可与唐生智同行，因唐要我与蒋联系，所以迟到几天。我在沪时，估计我们虽然离开部队已一年多，但根据过去的历史和平时的联系，我和唐两人进入部队，是有把握的。五十三师原系三十六军改编，人事上除少数军官有些调迁外，其余很少变动。廖磊原系我的师长，这时已经离开。我到达北平后，随即接任五十三师师长，仍驻开平。唐生智则设总指挥部于北平顺承王府。

阻击馮玉祥軍

一九二九年夏，馮玉祥反蒋的活动已很显著。蒋命令第五路军开赴河南，予以防堵。于是第五路军全部由唐山、开平开拔，搭乘火车至兖州，下车步行，经济宁至商邱，又复搭车至郑州。五十三师即驻郑州，五十一师驻洛阳西工，五路军总指挥部亦由北平移驻郑州，但唐生智本人早已去南京。

在郑、洛一带，整训了几个月。约在十月间，馮玉祥的反蒋步伐着着加紧，部队大部分开出潼关。我军的防线布置在偃师、登封之线。蒋介石另派有力鼎英、何成濬、楊杰三个军布置在南阳方面，防止馮军进入鄂西，威胁武汉。最初与馮军接触的是徐庭瑤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和魏益三的部队，接触不多的时间，就被馮军打垮了。先是，唐生智离开部队，回到南京后，蒋介石不放他回部队。这时，我们接电请蒋介石令唐回来主持作战，差不多每隔一天发一个电报。这样，蒋才放唐回到郑州。我军也就马上参加登封之线作战。担任正面作战的是五十一师的部队，五十三师作为

第一关帝庙里，随后就开打了。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实际上不是三昼夜），几經激烈的冲击，馮軍不支，紛紛向洛阳方面潰退。

对馮战事刚一結束，蔣介石即来到前方，在郑州車站与唐生智会面，見面就与唐擁抱，表示特別亲热，并推許备至；同时，下了一个最恳切的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都归唐生智指揮。我还記得手令里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的：孟瀟有軍事天才，我不及他，你們都要听他的指揮；听他的指揮，就等于听我的指揮一样。其余的話，我記不清了。蔣介石的这种做法，无非是表示对唐的信任，使唐为他所用。蔣在郑州車站，停留几个钟头，对在前方的軍隊，重新作过部署后，当日即回南京去了。

唐生智再度反蔣的失敗

对馮玉祥作战剛結束，大約是十二月，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反蔣，企图进攻南京。唐生智即在郑州通电反蔣。在发动前的几天，召集我和五十一师师长龔浩等几个人开会，宣布反蔣的問題。我还記得他在会上說过这两句話：“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当时，龔浩表示反对，认为唐前在武汉已一度反蔣失敗，这次被蔣起用，还不到一年，尤其在对馮作战后，蔣对唐更为重視，可說只要唐向蔣要求什么，蔣就給以什么，在这时候，不宜反蔣，只能借着蔣的力量来壮大自己。这个意見，沒有被唐接受。随后，龔浩看到唐反蔣的意志既已坚决，又劝唐快干，速战速决，又沒有被唐采纳，还碰了一个大釘子，唐指着地图对龔生气地說：“你不看路程好远嗎？”龔从此态度消极，有时穿上长袍，表示不愿干的意思。然龔随唐很久，关系密切，至此亦无可如何。

伊联系……，事先都表示附和……，早已成熟。当石友三在浦口反蒋的炮声一响，唐就生怕被人抢了先，便迫不及待地也行动起来了。

在准备发动反蒋的时候，唐即恢复了老第八军的名称，以我任军长，仍兼五十三师师长，辖五十一、五十三两个师。

先是，唐生智在发动反蒋之前，原与閻錫山、刘文輝、何鍵等都有联系，并与閻錫山商妥，通电由閻領銜；閻派来延国符为联络员，并准备送唐军费五十万元，已开好支票向银行兑付；及看到通电領銜的是唐生智，而不是閻，馬上又把支票收回去了。唐为什么临时变卦呢？不用閻的名字領銜呢？我至今还不了解。

唐的通电上列名的有二十多人。唐满以为只要一个通电，蒋介石就会下台，通电发出以后，坐候各方反应；詎料原被唐在通电上列名的人，多持观望态度。当蒋介石分电各列名人詢問时，他们竟纷纷否认其事。楊虎城本来是反蒋的，又归唐指挥，唐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后来，楊也背弃了唐，并向唐进攻，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

唐处此情况之下，通电既已发出，只得硬着头皮干，把军队由驻马店向确山方面推进。在确山正面的敌人，是陈誠的十一师和夏斗寅的部队。我们首先和夏斗寅的部队接触。我方的布置是派潘少武团绕过确山背后，魏镇凡师直冲十一师司令部。当魏镇凡师快要打到确山时，他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休息一天，因此就誤了时间，潘团也就没有达成任务。正在这时，駐在南阳的楊虎城部队向我方驻马店袭击，我駐在驻马店的仅有军司令部的少数人员，当发现楊的部队由南阳向驻马店移动时，还认为楊是我们的友军，不

疑有他，并无抵抗，楊軍遂不战而占领了駐馬店。楊軍进入市区后，到处搜搶，所有軍司令部人員的行李都被搶光，有的身上穿着的羊毛繩子衣也被強迫脫下，仅仅是沒有杀人而已。

我从前方抽調陈敦和团回头向駐馬店反攻。因为我們后方在漯河，而駐馬店正在我們的中腰，被楊这一冲断，使我們的前后方失掉了联系，这是不能不力爭的。当陈团正在反攻的那个晚上，原来留存車站的滿装彈药的車箱被士兵在車上烤火取暖失慎爆炸了，炮彈的爆炸声，通宵达旦，沒有停止，市民非常恐慌。楊軍終因陈团攻击猛烈不支退出，我軍遂又收复駐馬店。

此时，天忽降雪，寒冷异常。雪下得极大，有些地方，厚及于腰。据当地农民說，这是近二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雪。下雪地方在黃河以南，信阳以北，正是我們作战的地区。敌我士兵在前綫，都把穿的棉大衣翻轉来（因为里面是白布做的），用来作为保护色。我軍原已感到首尾受敌，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加上这样的天气，更使我們感到再也打不下去了。

正当我軍处在极度困难的时候，蔣介石来电，要我們开鄂西待命，旋又来电，要我們开武穴。我忖度，开鄂西比較有退路，若开武穴，就沒有退路了，难道要我們到武穴去繳械嗎？与其到武穴去繳械，何如在这里繳。加之陈誠派来代表，硬要我們就地繳械，我把蔣的电报給他們看，他們也不理会。我对他們說：“你們要繳械也可以，我們把机柄取下再繳給你們。”他們不接受。我又說：“你們既不愿意脫下机柄，但必須打收条。”他們同意了。我們就把槍捆好，一捆一捆地交給他們了。

先是唐生智通电反蔣，并把軍队向确山推进时，武汉空虛，人心恐慌，各机关人員都把东西搬上輪船，准备向南京撤退。夏斗寅几次来电催我軍速去，唐迟迟不动，迨蔣把軍队調齐，我們就失

掉了时机。徐源泉一万余人从鄂北赶到，楊虎城从南阳向我們的腰际袭击，至是势遂不支，終成敗局。唐生智化装坐土車至开封，轉搭火車到天津，隨行的有张苟波和郑州中央銀行行长两人。我于交涉繳械妥当后，才离开部队。其时，李品仙奉閻錫山的使命，由上海到北平，派代表郭錚專車来漯河，收編我們的部队，可是来时已晚，我們已繳械了。我和龔浩、晏助甫、周武彝一同搭車去北平。

唐生智自一九二九年三月間在唐山再起，至本年十二月在郑州通电反蔣，仅十个月時間，便告失敗。我和唐从此也就脫離了自己长期經營的部队。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唐 生 智

编者按：我们把刘兴遗稿《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送请唐生智副主席审阅，唐副主席表示：刘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出他自己的回忆录是可以的。你们如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可以就记忆所及告诉你们。我们就刘兴遗稿提出几个问题，唐副主席分别作了答复。下面是唐副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后经过他亲自审阅，同意发表。

（一）北伐以前，第四师在衡阳办了一个军官讲习所，由我兼任所长，周斓兼教育长。这个军官讲习所在衡阳只办了一期，后来并入了设在长沙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在衡阳时，广州的黄埔军校和我联系好，只要是我保送去的知识青年，可以免试入校受训。因此，陆续送去了好几十人，一般都是青年学生。我的弟弟唐生明，当时在旧制中学还未毕业，也被送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

（二）第四师在湘南缴获了宋鹤庚、汤子模两部的枪械，这是部队扩充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第四师在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之前，名义上是一个师，实有人枪在五万以上。这五万多支枪的来源，少部分是在作战中缴获过来的，大部分是通过马济的关系，秘密地从汉阳兵工厂陆续买来的。马济是陆荣廷的亲信将领（陆荣廷当过他父亲的部下，他的兄弟马鸾，是陆的女婿），和赵恒惕的关系密切，跟吴佩孚也常来往。他每次去长沙、洛阳，路过衡

阳时，和我見面的机会多，我們的交誼也不錯。他去洛阳見吳佩孚，路过武汉，我就托他向汉阳兵工厂代买一些槍支，秘密运回来。时日既久，数目就可觀了。当时，叶开鑫是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湘西是烏金之地，有大宗特稅收入，經濟充裕；我是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湘南地区比較貧瘠，又沒有特稅收入，經濟十分困难。我們买槍的經費，一是部队极端节省开支，把結余下来的錢用之于买槍支；二是水口山的矿砂蘊藏丰富，由湘南善后督办署派人經營开采（担任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的，先是宾步程，后为邓寿荃），卖出矿砂的收入，仅以小部分解省，大部分截留下来，作为买槍費用。当时，汉阳兵工厂是由吳佩孚所控制的。赵恒惕要我到洛阳去，我为了买槍的方便和馬济的慫恿，曾到洛阳見過吳佩孚。他把我待为上宾，留在家里吃飯，同看軍隊出操，并且对我大講其《易經》。他問我研究过《易經》沒有，我說很少研究，小时候看过一下，早已忘記了。吳在談話中非常狂妄自大，謾罵孙中山为人很下賤。

（三）一九二六年春天，赵恒惕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謂禱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并邀集各师旅长来长沙参加法会。我因与赵发生了意見，怕吃眼前亏，沒有应邀参加。在这前后，赵恒惕會假在长沙召开財政會議的名义，邀我来长与会，我对赵早有戒心，怕他借故为难，也托詞沒有来长参加。

（四）一九二六年三月赵恒惕被迫出走后，我在长沙捕杀了张雄興等人。当时实际的情况是：赵恒惕統治湖南时期，湘軍由最初的一个师逐渐扩充到四师（第一师师长賀耀組，第二师师长刘鏞，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党，利用葛豪（岳州人）与吳佩孚联系得很好，他是极力主张吳、赵合作的；賀耀組的态度搖摆，刘鏞对赵也不高兴。驅赵以后，各人的

打算不同，如刘鏞想拥唐嶽（号桀严，邵阳人。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曾任赵政府財政司长）复任財政司长；刘鏞的秘书长萧汝霖（号培猷），是一个吸鴉片烟、阴谋詭計多端的人，也有他个人的打算；叶开鑫看到大势已去，把第三师留在长沙的一部分军队撤往岳州，依附吳佩孚。另一部刘重威旅留駐洪江、武岡、邵阳，准备待机夹攻衡阳。三月十五日，我从衡阳到了长沙，即电邀賀耀組、刘鏞、刘重威等旅长以上軍官来省，共商善后事宜。賀耀組和我是湖南陸軍小学、湖北陸軍中学的同学，彼此关系还好。我首先找他商量，希望他和我合作共事，大家在一起把湖南的事情搞好。并且告訴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战争即将举行，广东方面我已派人秘密接头，他們內定我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长，他是第九軍軍长（后因賀游移未受，改派彭汉章担任。北伐軍进攻岳州时，賀部才受編为独立第二师，由原来的防地湘西轉入九江）。只等北伐軍进入湖南，就可以发表新命。賀当时說：“我的队伍实力薄弱，既缺乏子弹，又没有錢。”我說：“子弹沒有問題，我还有百把万发存在衡阳，可以送三分之一給你。錢現在沒有，我向中国銀行、交通銀行借了三十万元，也可以分一半給你。”（后来分了三四十万发子弹和十五万元鈔票給賀耀組）賀問：“他們（指刘鏞、張雄輿等人）怎么办？”我說：“如果他們听話，希望一起来搞。”賀又問：“他們不听話怎么办呢？”我反問他：“你看应该怎么办？”他犹豫未答，我接着說：“到了那个时候，我們不干掉他們，恐怕他們也会收拾我們。”賀說：“还是想办法拉攏他們的好。”我表示再商量。經過两天的酝酿，还是没有办法“合作”，只好采取最后的一着了。于是，就在三月二十五日，以召开軍事會議为名，當場扣押了第二师师长刘鏞、秘书长萧汝霖、旅长唐希朴，第三师參謀长張雄輿、旅长刘重威等人；派賀耀組兼任湘西善后督办。

张雄輿过去和我在保定軍官学校同学，他是被扣諸人中最頑固的一个。张到长沙后，劝我不要跟国民党走，他认为只有跟吳佩孚走才是出路。他对我說：“我們不跟赵炎午走是可以的，一定要跟吳子玉走。”甚至在他被扣押到衡阳以后，还想跟叶开鑫去依附吳佩孚，其頑固的程度可以想見了。当时，叶开鑫称病請假，派张雄輿代理师长职务，部队大部分駐扎在湘西洪江一带。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人，张則有謀多計，为赵恒惕所器重。刘重威也是一样，能猛打乱冲。我考慮到，如果把他們放出去，将来出师北伐，又会多一些麻煩曲折，拖延一些时日。因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令处决张雄輿、刘重威、萧汝霖三人（刘鏞和唐希朴两人，在关押一个短时期以后释放了）。这是当时的局势使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个人之間的私仇私恨。在尔虞我詐的旧社会里，統治階級內部彼此勾心斗角，各有打算，有些事情作长官的是不能跟所有的部下說的（如何鍵、李品仙、叶琪三人，就互不信任，各有意見）。刘兴当时不大了解情况，事后我也沒有和他詳談过这件事。因此，他只能就某些表相来猜度张雄輿等被捕杀的原因。我現在談的这些，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由衡阳到长沙接任代理省长后不久，吳佩孚調遣部队，增防鄂南，准备对湖南用兵。并派譚道南到长沙，要我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討赤”，或者率部回駐湘南，并讓叶开鑫部回到湘西原来的防地，恢复赵恒惕被迫出走以前的状态。譚是长沙人，和葛豪、叶开鑫都有交情，綽号“譚棉花”。他到长沙以后，由省政府招待住在天乐居旅社。我們見面多次，总是談不攏来。最后，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訴他：“我們湖南人生就的硬脾气，要干就干。历史上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完的，人生在世，只能作好一件事。我生平不会虛伪待人，也决不欺騙人，既已答应了广东方面，就决不会去跟吳子玉走。”

‘討赤’不干，回湘南也可以，‘省宪’恢复不恢复，待广东北伐军来了再说吧。”譚道南还要为吳辯解，我就干脆地说：“吳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至此，談判完全破裂，已无回旋余地，譚道南扫兴而去，吳佩孚再也没有派人来和我談了。

（五）自从一九二二年初劳工会領袖黃爱、庞人銓被赵恒惕惨杀以后，湖南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越发高涨起来。工会組織日益加多，罢工风潮此起彼伏。赵恒惕非常恐惧，害怕工会发动群众来斗争他。当时，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組織。一九二四年春国共合作以前，湖南不但沒有国民党的公开組織，暗中活动也很少。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在湖南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組織。夏曦、郭亮等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負責人，我和他們会见过（水口山工运蓬勃开展后，有一次把宾步程抓来游街，我托人向夏、郭疏通，才把宾释放了。否則，宾不止游街了事）。李維汉当时是中共湖南省委的負責人，易礼容在省农民协会工作，我也会见过他們。我指定邓寿荃、邓介松两人和他們密切联系。他們帮助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希望我們早日参加国民革命的行列。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間，我和广东方面已有了初步联系。一九二六年春，国民政府方面派白崇禧、陈銘枢来长沙和我联系参加北伐的問題（陈和我曾在湖北陆军中学和保定軍官学校第一期同学），他們在郴州、衡阳、长沙等地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也派了馮天柱、周鰲山先后去广州聯絡（周曾往返多次），互通声气。在湘粤之間往返奔走过，还有后来担任北伐軍前敌总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的刘文島，他也是我在湖北陆军中学的同学。其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經內定我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揮。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出走。吳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討賊联軍”湘軍总司令，利用

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軍監視其后。我到长沙后，即派人去广东，催促他們赶快出师北伐，广东方面最初答复說起碼要等一年。后来再去催促，說半年或三四个月以后可以出动，如北軍全力来攻，为了保全实力，可以先撤出长沙等地，讓他們来。国民政府給我的任命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同时送来了軍費十萬毫洋。六月二日，我在衡阳宣布就国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揮新职。六月下旬，两广北伐軍陸續到达湖南。首先到达的是第四軍独立团叶挺的部队，其后是第四軍第十师陈銘枢部、第十一师张发奎部，和第一軍教导师王柏龄部。第七軍和第三軍也都是經過衡阳、株洲进入江西的。北伐軍入湘后，第八軍开始分路反攻，于七月十二日占領长沙。一九二六年冬，前敌总指揮部撤消，成立第四集团軍，由我担任总司令。原第八軍先后扩編为五个軍：第八軍軍长李品仙，第三十五軍軍长何鍵，第三十六軍軍长刘兴，第十二軍軍长叶琪，第十七軍軍长周斓。

(六) 刘兴遺稿中提到一九二七年秋的“东征”討蔣(介石)，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曾劝我暫緩东征。我还記得，刘兴当时是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見的，这个意見有它一方面的理由。但是，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已經按照汪精卫的意图开到广东，我早已答应了他共同反蔣的，不能自食其言。更重要的因素是，汪精卫当时极力主张倒蔣，我和张发奎都是拥汪的，自应采取一致的行动。无容諱言，我当时对汪精卫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能說会講，过去刺过摄政王，有一段光荣历史。我到什么时候才看破这个人呢？直到一九三二年蔣汪合流，他当了行政院长，我才看破他是一个沒有骨头的东西，过去刺摄政王也好，倒蔣也好，都是为他个人，自私自利到极点，我再也不愿意跟他搞了。至于抗战初期汪精卫当上了国民党的副总裁，又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就大家都看破了他：岂仅沒有骨头，丧心

病狂，認賊作父，連一點民族氣節也沒有了。

(七) 一九二七年“東征”討蔣失敗後，我離開武漢東渡赴日休養，臨行前下令處決了第八軍第一師師長張國威。這件事外間傳說紛紜，實際情況是這樣的：這年八月下旬，寧漢雙方舉行廬山會議，決定分共及寧漢合流。汪精衛當時沒有去南京，他在上海打了一個密電給我，說廬山會議決定寧漢合作，第二步將對付我，希望我早作準備。我派葉琪往南京找白崇禧談談，了解一下情況。他回來說，譚延闓、程潛主張先攻武漢，程與張國威、何鍵有聯繫，請注意。當時得到這個消息後，有人主張把他們一起搞掉，我回答說：“不要把隊伍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過急，先找他們來問問再說。”在離開武漢的那天晚上（十一月十一日），我把李品仙、何鍵、劉興等人找來談話，張國威也來了。我只把這個問題提一提，何鍵就吓得發抖。我說了大家今後要搞好團結才有辦法等等一大套話，隨後就離開了會議的地方，並下令把張國威處決了，而沒有處分何鍵。從當時情況看，張、何之受程潛收買，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是小同鄉，又有些舊關係。

至於當時我為什麼要離開武漢去日本呢？原先我以為譚延闓等都是湖南人，縱然不幫忙，至少不至於與我為難，那曉得他們會和桂系搞在一起來對付我呢？他們到廬山開會期間，黃郛同蔣百里來漢口見我。黃要會我，蔣百里先告訴我他的來意，我然後會見了他。黃郛來幹什麼呢？據蔣百里說：“黃白（黃郛別號）的主張，也就是蔣先生（蔣介石）同樣的主張。現在是你和蔣、桂系、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的勢力最大，蔣與桂系之間已有意見，黃白主張你和蔣、張合作，而以你與蔣先生的合作為中心，再拉攏閻、馮，這樣，桂系也不敢動了。”蔣百里強調我和蔣介石合作的重要性，並說：“你們可以拜把啊！”我表示不同意，因為我根本對蔣無好感，

不愿和他合作。

廬山會議以後，譚延闓等都到南京去了，蔣介石“退隱”奉化，快要到日本去。這時，他要陳公俠（陳儀）和蔣百里說，要我和他合作，莫離開部隊。能打垮桂系則打，否則按兵不動，退回湖南，經濟上由他負責接濟。這個消息是蔣百里通過汪翊唐（時璟）轉告我的。汪翊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是漢口一個商業銀行的經理。過去我在常德當旅長時，王天培（黔軍袁祖銘部旅長）送了我幾十担鴉片煙，寄存在漢口。北伐勝利後，我就以這幾十担鴉片煙的款在漢口辦了一個商業銀行（股金總額為五十萬元，預備以賺來的錢作政治活動的資本）。汪翊唐在日本學過經濟，他就是由蔣百里介紹來擔任經理的。

汪翊唐把蔣百里的意見轉告了我，我當時考慮到：蔣桂終久是要發生衝突的。如果這時候我不走，跟蔣介石合作，桂系也可能会變的，他們也可能跟蔣介石合作，這對我並無好處。同時又想到，這麼多軍隊如果回到湖南去，供應方面大成問題（過去湖南軍費不足，還要靠湖北、安徽等省的稅收接濟）。再則桂系與蔣是迟早要決裂的，如果我不離開部隊，他們可能合起來打我；我離開了部隊，目標就沒有了。因此，我決定離開一下。總而言之，當時估計蔣桂之間一定會發生衝突，我如不離開部隊，縱然打垮了桂系，占便宜的是蔣介石；桂系把我打垮了，最後占便宜的還是蔣介石。暫時離開一下部隊，料想擺兩三年還不會出問題，這並不是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也不是有什麼特殊組織，而是估計凭私人感情的維系，可以拖住兩三年不垮。

我當時既經決心離開部隊，對於爾後的安排也擬了一個方案，並且在武昌到岳陽沿路駐有重兵，便于撤退。而不是象劉興遺稿中所說的我是那麼匆促地離開部隊的。當時的布置是這樣的：我自己

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以王德光（湘乡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一团摆在零陵，周荣光、罗霖两个团一起摆在洪江，刘兴的部队驻扎在衡阳、邵阳、新化一带。此外，我把湖北樵运局长周老四（周澜之弟，名字记不起了）找来，问他局里有多少现款，他说：“大概有八十多万元。”我故意追问：“一定不止此数，究竟有多少？”他说：

“顶多不超过一百万元。”于是我对他说：“这些钱我一个也不要，你全部交给刘军长（刘兴）作军费，由他支配使用。”樵运局长在当时是个肥缺，我的兄弟想干，我不答应，说要找个得力的人。我想找周鳌山来，他在湖南有工作，不答应来。刘兴和周澜是亲家，他在我面前力荐周老四，我也就迁就了一点。谁知周老四真不可靠，他并没有把这笔钱交给刘兴，自己在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花光了。后来我在香港会见刘兴，问及部队到湖南后的情况，才知道这笔钱全部给周老四私吞了。

我离开武汉后，西征军在中山公园里立了一块碑，骂我是军阀，又给我戴上红帽子。这块碑许多朋友都看到过，一直到抗战期间才去掉的。

（八）一九二九年秋，第五路军在河南对冯玉祥作战。当我军在巩县以西的黑石渡桥（黄河小支流）附近与冯军接触后，蒋介石到过郑州一次，同来的有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其时，归我节制参加讨冯的部队，还有郝梦龄师。我到前线指挥作战，就住在郝梦龄的师部（驻关帝庙）。蒋到郑州后，打电话到关帝庙找我接谈。他在电话中说要坐火车到巩县来。我请他等一天，因为今晚将有一个拂晓攻击，如果获胜，即到郑州相见。这次攻击得手后，我到了郑州见了蒋介石，就住在他的专车上（专车停在隍海花园里）。我们见面后，谈了许多话。蒋大概知道我和阎锡山有来往，故意对我说：

“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

閻錫山、馮玉祥陰險萬分，你無論如何搞他不過的。”他又對我說：

“這次戰事結束後，楊杰的第十軍以及徐源泉、楊虎城、蔣鼎文的部隊，都撥歸你指揮，請你坐鎮西安。漢卿（張學良號）是東北邊防軍事長官，將來你就擔任西北邊防軍事長官，負起建設西北的責任。”我不以為然地說：“建設西北嘛！我看起碼是三十年後的事。”蔣看到我不想去西北，便轉口說：“如果不去西北，我們重新訓練軍隊，德國顧問已找來了（其時，蔣已開始走法西斯道路，請來的德國總顧問，首先是塞克特將軍，其後是法根浩森將軍，此人後被希特勒迫令回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過駐比荷總督），就請你負起這個責任。”我未置可否，他接着說：“你希望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有機會到外國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和蔣介石的這次談話，龔浩知道一部分內容。後來醞釀再度反蔣時，龔表示反對，他說我要求什麼，蔣就給什麼。這話不是無因的。老實說，我幾次反蔣，總不相信他會把國家大事搞好，覺得他自私得厲害，沒有一點為人民為國家打算的念頭。只要自己想怎麼作，就什麼事都可以作出來的。

（九）一九二九年冬討馮戰事結束後，有一次，我在鄭州接到蔣介石的一個密電，大意是：據報韓復榘不穩，他到鄭州來會你時，希予以扣留。所遺河南省主席一職，由你兼代。當時，我正在醞釀再度反蔣，不打算執行他這個密令。蔣的密電到後不久，又派俞飛鵬來鄭州，送給我一部分彈藥和軍費。隨後，韓復榘也由開封來到鄭州。他帶了兩個衛士到隴海花園里我住的專車上來見我。衛士留在車外，韓單獨上車和我相見。寒暄幾句後，我對韓說：“石友三已經動起來啦，你對他怎麼樣？”（其時，石友三已經在浦口發動反蔣）他答：“我有什麼辦法呢？”於是我把蔣介石的密電遞給他看，他接過一看，臉色陡變，恐懼萬分，雙膝跪在我面前，哀求地說：“請總司令救命！”我邊扶他起來邊說：“你怕什麼！我如果要為難你，又怎麼

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呢。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韩这时才转忧为喜，感激地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俞飞鵬还在郑州未走，韩建议我把俞扣起来，我说：“这没有必要，何必打草惊蛇。”并嘱咐他赶快回开封去。听说韩回到开封不久，蒋介石就派人携带巨款（大约是几十百把万元）去收买了他。以后我在郑州宣布反蒋时，韩就不再跟着来了。我现在想起，戴笠那时虽然还没有搞起军统特务组织，却已在郑州做工作，我放走了韩复榘，很可能就是他向蒋介石告密的。说起来我们那时候反蒋也真幼稚，如第五路军成立后，我用了蒋鋤欧做铁甲车司令，谁知他就在铁甲车上秘密架设了无线电台，和蒋介石通风报信（后来知道，蒋鋤欧这样作，是林蔚文布置的）。

（十）刘兴的遗稿说：“杨虎城本来是反蒋的，又归唐指挥，唐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后来，杨也背弃了唐，并向唐进攻，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杨虎城的部队袭击我驻马店前进指挥所，这是意外的事。记得在战事将告结束时，杨部旅长冯钦哉曾来见我，请示机宜。我对他抚慰一番，并把郑州兵站存留的一部分弹药送给了他（当时，杨是想依靠蒋介石回陕西的）。

刘兴遗稿又说：“唐生智通电反蒋，并把军队向确山推进时，武汉空虚，……夏斗寅几次来电催我军速去，唐迟迟不动”。实际情况是：不是我迟迟不动，坐失时机，而是当时天降大雪，驻马店、漯河一带地方积雪两三尺多深（据农民说，这是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一场大雪），气候严寒，部队无法行动。这是天时不利，也是人谋不臧。

記大本营陸軍講武學校

湯季楠

(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盤踞廣東多年的陳炯明率部退往惠州，通電下野，滇桂各軍蜂擁入廣州。隨後，許崇智統領的粵軍，也離閩返粵。孫中山先生於二月十五日由上海啟程南下，二十一日由香港重入廣州，就任大元帥。三月二日，大元帥大本營宣告成立。當時，雖有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大元帥府設於廣州，實際上它的勢力幾乎限於廣州一隅。如在東江一帶，為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等所盤踞，南路為鄧本殷、申葆藩等所佔領，這些都是彰明昭著的敵人。在大元帥旗幟之下的，有楊希閔的滇軍、劉震寰的桂軍、譚延闓的湘軍、朱培德的滇軍、許崇智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樊鍾秀的豫軍、路孝忱的山陝軍、李明揚的贛軍等部隊。其中以楊希閔、劉震寰兩部實力最為雄厚，他們表面上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指揮，實際上是各籍一方，為所欲為。

在廣東的各派系軍隊，各有其培訓干部的機構，如滇軍有干部學校、粵軍有西江講武堂，其他各軍也有隨營學校、軍官講習所之類的組織。而作為最高統帥部的大元帥大本營，卻並沒有訓練軍事干部的学校。孫中山先生回到廣東不久，即籌劃北伐大計，以圖打倒軍閥，統一全國。由於革命形勢的迫切需要，大本營在一九二三年

年冬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军官学校，实际负责筹备工作的是大本营军政部。程潜时任军政部长，他对于建校工作极为重视，精心筹划，方得建成。

这个军事学校的正式名称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地点在广州北较场广东陆军医院旧址。除校本部利用陆军医院原有房屋办公外，食堂、课堂、寝室、浴室等都是利用棕叶、竹条临时搭盖的，虽很简陋，却还经济适用。由于这个学校是归大本营军政部主办，一般人又称为军政部讲武堂。

大本营讲武学校设校长一人，由军政部长程潜兼任。张振武、胡兆鹏任副校长，但他们仅随程潜来过学校一两次，实际并未到校供职。校长之下设监督一人，调军政部军需局长周贇虹充任（周系江西南昌人，出身江西陆军讲武堂，后留日习政治经济。一九一八年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北伐军克复南昌后，历任江西省警务处长、南昌市政厅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代建设厅长）。襄助监督，实际担任教育责任的是教育长李明灏（醴陵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武汉分校及二分校主任，九十七军军长。现任湖北省副省长）。讲武学校校本部设秘书室及教务组、总务组、军需组（兼管军械）、医务组，分别掌管有关业务。

在没有成立讲武学校之前，军政部就成立了教导团军士连，共两个连，由程宣、余贇立分任一、二两连连长。程宣是程潜的姪子，字博权，韶州讲武堂毕业，后任攻鄂军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即攻鄂军总部卫队营）营长，一九二五年六月随军讨伐杨希閔，在花县太和墟良田阵亡。我初到广东时，就在军士连第一连当学兵，同在一连当学兵的，还有桂永清、邓文仪。军士连原先驻扎在广州观音山下军械局旧址，后来迁到黄埔岛上鱼雷学校旧址；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时，又逼着迁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冬，講武學校醞釀開辦時，軍政部即派柳漱風等到湖南秘密招生，在長沙就錄取了青年學生一百多人。因為人數不夠，又在廣州以軍士連為基礎擴大招生。在廣州直接招收的學生，大部分是投奔廣東尋找革命機會的知識青年，也有一部分是湘軍、滇軍中的下級軍官和軍士，他們的年齡一般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其中以中學生居多數，有的讀過幾年老書，有的僅有高小程度。從學生的籍貫看，雖然學校辦在廣東，而湖南人占絕大多數，兩廣籍次之。

第一期新生四百多人，入校後編為四個隊：第一、二兩隊學科并重，以大教程（戰術、筑城、兵器、地形、交通）為主，規定學習時間一年；第三、四兩隊注重術科，以小教程（典範令）為主，學習期間六個月。隊職幹部和軍事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軍事學識都有一定的基礎。我現在能夠記得的隊職幹部有：第一隊中校隊長廖士翹（號卓如，江西修水人，日本士官學校步科畢業，後任國民黨江西省保安處長），第二隊中校隊長章鴻春（江蘇人，日本士官學校騎科畢業，後任國民黨騎兵學校校長），第三隊少校隊長程宣，第四隊少校隊長余賢立（平江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區隊長林柏森（廣東梅縣人，保定軍官學校工科畢業，後任國民黨工兵學校校長）、惠濟（後任國民黨安徽省保安處長）、承鈞天、夏其玉、黃必強、段唐華、何紹發、杜建威、任匡、黃雄、李榮等；軍事教官有王尹西（江西人，後任國民黨江西省民政廳長）、彭公威（江西人，後任朱培德部參謀長）、王俊（廣東人，後任國民黨步兵學校校長）、李國良（長沙人，後任國民黨輜重兵監、輜重兵學校校長）、傅良弼（江西人，後任國民黨九江市長）、張克俠（後任國民黨集團軍副總司令、綏靖區副司令官）、陳克球、張傲松、王戎等，他們都是保定軍官學校步科或特科畢業的；政治教官王祺（衡

阳人，后任国民党立法委员）、李隆建（醴陵人，后任国民党湖南省财政厅长）、王恒（江西人，号吉贞，北伐时任第六军秘书长）。上述队职干部和军事教官，有的是从军政部抽调去的，有些江西人是周贇虹带去的，也有少数人是李明灏由湖南讲武堂带去的。

一九二四年春，讲武学校第一期补行开学典礼，程潜亲临主持。全校四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新发的草绿色卡其布军服，头戴无边军帽（当时在广州的军阀部队官兵，一般戴宽边军帽，外面人讥笑我们“朽得帽子没有边”），精神十分抖擞，军容整齐严肃。程潜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这天戎装佩刀到校，讲话时的心情很激动，讲到沉痛处，不时以军刀顿地，鏗鏘有声，给同学们的印象很深刻。

讲武学校初开办时，经费是非常困窘的。当时，在广东的粤、滇、桂系军阀，各据一定的防区，包赌包娼包烟，把持财政税收，致使中山先生在经济方面一筹莫展，拮据万分。程潜为了全力办好这个学校，把军政部职员伙食费也节约出一部分，移作学校的经费；有时还变卖家里的金银首饰，维持学生的伙食。在如此困窘的经济境况下，学生的生活待遇还是相当好的。如每人发了单棉灰布军服，发军毯两床、白被单一床、雨衣一件，又发了一套草绿色卡其布军服和呢绑腿、皮鞋，作为外出服；吃的伙食是八人一桌，每桌两大钵，常有鲮鱼、鳙鱼等海味吃。湖南籍学生初到广东，水土不服，许多人生了脚气病，学校特地准备了花生米煮蚕豆，餐餐都有，让学生随意添食，对医治脚气病很有疗效。此外，每月还发给生活津贴，虽然为数不多，也足够零用花销。

应该指出的是，讲武学校能够开办起来，并且连续办了几期，卓著成效，是和孙中山先生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而廖仲恺则在物力和财力上作了积极的支持。一九二四年的夏天，孙中山先生亲临讲武学校校阅，看到学生在炎天暑热中举行的战斗演习，非常满意。

他在訓話中特別嘉許，並鼓勵學生發揮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革命軍人精神，擔當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神聖任務。我記得這天中山先生穿的白卡其布中山服，着白麂皮鞋，戴白帆布拿破崙帽，態度十分慈祥，陪同他來北較場校閱的有廖仲愷和大本營的高級將領。廖仲愷當時是大本營的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他對講武學校非常關心，曾多次到學校來巡視。有一次看到學生在操場操練，步伐整齊，而裝備很差，第二天便撥來了毫洋一千元，和一批嶄新的干糧袋、水壺等裝備。講武學校的經費，也是廖仲愷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辛苦籌措的。

廖仲愷和程潛受孫中山先生的影響下，苦心孤詣地創辦講武學校。與此相反的是，蔣介石對講武學校十分嫉妬、百般阻撓。據說一九二三年冬黃埔軍校醞釀成立時，最初的建校規劃，就是程潛擬定的，他原先準備在此開辦講武學校，擬有一套完整的計劃。關於黃埔軍校校長人選，中山先生原決定由程潛兼任，而以蔣介石為副校長。當時，程潛的資望在蔣介石之上，以軍政部長而兼任軍校校長，自然是名正言順的。但是蔣介石利慾薰心，患得患失，一氣跑到上海，表示消極。因此，孫中山先生才改派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程潛為黃埔軍校的校務委員之一。

(二)

講武學校的教育內容，包括軍事課程和政治課程，而以軍事課程為主。前面談到，第一期一、二兩隊學科並重，以五大教程為主，三、四兩隊注重術科，以小教程為主。由於軍事教官都是舊的軍事學校出身，學的是一套舊的軍事知識，教的也是這一套。他們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講解也很透徹。黃埔軍校初成立時，有人到講武學校活動這些教官去黃埔教課，除王俊一人應聘前往外，王尹

酒、李国良、彭公威、傅良弼等人都婉詞却謝了。

在术科教育实施方面，各级队长对于术科内容都是熟手，对学生反复讲解示范，教练极为热心。那时每个学生都发有广东石井兵工厂新造的七九步枪，并配发子弹五十发。除了操场教练之外，还经常举行野外演习，演习的项目包括营连排班长诸动作。野外演习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黄花崗、瘦狗岭等处。在酷热的阳光下，全副武装，跑步往返，大家感到很振奋。記得李明灝在一次讲话中对我们说过：“现在一般人說我們的学校好，为什么好呢？說大家黑得好。”（意指在操场野外苦学苦练的时间多。）

队上官长对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但他们不是以革命的办法来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而是搬来了旧军队的一套旧作风。当时，队长和区队长都是拖刀的，遇到学生在操场野外有违反纪律的事，就不由分說地用刀背砍。拳打脚踢也是常有的事，罰跑步、罰跪罰站打手板，更是家常便飯。特别是第二队区队长黄必强的脾气很坏，对学生动辄拳打脚踢，同学们都很怕他。輪到他担任总值日官时，不遵守纪律的就特別少。

讲武学校的政治课程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教官的油印讲义发了一大叠，照本宣科地念起来，同学们都不乐意听，打瞌睡的很多。这固然是由于讲授者不得法，术科分量太重也是原因之一。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到校外去听名人講演。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大学講演《三民主义》时，我們全体同学都整队前往听讲。此外，还到广东大学听过廖仲愷的講演，他說的是一口广东官話，讲话内容有的是关于国内形势和广东财政情况的分析。

无可諱言，当时讲武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是远远落在黄埔军校之后的。如黄埔军校一般学生的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

革命运动簡史等等，講武学校仅有三民主义一門課程；黃埔軍校設有政治部，由周恩來具体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并有許多共产党员（如譚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担任政治教官，講武学校沒有政治部，担任政治教官的，又是几个封建思想相当浓厚的国民党人。虽然如此，講武学校的学生还是在斗争中受到鍛炼。当时，广东虽是革命根据地，有孙中山先生坐鎮，但軍閥环伺，秩序并不巩固（广州市面时常发生搶案）。特别是滇桂軍閥楊希閔、刘震寰勾結英帝国主义与云南軍閥唐繼堯，阴谋推翻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形势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虽然学校周围是深沟高垒，我們仍时刻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严防軍閥部队前来劫槍。

广州商团，是在香港英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豪紳地主的反动武装組織，以香港英商汇丰銀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領。他們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的軍事援助，处心积虑要顛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群众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竟遭到商团的屠杀，死伤甚众。屠杀之后，商团全体出发，威胁商民罢市。面对这一严重的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心鎮压商团反革命事件，以巩固革命政权。十月十四日开始軍事行动前，原准备派遣講武学校学生前往广州西关，配合湘軍、福軍等部队，进剿商团反革命武装，后因考慮到西关附近有一座桥，街道上又建有鉄木柵子，商团可以依据頑抗，而講武学校的学生又缺乏战斗經驗，才改派担任观音山地区的警戒任务，以防商团突围窜扰。这次平定商团叛乱，我們虽沒有参加实际的战斗，但也受到了教訓，从而更加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心。

这次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是講武学校第一期一、二两队学生。在这以前，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由广州进驻韶关，

指揮北伐軍隊，程潛任攻鄂軍總司令，隨節出征。講武學校第三、四隊學生，奉命參加北伐，于十月初開往韶關。抵韶關後，短時期擔任過大元帥行轅的警衛任務（當時孫中山先生住在韶關鐵路局）。十月十日，舉行畢業典禮，孫中山先生親臨主持，頒發畢業證書，並獎給優秀畢業生指揮刀各一把。畢業後，全體分發到攻鄂軍總部衛隊營（程宣任營長。後擴充為攻鄂軍第三旅第二團，余韶任團長）見習，擔任下級軍官及軍需、副官、書記等職務。

第三、四兩隊開往韶關後，留在校里的僅有一、二兩隊的兩百多個學生。先是，黃埔軍校于一九二四年六月開學，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按照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和作戰經驗來培養革命幹部，成為當時革命根據地唯一的新型軍事學校。講武學校第一隊學生鄧文儀、桂永清、李漢藩、張際春（醴陵人，已病故）等，先後開小差跑到黃埔軍校去了，在第一期入伍受訓。黃埔軍校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作風民主，生氣蓬勃，給同學們的印象很深。而講武學校對學生的訓練管理，仍然是搬用舊軍隊的一套舊作風，動輒打罵，不講道理。兩相比較，同學們更加產生嚴重的抵觸思想。這時，程潛到韶關去了，學校經費困難，給養無着，同學們越發不安心。大家找監督周貫虹交涉，他也沒有滿意的答復。於是，推舉學生陳明仁、李默庵、袁朴、謝任難等為代表，到黃埔軍校去見蔣介石，要求到黃埔軍校受訓。蔣介石接見了他們，表示可以接受，並派人找周貫虹商洽。周內心並不同意，但為形勢所逼，又無可奈何。不久，黃埔軍校派人來接收學生，大家攜帶行李，整隊集合。周貫虹眼見學校就要散伙，不禁痛哭流涕，我們也幾乎都哭起來。當時，由於有些人在廣州有親友關係，有的找到了工作機會，實際到達黃埔軍校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人。到達黃埔後，編入第一期肄業，屬第六隊，由童錫昆擔任隊長（原來的隊上官長都沒有來）。他對我們說：“你們的學術

科成績都很好，只是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到这里以后要加把劲！”

这次編入黃埔軍校的一百四十六个学生，后来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分化：有的繼續坚持革命，成了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如左权（醴陵人，八路軍副參謀长）、陈赓（湘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蔡申熙（醴陵人，后改名蔡成西，曾任工农紅軍軍团长，长征途中牺牲）、袁策夷（长沙人，后改名袁仲賢，解放后任我国駐印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陈启科、李光韶、张际春等，都在人民革命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大部分人則走上了反革命道路，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忠实奴才，如李鉄軍（集团軍总司令）、李文（集团軍总司令）、丁德隆（集团軍总司令）、刘戡（集团軍总司令）、陈大庆（集团軍总司令）、张鎮（宪兵司令）、刘嘉树（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被俘）、李默庵（綏靖区司令官）、袁朴（軍长）、张际鵬（軍长）、陈烈（軍长）、刘詠尧（軍委会政治部厅长）、萧贊育（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委）等，都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支柱。也有一部分同学，是在解放战争中投向人民的，如一九四九年八月，陈明仁随程潜长沙宣布起义。这次率领部队跟随程、陈两將軍起义的軍师旅长中，有不少人是出身于誦武学校各期的。前教育长李明灝也于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由解放区秘密来到长沙，凭借旧日师生关系，展开联络活动。可以这样說，誦武学校的师生，在这次起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

誦武学校一共办了三期。第一期的情况，已如上述。

第二期的开学，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这时，攻鄂軍駐扎韶关馬坝，学校設于距馬坝十五里地的南华寺（我国著名的佛寺之一）。并改名为“攻鄂軍誦武学校”，仍由程潜兼任校长，李明灝（时任攻

易維 尤 有

輝；軍事教官有林伯森、傅良弼、廖士翹等。北伐期間，在廣州大約上了兩個月課。一九二五年春，攻鄂軍回師廣州，學校亦隨軍迂回，以原大本營旧址廣州河南士敏土廠為校址。程潛、林伯渠（攻鄂軍政治部主任）和俄顧問鮑羅廷曾多次到校講話。鮑羅廷講話時，由張太雷擔任翻譯（張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兼任講武學校的政治教官）。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鮑羅廷來校講話。他剛上講台說了几句，忽然有人來報告廖仲愷遇刺的消息，便匆匆地離去了。這可以想見他對於战友的犧牲是何等的關切。

同年秋天，二次東征戰事爆發，攻鄂軍擔任左縱隊（即第三隊，程潛任總指揮），由廣州出發，向博羅、惠州前進。第二期學生奉程總指揮之命，隨軍出發，參加東征。這次編為兩個隊：一、宣傳隊，由攻鄂軍政治部秘書唐卜年率領，跟隨政治部行動，擔任戰地宣傳鼓動工作；二、督戰隊，由講武學校大隊附蕭昌烈、彭子國率領，隨司令部行動，負責巡察戰地軍風紀。十一月底，東征勝利結束，攻鄂軍從福建永定回師廣東，駐屯梅縣休整。這時，宣傳隊和督戰隊都宣告撤消，隨征學生仍回廣州本校繼續受訓；李明灝另調軍職，由李國良繼任教育長。同年冬，攻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二期學生結業，全部分發到第六軍各部擔任下級軍官佐。第二期學生在校期間，經共產黨員王備介紹，都加入了青年軍人聯合會。

第二期學生沒有轉入黃埔軍校。抗日戰爭前不久，由於劉詠堯

二队为第二期，第一队和第三队为第三期。第一队上校队长文道平，区队长欧阳元、唐金元、叶謨（第二队的队上官长记不起来了）。当时，学校的经济情况更加困难，学生的被服装备一期不如一期，穿的是由部队换下来的破旧军服，连洗脸盆也须自备。同年冬，攻鄂军番号取消后，学校随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仍由程潜兼任校长，李国良任教育长。这时，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非常活跃，影响日益扩大，第三期学生也全部填表申请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在这以前，有许多进步学生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也就在一九二五年冬，根据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军事政治教育的决定，黄埔军校由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正式宣布），其他各军事学校一律撤消，以团结革命力量，统一军事教育。这时，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已经结业分发，在校的第三期学生，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军官团和军官预备团的各九人，特科和政治科四五十人。没有考取的学生，中途辍学，走投无路，曾因此引起一场风波，个别学生竟企图跳河自尽。后来重新再考，大部分编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

一九二六年春，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讲武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告结束。

本文中关于第一期第三、四队的材料，是张际泰同志提供的；第二期的材料，是唐菊庵同志提供的；第三期的材料，是文于一同志提供的。特此致谢。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由于自己休衰多病，记忆模糊，一定还有不少疏漏错误的地方，希望得到旧日同学和熟悉当时史实者的指正。

（本文出自《炎黄春秋》）（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编者注：本稿写成后，曾邀集有关人士进行座谈，补充和订正了一些资料。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作者和王德高、文于一、李拔夫、唐金元、唐菊庵、滕毓道、张际泰、彭子国、程邦昌、熊昌烈、谢任难等先生。

据作者回忆，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大陆方面曾派出一批干部到台湾，其中有一批是湖南人，他们到台湾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一些关于大陆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湖南的情况。

据作者回忆，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大陆方面曾派出一批干部到台湾，其中有一批是湖南人，他们到台湾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一些关于大陆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湖南的情况。

据作者回忆，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大陆方面曾派出一批干部到台湾，其中有一批是湖南人，他们到台湾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一些关于大陆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湖南的情况。

广州政治讲习班始末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根据有关来稿综合整理

(一)

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是一九二五年冬在当时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成立的。那时正是酝酿大革命的前夜。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完成了党的改组工作。国民党的这次改组，在政治上确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政纲，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军事上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整编了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割据称雄不听号令的杨（希閔）、刘（震寰）军阀，讨伐了称兵作乱的陈炯明等，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迅速地获得了巩固，促成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全国人民一致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无数革命青年不远千里投奔到这里来，寻找献身革命的机会；如何组织和培养到广州的数以千万计的革命青年，使之在各个革命战线上发挥各自的力量，成为当时的革命当局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黄埔军官学校，就是适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而创立的，它最初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至于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成立，除了具有上述原因外，还有它特殊的因素。

自从国民政府作出整編国民革命軍，統一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决定后，由譚延闓統率的湘軍各部队，奉命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該軍由譚延闓兼軍长（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員，国民政府委員会常务委員），軍务由副軍长魯滌平代理，李富春同志为軍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轄第四、五、六三个师和一个教导师（第四师师长张輝瓚，第五师师长譚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教导师师长陈嘉祐）。湘軍整編后，有一部分軍官被編余，需要給予适当的安置和培养，于是譚延闓建議开办政治講習班，以便将这批編余人員集中訓練。但因譚的这一建議与当时国民政府統一軍事政治教育的決議不相符合，遂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主办，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講習班”，并指定“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領導講習班的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湘籍高級領導人員所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它在受托主持講習班以后，即推定譚延闓、程潜、張敬堯、魯滌平和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毛澤

講習班籌辦期間，全國各地來廣州的青年，絡繹不絕，因而擴大招生範圍，在廣州就地招收一批進步青年到政治講習班學習，主要為第二軍培訓政治工作幹部。一九二六年春間，政治講習班正式開學以後，又增收了第二軍的編余人員五十名，他們都是經過該軍政治部考試錄取的。至此，全班學員人數將近四百名。此外，還有幾十名旁聽人員（他們大都是國民政府各部的湘籍職員。楊開慧烈士當時也是旁聽者之一）。學員和旁聽人員中各有幾位女性。學員的年齡從十八九歲到四十七八歲不等，而以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居大多數。在全部學員中，湖南籍占十分之九以上。據統計，畢業學員三百八十二人，其中湖南三百五十人，江西九人，湖北七人，江蘇三人，廣東、浙江、四川各二人，安徽、福建、陝西、河南、直隸、貴州、內蒙古各一人。從學員的政治條件來看，大多數人的家庭成份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也不少。由於大家來自各个方面，本身的階級成份、社會經歷和政治認識各不相同，因而在政治上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人受過嚴格的黨義訓練，對共產黨有較深刻的認識，對國民革命有極大的熱誠，他們是真正革命的青年。另一部分人，雖然也受過黨義訓練，但對共產黨認識不深，對國民革命的熱誠也不夠，他們是所謂「半革命」的青年。還有一部分人，雖然也受過黨義訓練，但對共產黨認識不深，對國民革命的熱誠也不夠，他們是所謂「半革命」的青年。還有一部分人，雖然也受過黨義訓練，但對共產黨認識不深，對國民革命的熱誠也不夠，他們是所謂「半革命」的青年。

在政治講習班學習期間，學員們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表現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不同。一部分人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是國民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國民革命的動力。另一部分人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是國民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國民革命的動力。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是國民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國民革命的動力。

政治講習班在廣州期間，學員們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表現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不同。

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擔任大隊長。大隊下轄四個中隊，由鍾健魂、唐非吾、唐慕堯等擔任隊長。上述大隊長和隊長，都是從黃埔軍校或其他軍事單位抽調來的。中隊以下的區隊，不設專職的區隊長，而由學員中民主推選，協助隊長進行軍訓和處理有關生活方面的問題。當時學員都穿軍服，每人發給步槍一支，作為軍事操練之用，惟不發子彈；生活按士兵待遇，除供給制服和伙食外，還按月發給零用錢。

政治講習班的班址，設在廣州惠愛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這裡是廣東省議會舊址，國民政府海軍局也在此辦公，講習班的一部分宿舍，就在海軍局的樓下。並在中央黨部的空坪里臨時搭蓋了一些簡陋而高爽的竹棚，作為教室、宿舍之用。

由於政治講習班是國民黨中央黨部領導的，帶有國民黨黨校的性質，學員當然都是國民黨員，一律參加國民黨的組織生活。當時按宿舍編成若干小組，全班共編為一個區分部，隸屬於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第四區黨部。並為使學員熟悉黨務工作，便於結業以後從事黨務活動，在班里組成了一個假定的“省黨部”，下轄縣黨部三、區黨部九、區分部二十七。各級黨部都按規定設有執委、監委、部長或干事等等。這些人員都由學員中通過民主方式選出，使大家都有實習黨務工作的機會。

政治講習班是國共合作時期的產物，學員中跨黨的為數不少。但一般沒有公開身份，誰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大家並不知道。由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秘密考選去的學員，有許多人在班里被目為共產黨員，實際上他們中間大部分的人，是國民黨的左派，入班學習之前正式加入共產黨或共青團組織的只是少數人。不過凡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一般學習認真，在群眾中起着核心和骨幹作用。但也由於原來班里成分的複雜，各個人的思想認識，當然不可能達到

完全的一致，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表现出来。

在第二阶段学习期间，班里发生过一次驱逐大队长的风潮，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发展已达到了顶峰。刘楚杰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曾企图以管理部队的要求来管理学员，引起了同学们的反感。某次偶尔说话不慎，激起大部分同学的不满，一时全班哗然，秩序极为混乱。并且谣言纷起，有的说闹事的学员将受刑事处分，有的说讲习班会被解散，弄得许多人惶惶不安。后来还是毛主席力持镇静，把这次事件作为改进教学管理的一个教训，结果没有处分一个学员，仅将刘楚杰调走了事。同时撤消大队的建制，不设专职的队长，改设管理员两人，由钟健魂、唐慕尧担任；又就同学中具有军事学识基础的，选为队长，区队长。

(二)

政治讲习班的教学内容，包括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而以政治主课为程。军事训练的目的，不过是让学员们具备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它在全部教学内容中，占的比重很小。学员虽然实行军事编队，穿着军服，发有枪支，但除每日必须进行晨操一个半小时外，军事制式训练是隔日举行一次的，要求并不严格，野外演习也很少举行，军事学科更没有专职教官，仅由队长或请外人来讲讲典范令而已。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等大教程，虽然有时也请人讲讲，但很不深透，仅是一些基础知识。至于后来有的同学（如张子清、段德昌等）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工农红军杰出的军事人才，那完全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政治讲习班的政治课程，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灵活安排的。其中主要的课程有：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北方政治状况、

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各国革命史、俄国新经济政策、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合作社概论、经济地理、地方行政、广东农民运动实际状况、广州市财政状况，等等。这些课程中，以毛主席讲授的农民运动和萧楚女讲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占的比重最大，也最受学员欢迎。政治课的学习方式是：教员讲授后，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或者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学员们在讨论和座谈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时常争辩得非常热烈。

当时，由于有毛主席和李富春同志在班里起核心领导作用，应聘来班担任教学的共产党人，有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熊锐、高语罕等，分任各门政治课程的讲授。他们都是当时在群众中极有声望的革命人物，因此，讲课时特别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毛主席当时负责领导宣传工作，并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址在番禺县政府旧址，第六期有学员三百多人），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培养骨干。他在百忙中对于政治讲习班给予了高度的关怀，并且亲自担任主要课程——农民运动的讲授。这门课程的讲授时间，约计一百小时左右。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现阶段的农民运动，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天才的论断。他讲课时，不用现成的书本，讲授提纲是通过在湖南农村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写成的。由于他亲身参加了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在讲课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出发，密切联系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论讲到任何深奥的理论问题，总是用通俗简练的语言（有时在黑板上画成图表），进行分析论断，使学员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深刻的启示。毛主席讲课，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而形象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开展农民运动，首先要解决的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同时指出，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间路线是永远走不通的。毛主席提出的农村中的革命路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李富春同志当时在班里没有担任政治课程的讲授。但他实际主持班务，工作是很繁忙的。他对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在晚间集合学员讲话，勉励同学们锻炼好身手，坚定为革命而献身杀贼的决心。在学员毕业后编印的“同学录”上，他还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再三勉励毕业学员：第一要刻苦耐劳；第二要有献身杀贼的决心；第三要绝对服从纪律；第四要明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等等。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此外，担任其他政治课程教学的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张太雷；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恽代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朱剑帆；各国革命史——石醉六；俄国新经济政策——林祖烈；合作社概论、中国北方政治状况——于树德；经济地理——刘劲先；地方行政——姜济寰；广州市财政状况——陈其瑗。

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以外，讲习班还经常邀请名流学者来讲演。如郭沫若当时是广东大学的文学院长，就应邀来班讲过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他引经据典地谈到中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成为黄金时代的事情，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是学员在课外的主要精神食粮。

政治讲习班的学习期间，原来定为半年。后来因适应形势需要提前结业，实际学习期间还不足四个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并不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因为自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正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实施他的反革命阴谋，这些都不能不直

三月二十日的事变，广州实施特别戒严，并搜查了个别的住宅，捕去了不少的共产党人。政治讲习班的宿舍就在海軍局楼下，不会被蒋介石一伙人注意。事后了解，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被軍隊严密地包围，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显然可以看出，它也成为反动派准备攻击的目标。这次事变后的第二天，同学们才得到消息。接着連續几天沒有教員来上課，大家都預感到問題的严重性。

这样一种阴霾四伏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在政治讲习班内部发生重大影响。政治讲习班三百多人中間，成分十分复杂。当时的左派虽然居于压倒优势，象孙文主义学会一类右派团体，还不能在班里公开活动，然而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也必然促使班内反动分子的抬头。大队长刘楚杰被驅逐的事件，最能說明問題。刘自到政治讲习班担任大队长以来，虽然作风生硬，有时处理問題不从实际出发，有他的缺点。但他对工作認真負責，一心想把軍風紀整頓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仅仅因为偶尔出言不慎，竟至引起軒然大波，如果没有反动分子从中推波助澜，事情是不会演变到这个严重地步的。刘是一个在班里几乎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而在學員中居然有人提出把他赶出去，显然是一种公开的反共行为，反映了班内左右派的尖锐斗争。

一九二六年五月間，广州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滿楼之势。国民党召开中央常会期間，外間有种种傳說，會議結束发表公报，发布了五月十五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的議决案。这个議决案是以反共反人民为中心內容的，如提出要共产党交出黨員的名单，限制共产党员不能充任国民党的常委，不能充当組織部长，等等，都是直接对中共的进攻。在大局逆轉的情况下，政治讲习班學員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好些人表现出情緒极为苦悶。

(三)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軍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北伐的前夜，政治講習班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决定提前结业。学员结业后的工作分配，是分三步进行的。首先是由于湖南的唐生智已经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把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軍，并派代表坐在广州，接洽成立該軍的政治部和要求分配所需要的政治工作干部。因此，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便决定把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的学生，和政治講習班的适合到部队中工作的学员，集中起来，由总政治部組織特別訓練班，施以短期的訓練，再派往唐部工作。

政治講習班派往特別訓練班参加訓練的学员一百多名，系用考試的方法送去的。这次考試，由班主任李富春同志亲自主持，考試論文题为《北伐与反吳》。这个题目含有明显的策略意义，因为当时出兵北伐的策略口号是：“打倒吳佩孚，放弃張作霖，中立孙传芳”。这就是說：国民革命軍应集中主力，先打倒吳佩孚这个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以便将敌人各个击破。

其次，湖南地当南北要冲，是北伐軍出兵的必經之路。原由湖南省党部考送去的一百五十名学员，本来系代訓性质，議定毕业后回原地工作。現在湖南成为北伐的中心战場，急需发动群众和北伐軍密切配合，因而迭电毕业学员赶回湖南工作。但由于形势的发展，毕业学员不可能照原議处理，只好由毛主席就其中选派五十名回湖南工作。除了参加特別訓練班和派回湖南工作的以外，其余的同学，有的分配到第六軍政治部工作，有的随第二軍政治部到江西后，派往政府机关工作，大部分留在第二軍担任政治工作。

革命形势的急遽发展，对政治干部的大量需要，造成同学们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順利条件。由于当时从三闖队伍中分化出来参加到

国民革命軍的許多部队，都需要成立政治部和为数很多的政工人員，无法从新訓練，只好就已經分配給第八軍的學員临时抽調一批到其他部队中去。如四川的楊森部，湖南的賀耀組部，都分去了一部分人。后来，唐生智的第八軍迅速扩充，由一个軍扩編为一个集团軍，需人孔急，又难于仓卒培养出来，也只有就現有人員中，不次提升，以应急需。如胡鉄波（胡渾庵）到湖南省党部工作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第四集团軍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相当于副主任）；其他担任政治部中校科长、上校秘书以及团指导员等职务的，約占派去人員中的十之八九。

派往湖南做地方工作的五十名學員，从广州步行到达衡阳后，由湖南省党部負責同志夏曦、何叔衡、周以栗等組織临时訓練班，主要是系統地介紹湖南的情况，并研究今后工作上应注意的問題。不滿一月，北伐軍克复长沙，这批人随同来省，即由省党部組織部、农民部分发到各县担任党务、农运特派員，負責开辟工作。当时湖南的边远县份，就革命工作而言，完全是处女地，工作沒有基础，而这些地方的反动势力，却异常猖獗，对工作阻力很大。不过这批同学到了湖南，热情很高，接受任务后，一般都能不怕困难，积极工作，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一九二七年发生了“馬日事变”大屠杀，政治講習班参加湖南地方工作的同学遭受牺牲的很多，侥幸脫险的，只是少数。

这批同学在广州临出发前，毛主席曾約集談話，着重指出三点：一、在工作中要經得起困难的考驗；二、思想上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三、要注意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最后一批毕业同学出发时，毛主席并和他們进行个别談話，作了亲切的指示。但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高涨时期，大家都抱着盲目乐观情緒，对毛主席这一含意深远的指示，不能有較深刻的領会，以致后来遇到形势逆轉，反

革命发动突然袭击，处于完全没有戒备的状态，因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随同第二軍政治部到江西的学员，有的在省府各厅局担任秘书、科长，有的则派到各县充任县长。国共分家后，先后离开了江西，有的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大部分人以后过着流亡生活。

政治讲习班学员由部队和行政机关淘汰出来的，大部分人因原籍已陷入白色恐怖，不敢回家，又找不到出路，流落南京、上海一带的为数甚多。他们经过集议，成立政治讲习班同学会，筹措了一笔钱，把流落宁、沪的同学收容起来，举办登记。并由谭延闿嘱咐吕苾蓀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介绍到各省政府录用。在国民党官僚机构中，仅凭一纸公文，是很难解决问题的，结果不少人空劳往返，一无所得。除了南京的同学会以外，在长沙也设有同学分会，它的性质和南京的总会相同。

政治讲习班同学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派人进行拉拢，答应所有政治讲习班的学员，按黄埔军校第四期待遇，由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统一办理登记手续。蒋介石的这一收买手段，遭到同学会的拒绝。

在革命与反革命壁垒森严、斗争激烈的年代里，革命队伍的分化也是很激烈的。有些人即使主观上不肯作有害革命的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现实的变化，最后仍不免堕落为革命的对象。至于站在反革命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的，虽然为数不多，情况却很严重。例如，胡铁波在北伐期间，由于工作上一时的表现，从湖南省党部的一个干事，擢升为第四集团军政治部少将秘书。国共分家后，他不便留在武汉地方工作，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派在某工厂工作时，被捕进了江苏省感化院。后来释放出来，又因与复兴社骨干贺衷寒过去在湖南旅鄂中学同学的关系，参加了反

共反人民的活动，作了可恥的叛徒（解放后在益阳畏罪自杀）。吳廣恕在政治講習班毕业后，由于有第二軍參謀长彭新民的关照，很快就被提升为軍部交通处长。后来通过复兴社骨干邓文仪的关系，参加了特务組織，作下很多罪恶。象胡鉄波、吳廣恕这些敗类，政治講習班的全部學員中，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并不止于他們二三人。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一些小資产階級出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本来也是合乎規律的，不足为怪。

当然，政治講習班的學員，究竟是受过革命的政治教育，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多数人对革命起过有益的作用。其中也不乏对革命事业始終表現忠誠坚定的人；在革命斗争中視死如归，足以为人楷模的，也不在少数。除被派回湖南地方工作的数十名同学，大都于“馬日事变”前后遭到反动派的杀害，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以外，其未死的繼續从事斗争，有的还获得一定的成就。如张子清于“馬日事变”前夕調任平江县农民自卫軍队长。在“馬日事变”那样大的震蕩中，他掌握了农民武装力量，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随后参加秋收起义，担任过紅十一师师长，长期坚持湘赣边区的斗争，不幸于作战中牺牲了。又如段德昌从第四集团軍被清洗出来后，并没有失去信心，和陈协平、秦雨田等同学在南县、华容一带乡村，坚持游击战争，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創建。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頻繁围剿中，不断給反革命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国民党大小軍閥聞风丧胆。他們的模范行动，值得后死的人学习和怀念。

記留俄學生

何漢文

一九二六年，我由中國國民黨選送蘇聯留學，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於一九二七年冬被遣送回國。現在我將當時中山大學的設置及教學情況和一部分留俄學生歸國後投效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過及其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種種活動，加以追述。這裡，我先要附帶說明兩點，第一、所謂留俄學生主要是指十月革命後的留蘇學生，也包括個別帝俄時代的留學生，因為蔣政府反蘇，當時，一般都稱蘇聯為俄國，對留蘇學生也就稱為留俄學生，本文為了敘述方便，仍沿用舊稱——留俄學生。第二，留俄學生在蘇聯求學期間和回國以後，都是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一部分是在中國革命史上作出了許多重要貢獻的革命戰士、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另一部分是一些國民黨員、托派分子，他們充當國民黨反動派的爪牙，作了許多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本篇敘述的主要是後一部分留俄學生。

本文所述史事，雖然大都是我的親身經歷，但事隔多年，個人記憶難免有疏漏和錯誤之處，希望當年同學能給以補充和指正。

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立

帝俄時代，中國的留俄學生很少。十月革命後，北洋政府雖然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因為怕“赤化”，一直沒有派人去蘇聯留學。

* 本稿第六、七兩節內容，經編者作了刪節。

一九二〇年九月，苏联在巴庫举行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后，在莫斯科設立东方大学，招收近东，中东，远东各国革命青年赴苏留学（同时也有一些苏联学生在校专门研究东方民族革命問題），中国也陸續有革命青年秘密赴苏求学；但当时在北洋軍閥統治下，他們回国以后不敢公开打出留苏学生的招牌。

自从一九二一年春，苏联派遣亚力塞夫到广州設立罗斯脫通訊社，开办俄文学校；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发表联合宣言，决定“以俄为师”；接着改組中国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苏联派遣以鮑罗廷为首的顧問团来中国帮助中国革命以后，情形便改变了。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如胡汉民、蒋介石、于右任等先后奉派赴苏考察，同时正式赴苏留学的人也多起来了。当时在中国的許多苏联顧問，和俄国革命理論书籍都需要翻譯的人才，外交使領也需用一班新的人員，而过去国内連通曉俄文的人都很少。因此，在国民政府統治区内开班学习俄文一时成为风气。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培育革命干部人才，征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以紀念中山先生为名，于一九二五年夏，在莫斯科設立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普通称为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同年十月，正式在中国招收第一期学生五百名，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广州招考一百五十名，各部队及各地方各保送若干名。因为学校是为紀念中山先生而設的，所以除了由中国共产党派送一部分党团员去参加学习外，都是以国民党的青年党员为合格。关于在广州招考一百五十名留俄学生的情形，以及中大的筹办經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政治周报》第二期有一篇署名子任写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叙述甚詳。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中大又招收第二期学生。这时，北伐軍已經出湖南、江西，下武汉，革命形势高涨，許多人看到《政治周报》

和报纸关于中大情况的报导，和第一期同学的通讯，都希望有到苏联学习的机会。这一次的招生范围除两广、两湖、江西，以及国民革命军和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都选送了学生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上海和各省也大都派遣了学生，先后共计约五百人。这些学生的选派，在北洋军阀统治区内是由共产党党部和国民党党部会同秘密指派的；湖南当时已经是国民党的政权，争取留苏的人很多，所以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考试。这次考试是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周以栗、谢觉哉、王凌波、凌炳四人主持。湖南大学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单独考送八名，其余各中等以上学校设有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的都可以保送党员应考。应考资格为加入了国民党一年以上、著有革命工作成绩、学业优良、思想纯正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因为上述条件的限制，共计只有两百多人与考。被录取的：湖大方面有姜凤威（即甘泗淇上将）、雷通鼎、杨道南、于均祥（女）、谷家儒、程大森等八人；其他各学校有刘之骥、易定三、马景山、张佑忠、蒋锡宪、周光亚、周砥、章章、萧范、曾月琴（以上四名女性）和我。

中大第二期学生，除了由国内各地选送的外，还有由法、德、日、美、英等国的中国留学生转来的。其中以留法学生和华工为最多，大约有几十人，大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在法国搞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因而转来中大。中大为他们开设了一个专用法文讲课的法文班。

一九二七年下期，中大招收第三期学生约五百人。这时，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国共分裂，宁、汉国民党反动派合流，所以这期的学生纯粹是共产党员和少共团员。一九二九年，中大停办，前后三期学生共计约一千五百人，加上东方大学中国班学生，以及红军大学、空军、炮兵、骑兵、步兵等军事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总计约在两千人以上。

二、中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思想情况

进中大学习中国学生，注册时不用中国原有的姓名，另外取一个俄文名字，以后在课堂点名或同学之间相互称呼，都用俄文名字。例如我在当时的俄文名字是阿伊发佐夫斯基。新生注册以后，即按各人的学历分编班次，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以后，再按照学习成绩，重行甄别分班。第一、第二、第三各期各分为六个班。第三期的新生入校时，第一期已经毕业，所以在校学生始终是十二个班。第四班为英文班，第五班为法文班，用英、法語讲课，是专为英、法文程度较好的学生而开设的；其余各班初用翻译，一年以后，除了重要讲座外，大都用俄語讲授。因此，学生在初入校的一年中，主要精力是用于学习俄文上面。有些俄文基础没有搞好的人，只好借同学的帮助进行学习，因而在自学研究方面的效果就较差了。

中大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领导干部人才，就其课程设置讲，完全是一个政治经济单科大学；讲课的都是从苏联各大学调来的一些较有声望的老党员教授，例如教经济学的是马丁诺夫、利浦曼等，教西方史的是瓦克斯，教中国问题的是拉狄克；此外，在同学中选择了一些党员如张闻天、沈泽民、秦邦宪、董亦湘、傅胜兰、王稼祥、沈观澜（即沈志远）等充当助教。在各学期终和结业时都不举行考试，也不发给毕业证书。

中大校长拉狄克，犹太人，是托派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左派，为德国革命党人三傑之一。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被害以后，拉狄克逃到苏联，和托洛斯基等结成反对派，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由筹办中大而当上了校长。

除了各项专门课程外，有时由苏共的主要负责人来校作专题讲

話。例如斯大林來講過兩次話：第一次是在第一期學生入校不久，當時我還沒有到中大，講演內容不詳；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正當和托派鬥爭得很激烈的時候，他針對托派言論，講了中國革命的十個問題^①。又如：羅佐夫斯基來講過國際職工運動；布哈林來講過宣傳工作；某法國老黨員（名字忘記了）在巴黎公社紀念日，來講過他參加巴黎公社革命的情形等等。中國國民黨要人到蘇聯時也有來校講演的，如胡漢民來講過孫文主義，鄧演達在國共分裂時來蘇，也會到中大講演，他以第三黨的觀點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此外，周達明（貴州人，當時是中共駐第三國際的代表）曾來中大報告第三國際情況；陳紹禹再來莫斯科時也來中大作過國共分裂後的中國革命形勢的報告等等。除了課堂學習，就是小組討論或到工廠農場去參觀，另有一部分學生在假期中被抽調到莫斯科附近去受軍事訓練。

學校對於學生的生活管理採取自治的方針，全校學生組織公社，遇有重大問題，舉行公社大會。公社以下有同志審判會，處理學生不守校規以及同學間的糾紛問題；還有生活福利委員會、俱樂部、牆報編輯委員會等等。這些組織和活動都是由教授、職工和學生混合組織而成。例如同志審判會的主席是瓦克斯教授，副主席是我，另外有幾個同學作評議員。

中大學生的政治面貌，除了一部分革命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黨團員，是為學習革命理論而來的以外，還有四五百個國民黨員，情況就很複雜了。其中有國民黨的高級官吏如馮玉祥、邵力子等；有蔣介石保證的黃埔軍校學生賀衷寒、鄧文儀、張澤等數十人；還

^①原講演詞題為《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載《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九卷239—258頁；中譯本載解放社出版的《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第181—211頁。

有一部分是国民党軍政要人的子弟或亲信，例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洞、叶楚傖的儿子叶南、馮玉祥的儿子馮洪国、女儿馮伏龙、于右任的女儿于鄺（即于芝秀）、女婿屈武、和他的亲信王陆一等，他們都是在国共合作、国内革命形势高涨的形势之下，来投革命之机的；其余来自各部队、机关、党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学校的青年学生，也都怀有各种不同的目的。这些人的年龄由十五六岁到四五十岁；学历由粗通文理到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经历由高级官吏到青年学生；他們的阶级出身和思想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苏联对待这班人并没有按照原来创办中大的目的——訓練革命干部的严格要求；而是作为一个类似“貴族子弟学校”来办理的。

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一条不甚熱鬧的街，叫瓦尔芬柯街。在这里有一座規模相当大的四层洋楼，原系沙皇时代的一个企业公司，便是中大的校址。学校前面即是皇家大教堂和大彼得銅像，附近的一个广场，便是我們的操场。因为校本部的房子不够用，除了教室、办公室、大会堂、俱乐部、图书馆和食堂集中在校本部外，另选择依利恩加街一座公寓和彼得罗夫斯基街一座很講究的洋楼，作为男生宿舍；加加林斯基街一座沙皇皇族的华丽住宅，作为女生宿舍（我們当时称之为“东宫”）。宿舍里的卫生、暖气、床褥等設備齐全，生活很舒适。

学生的伙食也特別好。当时苏联各大学学生的伙食一般是三十个卢布一月；中大学生的伙食費則是照上述定額增加一倍，三餐都是相当丰富的西餐。当时苏联一般人都只有定量的黑面包吃；而我們吃的是不限量并且质量很好的白面包和白塔油、牛奶、肉类等等。因为怕中国学生不习惯于长期吃面食，每星期还特別做一两頓中国大米飯吃。为了照顾中国人飲茶的习惯，除餐后备有紅茶外，还特

別設置茶座，供應牛奶紅茶和點心。學校除供應學生一切生活和學習的必需品外，每人每月還發給十二個盧布作零用。此外，每個學生憑學校所發的學生証，還可以在外面得到種種的優待。莫斯科夏季的氣候並不很熱，但在暑假中，學校把我們一部分人送到南俄黑海濱的克里米亞，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附近的工人幹部休養所等風景區去休養。可以說，這班留蘇學生的生活比當時國內一般職工乃至中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都優越得多。一些新從國內革命戰線上來到這裡的同學，對這樣舒適安逸的生活，覺得有些奇怪和不安。

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生活照顧得這樣無微不至；而對於學生的思想工作卻抓得不够緊，學習管理也很松懈。這樣，對於具有革命覺悟的黨團員學生來說，問題還不太大；對於成分很複雜的國民黨學生却是一個嚴重問題。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由於沒有受過革命的鍛煉，思想沒有得到較好的改造，不僅不感激蘇聯勞動人民給予他們的優厚待遇，而且不滿足於這種優越的生活，經常批評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嫌學校的伙食不好，常常三五成群，跑到中國城^①去吃道地的中國餐；身體有一點小毛病便要求休養，吃特別營養品；在學校里專門坐茶座，擺龍門陣，逛公園，亂搞男女關係。如韋永成、魯岱、李安甫、李毓九、羅萬森、劉泮珠、杜從戎、駱德榮、叶南、馮洪國等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人物。因為同學中男多女少（女生共計不到五十人），於是女的成為“眾矢之的”，鬧出許多爭風吃醋的笑話。蔣經國仗著他父親的招牌，便有馮伏龍等好些女同學陪他

^①在當時莫斯科城里，有一個周圍有中國式的城牆約一二里見方的地區，叫中國城。相傳是蒙古人征服莫斯科大公國以後建立欽察汗國的王城所在地。直到近代，莫斯科的華僑多半集住在这里，開設各種商店。聽說在莫斯科，已把它拆掉了。

玩，向他“反攻”；有些原来是夫妇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女的变了卦，鬧出家庭糾紛的也不少。更严重的是，还有一部分人在学校里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些人是以黃埔軍校出身的学生賀衷寒、邓文仪、萧贊育、郑介民、溫中、康澤等为主，加上从德国来的谷正綱、谷正鼎、王启江以及唐健飞、张恕安等。他們看中了同学中有三四百个国民党員，想把这些人拉攏，先在学校里結成派系，等到回国后，就利用它作为政治資本。他們以留法学生的国民党員有国民党旅法支部的組織，想仿照这个榜样，发起組織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遭到学校当局的制止，同时也沒有获得国民党中央組織部的批准。于是他們又着手搞第二套把戏，由賀衷寒等几个原来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发起在中大組織孙文主义学会分会。因为孙文主义学会在国内已經成了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右派的团体，在青年学生中有了深刻的不良印象，所以当他們开始在同学中吸收会員时，就有人向学校当局举发，由学校公社召集全体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組織，指出他們在苏联留学还要进行这种反动勾当，是十分不應該的，要求大会對他們作出严肃的处理。当时，有些同学主张把他們开除学籍，有些人主张責令他們檢討悔过，也有少数人为他們辯护，說这是“研究自由”，不应加以干涉。賀衷寒等始終頑抗，不肯默錯，在会場上大鬧起来，說不該压迫他們。当經大会決議：請学校开除他們的学籍。这时距离第一期学生結业的时候已經不远，学校当局便将賀衷寒等放在第一批首先遣送回国。記得当时被检举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有賀衷寒、邓文仪、萧贊育、吳淡人、张恕安、谷正綱、谷正鼎、唐健飞等八人。

从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在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已經开始露出了向共产党进攻的矛头，这种气氛馬上影响到中大。因为中大的共产党、团员較多，国民党右派分子不可能和在国内一样猖獗进攻；但是

他們也搞了一些破坏活动。例如当时校內的国民党員同学在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之下，加入共产党或少共的逐渐增加，于是他們放出空气，說：“中央已經明令限制国民党員跨党，我們是国民党進送的优秀党员，将来回国后要当领导干部，为了对党忠诚，作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应当以国民党員身份来，仍以国民党員的身份回去；如果成了跨党分子，回国以后，不好交賬，对于自己的前途会发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反动宣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某些国民党員同学，对于加入共产党和少共，犹豫观望起来。在公社大会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們繼續造謠，說：“这次事件是共产党无中生有，借題發揮，用以压迫国民党同志，想把中大造成清一色的党校，这是企图消灭国民党的阴谋的一个縮影。今后在校的每一个国民党同志如果不能伏伏貼貼地听他們的指揮，就随时都有戴上右派、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危險。”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同学中形成两个对立的壁垒，国民党的同学不和共产党的同学往来，彼此关系搞得很紧张。当胡汉民来莫斯科考察时，拉狄克为了緩和双方的关系，請他来中大講話，希望他对国民党員加以訓誡，从而加强团結，搞好学习。胡倚老卖老地向学生們說：“你們都不是东西，好象小孩子鬧着搶餅子吃一样。列宁不是要你們参加世界革命的么？列宁对于世界革命的参与者是同等看待的，并不是要你們象搶餅子一样和人家搶的。如果象搶餅子一样地鬧，决不是列宁主义的信徒。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員如果怀着惧怕共产党員来搶餅子的心理，也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天下为公的心腸。”①他这种表面上各打五十板、骨子里說成是中共想在国民党手里搶天下的挑拨論調，当时还居然得

①胡汉民这段話，后来一九三〇年在南京某次講演会上講《半年中所見的苏維埃之眞面目》，极力詆蔑共产党和苏联时，还得意地重述过。这篇講演載在当时的《新亞細亚》月刊和《俄罗斯研究月刊》。

到拉狄克的贊揚，說：“大家要听胡同志的訓示，和衷共濟。”結果一些右派國民黨員借此作為護符，氣焰更高了。有些廣東籍的國民黨同學和黃埔軍校出身的同學去見胡漢民談話時，胡進一步煽動他們，說：“蘇武在俄國境內的冰天雪地里牧羊十九年，受盡磨折，還是堅持漢節，矢志不移，你們難道受一點氣，受一些壓迫，就泄了氣么？”胡的這種挑撥和煽動，在國民黨同學中公開傳述，對於許多人堅持右派立場起了鼓勵作用。

在國民黨員學生鬧得烏煙瘴氣的同时，反對派即托洛斯基派的問題也在學校里鬧得很凶。當時托派在蘇聯還很猖獗，托洛斯基是紅軍總司令，其他如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羅佐夫斯基、加米涅夫、拉可夫斯基、皮達可夫、色略布略可夫、李可夫等許多人還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正是他們向斯大林領導下的聯共中央發動全面進攻的時候，報紙上登載着許多長篇大論的反對派的言論，中國革命問題也是他們爭論的一個重點。中大是幫助中國培養革命領導幹部的重要機構，拉狄克凭借校長的地位和講授“中國問題”的機會，從兩方面來爭奪學生，一方面向學生宣傳托派觀點，說什麼中國農村中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封建地主的剝削，甚至已沒有封建殘余的存在，而是商業資本的剝削。因此，他認為中國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地主，倒不如說是反對資本主義。他還說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既然不承認包含有幾個階級的革命政黨，認定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小資產階級終究是要同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走上一條路的，它的革命充其量只能搞土耳其凱末爾式的革命，那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就是錯誤的，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的。因此，共產黨不應當參加武漢國民政府，而應當另行組織蘇維埃政權；不應當參加國民革命軍，而應當組織紅軍；在共產黨參加的政權之下，不應當允許資本家的私人

工厂企业的存在而应当立即收归国有。”他以这一套“左倾”的論調講中国革命問題，并且引述一套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調查材料”，加上他的鼓舌如簧的詭辯，縱然有些学生提出疑問，他却能解答如流，因而迷惑了不少的学生。另一方面，他在学生中多方进行个别拉攏，經常找党团员中和他思想接近的人談話，或者带着这些人去見托洛斯基；对于国民党要人的子弟，更不惜多方籠絡，拉他們入党入团。例如蔣經国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一到学校，拉狄克就特派秘书巴卡列也夫專門照料他，不久便加入了少共。其他如馮洪国、叶南等也都是这样加入少共的。由于拉狄克在学校有计划地拉攏学生加入他們的集团，于是在党团员学生中也形成了一个斗争的对垒，开支部党员大会时，經常吵鬧打架。一九二七年五一劳动节游行时，在街上打过架；在联共中央會議決議开除托洛斯基等的党籍以前，托派分子糾集一些人游行示威、进行搗乱时，中大學生以梁干乔、陆渊（即陆一远）、俞季女（即俞季虞）、王新衡、楊华波、林爱民、李血泪等为首，也糾合了一部分同学附和参加，发生斗毆。这个时期，中大已經不能保持正常的学习空气，而是处在一場尖銳的斗争之中。当时，国民党員的学生一般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去分析和認清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大是大非問題，而把它看成是无原則的派系糾紛，是个人权利的爭夺，甚至抱着一种幸灾乐禍的卑鄙反动心理，坐山观虎斗，希望两敗俱伤。記得在五一节游行时，許多国民党員的同学特地赶到街上去看熱鬧，回来后，紛紛高兴地說：“今天的全武行真是够劲！”

这时，国际上的反苏、反共势力的气焰非常嚣张，英国保守党政府公然誣蔑苏联商务代表是間諜，在橫蛮地搜查了大使館以后，宣布和苏联絕交；苏联駐波兰大使沃义可夫被刺，苏、波关系十分紧张；德国的柏林，中国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天津都发生搜查和

袭击苏联使领馆的事件，整个国际环境对苏联都是不利的。而苏联国内的社会经济也处于很困难的境况中。由于生活物资比较缺乏，同我们交往的一些青年工人和学生看到我们带的舶来品的手表、钢笔，穿的呢绒西装大衣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用品，都不免有些羡慕。

上述这些情况，使本来对苏联抱有成见的国民党学生，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他们虽然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联共的革命历史，也看到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许多动人的成就，并且联共也在多方培养和争取他们入党入团，但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只看到苏联一些暂时的和局部的困难，看不到革命后的社会的本质的变革，更看不到美好的远景，原来的反动立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到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时候，中大的国民党学生除了第一期毕业的一部分已经遣送回国、一部分正待遣回外，在校的还有两百多人。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蒋介石的重要爪牙。

三、国共分裂震盪中的中大学生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内形势大变，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所举办的中大受到了强烈的震盪，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在校的国民党学生不晓得苏联当局对他们将怎样处理，因而疑虑丛生。当时邓文仪已经回国投效了蒋介石，在报纸上

（似是《党军日报》）发表了诬蔑苏联、辱骂共产党、辱骂中大的长篇文章。报纸寄到中大后，墙报上剪贴了邓的文章，并且标上《请看中大同学败类邓文仪的反动嘴脸》的题目，下面加上一段按语：“邓文仪受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而刚刚离苏回国，便变成了另一幅彻头彻尾的反动猙獰面貌，在校的同学中是不是还潜伏有这样的家伙？”

大家應該警惕！”这个报导出来以后，一方面在同学中激起了許多人对邓文仪的憤怒；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员学生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威胁，几乎大多数人不能安心上課，三五成群地議論、推測，乃至謠言鑢起；有的說，联共已經决定把所有国民党员同学都送往西伯利亚作苦工；有的說，某些国民党员同学已經失踪，可能是被格柏烏抓去了。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学生跑到街上与苏联人民接触的情况和往日也大不相同了。过去每一个苏联青年男女，遇到我們都表示热烈欢迎，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苏联合万岁！”抱着我們亲吻，拉着手提琴围起来一道跳舞，甚至把我們抬起来抛在空中欢呼，这时，苏联青年遇到我們却表現出一种憤怒的情緒，高呼“蔣介石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假如知道你是一个国民党员的話，更以厌恶的口吻說：“伙計！伙計！要盐么？”①由于苏联群众的义憤所形成的压力，簡直使我們不敢出門。

当时，所有国民党员的同学，大致有这么几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表示国共既然分裂，自己是国民党员，自然不能繼續留在苏联，干脆向学校当局請求退学回国，如张鎮、魯岱、謝振华、陈声孚、彭克定、廖开、韓亮兼等几十个人便是首先提出退学請求的。他們同时还在国民党员同学中到处制造恐怖空气，說出一套为了保持国民党员的“气节”，不能不馬上回国的道理。例如魯岱临別送我的律詩中有一联說：“傲骨嶙峋双眼白，行囊羞澀一錢青。”他还劝我早日提出回国的請求，說：“伯夷叔齐又不食周粟，你还在这里吃得下俄国面包么？并且共产党的面包也不会讓你便宜吃下去的，不如自己識时务些，早些离开，表示我們的骨气和对国民党的忠实。”韓

①沙皇时代，有些华侨死在俄国，因为要把尸体运回家乡，路程太远，为了防止腐臭，把尸体醃上盐，帶运回国。因此，当时有这样一句“要盐么”的屬中国人的流行語。

亮兼也向我說：“我們是风云际会而來，現在應該知難而退。”這些人所散播的這類“勸退”的論調，對於還在躊躇不定的人，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另一部分人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公開反動表示極端憤慨，自己決心獻身革命，請求加入少共，繼續留校學習。如張佑忠等便是這時加入少共的（張後來回國為革命而犧牲）。但也有些人當時雖然表示激昂慷慨，加入了革命組織，但回國後還是做了逃兵或叛徒，如周砥、程大森等便是這一類的人。還有一部分人平日就不大關心時事，在此嚴重關頭還是照常念書，照常玩，听候當局處理，自己不作表示。例如我是在第一師範行將畢業時來到蘇聯的，因為我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我升入別的大學，更不可能到別的国家留學，而我向上爬的心理迫切，考取留蘇後，我把它看做是一個“鍍金”的良好機會，所以入校以後，一直用功讀書，中間曾經有好幾個同學爭取我加入共產黨，我都以“學好本事再行入黨”來推却。直到這時，我還是想繼續混下去。又如韋永成等，他們還是照常吃喝玩樂，並且另有一套謬論，韋曾經說：“國共分合是上面的事，我們到蘇聯來是奉命而來，看看世界而已，無所謂革命不革命。我行我素，誰也奈何我不了，搞到那一天硬是不行了再說。”還有少數平時被同學們目之為“革命大少爺”的人們，雖然已經加入了革命組織；但是他們的父親這時在國內已經成為反動頭子，他們為了应付環境，不能不表現出一種戲劇性的姿態。首先是蔣經國，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介石。信的開頭說：“爸爸，這是我最後一次叫你作爸爸。”接着痛罵蔣介石不該背叛革命，屠殺革命同志，聲明永遠脫離父子關係。他這封信的原稿當時在中大的牆報上發表；蘇聯的報刊也多加以刊載，聽說連某些資本主義国家的報紙也把它登載了，因而轟動一時。由於蔣經國這一行動的影響，接着叶南、馮洪國等也都發表了同樣的信。當時同學們認為叶南、馮洪國等的表示是出于

不得已的仿效，是假的；而蔣經國則是出于“本心”，因此，蔣經國一時成為同學們所敬愛的人物。蔣經國在學校里除開為了交際學了一點俄文外，對於革命理論並沒有認真學習，根本談不到有什麼革命的認識。他每天大部分時間用在打球以及與馮伏龍和一些蘇聯女朋友玩耍；不過他平時沉默寡言，老是穿一件皮夾克，戴一頂蘇聯式的工作帽，儼然象一個工人，同學們也把他叫做“拉包子”（工人）。他的這些虛偽表態竟然迷惑了不少的同學。

國共分裂時，也正是蘇聯的托派被打垮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夏，中大校長拉狄克被撤職，初以教務主任阿果爾代理校長，旋即正式發表米夫繼任校長。米夫到校後，正式宣布：凡是國民黨員的學生願意留在蘇聯的，可以繼續留校；不願意留蘇的應即在一定期間內提出回國的請求。這個通告公布後，申請回國的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學校當局決定：分批遣送回國，回國的路線或由海參崴直放上海，或由蒙古，或由東北，或由歐洲轉道回國，可以自由选择；路費除由學校一律發給一張出蘇聯國境的車票外，另發旅途用費五十個盧布，不夠的由自己籌措。從九月起，開始分批遣送，每批一二十人，每隔幾天由學校宣布名單，即時辦理離校手續。

這時，我考慮：留校么，怕將來要參加革命工作，怕艱苦，怕危險；回去么，我是一個沒有靠山的学生，聽到當時國內“寧肯錯殺三千，不讓走漏一個”的白色恐怖，害怕自己從蘇聯回去，難免不被扣上紅帽子，送掉性命。我在這樣前怕狼、後怕虎的個人利害打算下，反復考慮，幾天几晚，游移不決，具有我這樣思想情況的，當時也還有好些人。最後還是幾個已經決定回國的同學向我煽動，說：“動身回國的同學已經有了好几批，快要遣送完了，過後，你再想請求回國，就不會再由你了，還是趕快提出請求吧！回國以後，總不會沒有出路的。”於是我才正式提出回國請求。學校馬上批准了，

把我編在第八批，取道海參威回國。在動身之前，有些和我平日比較接近的留校同學，為我餞行。在話別中，也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例如姜鳳威曾對我說：“你快要回國和我們分離了，希望你堅持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要做革命的敵人。”又如張佑忠對我說：“現在我們分手了，我是準備為革命犧牲的，將來回到國內，希望你不要殺共產黨人就好了。”傅勝蘭握着我的手，很淒愴地向我說：“漢文兄，你好了，可以安然回國了，我還不曉得將來死在什麼地方！希望能有和你再見面的機會。”後來姜、張等成為中國革命的干城，張且成為革命烈士，而傅則由叛徒墮落到當漢奸（初加入復興社，抗戰時期投靠汪精衛，當杭州偽市長，抗戰勝利後被槍決了）。這兩種臨別贈言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面貌，曾在我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憶當時情景，仍足發人深省。

我和第八批回國同學共十六人，於一九二七年十月間，由莫斯科動身，車抵伊爾庫茨克時，看到報紙，才知道中蘇正式宣布絕交，從海參威到上海的船航不通，這真是晴天霹靂，大家都驚惶失措，感到進退兩難。到達海參威時，有兩批先我們回國的同學還停留在那里。其中有一個過去在日本留過學的同学劉泮珠（湖南湘陰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和日本駐海參威領事交涉，同意我們取道日本回國。從海參威到敦賀，每半月有一班航船，這時班船已到，第二天便要啟行。於是我便和他們同伴搭這班船回國。上船時，只經過格柏島一次檢查行李和查驗出境證明，就放行了。

这里我附帶說一說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反蘇反共，其陰謀手法是无孔不入的。這位日本領事聽說我們都是國民黨員，因為國共分裂，在蘇聯呆不住了而回國的，立刻對我們表示熱烈歡迎，招待得无微不至，不但因為我們沒有進入日本國境的簽證而加以留難，并且慷慨地要我們把攜帶的盧布都交由領事館換成美金（普通人是兌

不到的)，所有船票一律免費；并且馬上打電報向東京外務省報告，要外務省派人到敦賀來招待我們。臨行，他還親自送到船上，交代船長好好招待我們。到達敦賀以後，除了外務省派了一個專員來招待我們之外，還有許多新聞記者從各地趕來，要我們發表對蘇聯的觀感。外務省的專員并且熱心地告訴我們：“蔣總司令（蔣介石）現在東京，不久會要回國了，你們將來一定是他左右的重要官員，如果你們在日本想和他見見面，馬上可以由外務省轉告他，請他約見。”原來日本官方預見到我們回國後一定會投靠蔣介石，因而把我們當作一批很好的反蘇反共的貨色，對我們大獻殷勤，企圖拉攏我們。

由敦賀經西京到達神戶的時候，這批回國的同學的反動面貌便完全揭開了。我們在神戶舉行了一次會商，決定：第一，鑑於國內局勢紊亂，白色恐怖嚴重，南京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的重心，回國以後，大家採取一致行動，都到南京去找出路；第二，暫在神戶停留下來，打電報給住在東京的蔣介石，表示我們一致擁護他，向他請示，要不要我們到東京去和他見面。當時蔣介石還在背叛革命之初，羽毛未豐，正是需用這類工具的時候，因而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信，并且派了一個人（姓名忘記了）來神戶和我們會面。他在信中首先表示歡迎我們，接着說他不久就會回國，要我們不必到東京去，可先回南京去等他；並說已經通知丁惟汾、陳果夫，我們到上海後，會得到招待的。同時，送給每人旅費二百元。這個復信正合我們的願望。於是大家於一九二七年年底，經由長崎回到上海。

我們到達上海，丁惟汾、陳果夫馬上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舉行一個歡迎會歡迎我們。會上，丁惟汾講話，除對我們表示慰問歡迎外，并且說：“寧漢已經合作，馬上就要改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蔣先生將出來主持一切。清黨以後，黨政工作正待開展，你們都是經過了一番鍛煉的同志，希望將來都積極參加黨的工作。”陳果夫接

着講話，說：“希望大家都到南京去，不要走散，听候党安排工作。在工作未确定前，一切生活費用由中央負責。听说你們回国的人很多，希望大家互相通知都到中央报到，以便分派工作。”他們在講話中都罵了共产党一通，鼓励大家对清共建党建国貢獻力量。到会的同学也有好几个人讲了話，表示“我們是因为不屈服于俄国和共产党的威逼利誘而被驅逐回国的，今后只有竭誠拥护蔣总司令，献身党国。”丁、陈二人都是当时替蔣介石搞党务的重要爪牙，丁并且是第一个重要人物，当时有“蔣家天下丁家党”之称。因为丁在北大教过书，在山东原籍和北京办过党，又有“大同盟”的小組織作基础，在华北的青年中有一部分势力，所以蔣介石特別借重他；但是并不信任他。陈果夫虽是蔣的亲信，但資望不够，当时蔣以陈監視丁，同时借丁的資望来提高陈的地位。丁、陈二人为了爭权夺利，到处各自搜罗走卒，互相磨擦。因此，对于我們都大献殷勤，极力拉攏。会后，两人分別找我們談話，表示在中央党部成立以后（其时，正是蔣介石复起，集合汉、宁、沪三方面的国民党中委，举行二届四中全会，組織中央党部，恢复“法統”的时候），一定要請大家帮忙。陈果夫还特別請我們在一品香餐厅大吃一頓。我們这帮人既然决心投蔣，因而除了少数人別有靠山，自由行动外，大多数的人都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鑼鼓开場的时候（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由上海到南京投效。

四、投靠蔣政权的經過

一九二八年春初的南京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局面：上边是南京、武汉、上海各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們在搞反共大合唱，同时又在进行新的派系斗争；下面是一些国民党的新官僚政客、地方軍閥以及北洋軍閥中的“遺老”、“遺少”麇集在这座破烂不堪的

“新都”，想乘机捞一把。彼此之間，极尽纵横闢闢，打击逢迎之能事。当时，南京所有的大小旅館都被他們塞滿了。我們到南京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了段詩園（原名段世援，中大第一期学生，回国后在国民党特別委员会工作）負招待专責，在青年会包了一批房間作为招待所，才解决了住宿問題。

我們到达南京初步了解情况以后，才知道我們的遭遇并不如蔣介石、陈果夫對我們所說的那么簡單順利。在我們回国之前先后回国的五批同学中，有一批經东北回国的，张作霖认为有“赤化”嫌疑，都被关在牢里；有一批經蒙古回国的，蒙古政府认为有反动嫌疑，也被扣押；其余几批虽已回到国内，但是有的回到各省，因共产党的嫌疑被杀害了，例如回到湖南的蔣錫宗刚到长沙，就被人举发，說他是留俄归国的共产党员，不由分說，馬上在所住的旅館前面被槍斃了；来到南京的約有四、五十人。那时，正是西山會議派的特別委员会当权，他們认为凡是从苏联回来的人都有共产党嫌疑，因而除了少数人有靠山証明的而外，都被关在牢里，直到我們来到南京前不久，特別委员会垮了台，这些人才获释放，情形都很狼狽。同时，第一期毕业回来已經在南京工作的同学，除了黃埔軍校出身為蔣介石所信任的人而外，也都在白色恐怖之下，慄慄自危。来招待我們的段詩園偷偷地告訴我們：“上面交代，對你們的言論行动要严加注意，看有无共产党夹杂其間，如果发现有嫌疑的人，要随时报告处理，大家要特別小心。”这样，不但我們的工作成了問題，就是目前的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而当时又別无出路，精神上都感到徬徨忧悶。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开了一个会，研究出路問題。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从而解决安全問題和工作問題，决定向国民党正在开会的二届四中全会上一个报告书，并推定我和沈苑明起草。报告书的

內容除了報告我們在中大的學習經過情形外，分為對蘇聯情況的分析和對今後國民黨黨務工作的意見兩部分。在分析蘇聯情況部分，對於當時聯共黨內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革命、人民生活、社會經濟、宗教信仰、農村情況、城鄉關係、以及第三國際與世界革命等問題，作了許多誣蔑歪曲的報道和分析批判，來表明我們的反動立場。①關於對國民黨黨務的建議部分，我們認為黨外的問題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革命的嫉視，軍閥的負隅頑抗，共產黨的暴動破壞；黨內的問題是由於黨員的腐化、惡化、軟化、而形成的組織鬆懈，紀律廢弛的狀態。我們主張充實黨的力量，實行以黨治國，以黨建國；在黨的組織方面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黨員訓練，培養職業革命家，加強黨的領導；在宣傳工作方面，要擴大黨的言論機關和出版事業，加強國際宣傳，擴大對工农群眾的宣傳；在黨員方面，要實行候補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制度，嚴格制裁黨員的貪污腐化，限制黨員的生活費，實行黨員武裝。我們就是抱着這種“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幻想，主要是迎合蔣介石的需要，從表面上標榜了一些聯共黨務工作的方式方法，寫成了一個四萬多字的報告書，作為我們的“獻禮”。②

國民黨的二屆四中全會開過後，中央黨部各部處、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都成立了，接着，在政權達到的地方的各省、市黨部也成立了。因為範圍很寬，需人很多，我們又成為各方面拉夫的对象。賀衷寒、鄧文儀召集在南京的留俄學生開了一次會，表示對所有的留俄學生可以包干，因為軍隊政治工作和黨務工作到處都需要人；

①後來我又把這個報告書的誣蔑蘇聯部分，再根據當時日、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反蘇的一些反動書刊材料，彙集起來，寫成一本極反動的小冊子，叫做《顯微鏡下之蘇俄》，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啟智書局出版。

②這個報告書的建議部分，後來在《蘇俄評論》第二期發表過。

陈果夫也来找我们，因为蒋介石当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当副部长，实际是由他负责，组织部和各省、市党部都要人到丁惟汾也来找我们，因为他当了训练部长兼负中央党务学校的责任，这些机关都要人；于右任也表示要一些人，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的三常委之一，他的亲信骨干王陆一（留俄学生）当了中央秘书处的书记长。在这种情形之下，各人根据自己的私人关系，都得到了反动工作岗位，除了一部分人由于原来的私人关系分散到各地而外，大致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以及在中大时和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接近的人都进入了军队党务、政训和军事工作范围；其余的人大都进入了党务工作范围，搞党务工作的人跟陈果夫跑的很少，跟丁惟汾、于右任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当时丁、于的资望比较高，作风也比较适合大家的胃口；对于陈果夫这个当伙计出身，资历既浅，又无理论学术修养的角色，大家有些瞧他不起。正由于当时有了这种分野，所以后来许多留俄学生参加了改组派、复兴社，而参加 CC 的很少。同时，由于这批留俄学生走上了依附蒋介石的反动道路，以致后来许多留苏的托派分子、叛党分子都因互相招引，陆续来到南京，形成了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反动集团。这个集团虽不过千把人；但分布在各个反动统治派系或机关，都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属复兴社或军统的有贺衷寒、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梁干乔、康泽、张元良、王祿丰、李秉中、李拔夫、郭寿华、汪少伦、周天德、骆德荣、吴淡人、白瑜、张镇、傅胜兰、李毓九、高傅珠（即高晶斋）、王志文、李厚征、李元杰、赵仲容、郑介民、张师、王新衡、谢力工、严灵峯、余鍾民、吴景中、叶道信、钱乃治、施岳、汪开元、陆梦衣、张曜南等；属 CC 或中统的有彭昭贤、张冲、于国楨、余奇（即余飞）、汪浩、徐浩（即徐振流）、伍家有、王启江、潘仲鲁、张秀嵐、馬玉夫、程大森、鮑成美、西門宗华、叶青（即任卓宣）、

王平一、費俠、費克勤、高其度等；屬改組派的有谷正綱、谷正鼎、羅芳炯（即羅方中）、沈苑明、何漢文、王深林、段詩園、楊子福、林柏生、陳春圃、唐健飛、高云裳、楊振西、楊振藻、張民權、劉舫西（即劉駕歐）、蔡炳彤、屠義方、汪嘯吟等；屬桂系的有韋永成、王公度、劉仲容、李血涓、張威遐、謝蒼生、區渭文、李梅五等；屬馮玉祥系的有鹿鍾麟、高新亞、郝鵬舉、魯崇義、馮洪國、胡運泰、鄧桂五、楊念熙等；屬太子（蔣經國）系的有徐君虎、劉漢清、俞季虞、黃中美、胡世杰、卜道明、屈武、朱茂樸、杜滄白、徐季元、高衡（即高素之）等；屬於（右任）系的有王陸一、張庚由、郝煥濤、趙文炳、熊保頤、段可情等；在空軍系統的有毛邦初、王叔銘、林理甫、余世沛等^①。他們在各個派系或機關中，一般都起了骨干作用。

五、留俄歸國學生招待所

留俄歸國學生招待所是蔣介石為了招集一班國民黨留俄學生以及留俄學生中的托派分子和叛黨分子的一個招安站。

一九二八年春，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以後，我和沈苑明、楊子福、黃永偉、汪嘯吟、屠義方等等進了丁惟汾的中央訓練部工作，谷正綱、羅方中、唐健飛、張民權、溫中、陳道守等進了國民黨中央黨校工作，王陸一、王眉江、劉舫西、蔡炳彤、王度昌、段詩園等進了于右任的中央秘書處工作，張沖、伍家宥等進了陳果夫的組

^①以上所述各個派系分子是我就其平日的關係、表現或工作情形加以揣斷區分的，可能有不正確的地方。又因僅靠記憶，也一定有重要的遺漏。同時，這些人的派系關係有些是前後又有變化的，例如改組派的沈苑明後來變成CC，張民權變為復興社，太子系的劉漢清、俞季虞等原來是復興社的等等。

機部工作。由于丁、陈曾在上海招呼我們互相通知留俄同学到中央报到的影响，这时陸續有許多留俄学生投奔南京来找工作。起初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指派段詩园負責招待。凡屬来京报到的留俄学生，沒有分派工作以前，都由秘书处发給維持費，直到介紹工作为止。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情形复杂，段詩园一个人負責不了，我們乃与于右任、胡汉民、王陆一商量，决定向国民党中央常会建議，設立專門的机构来主持这个工作。由我和沈苑明草拟“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組織規程”以及工作計劃，經費預算，签由丁惟汾提交中常会，因为事先得到了于右任、胡汉民（当时在常委会办公的三常委是于、胡和蒋介石）的同意，所以順利地得到批准。

組織規程的要点如下：

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招待归国留俄学生，审查其学籍、资历、思想起见，特設立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
2. 招待所工作由中央訓練部黨員訓練科主管。
3. 招待所設所长一人，干事二人，由中央訓練部派兼。
4. 所有来所留俄学生須先經在京任职的留俄学生二人以上之介紹証明，方能入所。
5. 入所受招待之留俄学生，以三个月为度，必要时經批准得延长之。
6. 入所受招待之留俄学生經审查确无共产党嫌疑，即发給証书，并設法介紹工作。
7. 招待所經費以預算定之。

当由訓練部派沈苑明（浙江平阳人，訓練部黨員訓練科总干事）为所长，楊子福（湖北枝江人，黨員訓練科干事）、段詩园（江西萍乡人，中央秘书处交际科干事）二人为干事。招待所預算規定以經常收容五十人为度，每人每月发給生活費五十元，連同其他費用，

每月的經費約四千元，由中常會撥給。招待所初設枯岭寺，後遷西流灣二號，係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間成立的。

招待所設立之初，來所的多半是國民黨員的留俄學生，入所後的審查手續比較簡單，只要寫一篇自傳，住上一兩個月，就可由中央訓練部發給證明書證明他確無共產黨嫌疑。領得證明書後，凡不能自己找到工作的，便由中央黨部分別介紹工作。後來要求入所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包括有托派分子，叛黨分子，於是審查就比較嚴格了。入所必須有同學負責介紹，離所也要妥實的保證人，還必須有一定的反共行動表現，才能發給證明書。因此，有住上三個月還不能得到證明書的。從招待所成立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經過招待所發給證明書的共約二百人左右。

這時，國民政府開始由考試院銓敘部對所有公職人員實施銓敘甄別。學校畢業證書是銓敘官階的重要依據之一。留俄學生因為蘇聯各學校都沒有發給畢業證書，想要銓敘官階就發生了困難。在招待所負責的幾個人都是留俄學生。他們為了自己的前途，於是想出了一個補救的辦法，建議中央訓練部印發一種留俄學生的畢業證明書，凡是經過招待所的留俄學生固然可以各發一份，就是早已回國有了工作的留俄學生，經同學二人的證明，也可以請領一份。為了具備做官的資格，所有屬於國民黨方面的留俄學生包括已有工作的在內，大都申請領取了這種畢業證明書。我們便借此摸清了在國內的留俄學生的人數和情況，並且逐漸同他們建立了聯繫。不久，就在這個基礎上組織了留俄同學會。

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中央黨部改組，丁、陳兩派鬥爭的結果，丁派完全垮台，訓練部改組為民眾訓練委員會，黨員訓練處（前身為黨員訓練科）改隸組織部，陳果夫當了組織部長。於是留俄學生招待所也改隸組織部，並改派于國

楨为所长。于为北京人，中大学生，是个共产党的叛徒，当过河北省党部委员，由于他和中统发生了关系，反共有功，很得陈果夫的信任。因此，陈把这个工作交他负责。

于国楨当了所长以后，招待所的性质便开始改变了。这时，原来国民党员的留俄学生需要通过招待所甄别的大体已经甄别完了，继续来所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自首分子和托派分子；一种是被中统特务逮捕在牢里关了一个时期，经过利诱威胁，已经发生动摇的人，为了进一步诱使他们彻底叛变，也把他們送到招待所来。对于上述两种人，名为招徕，实为集中管理。一方面利用他們原有的組織关系，便于对其他潜伏的共产党员进行侦察，或者通过他們之間的私人关系，加以招徕，或者根据他們所提供的线索，加以逮捕；另一方面由中统办了一个《中国与苏俄》月刊，要所有住在招待所的留俄学生写反共反苏的文章，来表明他們的政治态度。通过住招待所进一步走向叛徒道路的人不少。如卜道明（即卜世奇，湖南益阳人，中大学生，大革命时当过鲍罗廷的翻译），和其他几个留俄学生由海参威到达上海时，即被中统逮捕，随被送到招待所。通过卜的关系，接连逮捕了好几个人。后来卜道明以反共有功，并通过蒋经国的关系，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当了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又如费侠和她的姪女费克勤（湖北人，中大第三期学生）秘密回国后，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搞托派活动，旋和中统特务搭上了关系，把陈独秀等出卖，因而也被送入招待所住了一个时候。不久，费侠被任为中央民训会编审处的编审，后来作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小老婆。费克勤也作了中统的职业特务。

大约到了一九三四年，留俄学生招待所更进一步地变成了中统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改由组织部调查处主管，所址也由西流湾迁到离南京三十里的江宁县土桥镇。在那里，新建了好几栋房屋。所

长还是于国楨。所里的情形和外間隔絕，变得很神密，似乎已无繼續来所的留俄学生；但是所里經常住有二三十个留俄学生；有許多的人还帶着家眷住在那里。他們干些什么，局外人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是在于危害人民的勾当。这个罪恶机构直到抗战前才悄悄地結束。

在于国楨主持期間，究竟共有多少留俄学生进过招待所，无从确知，估計有二三百人。加上沈苑明主持时期經過招待所的留俄学生以及前后归国、未經招待所而在蔣政权下服务的留俄学生，总计約有一千人左右。

六、留俄学生所創办的几种反动刊物

当留俄学生开始投靠蔣政权以后，为了表明他們自己的反动立場，并且帮助蔣介石加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先后創办了几种反动刊物。^①

1.《党基》半月刊。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閉幕不久，賀衷寒、邓文儀約集了当时初进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聶綺（即聶紺弩，又名甘雨，当时是中央通訊社副社长）、沈苑明和我，說是为了闡明三民主义，駁斥共产党的理論，树立国民党的理論基础，要創办一个刊物。当即商定，組織“党基社”，出版《党基》半月刊；由賀衷寒担任社长，邓、聶、沈、何四人为編輯而以聶为主編；經費由賀、邓筹措，需要多少即供給多少，不作具体規定。大約在八、九月間，出版了創刊号。我們几个人都写了反动文章。一直出了三期，都沒有发生問題。当第四期出版的时候，正值蔣介石筹备国民

^①这里所說的仅仅是几种研究苏联和与留俄学生共同活动有关的刊物，至于某些私人所办的刊物，都未敘及。

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控制选举，实行独裁，决定以圈定或指派的方式产生代表，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聶箭写了一篇以《民主与独裁》为题的社論。^①因为这期的稿子沒有经过賀、邓的审阅就付印了。发行以后，賀衷寒气得暴跳如雷，指責聶箭是“为共产党作宣传”，同时說我和沈苑明也是故意捣蛋。《党基》就因此停刊了。聶的中央通訊社副社长职务不久也被撤免了。事后我們才了解，这个刊物原是蒋介石授意賀、邓搞的，而賀、邓又利用我們作走卒，并且想借此拉攏一些留俄学生作他們的政治資本。我和沈当时已經与改組派开始联系，而反对圈定代表，反对軍事独裁是当时改組派的口号。聶所写的社論即是以此为論点，并为我和沈所贊同的。蒋介石看了，認為是大逆不道，把賀衷寒、邓文儀罵得狗血淋头。从此，賀、邓等對我們怀有戒心。

2.《俄罗斯研究》月刊 一九二九年，哈尔滨发生搜查苏联領事館事件，引起了中东路糾紛，中苏間发生了武装冲突，南京和东北当局掀起反苏高潮。一九三〇年一月初，中国派莫德惠为全权代表，与苏联商談解决中东路問題。南京政府为了制造有利于中国的輿論和增强反苏气氛，外交部长王正廷倡議創辦刊物，当由外交部的耿济之（又名耿匡，別号西溪，当过中国駐赤塔領事，翻譯有許多俄国文学书）、李长卿（河北人，中大学生，曾任加倫將軍翻譯和中国駐伯力領事）、吳成章、张庆春（东北人，帝俄时代的留俄学生，当时在外交部第二司当科长）等邀集我和沈苑明等发起組織“俄事研究会”（实际上沒有向外間征求會員，也沒有其他会务活动），并由外交部每月拨发津貼五百元，創辦一个專門研究苏联和中苏关系的刊

^①《党基》現在很难找到，各期的具体内容已記不清楚了。这篇社論的题目，只記得大意是如此。

物，——《俄罗斯研究》月刊，以耿济之为主編，其余的人参加写稿和編輯工作。

一九三〇年二月，《俄罗斯研究》正式出版創刊号。在耿济之写的《本志使命》一文里說：“我們要对付我們的敌人，便不能不認清我們的敌人；要認清我們的敌人，便不能不先研究我們的敌人。这是我們办这个杂志的明白的态度。”把苏联作为“我們的敌人”来“研究”，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个刊物的极端反动的立場了。关于編輯的分工，当时决定：关于中苏外交关系問題由外交部的人負責；关于苏联国情的研究由我和沈苑明負責。在开始的时候，便有外交部和留俄学生两个集团的分野。从第五期起，因耿济之赴苏回任駐苏領事的职务，以李长卿接替主編。至此，外交部的人几已全部退出。五期以后各期的內容几乎全是关于苏联国情的文章。除了翻譯一些欧美資本主义國家的反苏論著外，大部分都是留俄学生以反动观点所写的一些反苏反共的东西。例如俞季虞（湖北人，又名俞季女，笔名莫儿，中大学生）、顧毅宜（浙江人，中大学生，托派分子）等写的《留俄外史》便是极力丑化苏联和共产党最突出的东西，后来还把它印成了专书。

由于外交部的人不能与我們合作，多方掣肘，把外交部的津貼故意拖延不发，因此，这个刊物名为月刊，实则不能按月发行。从一九三〇年二月創刊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历时一年半，只出刊十三期。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借口緊縮开支，停发津貼，刊物遂被迫停刊，俄事研究会也随之散伙了。

3.《苏俄評論》月刊：在成立俄事研究会和創辦《俄罗斯研究》的时候，我和沈苑明便有一种打算，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下的許多政客学者，往往都以精通某国問題为标榜，取得“美国通”、“日本通”、“英国通”一类的称号，作为政治資本。我們也想凭借創辦刊物作为专门研究苏联的据点，从而博得“俄国通”的称号。当我们利用耿济之

的辞职，把这个刊物完全占领后，外交部的旧留俄派害怕我们抢夺他们在外交部的地位，所以设法把《俄罗斯研究》搞垮，接着又把李长卿从外交部排挤出去。我们遭到这个打击，不能不另创据点。因而随着就有《苏俄评论》的创办。

《苏俄评论》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创刊的，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才停刊，历时五年多，出刊了六十多期，成为当时以反动立场研究苏联问题的一个重要刊物。它是凭着两个基本条件创办的：第一是适应当时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一些头面人物的支持。当《俄罗斯研究》停刊以后，我和于右任、方觉慧（当时代理中央训练部部长）等谈到今后还需要有个专门研究俄国问题的刊物，我们很想创办这类刊物，希望得到党的支持，他们马上表示赞成，叫我们把创办计划提出来。不久，得到了中常会的批准，每月由中央党部拨给经费一千二百元，并指定由我和沈苑明负责主办。第二是许多留俄学生为了表明他们的反动立场，也需要这类刊物来继续披露他们的反动文章。既有了经费，又有了写稿的基本队伍，《苏俄评论》便顺利地诞生了。

《苏俄评论》出刊时，留俄同学会还未成立，我们为了把这个刊物作为团结留俄学生的中心，首先以研究苏联问题为名，成立了苏俄评论社，开始有会员五六十人，后来陆续增加，达到一百四五十人。初由我和沈苑明主持社务，后来，沈投入了CC，并因患肺病休养，实际是由我一人负责。我们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以刘汉清、王新衡、俞季虞、郭寿华、屠义方、傅胜兰、吕振洲等为编辑委员，其他社员都不过问社务，只是少数人写点稿子而已。所以社的组织实际上和俄事研究会一样，没有其他社务活动。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四月。由我负责刊行的《苏俄评论》共有三十七期。这时正是国民党内派别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斗争在留俄学

生中也有反映：有一部分人加入了 CC 或中統，他們另外办了一个名叫《中国与苏俄》的刊物，和《苏俄評論》唱对台戏，这帮人里面有些人仍挂名为苏俄評論社社員，实际和我們采取对立的态度；另外一部分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和沈苑明都屬於改組派，所以他們對我們也采取多方挑剔的不合作态度。原来編委会的七个人，除屠义方是改組派外，其余六个人都是新从招待所出来的，沒有派別关系。当时他們很想加入改組派，甚至向我公开提出参加改組派的要求。我們自己当时对改組派已感失望，劝他們不要参加，于是他們就和另一帮托派分子一道参加了复兴社。随后，他們还退出了編輯委员会，轉而向我們进攻，想把《苏俄評論》搶到复兴社手里去。我們在这两种人的夹攻之下，只好放弃《苏俄評論》，并取消苏俄評論社，該刊遂改由留俄学生同学会主办，实际为复兴社分子（包括一部分托派分子）所掌握。从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八卷五期起由周天儔（又名潜六，浙江宁波人，由大学生，托派分子，和胡宗南很好，抗战时期在胡部以高等顧問名义作胡之幕后謀士，并且为胡讲授国际問題）主編，以刘汉清、王新衡、傅胜兰、俞季虞、郭寿华、邓季雨、朱惠之等为編輯。从此，《苏俄評論》和《中国与苏俄》成了复兴社和 CC 两派的对台刊物。当时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打击周天儔等，把中央党部原来按月拨給《苏俄評論》的津貼全部停发（在我主持的后一阶段已核減了一半），只好另由复兴社方面拨給經費。这个刊物办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才停刊。在他們主持期間，大約又出了二十四五期。总計《苏俄評論》約共出了六十一二期。

4. 《中国与苏俄》月刊 自从陈果夫把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納入調查处的特务系統以后，他認為《苏俄評論》是改組派主編的，嫌它反苏反共不彻底。因此，除了核減《苏俄評論》的津貼，對我們施加压力外，还糾集了一班在 CC 领导下的留俄学生，創辦《中国与苏俄》

月刊，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創刊。全部經費由組織部撥給，據說比發給《蘇俄評論》的津貼多一倍以上。由西門宗華（浙江人，中大学生，共產黨叛徒）主編，以程大森、黃甘棠、鮑成美（都是當時招待所的留俄學生）為編輯。除了披露有關蘇聯的文章外，還刊登一些與蘇聯研究毫無關係的東西。例如在創刊號有《怎樣擔負中國的文化使命》、《國民復興之路》之類的文章，成為一種綜合性的反動政治刊物。大約出刊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而自動停刊了。

七、留俄同學會

留俄同學會是以蘇俄評論社社員為基礎，由南京和各地的留俄學生兩百多人發起，於一九三二年開始籌備，一九三三年正式成立的。在發起之初，對於入會的人純粹以十月革命以後的留俄學生為限。後來有些帝俄時代的留俄學生（如張西曼、吳成章、彭昭賢、耿濟之等）和在哈爾濱、中東路服務、到過俄國、懂得俄文的人（如張冲等）要求參加，因而把組織範圍擴大，不論帝俄時代或蘇維埃時期的留學生，甚至只要在俄國逗留過一個時期的人，都可以加入為會員。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留俄同學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大會，到會同學有一百七八十人，選出于右任、馮玉祥、邵力子為名譽理事，賀衷寒、鄧文儀、蕭贊育、劉詠堯、王懋功、王陸一、谷正綱、谷正鼎、張冲、彭昭賢、康澤、毛邦初、沈苑明、何漢文、羅方中、段詩園、王居江、王仲裕、卜道明、劉仲容、高新亞、魯崇義、張云伏、唐健飛、李毓九、高傳珠、于國楨、林柏生、陳春圃、梁干喬、王澄如等三十多人為理事。因為蔣介石到過蘇聯，為了壯大同學會的聲勢，推舉蔣為名譽會長，以賀衷寒為理事長，段詩園為總幹事。

在成立大会之前，为了理事长的人选问题，曾经发生过一番暗中的争夺。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留俄学生有四五十人，连同复兴社、军统分子，共計約有百人，他们自命为同学会的主力，亟欲得到理事长一席，以便控制这个组织；但是非黄埔军校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留俄学生人数也不少，他们想以改组派的谷正綱或比較超然的王陆一为理事长。经过协商，才决定以贺衷寒为理事长，而以改组派的段詩园为总干事。总干事是负实际责任的，所以以后同学会的一切活动，不完全受贺衷寒的指挥。这两部分人在反苏反共的政治立场上虽然是一致的；但表现的姿态并不完全一样。黄埔军校出身的一部分留俄学生采取了露骨的顽固态度；而以改组派为中心的一些留俄学生则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态度。由于存在这种差别，加上权力的争夺，双方经常发生磨擦。前面所说的对《苏俄评论》的争夺，是一个例证。在组织同学会分会和通讯处的问题上，由于双方在政治上运用这个工具的目的不同，意见也有分歧。贺衷寒等主张暂时只组织上海、武汉两处，我们则主张凡是有同学的地方（如广西、四川、西安、广东等处），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应组织起来。结果还是采取了后一个办法。自一九三三年以后，先后在各地成立的分会和通讯处計有：上海分会（张伏云、刘泮珠等负责）、武汉分会（楊子福、錢乃治、解中杰等负责）、西安分会（邹桂五、胡运泰、魯崇义等负责）、广西分会（王公度、韦永成等负责）、广州分会（黎樾廷、陈春圃等负责）、北平分会（馬驊、李紹鵬等负责）、四川分会（袁青梵、董貞煊等负责）、昆明通讯处（潘仲魯等负责）、长沙通讯处（魯岱等负责）、南昌通讯处（先由刘济民负责，后有变更）、新加坡通讯处（英以权等负责）。此外，杭州、贵阳、安庆、开封、天津、福州等地也都設有通讯处。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留学苏联的片断

李拔夫

一、初入苏联中山大学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和纪念中山先生，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收中国留学生。是年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公开选送留苏学生一百四十七名（由各机关学校选送具有国民党党籍的学生或参加过党政工作的青年应考），加上另一部分由国民党中央的高级人员保送的，如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就保送了二十名；攻鄂军总司令程潜保送了十名；其他如汪精卫、陈树人等也都保送了他们的子弟或亲属。合共有二百多名，分为两批出国，第一批的一百名都进了中山大学。我是第一批去苏的。程潜所保送的十名中有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萧赞育等四名是保送莫斯科伏龙芝大学（红军大学）学习军事的。因为进军事学校必须先学俄文，我们四人也随同大家先进中山大学。

由广州去苏联的学生，仅由国民党中央发给治装费每人一百元，其余旅费自备。交通费和到莫斯科后的膳宿费，概由苏联方面负担。这批学生大多是出身于军阀官僚家庭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很少。在出国前，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曾约集我们讲了一次话。鲍罗廷也参加了这次的集会，并作了长篇演说。此外，

毛主席（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另一个茶話式的欢送会（似是在广州酒店举行的）上，对我们恳切地讲了很多问题，大意是鼓励大家坚定革命意志；对于革命的基础应该怎样巩固和怎样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也作了重要指示。他还打了一个比喻說，革命事业犹如建筑房屋一样，如果墙基不够稳固，一經风雨，这个房子就会倒塌；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即是为革命打好基础。

由广州去苏联的第一批学生是一九二五年十月間放洋的，經上海赴海參威。到达海參威后，苏联派有专人接待，免費发給車票，乘西北利亚鉄路的火車，經過两星期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校址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是一座規模不小的旧式四层洋楼。学生宿舍分在另外两处。比我们先到达学校的已有国内其他各省市分批秘密来的两百多人，还有由德、法两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二三十人，其中有谷正綱、谷正鼎、李毓九、方耕之、傅倫等。

由于托派掌握了中大（校长拉狄克即是托派的理論家），所以开学不久，即有一部分学生成为托派分子。另一部分国民党的学生則坚持反苏反共的立場。也有一部分坚持革命的学生，其中包括回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而壮烈牺牲了的，就我所知，有陈居科、黃悌洪、左权等。

二、中大的党派斗争

我們进入中大后，初期的学习环境尚安静，革命的气氛也頗浓厚，大家都羨慕苏联的社会风习和人們的工作作风。当时，除了少数共青团員間常开会而外，还没有其他的党派活动。可是不到半年，共青团員固然增加了很多，而属于国民党的学生也开始蠢动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学校举行中山先生逝世紀念会的前后，孙文主义

学会分子康澤、邓文仪、谷正綱、谷正鼎、萧赞育、刘詠尧之流看到共青团的工作发展得很快，他们就暴露出在国内一贯反共的立场，向学校当局提出要在中大組織国民党支部的要求，目的是想利用組織对付組織来抵制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活动，从而开展他們的反动活动。虽然学校方面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他們并不就此甘心收場，仍到处拉攏同学搞反苏反共的活动，而我就是被他們拉攏的一个。他們倡言共产主义不适用于工业落后的中国，又說中国的无产阶级很少，根本不能领导革命，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就搞什么共产主义；因此，一些落后的同学都被他們蠱惑了，暗中极力反对共产党的理論。当主講中国革命問題的苏联教授瓦克斯批判三民主义是代表小資产階級利益，不可能彻底革命的时候，邓文仪、康澤、谷正鼎等就出来煽动同學們，說瓦克斯的論断是毀謗三民主义，号召大家向瓦克斯进行辯論，妄图从理論上反对馬克思主义。一部分国民党分子三五成群地議論紛紛，造成同學們思想上的紛乱。我也是抱着狹义的民族思想，极端拥护三民主义的一人，曾經对同学张远猷、胡銘助几个人說：“苏联共产党的紅旗能插遍天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又何尝不可以插遍天下呢？”过了几天，康澤就找我說：“你在国内加入过孙文主义学会，現在应和我們一道为拥护三民主义而斗争。”这时，国内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日益发展，我錯誤地以为这是国民党的胜利和蔣介石的胜利，认为今后只有投靠蔣介石才有出路，因而同意了康澤之流的搞法，成为这个反动集团的一分子。一九二六年秋，我离开了中大，轉到基輔軍校去了。此后，对于中大方面的情况就很少知道了。

三、繼入基輔軍事學校

苏联十月革命后，各方面都实行軍事化，各机关团体的主要职

务差不多都是由当过紅軍的人充任。人們戴上紅軍的軍帽，就显得身价十倍。至于正規的紅軍更是无比光荣的。但是当日的紅軍，大部分是由参加武装起义的劳动群众所組成的，虽然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但多数沒有經過应有的軍事訓練，有的甚至文化水平也很低。苏联的党和政府为了提高紅軍的质量，开办了各种軍事学校。

莫斯科伏龙芝大学是苏联的最高軍事学府。曾在紅軍充任过团級以上的軍官，才有資格进入該校。一九二五年，該校为中国留苏学生設置了四个名額。因此，程潜就保送了我們四个人进这个学校。可是，等到一九二六年秋，我們四人要求轉进这个学校时，蔣介石又派来了賀衷寒、杜从戎、周明、王懋功等四人，也是要进伏龙芝大学的。由于他們四人的官阶都是团級以上，比我們四人的官阶高，所以把我們拉下来了。陈启科、左权、萧赞育三人自愿繼續在中大学习，而我却以早穿着上紅軍服装为荣，因而一再向苏联軍事委员会要求学习軍事，經批准我进入基輔軍官学校。

基輔軍官学校本名是混成軍官学校，設在基輔，我們平常就称之为基輔軍校。它的學員是由紅軍各兵种部队中抽調来的軍官（从排級到团級），带职就学。全校的編制相当于一个步兵团，分步、騎、炮、工、輜五个兵科，共有學員三千多人，按原有級別发給工資。例如，我是上尉級，每月領得工資八十个卢布，服装武器概由学校供給，給养則从工資中扣除，每月大約十二个卢布。

教育方面，以学科为主，采用四大教程；术科方面則在每年春秋两季作野营演习。演习时，优待中国学生，几乎每人每次都是发給子弹百发，以加强射击練習。步、騎、輜重三科是两年毕业，炮、工两科三年毕业。

在我进入基輔軍校以前，中国留苏学生进基輔軍校的逐步增加到四十名左右。这批学生絕大部分是由西北軍首領于右任、馮玉祥

所保送的。学校专为中国学生設个东方班，班主任叫高金，专負对中国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責任。东方班照样分为五个兵科，全班学生分別編入各兵科的連队。例如我們学步兵的就編入步兵科第一营第一連，和苏联学生一道起居生活，仅在学科方面，因为要用翻譯，另有东方班的各兵科的教室，与連队分开上課；在春秋两季的野营演习时，仍和連队一起行动。

东方班各科的学生，就我記憶所及的，列表如下：

步兵科：

任子勳 吳宝賢 王中岳 叶茂极 任增祿 王智燾 李拔夫
党秉文 盖智鴻 易子奇 王复初 田德修

騎兵科：

祁光远 馬宗显 薛子超 张成功 郑子俊 李西庚 王維績
白云洲

炮兵科：

郝鵬举 张子英 雷 放 阮英鏞 卢匿才 楊念熙 刘正泰
张秉鈞 张培哲 任南園 邹桂五 馮 恂 焦績华 李 特

工兵科：

李 泉 王公亮 胡运泰 师习德

以上共三十七名，尚有几名已記憶不起了。这三十七人之中，属于馮玉祥系統的有郝鵬举、叶茂极、盖智鴻、祁光远、馬宗显、卢匿才、楊念熙、刘正泰（即刘效齐）、张秉鈞、张成功、邹桂五、馮恂、王智燾、李泉、王公亮、王中岳、田德修、吳宝賢、胡运泰等，他們多系河南人（其中王公亮、王中岳二人系黃埔軍校第一期毕业生派在馮部服务的），属于于右任系統的有任子勳、任增祿、党秉文、易子奇、王复初、薛子超、郑子俊、李西庚、张子英、王維績、雷放、阮英鏞、任南園、师习德、馮恂等多系陝西人；另有少

数的人如焦積华、李特、李拔夫是由其他单位派来的。于、馮两人所保送的学生多系中等学校出身，在国内曾受过短期的軍事訓練。这两部分学生由于背景的不同，各有他們的传统作风，思想上也不一致。属于于右任方面的，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多少有些認識；属于馮玉祥方面的，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就非常隔膜。因此，他們虽然成为同学，但在学習期間，始終沒有消除一定的界限。

基輔軍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姓名已記不清楚）都是苏共中央的要人，也是托洛斯基的帮手。东方班主任高金，据說曾充任过加米涅夫的秘书，对中国問題頗有研究，能說几句中国話。他为了具体地帮助中国学生解决思想問題，允許学生在班內建立中国国民党的組織——国民党支部。当时，东方班学生中具有国民党党籍的人很少；支部的成立，也未經呈报国民党中央批准。支部成立后，起初是由卢璽才（共產黨員）、王公亮、雷放等几个人主持，活动很少；后来，李特（共產黨員，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抑系来自其他学校，現已記憶不清了）来了，参加了支部的工作，支部就活跃起来了，除經常召开小組討論会外，还設立了列宁室，举办了墙报，并且发行了油印的小刊物，刊載国内外报纸的一些社論以及譯述列宁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名言，报导学校生活的动态等等，目的无非是启发同學們的革命思想。同學們都热烈地参加了这些活动，在課余散步的时候，还互相談論革命問題，每每有所爭論，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也是孜孜不倦。那时，东方班的革命气氛是比較浓厚的。后来，郝鵬举、易子奇等基于他們的反动階級本质和个人目的，在支部中拉攏同学，搞小团体，作为回国后的政治資本；并在同学中大肆进行挑拨离間，說什么支部的成立不合法，支部执委的产生是指定的，不合党章，不民主等等。他們还企图改組支部，从而窃夺支部的領導。一九二六年秋，当我由莫斯科中山大学轉来基輔軍校时，同學們臥

为我是由广东方面来的，对国民党的情况和工作，必定熟悉得多，都来找我談論有关国民党工作的問題。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来拉攏他們，并且企图与中大方面的賀衷寒、康澤、谷正鼎等通声气，替自己搞点回国后的政治資本。我先和易子奇（湖南人，平日和我很接近）商談，对他說了一些共产党如何把三民主义批判得一錢不值，指摘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并且企图利用三大政策来操纵国民組織之类的誣蔑的話，来煽动他。这些話很快就传到了雷放、郝鵬举、阮英鑄等人的耳里。他們和我正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于是彼此之間来往很密，并且經常互相散播一些反动言論。尽管我們置身苏联，亲眼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成就和苏共党员忠于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艰苦踏实的工作作风，但是由于我們的反动立場根深蒂固，表面上借口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坚持反苏反共。我們特別醉心于搞小組織，希望回国以后，在反动政权下，可以飞黃騰达。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学校的国民党支部召开大会，我和易子奇、雷放、阮英鑄、郝鵬举等在会上提出支部組織不合法的問題来反对支部負責人，特别是反对李特和卢匿才。当时，多数同学对国民党的組織法，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本质不甚明了，因而有不少的人附和了我們的提議，认为应当把支部改組一下，最后，有几位同学（大約是张成功、师习德等）說：“今日的会并非为改組支部召开的，以后另行开会討論吧。”結果，改組支部的提議沒有通过，只是对李特、卢匿才两人攻击一通了事。这时，苏联的反对派（托派）鬧得很凶。他們还很有地位，如托洛斯基还是紅軍的总司令，加米涅夫还是苏共的中央委員，并且是基輔軍校的命名人。他們对中国革命問題，在理論上也有所爭論，引起了同學們思想上的动盪。多数同学当时认为只有赶快把学习搞好才是要着，从而把国民党的支

部工作放松了，例如墙报就因为沒有来稿而停止了。党派的紛爭，表面上是緩和了，但骨子里則已形成了兩派：一派是国民党或同情国民党的；一派是共产党或同情共产党的，彼此之間鴻沟很深，已不可能合作了。

一九二七年春，基輔軍区举行大檢閱，苏联軍事委员会委員長伏罗希洛夫来到基輔校閱紅軍，基輔軍校全体学生参加了校閱，东方班也在連队中参加受槍。这时，国内形势已經大变，蔣介石背叛了革命，鮑罗廷已回到苏联，西北軍如于右任、馮玉祥等也都随着蔣介石实行反苏反共。因此，苏联同学对待中国同学的态度突然改变了。他們不时用譏笑乃至侮辱的神气对着中国同学怪声叫喊：“蔣介石！”使得中国学生惶惶不安。檢閱后几天，伏罗希洛夫忽然召見中国学生郝鵬举、雷放、易子奇、阮英鑄等七八个人談話，更引起了一部分同学議論紛紛。有的說：“他們几个人，本来思想不对头，平时跳皮搗蛋，經常有不滿苏联的表現，特別是搞国民党的活动，当然为苏联所不能容許，所以被召見，还不是要挨一頓臭罵！”說这种話的多半是馮系的同學以及平时与李特来往較亲密的人。后来我問郝鵬举、雷放，伏罗希洛夫對他們究竟說了些什么，郝、雷都說沒有談什么問題，只是看看他們，囑咐他們好好学习；當他們走出办公室时，伏罗希洛夫发现他們几个人所穿的馬靴不甚干淨，笑着說：“馬靴要刷亮些。”其实，这几个被召見的人不仅在东方班搞国民党和小团体，而且还在校外搞了一些反动活动。例如易子奇原是背紅幫分子，他在基輔的中国工人中間来往很密。这些中国工人大多数是参加过十月革命时的紅軍的。这时，苏联的新經濟政策才开始施行，人民的生活还比較困难。易子奇就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煽动中国工人，使之对苏共不滿。因此，易子奇首先就被遣送回国了。他回国后，即在軍統特务头子戴笠手下搞特务工作。

郝鵬舉也是突出的反动分子。他和翻譯員畢耀庭搞得火熱。畢耀庭的愛人是個蘇聯婦女，並且是共產黨員，她和郝鵬舉來往也很親密。後來，這位蘇聯婦女因此被認為有與白黨分子（指郝）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嫌疑，幾乎被開除黨籍。（郝在抗日戰爭時期，當過偽軍軍官；在解放戰爭時，一度投降解放軍，旋即叛變，並將解放軍派在他的部隊里的代表朱克清送給蔣介石殺害了；不久，他又被解放軍俘虜而鎮壓了。）根據上述情況，當時我認為易子奇、郝鵬舉等的被召見很可能是受了伏羅希洛夫的一番警告，他們企圖隱瞞真相，所以對我胡扯一通。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公開反蘇反共以後，我們在蘇聯的學習已快要結業了。這時，思想比較進步的同學準備再度升學，另一部分同學則覺得國內局勢已變，不僅蔣介石背叛了革命，連于右任、馮玉祥也都有了反蘇反共的表現，這正符合自己的願望，認為正好趁此機會回國，可以大顯身手，升官發財。郝鵬舉、任增祿、阮英鑄等就曾經對我說：“繼續留在蘇聯，沒有什麼搞頭了，回國去，還可以大搞一下哩！”當時，我也同意了他們的看法。十月間，學校當局對中國學生舉行了結業式，還照了一個集體相。教員中也有邀集同學們照相作為離校紀念的。隨後，東方班全體學生由基輔到莫斯科停留了幾天。我和任增祿、郝鵬舉、阮英鑄、雷放、張子英、鄭子俊、王中岳、李西庚、黨秉文、薛子超、王維績等十餘人首先接到遣送回國的通知和車票。其餘的人仍留在莫斯科，另候處理。當我們將要離開莫斯科時，聽說留在莫斯科的同學已經蘇聯當局決定分別送入各高級軍事學校和中山大學。其時，中國又派來了大批的革命青年，其中從武漢方面來的更多。據說這些青年多為工農幹部，都是蔣介石所要逮捕的。中山大學把這批青年用軍事編組，進行訓練，為中國今後從事武裝革命準備幹部。因此，留在莫斯科的

基輔軍校學生中有些人便被分配到中大去擔任分隊長，如楊念熙、張培哲、蓋智鴻、鄧桂五、胡運泰等都是。

我們被遣送回國的十餘人於十月中旬，由莫斯科乘西北利亞鐵路的火車到達海參威，候船回國。在候船期間，有伏龍芝大學的中國學生賀衷寒、杜從戎、王懋功、周明四人，航空學校的中國學生毛邦初、石友信及航空機械學校的中國學生王某等兩三人先後來到海參威。從航空學校和伏龍芝大學來的都是未畢業的。這些人聚會在一處，互相談到回國的原因，都認為由於國內形勢變化，蘇聯當然不能再容許我們這些思想上一直反蘇反共的人繼續在蘇留學；我們獲得早日回國也是幸事。此外還談論蘇聯十月革命後已有七八年之久了，而社會上還有乞丐以及搶麵包的兒童和娼妓盜竊之類；特別是當我們參加野營演習時，在农村見到的農民生活還相當苦，他們吃的是黑麵包，甚至不得一飽，大家便根據這些片面現象，對蘇聯的革命和蘇共的政策進行誣蔑。正由於我們的反動立場根深蒂固，所以只看到也只談論蘇聯的局部和暫時的困難，挑剔勝利前進中的問題，看不到其在短暫時間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美好的遠景，甚至有意識地加以抹煞。

我們在海參威候船，滿以為將由海道到上海；可是蘇聯方面派人通知我們準備乘火車經東三省回國。那時，東三省還在張作霖的統治下，張不僅反蘇反共，並且是反對國民黨的。大家不肯冒險經東三省回國；在海參威停留了一個多月，錢都花光了，有的還變賣了衣物。由海道走既不可得，經東三省勢必遇到危險，大家感到迷途維谷，因而苦悶異常。當時海參威的中國領事館是張作霖的人，當然不能去找他們，於是想到找日本領事館這條路。當由毛邦初、賀衷寒等幾個人向日本領事館交涉，結果很圓滿，日本領事答應我們坐日本船先到長崎，再轉回中國。那時，日蘇矛盾很大，日本方

面已不得有这样一些事件出現，正好乘机挑起中苏人民之間的惡感。正当我們向日本領事交涉的时候，大約已为苏联方面所知道了，随即有苏联人員來通知我們，并送来由海参威到上海的船票，讓我們經海道回国。这时，同學們一方面为获得安全回国而衷心喜悅；另一方面从一貫反苏的立場出发，認為要有力气才好对付苏联，否則只有任其宰割。

大約是十一月初，我們回到上海。当輪船將抵上海尚未进口时，就有密查人員來到船上監視我們这批由苏联回国的学生，不准我們上岸。經由王懋功、賀衷寒与之交涉，才允許他們兩人先上岸，向上海市党部接洽，并用電話請示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得了維汾等的准許，我們才全体上岸。旋即由上海市党部派員招待我們分住在旅館里。次日，市党部又派來一位名叫李世华的，向我們表示欢迎，并說我們可以全体都往南京，南京方面急須人用一类鼓励我們的話。这时，蔣介石已下野，宁汉正將分裂，同學們对国内形势不很明了，都認為以先回到原来所屬机关为宜。除賀衷寒、王懋功、毛邦初等去南京外，其他的人多回到原来所屬的部队中去了。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回到汉口第六軍。刘詠尧、蕭贊育、陈道守、赵可夫、张民权、李达农、楊振西、楊振藻、何瑞祺等由莫斯科中大回来的十多个人已經先在那里。他們正在第六軍搞反苏反共工作，我也隨他們走上了共同的道路。

賀衷寒、王懋功等和先前由莫斯科中大送回的邓文仪等，适应蔣介石加强反苏反共的需要，吸收先后回国的留苏同学，組織了留俄同学会。所有由基輔軍校先后回国的同学都陸續加入了該会。由于有了这个組織，更便于同學們麤集在蔣介石的反苏反共的旗帜之下。就基輔軍校的同学說，有些人还猎得了較高的反动地位，如党秉文在新疆当过保安副司令，刘正泰在伪国防部第二厅当过科长

(对苏情报科),任子勤在陆军大学搞了几年之后当上了师长,我也曾由蒋介石派充驻苏大使馆的副武官。只有李泉、李特、卢匿才、师习德几位已否回国,何时回国,以及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就是我们几个经常见面的基辅军校同学都无从探知。

以上是我留苏学习的片断回忆,由于事隔多年,难于记忆,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现在在各方面的同学给予补充和指正。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卜介侯 任伊平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左右，我赶往省府秘书处译电室接晚班，纔进旧督署卫門，驟聞一声槍响，因无續声，疑系卫兵走火。我經過軍事厅，沒有碰見一个人。穿过內卫門，进入译电室，刚落座，續聞稀疏槍声。这时听得二楼主席办公室一陣脚步声和搬移椅凳的响声，（当时系唐生智兼湖南省主席，他常驻武汉，由张翼鵬代理）我跑上二楼，首先碰到軍事厅上校參謀李承恩，探問槍声何来。李答不知。这时續有槍声，似非来自一方。我走到主席室，見张翼鵬和他的家小都坐在房里，我感到诧异。因为张的姨太太是常来常見的，这一群孙男女却从没来过，今天来得这么齐全，一定不是偶然的。我便冒冒失失地向张說：“外面响槍，不知是什么原因。”张說：“我沒有得到报告。”我說：“請代主席問問卫戍司令部，看有什么情况。”张即按鈴叫卫弁接电话。我又說：刚来上班时，从头門到內卫，只見卫兵四人，府側营房里也是靜悄悄的，像沒有人一样，代主席可不可以叫周司令（名荣光，当时的长沙卫戍司令）派兵保卫省府，以防万一。张頷首。他与周通話后，笑着对我說：“周司令馬上会派槍兵来。”这时不仅四处有步槍声，而且听到来自小吳門外这一方向的机槍声（当时許克祥团駐小吳門外原湖南講武堂旧

址)。张带着家人下楼，随身只有卫弁四、五人，都揸槍实弹。此外还有李承恩、秘书程某和我三人随同下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突然事变，张的态度却是那么鎮靜，看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卫弁散在天桥那边監視（省府与民、財、教三厅只隔着又一村一条馬路，原搭有天桥沟通）。旋报又一村馬路有队伍通过，均佩白袖章；里面的人就将白布門簾撕成条条，系在手臂上。我想：从这个臂章所显示的意义，今晚事变的性质，也就不言可喻了。外面槍声时断时續，时远时近，扰攘通宵，至次日黎明始告靜寂。許克祥部原駐有一个連在省府担任守卫，天大亮了，才由外面开回，在省府右側大坪集合，因退膛走火，响了一槍。这說明这个連是参加了昨晚的叛乱活动的。旋見建設厅长邓寿荃改着旧蓝布长衫、帶便帽，匆匆走进省府（省府办公大楼右后側有一便門通建厅），見我便問：“代主席在那里？”我答：“在楼上休息。”他就急忙跑上楼去。不久，教育厅长董維鍵也坐在主席室。这时，我听說长、汉电报受阻，便向电局查詢。据答：綫路无阻，是許团长（克祥）派李团副（华龄）带来槍兵把守报房。李华龄当即接住話筒問我：“电报拍往何处？”我答：“汉口。”他随追問电报內容，我說：“是代主席发給主席的，內容不能告訴你。”我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张翼鵬，张仅点头表示知道了。此时秘书长謝晓钟也到处里来了，他对我說：“我請了一位秘书（指龔飲冰），不叫他到这里上班，专门負責联络工作。昨晚的事，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二十三日上午，张翼鵬曾召开一次紧急會議，参加的都是駐长軍官，會議地点在办公厅前面大花厅，四周警戒严密。会后，张示意邓、董两厅长离开长沙（当时藏身在主席办公室后楼），并亲赴电局与汉方直接通話，报告事变經過和會議情况。傳說在事变中，叛軍目标在于消灭工人糾察队，曾围攻省总工会，（当时省总工会設現东茅街現在的省人民医院附近）搗毀省农会；也有槍兵搜查邓寿荃、

黃維鍵寓所。叛軍張貼布告，聲討“暴徒”，由五團長（許克祥、周榮光、王東原、李殿臣、張敬兮）署名。同時外縣駐軍亦有几起通電聲討“暴徒”。我們當時譯出此類電報，覺得這樣異口同聲稱“暴徒”，竟像事先有過商量似的。

介紹

二

“馬日事變”後幾天，國民黨湖南省救黨臨時辦公處在曾公祠召開過一次各界聯席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且印象頗深。現將參加會議的經過和在會上所見所聞寫述如下：

“馬日事變”時，我在湘中汽車路局任課員兼路局特別黨部第一區黨部常務委員（路局和特別黨部原都設在戲子橋）。事變後兩三天，特別黨部接到國民黨湖南省救黨臨時辦公處的通知，在曾公祠召開各界聯席會議，須派代表二人參加。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夏綸（字煥球，武岡人，未公開的共產黨員）要我和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李士元（字樹藩，湘潭人）代表出席，了解會議情況，回來匯報。我不便推辭，屆時與李一同赴會。

我們進入會場時，只見軍警林立，門禁森嚴，對到會的人都要經過仔細檢查，方准入場。我們感到心煩，但也只好硬著頭皮進去。

會場里坐著數百人。張翼鵬、許克祥、周榮光、李殿臣、王東原、張敬兮、陳其祥、彭國鈞等都在座。開會時，首由許克祥報告“馬日事變”經過；繼由彭國鈞等講話；所講的不外是一套反共的陳腔濫調。當彭講到“有敵無我，有我無敵”兩句時，咬牙切齒，表現出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有的說，“共產黨鑽入了國民黨的肚子裡，把國民黨的血液慢慢吸盡，留下一個空壳，然後取而代之；要救黨就必須反共，不反共便不能救黨。”有的對五團長“救黨、救國、救民”的“功勞”大加歌頌；有的則号召大家檢舉潛伏的共產

黨員。因為到會的大都是地主豪紳的代表，當每個人講話完畢時，照例有很多的人鼓掌。

會議大約開了三個鐘頭。在主席台上的人提議之下，決定成立“湖南省救黨委員會”，以舉手方式通過許克祥、彭國鈞、仇鰲等十多個人為“救黨委員會”委員。這時，本來可以宣布散會了，忽然許克祥出來作緊急報告，說武漢政府已派譚平山、彭澤湘、陳公博等偕同鮑羅廷顧問專車來長徹查這次事變，我們應速謀對付辦法；建議由張代主席急電岳陽駐軍師長周磐，候專車經過岳陽，即將他們扣留，就地槍決。大家舉手贊成。許隨即將預先擬好的致周磐的電稿向大會宣讀；並說：“電報立即派人拍發，在未發出以前，所有在場的人，一律不准離席外出。”此時門禁更嚴，我們只好坐着等待。約莫等了一個多鐘頭，發電報的人回來了，才宣布散會。

當我聽到許克祥宣布上述消息和發出給岳陽駐軍的電報後，內心非常焦急。因為武漢政府派來的代表中的彭澤湘（時任第八軍黨代表與政治部主任），是我的同鄉和中學同學，今當他處於危難之際，我竟不能通個消息，使他得以脫險，若竟因此犧牲，我心何安。接連幾天，忧心忡忡。直到岳陽來人，說他們一行已安返武漢，我才放心。因此，我對那次會議，印象甚深，至今難忘。

下面，我再補充談一點“馬日事變”發生時的情況：

事變那晚，我睡在路局樓上。約近半夜，槍聲突起，把我從夢中惊醒。我披衣起床，只見职工們都起來了，他們把大門鎖上，並用長凳撐緊，以防意外。我們聽到緊密的槍聲，來自近處，揣測這是反動軍隊進攻曾公祠省農會的農民自衛軍。槍聲響了几个鐘頭。忽又聽到路局左側通往衡清試館的小巷內一陣急驟的跑步聲，有如潮水一般。二十分鐘之後，腳步聲消失了，槍聲亦漸稀疏。我們通宵胆戰心驚。天亮以後，開門出去探聽情況，始知晚間巷內的跑步

声，是农民自卫军經此向城外退却。走到曾公祠，只見屍体縱橫，慘不忍睹。

过了几天，聞一友人說，事变那晚戒严的通行口令是“土豪劣紳”。我問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說，是一个劣紳告訴他的；这个人当时被关在司禁湾（現在的成仁街）監獄里，那里关的尽是土豪劣紳反革命分子，那晚反动军队打开監獄，將他們放出来，并囑咐他們，今晚全城戒严，如果遇到軍警喊口令“土豪”，你們就答“劣紳”，方可通过。反动派用“土豪劣紳”作口令，倒也滿有意思。

任伊平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二)

童紫劍 欧阳泗 陈慈濤 郑汉香

一九二七年五月澧浦反革命大屠杀始末

澧浦县僻处湘西，北伐前，长期为軍閥土匪所盘据，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澧浦駐軍原为袁祖銘部，县境四周为陈汉章部；一九二六年袁祖銘被杀，陈部即占据城乡。陈原系怀化土匪，初受賀耀組收編为保安营，后来又扩編为湖南省防軍之警备旅。陈部盘据澧浦期間，与地主豪紳勾結一气，派款征税，迫种鸦片，奸淫擄掠，残民以逞，弄得全县昏天黑地，民怨沸騰。至一九二六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澧浦也同全省其他各县一样，兴起了巨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反动势力惴惴不安，时图反攻。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澧浦县党部正式成立，各界群众在县城举行近四万人的庆祝大会。当时澧浦大恶霸陈壬齡（軍閥陈遐齡之弟）任团防总局长，阴谋調集各区团队，乘机发动反革命暴乱，杀害共产党员，摧毁县党部和其他革命机关。不意其阴谋败露，革命领导机关为了先发制人，将陈逮捕，召开群众大会予以镇压，与会群众欢声震天。至此，澧浦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进入高潮，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更为剧烈了。

自陈壬齡被镇压后，隐藏在县城里的反革命分子陈清川等便暗中結合起来，四出散播謠言，阴谋制造事件。五月初，城乡盛传将

于某日攻打县党部的謠言；有些县党部委員、共產黨員还接到匿名警告；接着又发生了反革命分子纵火烧燬县党部头門的事件；街头还发现一种暗含“打倒黨員”四字的无名揭貼。这时，人們特別注意的是陈汉章的态度。陈在群众革命运动兴起后，他的为非作恶暂时被迫收斂，表面上还装做支持革命运动的样子。当时群众斗争的主要锋芒是指向以陈玉龄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对陈汉章采取尽可能使他中立的策略。当革命群众利用他同陈玉龄之間的矛盾鎮压了陈玉龄之后，他对革命的恐惧和仇恨加深了，对当时县里发生的反革命暗流，他实际上是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五月中旬，县党部多数同志已去长沙参加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留县党委也知道陈汉章与革命力量之間的关系是紧张的，但估計他既已受編为湖南省政府軍事厅直轄的警备旅，总得服从唐生智的指揮，暂时还不致翻脸投到反革命一边去；只要对他的部队作些工作，可能使紧张关系緩和下来；大家都沒有料到反革命集团正利用了在长沙召开各县、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时机，来发动一次全省范围的反革命叛变。

长沙“馬日事变”发生时，溆浦的共產黨員全无所聞。“馬变”后第二日，党組織接到共产党省委来电，大意謂：对現在的局势不要乐观，但亦不要过于悲观。經會議研究，为了緩和革命力量同駐軍之間的紧张关系，便于繼續开展工作，决定进行一次慰劳駐軍的活动。这时，陈汉章本人正在乡下視察他的部队，他忽于五月二十三日回到县城（显然他是奉到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鵬的密令回城的）。县党部遂决定于五月二十四日邀集各界联合举行慰劳陈部的大会。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溆浦县各机关、团体代表和一部分学生約百余人，由党务特派員、共產黨員刘积成率領，扛着酒肉，列队燃

炮，繞街游行一周，最后来到考棚陈汉章的司令部，举行慰問联欢。代表們滿以为这是搞好軍民关系的一个盛会，不料一場包藏禍心的反革命大屠杀竟在此时演出。

当慰劳队跨进陈匪司令部时，大家即感到情况有异：司令部头門守的是双卫，各門都設有哨兵，戒备森严；当鞭炮燃放得正烈时，陈部匪兵忽然上前踩熄，不准燃放，并将抬着待放的一条龙长炮竹摺在地下；入內代表都被置于武装監視下，不許自由行动，并只准进、不准出；招待室內的桌子四方，各摆着一个茶杯和几顆糖果，儼如供品，不像招待茶点。大家还没有就坐，陈匪的參謀长欧阳某即邀各代表至司令部內走廊两旁排列开会，并請刘积成讲话。这时，刘积成已感到凶多吉少，但还想凭三寸舌与陈匪周旋。他刚讲了儿句开場白，陈匪即大声咆哮：“我軍过去沒得飯吃，你們都不聞不問，現在要你們慰劳什么？”随即喝令匪兵将到会者一律捆绑。商民协会执委王彦章（徽吉祥少老板，为一青年有为之士）当即抽出手槍对陈射击，不料仓卒之間，弹未上膛，沒有打响。这时情况混乱，陈部匪兵与慰劳队展开了肉搏混战。陈率匪兵退出大門后，即令匪兵用机关槍把住門口向內扫射。未进司令部的学生即狂奔逃命。周围槍声四起。十几分钟后，几十位烈士的尸体已横臥于血泊中。陈匪于打扫屠場后，将全部尸体拖置水碼頭河边，未气絕者补槍。有的尸体浸在水里，有的露在岸上，一时，鮮血染紅了半边江水。日未及午，全城已关門閉戶，頓成死市。

此次惨遭屠杀有姓名可指認者，有党务特派員刘积成、县党部委員向五九、教育局督学向望湘（局长因公出差，由向代理）、农协委員胡子純、商会委員王修兰、王彦章、总工会委員黃龙光、张吉星、县立模范小学校长韓承琳、城区小学校长龔怡棠、学联会委員张德先、高小教員周崇山、吳熙堂、吳麻子（忘其名）等，連同未查明

姓名者共三十余人。县党部干事樊国元，匿卧群尸中，在匪兵清扫屠场前挣扎逃出，得庆生还。

陈汉章和陈清川复于翌日派兵往各区进行捕杀。被害而有姓名可查者计有：大江口小学校长肖明耀、教员阳德元、刘子廷、向子楚四人，桥江商会执委王天成，龙潭党员吴盛世、唐思炳，底庄党员傅仪之等数人。

五月二十四日大屠杀后，县里的革命领导机关虽受到了严重摧残，但各区的农民协会尚未即遭毒手。部分散处在乡村的革命同志愤于反革命的残酷屠杀，决定组织武装反攻。不久就爆发了舒容溪的农民武装暴动，杀死了土劣龙明汉。陈汉章得信，率领全县团防队前往均坪、曹家溪一带“围剿”，数十名农民惨遭杀害。曹振华逃亡贵州，不久也被反革命当局捕获，解回溆浦杀害。

从此以后，溆浦人民陷于反革命白色恐怖中，革命人士除被捕杀外，相率逃亡外地，革命力量就不绝如缕了。今日回忆往事，犹有余痛。

董紫剑

“马变”后反动派在汝城的疯狂屠杀

“马日事变”后，湖南反革命气焰高涨，反革命政权又在各县先后复辟，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当时汝城县中共组织面临这种严重情况，便积极扩充工农武装，并以范大澈、朱书诚、欧阳焜、叶愈藩等为委员，组织县公安委员会，与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坚持达三月之久。

六月间，以高静山、黄文灿为首的宜章县农民自卫军百余人，

由吳振民、李軍杰、李芳歧等率領的广东惠潮梅农民自卫軍二百余人，以及郴县、資兴等地的革命干部陸續来到汝城。中共湖南省委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派武文元（当时省工人糾察队总队长）、陈东日、王桂生等攜夏曦亲笔函来汝城組織和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使当时汝城县的农民运动仍搞得热火朝天。逃亡在粤北乐昌、仁化等地聚众为匪的汝城大恶霸地主何其朗（号介青）、邓邦彦（号虞弼）等曾以武装进袭或阴谋瓦解等手段，企图摧毁、顛复汝城革命政权，均遭到有力的打击。

何其朗等計不得逞，乃进一步勾結云南軍閥范石生来汝鎮压革命运动。当时范石生正攻滇失利回粵，被蔣介石收編为第十六軍，駐曲江、乐昌、仁化等地整补，正想收編湘粵边境土匪和收繳地方武器，扩充实力。經何其朗等勾結，自然一拍即合。他們于八月十五日夜間，以数倍优势兵力，由城口出发，經高排、大坪向汝城进攻。汝城农軍初犹以为是何其朗匪部，决計予以歼灭。由于判断錯誤，苦战数小时，农軍伤亡甚重，吳振民、李軍杰、朱青勛等领导人都壮烈牺牲。余部分途撤退到濠头圩集結后，即进入湘、贛边区打游击，繼續坚持斗争。

革命武装撤离汝城后，全县人民即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范石生部不久即撤回粵北，何其朗、邓邦彦等乃粉墨登場，邓自任县长，何自称司令官。他們組織清乡委员会和剿共义勇队，对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們規定，凡是参加了大革命的人，不論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员或进步人士，一律格杀勿論。何更与自称司令的汝城匪首胡凤璋勾結，有所謂“胡、何两司令联合起来，共同剿共，保卫汝城”的口号。

何、邓等反革命复辟后，主要就是派兵下乡进行所謂“清剿”。他們实行“五光”政策，即：对于曾参加过革命或有嫌疑的人一律

杀光（他們說：“宁可錯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对于革命者家中的財物一律搶光，笨重傢具等物一律燒光，猪牛鸡鴨一律吃光，房屋一律拆光（拆磚瓦筑碉堡）。何其朗勾結桂东何鑑匪部千余人到濠头圩清乡数十天之久，进行残酷的烧杀劫掠，使当地廬舍为墟，田园荒蕪。那次他們杀害了留守濠头圩的革命人士朱国治、朱芳华、曾瑞生、邓品古、李万成、张錦成、刘世雄、曾佑奴、张前林、宋和德等十人。他們惨无人道地将这十个人用棉絮浸火油捆扎，倒吊在树干上活活烧死。他們抓不到本人时，則罪及妻孥和父母兄弟，如欧阳焜的父亲和妻子，范大澈、范修之、李紀嵐、何大修等数十人的父母，都被关押数年之久，受尽牢獄折磨；欧阳焜的妻子有孕，也不准保外生育。

在反动派血腥鎮压下，死难者数不胜数，除上述者外，我还能記得姓名的有：大革命时一区党部常委欧阳杰，区农民协会委員刘登鵬，省党部派駐汝城的农运特派員宋清賢，县农民协会副委員长胡书田、組織委員宋孝庠，仲裁委員朱庭芳，县商民协会委員胡伟章以及基层干部卢正心、何举文、朱国荣、欧阳江、欧毛奴、何保之、张佑喜、张石林、周楚章、胡美章、胡照奎、何会良、何大用、何廷洪、陈柏林、罗日日、朱性征、刘昆元等。当时比較进步而同情革命的人士都在惨杀之列。如西垣村何贊汝先生，任云头学校校长，也被加以在学校欢迎了革命人士的“罪名”而槍杀了。反动派不特要杀光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而且連这些人的后一代也想杀絕，所謂“斬草除根”。如何其朗手下的劊子手大恶霸朱少达到橫逕村抄劫范森泰家时，除將一切財物搶光外，并将范森泰一个未滿周岁的小孩，从其母亲哺乳中强夺过去，举起两脚，向石墩上一摔，活活摔死了。

何其朗等以及他們的爪牙，对于他們所痛恨的人及其家屬，常

施用各种毒刑，如坐快活椅、灌辣椒湯、香火薰、冷水灌、踩鋼絲、上撐杆等，无所不用其极。如朱庭芳被捕后，不向反动派屈膝求生，受尽各种严刑，手足折断，体无完肤，最后被用籊筐抬往刑場槍杀示众。何大修的父親也是受尽各种毒刑变成残废而后死去的。另外，他們还使用一种灭絕人性的“鋼絲穿奶”毒刑以残害女性。如朱春荣（女）被捕后，坚貞不屈，受尽侮辱和各种酷刑，最后用鋼絲穿其两乳，再行槍杀，暴尸示众。这只是无数受尽严刑迫害的一二例子而已。

反动派除燒杀搶劫之外，还对革命人士的家屬进行勒索。記得宋訓玉家被搶光之外，还罰款二千五百元，将房地產拍賣抵罰，全家流落在外，无家可归。欧阳鼎臣家被罰六百元。欧阳焜家貧，則拍賣住房三間得款三百元抵罰。总之，他們敲骨吸髓，要弄得你家破人亡而后止。

上面所举，只是个人所知道的一点情况，远不足以暴露汝城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欧阳泗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馬变”后反动派在常德的屠杀片断

（一）

一九二七年上期我在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初級中学教书。我們上課約莫两个多月时，外面风声突然有些紧张。到五月二十三，有一位朋友董慧田从长沙回桃源，路过常德，告訴我們长沙发生了政变（即馬日事变），可能波及常德，要我們小心在意。

第二天吃了中飯，我提着一个梵阿鈴，準備到儲新中學去上課（我在該校兼課）之後還給人家。當我正向總辦公室走去時，忽然聽到槍響，看見很多人（包括師生員工）在一條長廊上舉着手。還有很多學生像潮水一樣向教員室奔跑，其中有人喊我：“陳先生，不要走了，回房裏去吧！”這時外面槍聲響得愈來愈緊，許多教員和學生都躲在教員的飯廳裏。於是我們問：“剛才大家都在總辦公室前面舉手，是為什麼？”他們中間有人告訴我：剛才是公安局長帶領幾十名槍兵，把校長胡佐武、教務主任陳觀祥和訓育主任張仲芬捆起來了；公安局長舉着手大聲地對大家說：“我們劇共，擁護國民黨，你們贊成的就舉手！”他看見站在那裏的人都舉起手來，就說：“你們都舉手贊成，這就好了。”說完就把胡校長和兩位主任帶走了。

約莫過了兩三個鐘頭，學校內的緊張空氣才稍為緩和下來。有一位工友走出去探聽了一下外面的情形，回來對我們說：“學校頭門口站了一排兵，架有機關槍，教職員、學生和工友一律不准出入；街上還在放槍。”我心想，既然不能出校，那就在學校裏等着看罷。

吃晚飯的時候，教數學的陳炳麒提醒大家說：“外面還在戒嚴，說不定我們這裏晚上還會發生什麼事，大家睡覺惊醒一點。”又有人對我說：“老陳的房間在教員室的頭門口（我們住在東邊教員室，可住二十來個人，自成院落，故有頭門）、有什麼事他先聽到，我們就聽他的動靜好了。”我接受了這個任務，說：“大家都惊醒一點，有動靜我准來通知你們。”晚飯後不久，我就和衣早睡，等待着突如其來的事變。

到半夜時，果然聽到有人敲我們的頭門，我立即起來，在樓上樓下喊醒他們。大家都沉不住氣。有一位姓任的黨義教員（湖北人，忘其名）倒很鎮定，他說：“等我去看看，你們等我的回信。”他走後不到十分鐘，氣呼呼地跑回來說：“我一開門，兩個兵帶着我向前走，走到理化教室前面，又見兩個學生被捆在那裏，要連我一齊

押送出校，我趁他們沒注意，向黑處一鑽，就跑回來了。情形不好，我們要走。”

向哪里走呢？大家都沒主意。有一位老工友楊慶對學校環境熟悉，他領我們經由廁所打開一扇多年沒開的後門，走進一條又窄又長的死巷子，直抵一棟私人住宅的後牆。大家在這裡凝神斂氣，站著等天亮。這時夜深人靜，外面的槍聲清晰可聞。

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那位老工友來告訴我們：校內的情形已經好了一些，要我們回去吃早飯。早飯以後，工友又來報告：學校頭門可以進出了，愿走的可以走；最好莫穿中山裝，換上長衣，莫系皮帶。我當即換上長衣，離開學校到我的一个亲戚家去。十字路口還站著崗哨，對行人進行檢查，發現我的皮褲帶，便盤問起來：“你是不是黨部、工會、農民協會的工作人員？”我說“不是”，“那麼你是鄉里的土豪劣紳躲進城裏來的吧？”我正苦於沒法過關，連忙說“是”。這才讓我通過。

大約下午三點鐘的光景，一位工友把我的行李送來了，他說：“胡校長已經槍斃了，你知道麼？學校裏的情形亂得很，你的東西搬回來保險些。風聲還是很緊，在城裏好像關的一籠雞。我打算在今天回桃源去。”等他走後，我連忙把兩套中山裝沉在井里，又把一些宣傳共產主義的書刊燒了。這時，忽然聽得敲門，那位替我送行李的工友的聲音在高聲地喊：“陳先生、陳先生、快開門咯！”我心里想：他大概是出不了城，到我這裡來睡的。當我把門打開，只見四個槍兵把他捆著，見我出來，就問：“他是陳先生麼？”得到肯定的答復以後，就把我捆起，先搜全身，後搜行李和全家，除從口袋裡搜去了鈔票十元以外，沒有搜出任何于我不利的証據，就把我和工友一起帶走。這時我暗想：今天的問題是“剿共”，我既不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沒有拿到我的任何証據，大概不會把我怎麼樣。因此我心里很坦

然，以为和他們的长官一說，問題就可解决。但当槍兵押解着我走到小西門拐彎的地方，我心里不免一惊：小西門外校場坪是个刑場，难道就要送我到那里去槍斃嗎？然而走到小西門口，他們却把我帶上了城樓，我这才松过一口气来。槍兵把我系在一根柱子上，向他們的长官报告：“連长！第二中学的教員捉来了。”連长面向工友說：

“教員捉到了，沒你的事了，你走罢。”这时城楼上有很多被捉来的男女学生正在受連长的检查和审讯。当他問到一个学生自認是共产党时，就被拖去槍斃了。輪到問我：“你是第二中学的教員嗎？”我說：“是的。”“那你就是共产党。槍斃！”我說：“我沒加入共产党。”“我們都調查清楚了，第二中学是常德共产党的大本营，教員都是共产党，你哪里會沒加入？”“連长，你誤会了，第二中学的教員有很多不是共产党，不独我不是。”“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我可要杀你这个共产党。槍斃！”說罢就吩咐押去执行。正在解索时，一个伙伕来报告：“連长，晚飯熟了，吃过晚飯再去槍斃吧。”于是又把我系在柱上。我当时感到求生已无希望，只有一心待死。他們吃了晚飯就来解索。我向連长說：“連长，我有一个請求。”“什么？写遺囑么？”“我請你允許我見一見你們的熊旅长（震）。”“你見他作什么？你和他有什么关系？”“我和他姪儿是同学，今年正月我还在长沙見過他。你說我是共产党，我說不是，你不信，只有熊旅长知道我冤枉。見了他，你对我的誤会就会消除。”連长一怔：“听說你們全体入党了嘛。”“那是集体加入国民党呀。”連长又思索一下：“你真不是共产党嗎？”“真不是。”“你找得到鋪保嗎？”我知道事情有轉机了，忙說：“找得着，要几家有几家。”他又思索了一会，脸色由严肃变为和易，對我說：“我告訴你，今天‘剿共’，我有絕對斬杀权，杀人可以不上报。但是我也不想冤枉杀人，你既不是共产党，那你就去罢。”他亲自为我解綁，我對他道了謝，就走了。

事變當天，槍聲一响，槍兵四出，到處殺人。街上行人走避不及，遭難的人不少。有兩種人是很难倖免的：一種是穿中山裝的。如老鴉池街口正大洋油行的一个少老板蔣某（忘其名），平日喜欢吹洋号，那天，他穿着中山装，正拿着一只洋号在街上走，刚走到他鋪門口，便被槍杀。一種是佩帶証章的。我有一个朋友魯榮甫，在常德南門外大河街开烟鋪，这时正开完会回家，看見前面一群槍兵吆喝着一个人，要他站住，从他身上查出一个証章来，就喊“跪下”，对着他背后就是一槍。魯榮甫很机警，老远望見槍兵吆喝，已把自己的証章甩了，等到槍兵要他站住时，身上沒有查出什么来，槍兵仍喊他跪下，他知道一跪即死，便央求他們：“我是个老百姓，沒犯法，要我跪下干什么？”正危急間，另一槍兵說：“他沒証章，算了，我們走罢。”他脫險到家以后，向他母亲磕了一个头說：“今天捡了一条性命。”

(二)

育德女学是常德一所成立很早的女子高等小学，我愛人早年在这里讀書，馬变时在这里教书。一天正在上課，一个軍官帶領便衣来校指名逮捕三位女教員——刘璞、陈兆森、邓良慧和一个不滿十五岁的女学生左协元。除邓良慧已往他校上課，得以聞風逃脫外，其余三人全数被捕。接着又在东門外一家刻字鋪里逮捕四位女青年，其中一位名叫熊琼仙，是个小学教师；一名曾素貞，只十二岁，都是汉寿人；另外二人忘其姓名，也是教小学的。連同上述三人共七人，都关在常德县政府監獄里。經县长审訊一次，就以“當場拿获、証据确凿”的“共产党”罪名判处死刑，电省請示。在批示未到以前，县长的妻子亲往探監，向她們說：“你們的罪是重大的，但是县长会保全你們。你們現在安閑无事，替我編几件毛綢衣，好嗎？”她們以为“救星”来了，巴不得有效勞“贖罪”的机会，大家都滿口接应，

忙得指肿腰酸。隔了几天，这位县长太太又来催她们赶快把毛衣打好，說是不久可以出獄。她们赶着把县长一家大小几口的毛衣編好送去，指望即可恢复自由。誰知第二天天亮时，一群凶惡的槍兵走进牢里来捆绑她们。她们一見情形不对，就七个人紧紧地相互箍在一起，死也不肯松手，边哭边叫：“我們就这样死在一块吧！”当她们被綁赴刑場时，那个不滿十五岁的学生左协元的父亲拿了三百元，紧跟着刽子手追，把錢向他口袋里一塞，說：“老总，那个胖胖的女孩子，請你槍下留情！”这个槍手真有本領，槍彈从她右頸表皮擦过，只出了一点血。旁觀的人中有人喊：“这个女的沒打死。”槍兵們怕泄密，連忙解下身上的皮帶，把群众驅散。她父亲立即把她送到东門外广德医院治疗，对外只說死了，大家也信以为真，无人追究。抗日战争初起时，我爱人一天在街上碰着她，不由大吃一惊：“你不是左协元嗎，怎么沒有死？”她才把个中情形从头至尾和盘托出。

那个十二岁的曾素貞，曾由汉寿公法团体和士紳具保，說她沒到法律負責年齡，請求释放，也沒批准，开亙古槍杀幼女之先例。

(三)

一九二八年，我教书的那个第二初級中学已改为省立第三中学，我仍蝉联任教。

快放暑假时，一天半夜里忽然来了一队槍兵，把住前后校門，一个軍官带着四名揸駁亮槍的兵入見校长陈鎮襄，要他交出国文教員胡际虞（名叔尼），說明是奉湖南清乡司令部密令逮捕，并出示电令。陈校长只好将胡际虞交出。胡被捕后，当日解省。虽經亲友多方营救，也无效果，不久即被杀害。現在省博物館的藏品中还有清乡司令部宣布他的“罪状”的石印文告。

陈镇襄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馬变”后岳阳的白色恐怖

岳阳自一九二六年夏季北伐軍过境以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下，革命群众运动发展很快。革命群众团体如总工会、农协、学联、妇联以及各行各业的組織相继成立。革命党人还接收了旧的团防武装、改組成为农民自卫軍，举办农运訓練班，以为深入民主革命的准备。

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敌人也沒有睡觉。只是由于岳阳为武汉的后方，强大的叶挺師駐在武昌，岳阳如有不安，叶師可迅速南下鎮懾；同时岳阳駐軍——三十五軍（軍长何鍵）第一師（兼師长叶琪）的周磐、周希武两个团的一部分——中有少数共产党员干部，可与党的领导暗通信息。因此，敌人一时尚不敢公开活动。但反革命势力已經钻进了国民党的领导层。原来在“馬变”前，岳阳就有“左社”的組織，其中重要分子有联中校长包澤兰（华容县人）、国民党县党部委員王品三（后改名王裕先，解放后被鎮压）、高鴻鈞、县立高小教員邓蒲青、县中教員李鴻湘等。他們的反革命面目虽經共产党人在群众大会中揭露过，他們的組織却沒有遭到有力的打击，仍在繼續进行活动。当“馬日事变”的反革命逆流到来时，这班家伙就成了岳阳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謀臣策士。

“馬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省会的反动派头子就通知岳阳駐軍团长周希武逮捕岳阳的共产党员，并寄来黑名单一紙。周希武的团指导員张天一系共产党员，見到这份名单后，当即告知国民党党务特派員、公开的共产党员刘士奇，轉告一些担任革命团体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即晚躲避，轉入地下。当时周希武等部的任务是加强对武昌方面叶挺師的警戒，以掩护許克祥等在长沙的反革命

軍事叛變，所以他們在岳陽還沒有立時發動對革命群眾的屠殺。

當許克祥等在省會成立所謂“救黨委員會”的消息傳到岳陽後，聚集在縣城里的地主豪紳反革命分子李鎮湘、戴紹先、高懷邦等即在駐軍的支持下公開出面活動，組織岳陽縣“救黨委員會”，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權。隨著省“救黨委員會”的迅速消失，岳陽縣的“救黨委員會”也很快為所謂“改組委員會”“黨務指導委員會”之類的反革命組織所代替了。到一九二九年何鍵取得湖南政權，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暫時告一段落、岳陽城防反復易手的局面結束後，岳陽地方的反動派即成立清鄉委員會、剷共義勇隊，全力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進行瘋狂的屠殺，統計在“馬變”以後一個時期慘遭反動派殺害的革命同志有姓名可查者達四百零九名，其中絕大部分是何鍵統治時期犧牲的。至於遭反動派屠殺的革命群眾，就更無法統計了。

“馬日事變”後，縣屬各區鄉地主豪紳對革命群眾的反攻是十分猖狂的。城區反動派在“馬變”後不久即成立挨戶團，以加強其反革命統治，鎮壓革命人民。是年七月，縣挨戶團副主任（縣長徐漢標兼主任）王柏生（解放後被鎮壓）率兵到湖濱雙十學校（原美國教會所辦湖濱大學，因一九二六年雙十節時北伐軍進入岳陽，美帝分子离校，遂改此名）搜查，在糞缸底下搜出革命標語，當即捕去學生袁進賢等七人。袁終被殺害。一九二八年秋，聯中教員劉光燦被捕，關押達三年之久。此外，被捕、被殺的人還有不少，可惜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

中區包括郭鎮市、新開塘、麻塘、簍口、商溪街等地。岳陽第一個以反共起家的軍人閻仲儒（新開塘人），出身於保定軍校，大革命時期，流落武漢，“馬變”前，得一旧官僚黃某慫恿，回到臨湘桃林地區，大肆活動，拉攏地方各色反革命分子，陰謀組織反革命武

装。“馬变”后，岳阳农民自卫軍奉共产党湖南省委令調往长沙反击反革命叛变，行抵新墙河，忽又奉命停止南行，内部发生不稳，閻即乘机收繳了农民自卫軍的槍枝，并繼續进行招兵买馬，自封为岳阳、平江、临湘三县清乡司令，大肆屠杀、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杀了不少的人，还有許多人被他害得傾家蕩产。如新墙富商唐某的儿子唐曦明系共青团員，“馬变”后逃亡在外，閻即借此勒索他家光洋五千元，迫使完全破产才予了案。閻以屠杀革命人民有功，不久即被何鍵委充旅长。中区的挨戶团主任张华府，队长周勉之、李昇武等，也都是出名的屠杀革命群众的劊子手。麻塘的挨戶团队长张慈伯曾捕杀农运积极分子潘光第、潘光閻兄弟。

南区大地主多，“馬变”后他們的反革命活动也表現得最为凶残。地主楊芝荃任挨戶团主任时，曾指使其队长刘内刚恣意屠杀，乡里称刘为“屠夫”。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間，他率团队与平江农民游击队作战失利，竟将平江岭川地方的农民多人抓来槍杀，割下头来祭被游击队打死的团丁，并挖取被害农民的心肝作菜飲酒，其灭绝人性，令人发指。閻仲儒的舅子費隐之于馬变后任新牆、柴家湾、鹿角等地区挨戶团主任，他一上任，就将在黄沙街做过革命工作的胡伯顏逮捕，綁在屠案上砍死。西区君山、广兴洲一带的豪劣金潤生、龔錫运、刘孝棠（均于解放后被鎮压）、黎督純（病死）、刘孔鈞（逃亡）等在“馬变”后即結合起来，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鎮压。大革命期間曾在广兴洲做过农民运动的姜丽甫（麻塘人），于一九二八年被反动派杀害于岳阳县城，其家屬运尸回乡安葬，抬到南津港时，金潤生等聞訊赶来，割去姜同志的头，挂在岳阳樓小渡船碼頭示众数日。金潤生等还在一九三一年間伙同何鍵手下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段珩在广兴洲和华容交界处的桃花山（游击队根据地）进行过一次血腥大屠杀。北区梅溪市、洪山、西塘、白湖垸一带在

“馬变”前夕，曾为閻仲儒匪部所事扰。“馬变”后，閻的喽囉潘宗玉繼承其反革命衣钵，在这个地区进行更为猖狂的屠杀。一九三一年，他被何鍵提升为岳阳县挨戶团副主任（县长侯厚宗兼主任）。是年四月，岳阳县苏维埃主席徐春浦同志在北区芝麻坳被潘亲自率队捕获，解往岳城，被杀害于火車站旁。春浦同志临刑时，神色不变，高呼革命口号，表现出革命者至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郑汉晋

何鍵統治湖南初期的一次黨潮

——國民黨“反小組織”和“小組織”的內鬨

文任武

(一)

自“馬日事變”以後，湖南國民黨由“救黨委員會”先後改變為“整理委員會”、“改組委員會”，至何鍵任湖南主席時，早又變為“指導委員會”。招牌雖一變再變，其組成人員總離不開彭國鈞、李毓堯、張炯、王鳳喈、劉岳峙、陳嘉任、羅介夫、陳大榕、蕭逢蔚、謝祖堯、曾省齋等。其中彭國鈞、張炯、李毓堯、王鳳喈等四人，則是四個所謂“不倒翁”。他們形成了一個小集團，借黨營私，排斥異己，異常驕橫跋扈。劉岳峙則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理人，手法也相當高。他與彭國鈞等是貌合神離的。先是，在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間，國民黨“指導委員會”曾搞了一次黨員總登記，由於有些黨員不滿彭張等人的把持黨務而拒絕登記，黨內的矛盾就逐漸加劇。當時，我和湖南大學教授伍憲宏、鄒曼支，以及國民日報總編輯易家鉞，省立一中校長吳劍真，育才中學校長龔心印，建設廳科長李先教等人都是國民黨的黨員，想在省黨部分一杯羹而不可得。因而对彭國鈞等的把持操縱黨務很不滿意。

李先教早想要搞省或市黨部委員，曾經托我和曾筱岑找劉岳峙和曾繼梧（湖南省政府委員兼全省地方自治籌備處長）為他關說。

刘表示自己沒有力量，主張还是請曾繼梧向彭國鈞提出。我素知曾繼梧的个性，決不愿代人关說这一套。但为了答复李先教，一九二九年三月的某天下午，我仍邀曾筱岑同訪曾繼梧。曾留进晚餐。席間閑談，我着意把話題引到李先教想当省、市党部委員的問題上来。曾說：“华南（李先教別号）也想做党棍子嗎？”我說：“华南最恨彭张等把持党务。”曾說：“难道他要去闖轅門嗎？刘梅斋（刘岳峙別号）早就說过，彭全方（彭國鈞別号）他們在湖南搞了一个什么小組織，岂容外人插足！”我說：“正因为如此，凡是国民党员都可反对他。”曾問拿什么去反对。曾筱岑乘机揮毫对我說：“你是国民党员，而且做过党官，你也可以出来講話，到必要时，和华南去闖闖他們的轅門也未尝不可。”曾繼梧正色地說：“党官还馬馬虎虎，党棍子則万不可做。”由于曾繼梧在湖南有較高的威信，他的言行在当时是能产生影响的。我們知道他討厭党棍子，也沒有反对所謂闖轅門的話，我意味着即使动武的話，他也是会支持我們的。我把这情况告訴李先教后，他便跃跃欲試。于是反对彭、张等小集团的活动就逐渐酝酿起来。

（二）

一九二九年二月，何鍵利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蔣介石的矛盾取代魯滌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掌握了湖南軍政大权，又想把党权抓到手里来，以实现其封建割据的野心，但事实上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何鍵从来没有插手党务，而操縱湖南党务的彭國鈞、张炯又是与魯滌平有較深关系的人，拉撤不易，打垮更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这些反对彭、张集团的人們，自然成为何鍵爭取利用的对象；且在爭取利用我們的同时，还有爭取利用曾繼梧的双重作用。因为何当主席不久，桂系軍事失利，他又弃李、白而投入蔣介石的

怀抱，他不能不重新考虑与鲁滌平的关系，特别是与行政院长譚延闓的关系。他知道魯是譚延闓安置在湖南的亲信，魯之被逐，必为譚所不满。为了弥縫他与譚、魯之間的感情，并达到稳定湖南政局的目的，他一向对魯滌平的上司又与譚延闓私交很深的曾繼梧（曾任第三軍軍长时，魯为曾部团长）恭维备至，想利用曾为他向譚、魯讲点好話。当他想插手湖南党务的时候，发现我們这些反对彭、张集团的人，許多是兼任了曾繼梧的自治筹备处的职务的，如易家铨和我是自治筹备处的科长，我并深得曾繼梧的信任；伍意农和邹曼支都在自治訓練所兼了課；李先教則是曾的同乡和老部下。爭取拉攏了这些人，自然又能对曾繼梧起包围作用。因此，何鍵的亲戚殷德洋（当时任湖南电政管理局长兼清乡司令部宣传处长与何鍵的日文翻譯）忽然大肆活动，他利用与吳剑真等的留日同学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与我們这些人交往起来。虽然殷的活动比較圓滑，除一般应酬之外很少涉及其它，但我們还是隱約知道他有所图謀，不过話未明說罢了。一九二九年的四月四日，殷忽約我和伍意农到他家午餐。我們从中午一直談到晚飯上桌，殷才吐露一点何鍵對我們所寄托的希望，并再三囑咐要絕對保密。我当时表示須与李先教他們交換一下意見再答复。过了两天，我首先找李先教談。李本是有心人，有了这个机会，他当然是欣然乐从的。李认为殷代何鍵表示的不夠具体，必須开誠相見，談得更具体些。他更认为光是何鍵还不行，必須曾繼梧出面支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說我和曾的关系頗深，同时我所任职的自治訓練所有八百多学生都是国民党員，是一支可以爭取的力量，因此，在当时的朋輩中我的条件較好，要我下最大决心，放手去干。李并向我发誓，表示不論事态鬧到什么程度，决不袖手不管或臨陣退縮。

我与伍意农随即把李先教的意見轉告殷德洋，并通知一些人准

备开会商讨。四月上旬的某天，我們首次在魚塘街天乐居旅社集会，到李先教、伍意农、胡翼如、左国雍、邹曼支、吴剑真、易家铨、殷德洋和我等九人。原来，我們早有鬧轅門的打算，但手无寸铁，对于軍警可能的干涉是有所顾忌的；何鍵若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一点就可放心了。当时大家精神都非常振奋。会上，我們把彭、张等的集团称为“小組織”，把我們自己一方称为“反小組織”。伍意农事先草拟了几項办法，大家进行了一番討論之后通过了。大意是：

(1) 我們对內的名义叫做“中国国民党湖南反小組織指揮部”，对外則用“湖南省国民党黨員反小組織代表會議办事处”的名义；

(2) 目的是以肃清党内派系，坚决打垮并解散为彭国鈞、张炯、李毓尧、王凤喈等所盘踞的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另行改选成立正式的湖南省党部；并要彭、张等交出“小組織”名单；提送党的监察委员会严加惩处，以肃党纪；

(3) 凡参加“反小組織”的党员在进行活动时所付出的任何代价或損失，概归各人自己負責，組織不予酬偿，但各成员有参加各項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4) 凡屬集体行动必需的費用，推定专人负责，統一筹划开支；

(5) 在“反小組織”成员中推定三至五人組成主席团輪流担任主席；

(6) 发传单、貼标語，暫以彭国鈞、张炯、李毓尧、王凤喈为打击对象。

我們取得一致的意見后，随即就組織分工进行了如下的部署：

(1) 推派我和李先教、疏通曾繼梧，要求他出面主持正义；

(2) 决定殷德洋联系省会警备司令李觉（何鍵的女婿），要求他随时暗中协助；

(3) 所需費用暫由殷德洋負責筹措，归殷德洋和伍意农經手收

支；

(4) 正式行动时，需要人力和器械等问题，由殷德洋和我相机解决；

(5) 邹曼支、吴剑真、胡翼如、易家铨、左国雍等负责收集“小组织”方面的情况；

(6) 其他临时发生的问题，由我和伍慧农、李先教共同处理，并暂推我负常驻责任。

会上，大家怕何键过河拆桥，认为何键应正式参加“反小组织”。殷德洋则认为以何键当时的地位，这样作诸多不便。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军政方面负责的国民党员，得因职务关系委托全权代表参加“反小组织”活动。所谓军政负责人，骨子里就是指何键，而全权代表自然就是殷德洋了。虽然如此，到会的人还是耽心，大家要求与何键直接碰头，谈好条件，再行合作。当一致推举伍慧农为谈判代表，因为他是湖大教授，又学过外交，担当与何键面谈的任务最为恰当。

会后，我和李先教去游说曾继梧。曾认为我们以党员身份反对党内派系是可以的；只要我们行之以正，要他出面讲几句公道话也是可以的。但他也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受任何人利用，以免贻人口实。从此，我们进一步获得曾继梧的支持。同时，殷德洋也已和李觉取得联系。伍慧农则由殷德洋陪同去何键私宅与何晤谈。据伍回来告诉我们，他很坦率的向何键提出了不能过河拆桥的意见，并请在行动方面予以支持。何认为反对党内派系是完全应该的，表示愿从旁助一臂之力，要我们大家不要怀疑和顾虑。伍说，何键还要我们多向曾继梧请示、联系，何认为如得曾出来主持公道，事情就更好办。我们得到何键的这一答复，更加勇气百倍。

除预定联系的人都取得联系外，当时长沙教育界有原由熊亨翰

(熊与邹曼支、易家铨为留日同学，曾任育才中学教务主任，也是极端反对彭、张的。教联会的胡翼如、周勺泉等颇受其影响)所发起的“长沙市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由复初中学校长胡翼如领头出面声援“反小組織”，为我们增加声势不小。此外，党校学员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也是支持或同情“反小組織”的。我们的斗争也就由秘密酝酿走上公开行动的阶段了。

(三)

四月中旬，一切有了头绪，我们就开始发动政治攻势。某日拂晓，长沙的通街要道都贴出了许多打倒彭、张、李、王等人的标语。当日没有反响，次日仍寂然无声。第三天，代表国民党省党部的中山日报才刊出一条新闻。略谓：近日在本市墙壁上发现有反动标语，显系奸徒所为，希望治安当局注意及之，云云。在“反小組織”方面则认为声势还不够，搞不出什么名堂，必须大张旗鼓，才能掀起反对“小組織”的高潮。乃通过集议，决定首先向中山日报开火。四月下旬的某晚，由清乡司令部职员、帮会首领刘岳晋带队，百余人直捣中山日报，当将排字房全部捣毁。由于我们事先决定，如对方不抵抗，只毁物，不伤人，所以该报总编辑陈介石、经理曾省斋均安然无恙。中山日报被捣毁后，彭、张集团才从自治训练班的学生傅家圭（后任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常委，中统骨干分子）、彭家友（后任浏阳县党部常委，CC分子）、丁学礼（后任醴陵县党部常委，CC分子）等的密报，获悉“反小組織”的活动情况。彭、张等知道这次事变是有何键的暗中支持的，他们想先遏止事态的扩大，再图应付办法。于是，彭国钧首先去找李觉交涉，要李制止“反小組織”的公开捣乱。事后，据殷德洋告我，彭找李交涉时，李认为这不是公共治安问题，而是国民党的内部纠纷，党权高于一切，可由党方

自己解决。彭被这个橡皮钉子碰起火来了，严詞厉色地对李說：李司令既然知道党权高于一切，現在我就代表党命令你即刻将搗乱暴徒逮捕；李又表示对于彭的口头命令无法执行，因为他的上級机关是省政府。請彭逕向何鍵交涉。彭見李竟一点不卖眼，乃憤憤冲到省政府去質問何鍵，問何鍵对于暴徒貼标語、打中山日报的事是否也有所聞。何答以微有所聞，但托詞說他只負行政、軍事責任，对党务方面的問題不便干預；并表示在他职责以內的事情可以照办，如果是省府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就只有請示中央处理。于是彭提出逮捕暴徒的要求，并将与李竟交涉的經過告何。何滿口同意照办，但要省党部将暴徒名单备函送去，以便提交省府會議通过执行。彭以为可以紧急处理，不必提交省府會議。何又表示案情属于党内糾紛，未便輕率从事。彭反駁說：这分明是暴徒搗乱，怎能說是党内糾紛呢？何最后表示，暫不研究是非，还是要求省党部备函去省府，再研究处理或請示中央。彭見何态度坚持，悻悻而去。随在省党部召集紧急會議，密商对策。

搗毁中山日报的第二天下午，何鍵电话約曾繼梧晚上八时在自治筹备处会見。曾以告我，并囑我迟点回去。何果准时而来，曾陪他在筹备处里話雨軒密談。約一小时后，曾叫我进去对我說：“刚才何主席談及党的糾紛，你把起因、經過及要求尽情談一下。”于是，我就大放厥辭地說了一通，大意是說彭、張等在党内制造派系，把持党务，企图借党营私，引起多数党员不滿，曾一再要求省市党部解散他們的“小組織”，提早成立党的正式机构，无如他們坚持不改，以此引起糾紛。解决的办法，只有取消“小組織”，另行改选，組織新的机构，并交出“小組織”名单，按党紀分別輕重进行惩处，則一了百了；否則，我們决不罢休，更无协商的余地。曾說：“党外可以有党，党内不能有派。过去刘梅斋也对我談过，彭全方、张星舫

这几位先生在中央党部某些人支持下，在湖南組織了一个什么“小組織”，究竟内幕如何，我不清楚。如果真有其事，那是應該反对的。”何接着說：“凤老（曾繼梧号凤岡）的說法我很同意，不过这次站在‘反小組織’方面的人都是国民党员嗎？”我說：“不是国民党员就不会过問这回事，更不会对他们采取积极行动。这一点我可以向主席和处长負責。”我出来約半小时，何才辞出。何走后，我又去問曾：“何来除为党的問題外，还談了一些什么？”曾說何要他写信給譚延闓，替他向譚表明几点：（1）他負責反共防桂；（2）軍費尽量做到自給，以減輕中央負担；（3）湖南党务糾紛，由中央党部派人来湘解决；（4）厅处人事問題請譚安排，他絕對遵办。曾并說呂苾筹（譚的秘书长）不日会回长沙，他将把何的意思托呂轉达。从这里不难看出何鍵为什么要对曾繼梧表示恭順的原因。

五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方觉慧来湘了解党务情况，順便調解党务糾紛，因为我們双方都不肯讓步，遂无結果。方走后不久的某天，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員肖逢蔚突然来到自治筹备处，找了十几个与他有关系的自治訓練班的学生，如傅家圭、彭家友等談話。他想以威吓手段把站在“反小組織”方面的学生一齐压下去。傅等引他到一个教室里公开演說。他左一句“党紀”，右一句“暴徒”，正談得起劲时，不料学生中有人站起来大呼：“肖逢蔚滾下来！”有人高叫：“这就是暴徒！”随着喊声，許多学生一窝蜂地冲到講台上把肖拖下来，声声喊打。肖吓得脸无人色。学生中有人倡議說：“不要打他，把他关到廁所里去，臭死这个党棍子！”傅家圭等看到众怒难犯，赶忙奔向处长室找曾繼梧。适曾外出，由秘书邓葵之接談。邓責怪肖来演說，事前沒有和处长商量一下，以致事情鬧得难以收拾。但仍劝解同学将肖释放了。肖仅受微伤。曾繼梧回处时，邓向曾报告情况，曾点头而已。次日，彭国鈞一再来找曾繼梧談这次糾紛和

肖逢蔚受辱的事，并硬說侮辱肖的事是我主使的，要求将我撤职，将行凶学生开除，均不得要领而去。事后曾对我說：“彭全方找我，来势很凶，但他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我看这回事，你們是不会有好收場的。何荃樵（何鍵別号）比彭、张等人还坏得多，你們要当心些。”事实确实也如會所說，我們原想利用何鍵一下，不料結果反为何所利用。

（四）

方覺慧来湘調解不成，彭、张感到形势不好，隨即派了夏开权赴南京，与罗介夫、王祺等密謀倒何拥魯（滌平）。除求助于譚延闓外，并囑通过胡元倓（胡当时在南京）去联络湖南教育界的陈潤霖等一致声援他們。“反小組織”方面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自己在地方的条件虽优于彭、张集团，而在中央却有敌强我弱之势。因此，有些人产生了动摇情緒。某天晚上，大家聚議于天乐居。李先教、邹曼支、易家鉞和我主张坚持下去，反对散伙，动摇的人最后还是趋于一致，决定搞个一不做二不休，布置即日行动打市党部。

先是在捣毁中山日报后，“反小組織”应殷德洋之請，曾召开一次临时會議。会上殷建議由清乡司令部職員何国柱、刘岳督两人任行动队长，指揮战斗行动（实际就是何鍵布置的）；并认为自治訓練所八百多学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力量，应当积极爭取。我也极力主张先邀約少数学生参加“反小組織”。會議一致同意，并推邹曼支、伍惹农和我去发动組織这些学生，結果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反小組織”，为进一步的暴力行动創造了条件。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下午三时，由何国柱、刘岳督带队直捣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当时市党部正在开会，各方面来人很多，被突然而来的袭击，打得越牆而逃，伤李余、文斌等十余人。彭、张等

对市党部被袭击事，愤怒万分。除函电交聘向国民党中央告状外，并向省政府提出严重质问。中央对此也重视起来，八月初，特派鄧悌来湘处理。彭、张等要求将李先教、易家铨、伍意农和我开除党籍，并撤职交法院处分，其余听候中央处理。“反小组”方面还是要求改组省、市党部，交出“小组”名单由中央从严惩办。鄧悌两头奔走，多方劝说，因双方都不让步，也不得结果而去。尔后，“反小组”不断在大公报及国民日报揭露彭、张等借党营私的种种劣迹；彭、张等则利用中山日报大事反攻。武打变为笔战，双方旗鼓相当。

八月中旬，我因别事奉曾继梧命到南京见了譚延闓。譚順便談及湖南党潮問題，說胡元倓、陈潤霖、彭国鈞等都写了信給他，措詞与旅京湘人王祺、罗介夫等的請愿书如出一轍。并說他們都認為是何鍵搞的鬼。所以蔣介石决定要改組湖南省政府，并将再派人到湖南来查办。最后他囑我注意并轉告曾繼梧留点神。我回湘后，把譚的話轉告李先教。李暴怒說：“老子非干到底不可，砍了头碗大一个疤！他們上下为奸不講理，老子也来个橫冲直闖不認人，充其量不过坐牢和砍头！你有胆量嗎？”在李暴怒的情况下，我虽別有心情，但也只好答应說：“好极了！”

八月下旬的某晚，我們聚議于天乐居，与会的人大都慷慨激昂。惟我因在南京被譚延闓泼了一瓢冷水，覺得如果违背譚的意旨，繼續坚持下去，会把譚的这条門路断送，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其次，曾繼梧再三叮囑提防被人利用，因而也有顾虑；第三，那时何鍵已附蔣倒桂，奉蔣命統兵永州，湖南省主席职务由曾繼梧代行（何达到了所望于曾的又一目的），我深恐党潮責任落到曾一人身上，于心不安。我在会上几乎把自己的消极心情和盘托出，但遭到大家的反对。尤其是一向胆小的殷德洋，这次居然表示坚决异常。他說：“要干就干，哪怕流血亦在所不惜，打死他們几个人或自己牺牲几

个人也沒問題！大家要槍有槍，要人有人，怕什么呢？”由于殷的态度坚决，空气更形紧张。會議决定打省党部，并成立“临时省党部”。

曾繼梧听说我动摇了，单約我到他家里去談話。他說：“筱岑告訴我，說你对‘反小組織’的活动想中途而废。我认为不好。凡做事不成則敗，斤斤計較得失，則无事可为。尤其是有害于团体的言行更不應該。譚延闓浇了你的冷水，我今天又向你說了这一些，这都不是‘反小組織’的成败关键。你怕什么呢？所要注意的，就是拿定宗旨，莫被人利用。你大胆干去，我不会袖手旁觀的。”他这些話，在当时听来的确是义正詞严，說得我面紅耳赤，只說了一句“感謝处长”，就告辞而出。

我們分途布置。在天乐居开会作出决定后的第三天早晨，“反小組織”方面动員了一百余人，仍由何国柱、刘岳督带头，直搗省党部。因時間甚早，彭、张等都沒有来，更沒預料到我們会来这一手；因此我們像入无人之境，所有省党部的办公桌、椅、屋瓦、門窗多被短棍、砖头、石块打得一場糊涂。并在街头、巷尾遍貼标語传单。彭、张等得訊，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同时长沙市吉祥巷大吉祥旅社牆上貼起斗大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省党部”字样。当时推定临时省党部的委員是：李先敬、伍蕙农、邹曼支、易家铨、胡翼如、左国雍和我共七人；以胡翼如、伍蕙农、左国雍三人为常駐委員；伍蕙农并为对外发言人。他主要是向新聞界宣布我們的宗旨是要坚持中央“党外容許有党，党内不許有派”的原則。大吉祥一时車水馬龙，儼然像个党衙門了。我們感到痛快已极。但为时不久也就随着“反小組織”的散伙而烟消云散了。

中央党部接到彭、张等的急电报告后，临时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議，决定派曾傑、王祺和鄧悌等三个委員来湘彻底解决湖南党务糾紛。他們来到湖南后，看到当时情况，认为对“反小組織”方面采

用高压手段是行不通的，因此只好接受“反小組織”方面的意見，改組省、市黨部，並申請中央加派何鍵、曾傑、王祺、鄧悌為改組省、市黨部指導委員會委員，籌備改選。經過几晝夜討價還價的爭吵，中央採取就鬼打鬼的做法，彭、張等也只好採取讓步的態度。選舉結果，何鍵當上了省黨部常務委員，达到了他利用“反小組織”反對彭、張集團的最大目的。而“反小組織”則從此散伙，大部分人依附于何鍵。我與李先敬、易家鉞、伍惹农等四人則被开除黨籍（並未宣布什麼罪名，而且到一九三一年省黨部改選，李先敬仍然當上了省黨部的監察委員）。我們被开除黨籍後，彭、張集團仍心有不甘，堅持要撤除我們的行政職務並送法院究辦。無如曾繼梧堅持不肯，何鍵也不能不為我們說几句话。彭、張等看到曾、何都袒護我們，恐過於堅持反于己不利，也只好見風收篷。

省黨部改選後，彭、張、李、王這四個“不倒翁”終歸還是“不倒翁”，但他們的“小組織”也起了分化，里面大部分嘍囉，原來預備走丁維汾路綫的（丁為國民党中央黨部委員，在北方組織“大同盟”，圖另樹一幟，到處擴張實力），看到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勢力強大，乃紛紛皈依了他們的CC集團。

事後，曾繼梧告訴我說，何鍵最近向蔣上了一篇披肝瀝膽的投降表，大有鞠躬盡瘁誓死效忠之意，並暗中獻厚禮于宋美齡，因此，博得蔣的歡心。蔣不但打消了改組湖南省政府的原意，而且讓何鍵當上湖南省黨部的常委。曾傑、王祺、鄧悌等之來，不過是過場鑼鼓而已。

湖南國民黨的內鬨，雖然暫時平靜下來，但依附何鍵政權的一派與依附CC的彭、張集團之間的矛盾，仍在繼續發展，不久以後，又爆發了所謂“甲派”和“乙派”的長期而激烈的鬥爭。

（民革湖南省委員會供稿）

补充与订正

关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片断回忆

彭子国 湯季倫 唐菊庵 張际泰

謝襄韓写的《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谈到一九二八年夏第六军驻扎醴陵时，部队人事调整情况。有一件事是他所没有谈到的。这年五月，程潜在汉口被桂系军閥扣押，在六军有悠久历史的李明瀾，不久也调离军职，由十九师师长胡文斗、十八师师长张軫升任正副军长。农历端午节前夕，全军集结浏、醴一带，准备向赣西移动。在醴陵附近集结的，还有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所辖的独立团（团长罗定，攸县人，过去和我在韶州耕武学校同学）和监护团（团长叶文科，醴陵人，原在第六军任连营长时，系我旧属）。当时，四路军总部因总指挥被扣，已无形瓦解。胡文斗、张軫为保全实力计，决定将这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师，隶属第六军。因为军的编制只有十七、十八、十九等三个师，故用教导师的番号。其人事部署如下：我由十七师副师长调代教导师师长，罗定为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叶文科为第二团团长。部队基础就是原来的独立团和监护团，并加上炮兵营、特务连。六月下旬，教导师按照军部所定全军向赣西移动的总计划，由醴陵出发，开抵江西莲花县境。后来又移驻永新。

教导师向赣西移动前后，罗定即秘密与何键（三十五军军长兼湖南清乡会办）勾结，叶文科也与鲁滌平（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

督办)暗中勾搭甚紧。罗、叶之所以与何、鲁秘密勾搭,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原来,罗定的部队是由攸县的地方团队编成的,在湘东清乡剿共期间,曾受何键指挥,这时何正野心勃勃,千方百计地扩充实力,罗自然成为他拉拢的对象;叶文科系第二军军官学校毕业,鲁滌平曾任第二军副军长,这时第六军处于风雨飘摇中,他正好借旧关系投效老长官,另谋出路。事后了解,罗、叶曾多次派人找何、鲁联系,何键并曾派代表到罗团接洽收编事宜。

同年八月,胡文斗在新喻被戕杀,张軫代行军长职务。他下令全军集结安福(十八师时驻安福,张軫兼师长),准备东渡。教导师由永新向安福移动。不料行至距安福三十里路处,罗、叶两团都抗命不再前进了。他两人对我说:东渡很危险,不能救住老本钱,我们决定回湖南去。接着,又将他们过去和何键、鲁滌平暗中勾搭的情况,坦率地告诉了我。我见大势已去。军心涣散,无可挽救,也就答应不再向安福进发,让他们各奔前程。不久,罗、叶两团分别归何、鲁收编,我自己也离开部队回到湖南了。由是,曇花一现的第六军教导师,遂告结束。

谢文谈到第六军入赣后,集结宜春,“由我电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请其允许我军暂驻宜春,并请拨款二十万元以维军需。朱在政治上是唯谭的馬首是瞻的,爱屋及烏,对于我们的请求完全应允了;但要我们派一个师移驻安福,担任地方綏靖。”(《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8页)按照这样的说法,朱培德有心维持第六军,是基于和谭延闓的交誼,爱屋及烏,誠意可感。其实不然,这个国民党军队是別有用心的。这是一笔有条件的政治交易,而不是无条件的真诚支援。

一九二八年四月到七月,正当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蒋介石调集江西、湖南的军队向湘赣边区红军进行围攻。红军以不

到四个团的兵力和国民党军队相周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湘赣两省的“会剿”，巩固了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次“会剿”中，朱培德调动了正规军一个师和一个旅，加上地方团队，共计有兵力四五千，疯狂进攻红军。结果完全被红军所击溃，损失很大。这时，赣西莲花、安福、永新一带广大地区完全空防，各县地方行政机构都解散了，军警人员逃避一空。当此惊慌万状的紧急关头，适第六军为形势所逼，向赣西移动，军需处于绝境（在湘东一带驻扎时，还可以向当地税收机关提款接济，入赣后地方行政机构瓦解，无款可提，仅靠向地方上摊派粮油蔬菜，勉强度日）。朱培德为了暂时利用第六军的力量对付红军，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因此，允许拨给第六军二十万元，以维军需。同时提出要第六军派一个师以上的兵力驻扎安福、永新之线（此时红军有一个团在永新打游击），担任地方绥靖。一九二八年七月，第六军十八师移驻安福，教导师经安福移驻永新，就是为的履行朱培德提出的条件。当时，朱培德还以命令式的口吻说过，第六军不要乱动。只要专心一意地帮助剿共，其军需餉弹随时可由江西省政府接济。朱培德以二十万元收买第六军投入反共战争，要第六军官兵为他拼命，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彭子国

二

一九二八年，我在第六军十七师第一团担任中校团附。现在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对《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发表的谢慕韩所写《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作如下的补充。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间，我由南京到汉口，回到第六军工作。李明灏时任第十七师师长，发表我为该师第一团（原四十九团）中

校团附。当时十七师共辖三个团，易維揚、彭亚尧、黎盛邦分任一、二、三团团长。其中第一团一、二、三营营长为彭杰如、刘名彪、罗炳正。

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六軍軍长程潜在汉口被李宗仁扣押，由李明灏代理軍长。这时第六軍部队分驻湘东平、浏、醴一带，軍部驻醴陵县城天主堂。不久，李明灏调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留住长沙。第十七师师长职务，由副师长周希武代理；十九师师长胡文斗，升代第六軍軍长。六月二十二日，即农历端午节，胡文斗约集团长以上軍官到軍部吃饭。胡在席間說明部队在湖南处境困难，将向江西移动，以求生路。并发布出发命令及地图等文件，决定第二天全軍沿株萍路出发。其时，我团驻扎在醴陵东門外城郊。二十三日上午六时，团长易維揚先集合全团士兵讲话，随后又对全团官佐讲话。两次讲话内容，都谈到第六軍将出发江西，另找出路。

易維揚对官佐讲话时，大家沒有表示什么意見。随后，三个营长把我邀到一个坟堆上，二营营长刘名彪首先說：“团附，我們不能到江西去，士兵带不动，大家都不想走。”我說：“刚才团长讲话时，你們为什么不做声，現在叫我怎么讲？”刘說：“三个营官兵都是一致的不想走。你要去跟团长讲，不讲不行！”他們这样逼着我，我无可奈何，只好去找易維揚談。易見面时也責备說：“刚才訓話时，他們怎么不讲，你喊三个营长来。”結果决定，全团开回城內去，不随軍行动。当軍部的一列軍車开过以后，我們的队伍就开进城內，团部驻在天主堂。就在当天晚上，易維揚突然把我扣押了，关在天主堂的一間小房子里，派有槍兵看守。第二天，我写信給他，問他为什么要扣押我。他叫一个副官来告訴我：“全团不准照軍部的命令行动，是你主战的，你要負責。不然，昨天为什么三个营长一致要求不开动。”这个副官接着說：“团长认为你还老实，来团又不久，主要是不

熟悉情況，因此，暫時請你委屈一下。”過了三天，易維揚又派副官來開釋我，並對我說：調查結果，證明這次事件與你無關。同時，發還了我的行李，送了光洋十元作路費。我隨即離開了醴陵，仍然回到南京。事後得知，易維揚在扣押我的時候，還扣押了三個營長。這是羅炳正被開釋後在南京告訴我的。他並且說，當時三位營長的意見，我如果不轉達易維揚，或者易不接受意見，我和易一定死於敵彈之下。

關於彭亞堯的情況，我比較熟悉。他是寧鄉人，號夢庚。一九二三年，他任湘軍葉開鑫部二十五團（團長朱耀華）中尉旗官，被保送到廣東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第一期受訓。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後，由於第六軍十九師師長楊源濤的輾轉推薦，經鮑羅廷顧問介紹我們兩人到蘇聯去留學（其時，彭任十九師上尉連長，我任江右軍總指揮部上尉參謀）。我們到達蘇聯後，因介紹手續沒有辦妥，又被退回來了。我們回國以後，仍然回到第六軍工作。

一九二八年夏，第六軍軍部駐醴陵。彭任十七師第二團團長。端午節那天，代軍長胡文斗請團長以上軍官吃飯，飯後分發出發命令及行軍地圖。彭亞堯領了地圖以後，秘密跑到胡文斗房裡，對胡說：“周副師長（周希武）靠不住，部隊不容易帶走。”胡文斗听了，不假思索地下令，周希武撤職查辦。彭亞堯升任副師長，代行師長職務。彭拿了胡的一紙手令回去之後，就交給周希武看，並假装很關心地問他怎麼辦。周為人渾厚老實，在部隊里有“周婆婆”之稱。他看過胡文斗手令後，稱彭為恩弟，對彭說：“你讓我走開算了。”彭仍然一本正經地說：“你不要走。你的生命安全，我負完全責任。”於是，他把周希武安置在附近的一個小廟內，派兩個勤務兵照料。名為保護，實則看守。就這樣玩弄兩面手法，輕易地由團長升代師長。彭部原來駐紮醴陵一條小河（河名記不起来了）的東邊。如去江西，

不要过河。当第六軍向萍乡进发时，他忽然把部队带到河西，构筑工事，对东警戒，与軍部的行动背道而驰。

从上述情况看出，程潜被扣后，李明灏又继之离开了第六軍，整个部队顿失维系的重心，以致内部意见分歧，行动不能一致，并且发展到自相残杀的地步。这是第六軍最后被蒋介石彻底消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江西发动兵变，刺杀胡文斗的团长蔡雄，号道为，又名燕生，攸县人，也是大本营讲武学校第一期第二队学生。他讲一口攸县土话，为人粗鲁到极点，作战却十分勇敢。胡文斗被刺几年之后，我在长沙和他见过一面。从谈话中了解，他在胡文斗被刺之后，即脱离部队，到杭州的一个著名佛寺（好象是灵隐寺）做和尚，放下屠刀，吃斋念佛。两三年后又还俗了，改名换姓，回到湖南。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闖下那么大的祸（指戕杀胡文斗）？”他说：“本来只想把胡文斗捉住的，没有打算杀死他。我带了一连人配合特务营冲进軍部，我的几个马弁，冲进胡的房间，见面就开枪，竟把他打死在行军床上”。这显然是蔡雄推卸罪责的谎言，不可置信的。蔡还俗后，曾在福建充任保安团长。抗战期间，他带着妻女请假回来，在路上翻车，全家死亡。

湯季楠

三

《湖南文史資料》第四輯所載謝慕韓寫的《關於“東征”“西征”和第六軍被消滅的片斷回憶》一文，其中有與事實略有出入的地方，茲就我所知道的提出訂正如下：

（一）謝文談到一九二七年春，蔣介石第一次消滅第六軍，“其作法是，先命令第六軍隨同第二軍渡江，追擊孫、褚部隊。當第六

軍過江完畢，又命令第十九師回師南岸。蔣已先就南岸預伏部隊，等該師進入其包圍圈內，即予以消滅。”據我所知，這與事實有出入。當時，我已隨程潛總指揮到達漢口。問及後來逃到漢口的官兵，都說第六軍是在南京城解散的，並未聽說過奉令隨第二軍渡江，又回師南岸，然後被包圍消滅。據亲历其事者杜森泉（臨武人，當時任第十九師五十五團軍需，曾目睹部隊被解散）最近對我說：關於第六軍第十九師當時被解散的情況，雖然事隔三十多年，記憶猶新。第六軍原駐采石磯一帶擔任江防守備。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到總司令部的命令，開赴蘇州補充整訓。次日早上開動，步行到城內神策門就停下來。當時，在神策門內各有一長列的火車車廂，所有官兵和裝備等等，于下午陸續運載上車，停車待命。不意于當晚（四月二十七日）十點鐘左右，在毫無戒備的狀態中，賀耀組（獨立第三師師長兼南京衛戍總司令。程潛離南京後，賀已被蔣介石收買）突然持蔣介石解散部隊的命令來到各團營直接下達（當時第十九師師部駐南京城內三元巷）。當賀宣布命令時，五十五團第三營營長劉名彪（醴陵人，北伐時負傷，割斷了左臂）憤怒地責備賀耀組，說，我們第六軍參加北伐，是勞苦功高的部隊，為什麼要被解散？賀耀組突遭詰責，無話可答，僅說，這是總司令（指蔣介石）的命令，你們只有絕對服從，趕快繳械。各官兵知已在嚴密包圍中，如果貿然抵抗，必遭嚴重犧牲，只有繳械而已。這個部隊就是在神策門內火車車廂中解散的。（另據張際泰同志回憶，他的那營是在棲霞山附近車廂上解散的。由此可見，第六軍的被解散，不是集中一地進行，而是分散宰割的。）當第十九師被解散的前夕，約在四月半間，蔣的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曾召集第六軍團官以上的官佐“訓話”，對第六軍的北伐功勛，各致贊揚。並說，蔣總司令對你們十分關切，並不因為程軍長到漢口去了，而存有芥蒂。你們大家儘可安心供職，不要

心存疑慮。关于你們的安全問題，我可以向你們作保證。如果我有欺騙你們的話，你們可以隨時用手槍对付我。云云。白的這番話，听來似乎很懇切，應該是可以信任的。因此，第六軍各級官佐，都信以為真，不虞有他。后来第六軍被蔣解散了，大家才明白白崇禧的講話原來是個大騙局。

(二)謝文叙述第六軍軍部駐江西宜春，弑杀軍長胡文斗的是軍部特務營營長黎某。这与事实也不符。当时，第六軍軍部系駐江西新喻城里天主堂，非駐宜春。杀害胡文斗的特務營長，不是黎某，而是李伯坤（长沙人）。胡文斗被害的当天晚上，軍部副官長蕭昌烈，睡在胡的对面房間里，当听到槍声时（午夜一点钟左右），立即披衣起床，走出房間，睡眼朦朧間，不知出了什么乱子。正在紛扰中，有一个軍官模樣的人（他至今不知道是誰），閃了一下手電筒，知是蕭某，随手拉他到后面院子里去站着，叫他不要动。待乱兵散去后，蕭才逃出軍部，走到“同春行”（妓院）躲藏起来。事变后第三天，李伯坤在同春行找到了他。初見面时，李对蕭表示痛悔，說：事到如今，没有办法，請你出来收拾残局，維持地方秩序。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虛与委蛇地和这伙叛軍周旋了两三天，才設法秘密逃出新喻。事后了解，蕭的安全，是李伯坤事前有計劃地安排的。因为李系大本營訓武学校第二期学生，蕭是大隊附，有師生之誼，存心照顾，未予加害。这是蕭昌烈同志最近在病中亲自对我說的。追記于此，可补謝文之疏漏。

唐菊庵

四

第六軍虽是在反对封建軍閥的北伐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部队，但因它本身也还是一个旧部队，内部矛盾重重。程潛长軍之日，他的

个人威望高，领导强，全军的团结没有多大问题。程潜被桂系军阀扣押后，第六军群龙无首，内部矛盾迸发，部队迅速瓦解，致蒋介石消灭第六军的阴谋得以顺利实现。

程潜被扣后，李明灏（十七师师长）奉令代理第六军军长。他曾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同第六军多数中下级干部有师生之谊，且因他是湖南人，与第六军历史关系深，获得一班中下级湘籍干部的拥戴。大家都希望他能设法团结全军保存第六军实力，使程潜早日恢复自由，免使大家陷于前途渺茫的境地。但是张軫（十八师师长）、胡文斗（十九师师长）对李任军长，却不是心悦诚服的。他们在程被扣消息传到六军时，都曾暗中派人去武汉活动，企图争夺军长位置，目的未达，乃公开抗命，不服从李的指挥，使李大感灰心失望。有一天，我同六七个团、营长在讲武学校同学朱继唐家闲谈，恰好李明灏也来了。大家谈论到第六军的去向问题时，李很感慨地说，“颂公（程潜号颂云）革了十几年的命，竟得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全没有一点是非，令人寒心。现在上面叫我来负责，大家又不听指挥，各行其是，第六军又怎么能够保存下去呢？我看，不如将现在所存两万多枪架在状元洲（潋水河上的一个小洲），一把火燬了，大家解甲归田，个人还能保全！”当时，我们坚决反对他这种悲观论调。我们说：丢了棒槌，狗都会咬。六军是颂公费了很大的心血搞起来的，从前在馬坝（韶关县）时，我们穷得没有饭吃，颂公卖枪吃饭使部队维持下来。我们从学生、排长搞起，出死入生，干到现在，怎么能够中途散伙呢？你不干，我们干，打死了算了！我们这种保存第六军的愿望，并没有得到他们军师长的重视。

李明灏因张、胡不服从他的领导，愤然辞去了军长职务。李去职后，胡文斗代理第六军军长，张軫任副军长（仍兼十八师师长）；同样，张軫对胡的领导也不心服。当部队进入赣西后，胡率十九师

駐袁州，張率十八師駐安福，兩人就已貌合神離了。張對胡在部隊供給方面的作法頗有怨言，認為胡厚於十九師而歧視十八師，因而在部隊行動方面就不服從胡的指揮。胡文斗正部隊進入江西後，堅持迅速東渡贛江，轉入福建，依靠程潛的老朋友楊樹莊（福建省政府主席），以保存第六軍，但張軫却想將部隊拖往河南。胡終不顧張的異議，獨自率部向新喻前進。

第六軍的中下級幹部多系湖南人，其中不少是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出身的，當程潛被扣後，大家都感到悲憤，特別是關懷六軍的存亡問題。部隊何去何從，既沒有及時召集幹部會議，共同商討，只是由少數幾個士官、保定出身的領導幹部密商決定，且未取得一致的意見，去向目標不明，更引起了中下級幹部的疑懼不安。一些與湖南地方實力派有個人關係具有強烈個人野心的團、營長，這時就各找關係，自謀出路。

首先發動叛變、脫離第六軍的是十七師第二團團長彭亞堯。彭為湖南寧鄉人，講武學校出身，與魯滌平有同鄉之誼，與張輝瓚有舊屬關係。經魯滌平勾引（魯許以師長職位），當部隊由醴陵入贛前夕，即陰謀驅逐張、胡，並擬於必要時，將部隊拖往湘西，以待時局變化。他在端節前夕，約張、胡到他團部（駐離醴陵縣城不遠的丁家坊張家祠堂）過節，擬乘機以武力強迫他們離開第六軍。屆時，胡未往。彭恐陰謀敗露，不敢發動，只得臨時弄了一些菜飯將張敷衍一頓了事。第三天（六月二十三日），部隊向贛邊進發，十七師三個團在彭亞堯的策動下投向了魯滌平。

彭亞堯還同時策動了十八師第一團第三營營長陳增鴻的叛變。當十八師開抵湖贛交界處的白兔潭時，陳即率部脫離六軍。我營連長周中予為彭亞堯表弟，經彭串連，他也企圖與彭一致行動；因下級官佐和士兵傾向於我，他拖走部隊的陰謀才未得逞。

陈增鸿与我同乡同学。他叛变时，曾带着他的副营长彭溪源前来威胁我一致行动。当晚，他们率兵冲进我的卧室，恰巧我睡在室外，他们没有找到我。我惊醒后，当即集合全营官兵，晓以大义，军心才稳定下来。

陈增鸿的叛变，震动全师，使上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了。张軫平日拘限在少数几个日本士官出身的干部的小圈子里，对非士官出身的干部总不大信任，曾两次企图将我调走，均为程潜批驳不准。而我平日与所属官兵关系密切，与一班同学的团、营长也多声气相通。当晚，张得知陈增鸿叛变情况后，对我颇存顾虑，即紧急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以稳定军心。我也就在这时被升为第四团团长。张軫的意思是想借此将我同所属官兵隔离开，使我不能纠众异动。

当部队进入江西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正苦于湘赣边区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希望第六军留驻赣西协同“围剿”。这时，第六军驻袁州、安福的六个团也摆出了参加“围剿”的态势。十八师第一团第二营曾在安福西南六十里的水柏（系小地名，可能有误）与红军战斗一昼夜，击退了红军的围攻，但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第六军的去向不定，一般中下级干部感到很苦闷，甚至有人还谈论过投向红军的问题。就在这时，十九师的张毅中团（驻袁州）和教导师的罗定团与叶文科团（驻安福）又被何键、鲁滌平勾引，先后拖回了湖南。

叶文科与我同乡。叛变前，他曾企图串同我一致行动。当时，十八师第一团第二营正困于水柏，张軫令我前往指挥，将该部带回。我回安福途中，过叶团驻地，他告诉我鲁滌平要他将部队拖回湖南，并许他任十八师师长，要我同他一致行动，任十八师副师长兼团长。我当即劝他说：“我是在第六军长大的，现在颂公被押在汉口，我们不能拆他的台。六军整个部队在湖南都站不住脚，一两

个团拉回去有什么用？結果还不是被人家吃掉。我們必須團結起来。如果你一定要走，我自不能勉强，以后我們可以保持朋友关系。”一两天后，叶文科就率部叛变、拖回湖南去了。

这样一个团接一个团的叛变，愈加深了官兵的思想混乱，加速了第六軍的瓦解。不久，又发生了胡文斗被杀的事件，这样，第六軍的复灭就成了定局。

唐蟒是老六軍的參謀长。他个人生活腐化，但馭下寬和（中下級干部称之为“有求必应”）；因胡文斗等士官出身的青年軍官怕他妨碍他們的晉升而对他存有嫉忌，加以白崇禧从旁煽动，致被从第六軍挤走，但他一直未忘情于第六軍。这时，他到了南昌，派大本营訓武学校毕业的刘效謀、周正宗和李某等带着一笔現款、药品和他致各团长的慰問信到第六軍活动，并致电张軫、胡文斗，說要回六軍同大家“共患难”。胡文斗当时坚决反对；张軫因与胡不协，沒有明白表示意見。但唐蟒的活动，受到一般中下級干部的熱誠欢迎。

第十九师第三团团长蔡雄也是訓武学校出身的。胡文斗任团长时，他就在胡团任營长；胡升师长后，他被升为团长。他一向怀有个人野心。当胡任軍长后，他自认为胡所遺师长一职理应由他升充。但胡却以同学关系派士官出身的张寿芬代理十九师师长。他对此大为不滿。加以过去胡文斗对他态度粗暴，积怨在心。一經唐蟒串通，他就公然与徐煥湘等发动兵变，指使駐新喻的特务營长李伯坤将胡击毙于天主堂軍部駐地。（按：《湖南文史資料》第四輯載謝慕韓文內称“蔡雄、徐煥湘等与軍部特务營长黎某等发动兵变，黎某当系李伯坤之誤。”）

蔡雄等发动兵变杀死胡文斗后（不久他就將該团拖回湖南），曾向各师、团长发出快邮代电、称“奉圭公（唐蟒字圭良）令，将胡驅逐，胡抵抗，为兵所誤杀。”张軫得訊，即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对策；

会上，他正式表示拒絕唐蟒回第六軍。当时，許多中下級干部对张軫拒絕唐来頗为不滿。

胡文斗被杀后，十九师第一团团长张天一为了推卸責任，指該团两个營长彭清邦、游艺为蔡雄同謀，将他們交給张軫。张拟于举行追悼会时，将彭、游槍决，以祭胡文斗。經我同几个講武学校的同学坚决反对，张始罢手。彭、游的生命虽然得到保全，但有些講武学校出身的湘籍中下級干部却从此对张軫的领导更为疑惧不安，軍心也更加涣散了。这时，整个第六軍还轄下十八师四个团（缺一營）、十九师两个团和一个炮兵团，由张軫率領，分两路在樟树鎮、峡江渡过贛江。

胡文斗死后，唐蟒并没有立时打消回六軍的念头。张軫不得已，只好要他留在南昌同朱培德周旋，为六軍借餉，并洽商假道过境等問題，借此挡駕。朱培德曾一再表示不愿六軍东渡贛江，也不愿意唐蟒回到六軍；所以，他对六軍这些要求，始終只作表面应付。张軫率部进抵樟树后，曾胁迫該鎮商会主席和各大商号老關，分途紧急筹款，三日內得光洋十万元。

当部队离樟树鎮前，我曾用电话向张軫請示部队行期，他叫第三团团长张鴻儒回答我說：“师长的意思，叫我們在南昌佳宾楼过中秋节。”电话当被朱培德部所截听，朱大起恐慌。恰好这时金汉鼎的第九軍已从南京浦口赶回江西，朱即合王均、金汉鼎的第三、九两軍之众，突然执行蒋介石消灭第六軍的密令。张軫在樟树筹足十万元的当晚，就率部开动，向宜黄疾进。十九师也由代师长张继良率領，由峡江渡过贛江，向宜黄进发。当十八师一开动，王均部即出动截击。时，第一团居前，师部与第二、三团居中，我团居后。当第一团通过后，第二、三团与师部遭敌截击，当被打散，随行的十万元光洋担子也丢失大半。十九师一路行进尚称安全，抵宜黄后，

两师残部合为一路行军。当部队进抵南城附近毛牌时，我团居前，又遇劲敌。过宜黄时，我知道十九师内部又出现不稳，行军环境又极为困难，更感到仗不能再打了，乃建议由我团掩护，余部迅速绕道由南丰转入闽边，但张軫却仍想打进南昌筹款。经过一夜战斗，全军损失惨重，十八师三个团、十九师两个团全部被围缴械，张軫等也跑散了。我率部死力突围，进入福建建甌地区时，全团只剩千人和七百余枝枪了。三日后，张軫才带着参谋长等人来会。

当时张軫主张将缴下来的枪全部交给当地驻军卢兴邦。我不同意。过了几天，我们得李隆建从上海来电，嘱将全部武器交给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俾程潜早日恢复自由。我们只好照办。张軫遂通电下野。卢兴邦托张軫转送了我们两万元，由我率领残余官兵由福州乘轮转往上海。

至此，第六军遂为蒋介石所彻底消灭。

張際泰

对南岳游干班、西南干训班史料的订正

熊 壯 猷

《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载《关于南岳游干班的回忆》、《西南干部训练班及突击队》两文所记史实，尚有某些遗漏和个别错误。兹就个人记忆所及，提出以下补充和订正。

《关于南岳游干班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南岳游干班学员队共办了七期，而不是五期；除学员队外，还办了两期军士队和学生队。一九三九年九月，该班在南岳办完第二期后迁零陵，是因房屋不够用，于年底再迁祁阳山川塘，在这里共

办了第三、四期学员队（三个月一期）和第一期学生队（六个月一期）。这时，全部员生合编为一个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队。第一大队为学员队，其中第一、二队为军官队，第三队为党政队。第二、三大队为学生队，系招考在学和失学、失业的男女青年组成，女生集中编为第九队。另有一直属于总队的第十队，系在南岳时专门训练特务人员之第五队的继续。一九四〇年八月，该班再迁修水漫江，至次年八月，又先后续办了第五、六、七期学员队，第二期学生队和两期军士队。

在这阶段的初期，李默庵为了进一步贯彻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并为迎合和结好于陈诚，不惜压抑其多年的骨干分子刘嘉树，将刘原任之总队长职务让给政治部主任戴之奇兼任（原文误为戴子琪）。戴之奇，贵州人，系陈诚手下的一名忠实走卒和反共急先锋，后任整编九十六师师长时，在淮海战役中被击毙。在第二期时总队长杜聿明未到职，刘嘉树以教务处长兼总队长，及被调为班部办公厅主任后，乃称病零陵。戴以政治部主任兼总队长后，对中共人员展开磨擦，渐至公开诋毁，迫使他们无法继续留下来。所以在办完第三期后，约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前后，他们便全部离开了游干班（原文误为皖南事变前夕才离开）。迁漫江后，刘嘉树曾被改任副教育长，未到职；后因出任第五军副军长，副教育长一职，改由湘鄂赣边区副总指挥王劲修兼任。戴之奇后调边区总部参谋长，其政治部主任遗职由刘公武接充，总队长初以边区第五纵队司令尹立言兼任，不久又先后改派万绍成、周淘漉担任。

关于《西南干部训练班及突击队》的补充和订正。

（一）南岳游干班是一九四一年九月迁回祁阳并改为西南干部训练班、开始编组突击队（原文误为一九四〇年六月）。一九四二年一月（原文误为一九四一年初），英军到达祁阳。一九四二年四月

底，第一突击队（缺一、二两营。辖英軍指揮部及其所屬英軍三、四、五队），乘火車由祁阳出发，开赴緬甸，以腊戍失守，統帥部急令湘黔鐵路沿綫各站截留第一突击队列車，旋奉令原車回祁阳。五月（原文誤为一九四一年夏）又开往江西靖安县邱家街，归入第九战区序列，由长官部直接指揮。一九四二年九月（原文誤为一九四一年冬），英軍自邱家街撤退；同年十一月（原文誤为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第一突击队（缺一、二营）自邱家街开浙江仙居，西南干訓班也同时分批由祁阳开往浙江丽水。

（二）原文称第一突击队司令部成立时，軍委会政治部即派李承恩为突击队政治部主任。此說与事实有出入。按第一突击队司令部的編成系在部队出发緬甸之直前。在此以前，各营屬西南干訓班之第一总队。司令部編成后，营、連各級虽均有政工組織，但司令部初无政治部，只有一政治督導員室，直到一九四二年冬在浙江仙居时始正式設立政治部，由国民党軍委会政治部派蕭輔之（邓文仪的老师）为主任，原政治督導員李承恩为副主任。

（三）第一突击队参加四明山的反共战争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夏。这时正是新四軍三、五支队把张俊升、田岫山两纵队打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在当地官僚、地主的呼叫求援下，李默庵令第一突击队派了突击队第四、五两个营进入四明山，归第五营长陈士瀛指揮，并派政治督導員李承恩率領一部分政工人員前往。但只搞了两个多月就返回天台。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冬。那时，新四軍三、五支队在四明山区日益壮大，官僚、地主的叫嚣也更凶了。浙江省參議會正式提請要第一突击队开进四明山担任“剿匪”任务，并决定成立“四明山剿匪指揮部”于天台。还成立浙东行署，由蔣介石的外甥、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长竺鳴涛出任指揮官。由于人事調动关系，延到一九四四年春，第一突击队（缺第

一營，留天台）便由新任司令羅覺元率領再進入四明山。五月，李默庵又調暫編三十三師師長周海瀾率所部第三團進入四明山，並任周為四明山“剿匪”副指揮官，設副指揮部於寺嶺，負四明山區反共指揮的實際責任。為了保存第一突擊隊實力，六月即令羅覺元率領突擊第四、五兩營返回天台。副司令王理直率突擊二、三兩營仍留四明山。十來天后，又趁日寇進犯麗水溫州，以增援為名把二、三兩營也調出了四明山。

國民黨湖南省黨校反共活動的訂正和補充

胡 菊 影

《湖南文史資料》第五輯吳劍真寫的《“馬日事變”後國民黨湖南省黨校的反共活動》一文中，轉引了黨校學生余琨在省黨校周刊第十、十一期合刊上發表的《本校同學剿共之經過》，其中載有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在白馬巷胡普生藥室內，拿獲胡秀影、胡淑媛二女犯，送交特別法庭。”等語。

按，這兩個人名都錯了。胡秀影系胡寄影之誤，胡淑媛系胡淑群之誤。事實經過是這樣的：

我的父親胡漢槎，向業中醫，並在長沙白馬巷開設胡普生藥室，經濟情況還算好。我原名胡再琮，現名胡菊影，胡寄影系我在被捕時的化名。“馬日事變”前，我在長沙含光女校第三班讀書，這個學校在長沙寶南街，當時有學生四百多人。我是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團的。“馬日事變”以前，長沙學生運動非常活躍，各學校的黨團組織迅速發展。這時，含光女校也秘密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黨支部書記是第二班學生張玉琴（慈利人，現在黑龍江省人委工作），我擔任團支部書記。

“馬日事变”发生后，整个长沙市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全省各地也展开了血腥的清乡大屠杀。我因在长沙立足不住，便逃往武汉，想另找出路，当时一同逃至武汉的同学，现在记得起姓名的有张惠琪（浏阳人）、潘陶（醴陵人）。不久，武汉政府也背叛了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我們在举目无亲、处境万分危险的时候，只好奔回湖南，約定各自回家，等待时局变化，再图活动。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由武汉回到长沙的。第三天（一月五日）下午，在药王街与舍光旧同学张翊笙（醴陵人，张翼鹏的姪女。原系共青团員，“馬变”前考入省党校）邂逅相逢，她见到我非常亲热，寒暄几句后，忙說：“我今晚到你家里細談吧，”当时我也很高兴，滿以为找到了自己人，可以了解在长沙的同志們的活動情况，不疑有他。殊不知她已在“馬变”后进了反动的国民党省党校，正在替反动派当特务，到处抓人。这天晚上，她帶領一二十个穿蓝布制服、全副武装的党校学生，如狼似虎地跑到我家，一进门便不由分說地把我和我的姐姐胡淑群（她並沒有参加过革命組織）捆绑起来。我們被捕后，立即被关进惩共法院的看守所（地点在长沙大官园）。这个看守所共关了一百多人，男女分別关押。每間女牢房关了六七个人，席地而臥，拥挤不堪；吃的飯菜也很恶劣。我和我的姐姐是分开关的，只有在下午“放风”的时候，才偶然能見到面，但不敢接触談話。

自从我們姐妹入獄后，家人焦急万状，多方营救。我的父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花了很多的錢，托我家对門的五福旅館老板张保生，向惩共法院院长唐孟侯、剿共队长唐季侯打通关节（张和唐氏兄弟是嫖賭朋友，交情很深）。不仅花了重金賄賂唐氏兄弟，連女監看守也送了厚礼。果然錢能通神，我們在獄二十多天，沒有受到严刑拷打。而其他的人，則受尽折磨，慘不忍睹。最使我难以忘記的是，长沙人湯翼（过去在东牌楼邊道会女校同学），因在审讯时受

踩槓子酷刑，双腿都被踩断，不能行动，反动派最后用籬筐把她抬到刑場杀害了，真是灭絕天良！一月十六日，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獄卒突然打开牢門，把我提出来，綁往法庭审問。当我走上法庭时，警卫森严，上面正中坐着一人，自称是“本庭长”，他問过姓名年龄籍貫以后，声色俱厉地对我逼供，要我供出組織情况及同党人的姓名住址等等。我在这个时候，还算能够力持鎮定，总是回答“不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組織”。他仍再三逼供，說：“你赶快坦白吧！只要肯自首，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否則，就会后悔莫及了。”任凭他怎样追逼，我还是回答“不知道！”他見反复威逼无效，又拿不出人証物証，才宣布退庭还押。我回到牢房里，同房的难友都为我捏一把汗，她們說：像这样五花大綁上法庭，向来是凶多吉少的，你今天还算幸运！

經過这次审問后，唐孟侯曾叫他的勤务兵来看守所找我談話，表示很关心，并問我需要什么东西，可以随时送进来。我知道他来意不善，严詞予以拒絕了。随后，唐孟侯又指使他的老弟通过张保生的关系，向我家提出两个条件：一、如能送他光洋两万元，可以把我們两姐妹释放出来；二、如果没有錢送他，就要我嫁給他做姨太太。这种无耻的要挟，也遭到我家父兄的严詞拒絕。

在我被捕入獄期間，含光女校教务主任吳日三、英文教員楊秩彝（現在均为省文史館館員）两位老师，曾多方进行营救，毫无效果。

正在走投无路的生死关头，西征軍进入长沙，形势有了变化，我才被友人营救出獄，时为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的姐姐也是和我同天出獄的。

前面提到的湯鬻案，即吳剑真文中轉引的，“二十八日，在麻园岭松园破获共匪机关，当场拿获共匪湯易襄、湯云衣、湯克三、湯鬻等四名，送特別法庭。”他們是四兄弟姐妹。并此附記。